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

信·息·管·理·系·列

图书馆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于良芝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C-0117.0101)

封面设计：

作者简介

于良芝，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英国拉夫堡大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副教授，《津图学刊》副主编。著有Public Library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合著者)、《中国经济学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合著者）等公开出版的研究报告，Studying e-journal user behaviour using log files: The experience of SuperJournal 等SCI或SSCI收录的英文论文，以及《从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社会环境》等中文论文。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ISBN 7-03-011659-3

9 787030 116598 >

ISBN 7-03-011659-3
定 价：25.00 元

21 世纪高等院校教材——信息管理系列

图书馆学导论

于良芝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的概述性著作。它将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整理和交流确定为图书馆职业的基本社会分工，将知识与信息组织整理的技术、理论，以及通过图书馆实现知识、信息传递的原理确定为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以此为出发点，以复合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的现实为背景，概述了图书馆职业进行知识与信息组织整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各类型图书馆进行知识与信息传递的基本途径、图书馆职业的知识创新体系和图书馆职业的哲学基础。

本书的主要适用对象是图书馆学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它对从事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人员也有参考价值，对希望了解图书馆运行原理、提高自身信息素质的其他学科人员也有裨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学导论/于良芝 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8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信息管理系列)

ISBN 7-03-011659-3

Ⅰ.图… Ⅱ.于… Ⅲ.图书馆学-导论 Ⅳ.G25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8124号

策划编辑：刘晓炜/文案编辑：邱 璐/责任校对：包志虹

责任印制：安春生/封面设计：耕者设计室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3年8月第一版 开本：B5(720×1000)

200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1/4

印数：1—2 000 字数：257 000

定价：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环伟〉)

自　序

1996年10月，我在英国拉夫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徘徊于立刻回国和暂时留在英国的选择之间，因为当时我丈夫正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很希望我能拖延一段，等待他完成学业后一起回国。在这段工作的间隙，我第一次萌生了撰写《图书馆学导论》的愿望。

这个愿望里包含着若干心愿。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将我所学的知识与国内同行和学生分享。四年异国寒窗，我的确学到不少新知识——拉夫堡大学图书馆这座知识殿堂曾给我这个学海拾贝的游子带来无数惊喜。我曾贪婪地阅读过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意义赋予理论以及历史较长的阅读理论等；也曾如饥似渴地吸收过研究方法、计算机技能、写作规范等一般技能。所有这些，我都渴望与国内同行和学生分享。

我的第二个心愿就是把国外值得借鉴的经验介绍给国内的同行。起初，我希望介绍的内容主要有三点。首先是西方图书馆职业的精神和哲学基础。西方图书馆职业精神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个人的人文思想、尊重理性的启蒙运动思想、追求平等及关怀弱势群体的社会主义思想等进步思想基础上的职业精神（详见本书第六章）。英国学者福斯克特（Foskett）曾这样评价这些职业精神及其哲学基础对图书馆工作的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哲学，那么我们就等于放弃了理性的指导，我们就会陷于维持生存、穷于应付的境地，就会缺乏源于我们对自身价值之信念的驱动力。"[1][注1]我曾从英国图书馆员身上看到了这些精神的魅力。尽管英国图书馆职业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曾濒临窘境——它的成员经常囊中羞涩，它的教育机构经常生源不足，它的图书馆经常经费短缺，然而，它的职业精神却使它一如既往地提供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图书馆服务，也使图书馆成为英国社会最受尊重和爱戴的机构。这种精神使我作为图书馆专业人员的良知受到深深震撼，我相信它们对我国的图书馆职业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其次是国外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discourse）。简单地说，一个领域的话语体系就是这个领域所采用的词汇、句子以

---

[1] Foskett D J. The creed of a librarian: no politics, no religion, no morals.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1962

[注1] but if indeed we have no philosophy, then we are depriving ourselves of the guiding light of reason, and we live only a day-to-day existence, lurching from crisis, and lack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an inner conviction of the value of our work.

及表达意义的风格。在我阅读了大量国外图书馆学论文和专著之后，我开始注意到，这些著述所采用的话语体系似乎都非常注重意义表达上的清晰、明确、透明、客观，因而大多数著述都能称得上字字有声，句句有意。这种话语特征，加上研究方向的务实和研究方法的严谨，使国外图书馆学的著述具有更饱满的意义（meaning）。我心有不甘地意识到，在我的祖国，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似乎更多了一些泡沫成分，它虽然不乏通顺、流畅，甚至优美的语言，却相对贫于意义，这使我们的很多著述颇像阳光下的肥皂泡，你明明能看到它光彩照人的魅力，但是当你试图抓住它据为己有的时候，它却从你的指缝间溜走了，不曾给你留下实实在在的东西。我相信，在话语体系方面，西方图书馆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再次是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我注意到，自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倡导图书馆学的科学化以来，国外图书馆学是顺着研究方法的大门步入社会科学殿堂的。从那时起，研究方法的严谨始终是国外图书馆学学术刊物录取论文的头条标准。我再次心有不甘地意识到，国外图书馆学著述更多地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而我们自己的著述则更多地建立在思索的基础上，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产生知识（knowledge），后者产生观点（personal opinion）。英年早逝的黄纯元博士在留学日本后，就曾这样反思他以前的研究："回过头看，过去（的研究）最多只能称为'写文章'，不能称为'研究'。因为那些文章中的几乎所有论据都是来自别人的文章，而不是来自'第一手'资料，如档案、调查。"[2]可见，他早已认识到，我们需要更大程度地推广规范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希望向国内同行介绍的东西也在逐渐增多，撰写《图书馆学导论》的愿望也更加强烈。2000 年回国后，我在南开大学主讲图书馆学概论课程，终于促使我把这一写作欲望付诸行动。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正是我过去两年多笔耕舌耘的结果。

很多人对这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很大帮助。南开大学资助了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为本书的内容和出版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我的硕士导师陈誉教授、博士导师 Ann O'Brien 博士和我做博士后期间的课题组组长 Ken Eason 教授都用他们的睿智和关怀给了我灵感和勇气。我的研究生刘文梅同学，不仅替我去中国国家图书馆复印了第一批参考资料，还多次批判性地阅读书稿，对内容和文字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的闫慧同学帮助整理了参考文献并编制了书后索引，马志琴同学帮助草译了书中的部分引文，庞佳同学帮助查找了书中引用的部分数据。我的其他学生——高军善、郝玉峰也都对本书内容提出过批评意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李桐老师和她的同事曾不厌其烦地为我提供资

[2] 范并思. 悼念黄纯元老师. 见：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料。我的家人在精神、时间和物质方面给了我不可缺少的帮助：我远在山东的父母对我多年不归给予了极大的理解，我的公公、婆婆几乎承担了我作为母亲的所有责任。科学出版社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巨大努力。对以上所有老师、朋友、家人、学生以及其他不能一一列举的同事和朋友们，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前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界面临十分紧迫的更新图书馆学概论性著作的任务。导致这种需求的主要原因在于，在这段时间内，图书馆职业环境和职业实践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求图书馆学教育对这个职业及其学科做出适应新形势的概述。在职业环境的变化中，有两大趋势最引人注目。首先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革命，即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相结合所引发的革命。至20世纪90年代末，信息技术革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图书馆的存在形态和工作模式——复合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以及我们的前辈闻所未闻的工作模式，如文献授权、虚拟咨询、即时文献传递，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就成为现实。其次是所谓的"信息社会"特征的逐步出现：信息产业迅速崛起、知识与信息在财富的创造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知识和信息被视作社会和组织的重要资源。社会的变化或许不像技术的变化那样先声夺人，但其影响却同样深远。例如：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我们的用户在满足情报需求方面已经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企业、组织甚至广大群众已经习惯于把知识和信息视作组织的资源而非公共财富。对于日渐独立的用户，我们的职业价值将如何体现？面对社会观念的变革，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又将何以为存？过去的十几年中，类似问题向图书馆职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促使图书馆职业重新思考已有的理论和哲学基础。上述变化，无论是新的工作模式，还是新的理论总结，都需要及时纳入本专业概论性著作的内容体系，以便将它们提纲挈领地传授给图书馆职业的从业人员和学生。

然而，这段时间却是图书馆学的概论性著作十分贫乏的时候。这种沉寂有很多客观原因，例如，一些曾对学科总结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学者，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辞世，无法更新他们曾经做出的总结，而有些创作集体（如《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的创作集体）则因涉及人员太多，几乎不可能再重整旗鼓。概论性著作的缺乏也有学科建设的原因。过去十几年，由于环境变化的冲击和概念体系的混乱（试想因"情报"改"信息"而产生的混乱）等因素，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步伐不是加快了，而是放慢了，这就决定了过去10年图书馆学学科总结可资吸收的素材是比较贫乏的，这种贫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近年来出现的少数概述性成果的创新程度。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在总结我国和世界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我国图书馆职业队伍提供新的关于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的概述性介绍。它的具体目标如下：

第一，为立志从事图书馆职业的初学者提供适应新时代的专业基础知识。它

希望让初学者了解图书馆职业的使命和价值、职业活动依赖的核心技术和方法、与职业活动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职业知识体系(即图书馆学)的创新和应用、职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等问题,从而为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打下基础。

第二,帮助初学者了解图书馆职业的专业特长和职业精神。图书馆职业的专业特长是指从事图书馆职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这不仅包括组织、传递人类知识和信息的原理及技术,也包括运行、管理图书馆的知识和技能。图书馆职业精神是指图书馆职业的信念和追求,这不仅包括现代图书馆职业的先驱(如杜威、爱德华兹)所秉承的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信念,也包括新一代图书馆员所倡导的信息平等、互助合作、技术创新精神[1](详见第六章)。从 19 世纪末以来, 西方图书馆职业教育始终致力于既培养专业特长,又传授职业精神[2,3],其目的是使学生不仅能在未来的职业活动中发挥专业才干, 而且能够在职业面临挑战的时刻正确选择前进方向。本书希望借鉴这一职业教育传统。

第三,帮助初学者理解从事专业技术职业(图书馆员与医生、律师等同属这类职业)必须具备的务实精神和科学精神。这里的务实精神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职业实践必须切实满足社会需求,对图书馆职业来说,就是满足社会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二是指职业研究必须服务于职业实践,或解决职业的现实问题,或为职业活动提供具有解释力、预测力的理论,或为职业交流活动提供规范化的术语;三是专业技术职业的话语(discourse,即词汇、句子及表达意义的风格)应该传递实在、明确、具体、透明的意义。"科学精神"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图书馆学研究者应该按科学方法追求知识创新,从数据收集到理性分析, 都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不把观点 (opinion)、猜测 (conjecture)、个人经验当成科学理论接受;二是指图书馆实践者要尊重科学发现,积极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书希望对已有的图书馆学概论教材做若干方面的改革。与以往的图书馆学概论性著作相比,本书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本书调整了图书馆学概论教材的体系结构,新的体系结构主要基于作者对图书馆职业分工和图书馆学核心内容的认识。本书认为,图书馆职业的基本分工是组织整理知识、信息,并通过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传递知识和信息;与此相适应,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知识、信息组织整理的技术和理论,以及通过图书馆

[1] Owen D. An idealist's charter for public libraries. New Library World. 1995 , 96 (1120) : 6～15

[2] Wiegand W A. The socializ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tudents: reflections of a century of formal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Library Trends, 1986(winter): 383～399

[3] Loriene R. Personality, tradition and library spirit: a brief history of libsarian education. In: Loriene R, Brooke S E, 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Mansell, 1998: 1～15

实现知识、信息传递的原理(详见第一章)。根据这一认识,全书包括三大部分内容:①基本概念;②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整理、传递;③图书馆职业建设。第一部分讨论了从数据到知识,从图书馆到图书馆职业等学科基本概念,并为以后各章内容提供了起点;第二部分涉及图书馆职业的基本分工和图书馆学的主体内容;第三部分讨论了职业本身的建设,包括学科建设和哲学基础及职业精神建设。

第二,本书力图将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相结合,这种结合既体现在全书的结构上,也体现在各章节的处理上。从全书来看,本书既包含以图书馆专业知识为主的章节(如第二章至第四章),也包含以职业精神为主的章节(如第六章);从各章节的处理来看,本书既介绍了职业技术背后的哲学基础,也介绍了图书馆哲学思想在职业技术方法上的体现。

第三,本书力图改变以前图书馆学概论教材重学科意识、轻职业意识的特点,更加突出了图书馆职业的建设问题,如职业哲学问题,相对减少了图书馆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比例,如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的争论。

第四,在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增加了一些新内容。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特别是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二是"信息社会"及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新内容既包括新概念(如复合图书馆等),也包括新理论(如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新方法(如元数据编码方法)。

第五,对尚有争议的新问题,如职业范式和学科发展方向(第五、六章),本书采取的是"提出问题、讨论分歧、不做结论"的处理方法。这样处理的目的:一是为了客观地综述各家之言;二是为了培养学生通过批判思维,自己得出结论的能力。

第六,对涉及区域的问题(如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演化过程),本书改变了国内、国外分别处理的办法,而是试图在每个问题上都确立一个主线或基本视角,以此为基础,对国内外做一体化讨论。这样处理的目的是把我国的问题放到世界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避免孤立地看待我国的问题。

第七,本书对现有同类教材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删减。它首先删去了关于图书馆学学术流派的内容。本书认为,以往划分的图书馆学流派其实主要是图书馆职业哲学的分歧。这种分歧所影响的主要不是整个学科的研究范式,而是图书馆工作的实践模式。一个图书馆员可能终生没有著述(因而不属于任何学术流派),但却可以拥有明确的哲学信念。因此,本书从图书馆职业哲学的角度重新分析了这些分歧,删去了对学术流派的划分。本书还删去了其他同类书中常见的"图书馆事业"一章。"图书馆事业"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很多场合,它也是一个很方便的术语,可以用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图书馆相关的一切方面:不仅包括各类型图书馆、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方针政策,也包括图书馆资源、图书馆用户、图书馆工作方法、图书馆的作用和影响。或许正是由于这个概念的宽泛外延,有些学者便用它来概括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

象就是图书馆事业[4]。本书认为,如此宽泛的概念,犹如一个盛满珠宝的盒子,里面的每一分子都有独立研究的价值,若用一章以蔽之,难免失之笼统,而当我们把它的成分一一单独研究之后,它本身也就失去了独设章节的必要。因此,本书在介绍了各类型图书馆的目标、活动、功能、政策、管理、合作等内容之后,便不再专设“图书馆事业”章节。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介绍了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包括数据、信息、知识、文献、图书馆、图书馆学、图书馆职业;第二章介绍了知识和信息组织整理的原理和技术,包括分类、描述、编码等;第三章介绍了图书馆的演化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留给当代图书馆职业的经验教训;第四章介绍了当代主要的图书馆类型,包括它们的目标、用户、文献体系、活动及功能、管理体制和组织、绩效评估等;第五章专门讨论了图书馆职业的学科建设问题;第六章则着重讨论了图书馆职业的哲学基础问题。对数字图书馆的讨论贯穿上述所有章节,以帮助学生连贯地看待历史,全面地理解印刷与数字世界并存的复合图书馆现实。

本书主要适用于图书馆学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它对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人员也有参考价值,对希望了解图书馆运行原理、提高自身信息素质的其他学科人员也有裨益。

虽然,作者为实现本书的目标竭尽全力,但由于认识水平和时间的限制,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带着它的雄心和它的局限,此书或许会给人留下“志大才疏”的印象。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决定勇敢地把它献给读者。如果它的目标能获得同行的共鸣,如果同行的批评能缩短它与目标之间的距离,那么留下“志大才疏”的印象又有何妨?

---

[4] 吴慰慈,董炎. 图书馆学概论(修订本).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目　录

图表目录

第一章　数据、信息、知识、情报、图书馆与图书馆学

第一节　数据、信息、知识、情报

一、数　据

数据(data)或许是现代生活中使用最多、也是含义最模糊的概念之一,但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数据一般被理解为未经整理的,可被判读的数字、文字、符号、图像、声音、样本等[1~3]。例如,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的访谈记录、问卷反馈,人造卫星拍摄的天体照片,实验研究中形成的一组原始数据(如 220、300、345、480、600、610、605)在经过整理并被赋予特定的含义之前,都被称作数据。不能被判读的符号、声音、图像,如计算机的乱码,则不能称作数据。

二、信　息

与"数据"相比,"信息"(information)是一个在更大程度上被滥用的概念。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以外,"信息"经常被用来指事件、信号、基因编码、消息通报、金融数据、发明创造、间谍情报等完全不同的事物。美国学者瑞蒙德(Raymond)曾经并不夸张地指出:信息一词几乎已经被用来指代太阳底下任何事物[4]。这种滥用的结果使"信息"概念几乎在任何场所都需要重新界定,否则就很难知其所指。

即使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内部,信息也是一个歧义繁多的概念。例如,美国学者巴克兰德(Buckland)认为"信息"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其中一种含义就是指各种具有通报、通知 (inform)性能的事物,如图书、期刊、图片,甚至特定条件下的自然物体[5];另一位美国学者德尔文(Dervin)则将信息定义为"被理喻的东西"(that which is sense-made),即进入主体理喻过程的事实、数据等[6]。还有不少学者从通信科学借用"信息"概念,其中借用最多的,一是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的概念,二是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的概念。申农将信息定义为"减少随机不定性的东西",即能减少决策或选择过程中的随机性的任何消息、信号、事件等[7];维纳则认为"信息是人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8]。我国学者孟广均等所采用的定义"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与方式"[9](或者说,信息既不是事物本身,也不是事物的运动过程,而是事物运动的状态与方式),便是维纳定义的另外一种表述。

这些定义之间的主要区别不是语义上的差异,而是本体论,即哲学层面上的分

歧。简单地说,本体论就是对"现实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哲学解释。从本体论上看,对信息的解释存在三种不同的立场。以申农和巴克兰德等人为代表的第一种立场认为,信息是具有通报功能(或消除不定性功能)的"事物"或"事件",它强调的是信息意义的外壳及其客观性。例如,在巴克兰德看来,信息包括任何具有通报功能的事物、事件,即任何可以承载意义的外壳。他认为,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意义的外壳尤为重要,因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技术和方法只能作用于意义的外壳:我们贮存的是"物"——图书、期刊等;检索的还是"物"——图书、文章、图片等[10]。以德尔文等人为代表的第二种立场认为,信息是主观意识的范畴,它强调信息的意义及其主观性。德尔文坚决反对把信息看做可以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的"物",而主张把信息看成一种主观"建构"(construction)。她认为传统图书馆工作对用户需求特性的漠然,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上把信息看成对所有人都一样的客观事物。德尔文批评说,图书馆职业长期以来假定用户的头脑"就像一个空净的容器,会对注入其中的信息照单全收,而要做出这样的假定,就得首先假定信息是物(thing),而不是主观的建构,假定信息能够独立于主体而存在,并与它描述的客观存在之间存在固有的、绝对的、正确的、一致的关系。带着这些假设,(图书馆职业便觉得)有理由期待用户在接受信息后自然地做出反应"[11][原文1]。

第三种立场认为,信息是意义和某种外壳的结合,它既注重信息的意义也注重意义的外壳;既承认客观信息(依附于人工载体的信息)的存在,也承认主观信息(依附于人的头脑的信息)的存在。尽管这组观点包含了很多不同的表述(这些表述各自规定了不同的信息内涵和外延),但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他们都认为,信息是一种经过特定编码系统(如语言、计算机信号)编码的,具有时空特征的抽象物[12]。通过强调信息需要经过编码、需要依附于特定时空中的事物(如头脑、书本、计算机),这种立场否定了只注重意义及其主观性的立场;通过强调信息是一种抽象物(abstract object),它也否定了只注重外壳及其客观性的立场。这种否定在瑞蒙德(Raymond)、巴德(Budd)等学者的著述中表述得很明确。瑞蒙德在评论巴克兰德的观点时说:

> 如果按巴克兰德(Buckland)的"信息为物"的定义来使用信息概念,即用来指一本书、一篇文章、一件实物,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术语,指代宇宙间一切可能的事物,从一个基因到一份手稿到巴克兰德(Buckland)的

[原文1] At root, behind all these assumptions, is a core assumption dealing with the nature of information, that information can be dumped into people's heads as if people's heads were empty buckets. To make this assumption it must be assumed that information is a thing rather than a construction, that it exists independently of observers and has an inherent, correct, absolute, and isomorphic relationship to the reality it describ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se assumptions, it is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a receiver exposed to information should ipso facto respond.

羚羊。这样一来,它也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13][原文2]。

同样,巴德援引罗杰斯(Rogers)和肯凯德(Kincaid)的评论,表明了他对申农只重外壳不重意义的立场的否定:

> 因物理层面的信息处理而减少的随机不定性与意义层面毫无关系,意义层面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如果我们把物理层面的信息处理与语义层面的信息处理区分开来,那么不定性的减少和增加就可能在不同层面上同时出现。判读一个特定的字符,如 Democrat(民主主义者),可能减少了关于这个字符为何字的不定性(物理层面的不定性),但同时可能增加了对这个词的含义的不定性[14][原文3]。

本书采取的是第三种立场。根据麦德斯(Meadows)[15]、海伍德(Haywood)[16]和阿尔菲诺(Alfino)[17]等人的解释,本书将信息定义为在特定背景下经过整理的,表达一定意义的数字、文字、符号、图像、声音、信号等。根据这一定义,一组实验记录的堆砌不是信息,但是将这组数据按一定的顺序加以组织,它就成为信息。以上一小节中的数据 220、300、345、480、600、610、605 为例,假如我们被告知,这些数据分别是一个图书馆的用户在引进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之后第一至第七个月里使用该数据库的次数,它们就变成了有意义的数据,这组被赋予特定含义的数据说明,在新数据库被引进后的最初几个月里,用户对它的使用逐月递增。在经过了约半年的熟悉期后,用户的使用量逐渐趋于稳定。“全文电子期刊的使用”这一背景,加上按月份的排列,便赋予例中的数据特定的意义,这样形成的有意义的数据,无论是储存在大脑中的,还是通过文字或其他方式表达出来的,都是信息。

三、知　识

1. 知识的概念

与信息一样,知识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对“什么是知识”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既包括哲学层面的分歧,也包括语义层面上的分歧。在哲学层面上,歧义的

[原文 2] The problem of applying the term“information” to what Buckland calls “information-as-thing”, that is , to a book or a text, or any other physical representation of a communication, is that then it becomes a portmanteau word that denotes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from a gene, to a manuscript, to Buckland's antelope, and thereby loses all meaning.

[原文 3] The reduction of uncertainty at the physical level of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has little to do with meaning, which occurs at a higher level of abstracti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the semantic level of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ans that a reduction, and an increase, in uncertainty can occur simultaneously, but at different level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us interpreting a particular pattern that one perceives as the word for"Democrat", for example, may reduce one's uncertainty about which word has occurred (the physical level of real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may create uncertainty about the meaning of that particular use of the word "Democrat"(at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of reality).

产生主要是由于定义者在认识论上的不同。简单地说，认识论是对“人是如何认识现实的”这一问题的哲学解释，认识论立场上的不同，导致有人认为，“知识是人们对自然现象与规律、社会现象与规律的认识和描述”[18]；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知识是被一定的社会规范（如学术规范或文化规范）所认同和接受的认识”[19]。在语义层面上，对“知识”定义的分歧主要是由于人们对知识和信息关系的理解不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知识和信息构成包含关系。在这种观点内部，有些人认为知识是信息的子集，有些则认为信息是知识的子集[20]。另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知识和信息存在转化关系。在这种观点内部，又存在两种不同的转化观，其中一种转化观认为，信息是生成知识的原料：知识是理性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后形成的产物，知识与信息的区别在于知识比信息经过了更高层次的组织，因而也具有更大的价值；另外一种转化观认为，知识与信息相互转化：信息在人脑中与个人已有的经验、知识结合，就生成知识，而知识一旦被记录下来就成为物化的信息[24~26]，知识与信息的区别在于知识是主观的、个性化的、依附于人脑的，而信息是客观的、物化的。

根据本节第二部分对信息概念的理解，本书将知识理解为在信息这一原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见解、认识。再以上文提到的电子期刊的使用数据为例，如果有人（如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人员）在用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里找到了足够的证据，说明已经观察到的电子期刊使用率增长模式并非由于纯偶然因素所致，或者有人在足够多的其他场合（如其他图书馆）也观察到类似的增长模式，表明这样的增长具有普遍性，那么，上例中提到的信息就转化为知识。这条知识可以用汉语表述为：在学术研究环境中，用户对新的电子资源的利用要经过一段较缓慢的增长时期，随之出现一段较快的增长时期，然后趋于稳定，整个利用率增长模式呈倒“S”型。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信息加工过程都产生知识。信息在加工之后能否转化为知识，取决于它是否能达到“知识”的标准。这种标准将知识与一般的“观点”或“猜测”区分开来。例如，上文提到的“足够多的背景材料”或“足够多的、相同的观察结果”，指的就是使知识得以成立的认识论标准：知识必须有充分、可靠的经验性证据，并且要经过理性的合理加工。在不同的知识生产领域，这些认识论上的标准——充分、可靠、合理等，往往被具体化为一些比较公认的尺度，并通过方法论著作、方法论教学和期刊载文标准等途径得以传播，对新的知识生产起到规范或约束作用。知识的生产者据此对自己的产品做出初步鉴定。一旦做出了肯定的鉴定，他（她）往往希望将这一产品公布于世，形成对人类知识的贡献。此时，社会将采用同样的标准对其声称的知识产品进行再次鉴定。

事实上，确认某种信息加工结果能否成为知识的标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识论问题，自古以来就困扰着从事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有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确认知识的认识论标准，例如英国哲学家休

姆认为,人类没有能力做出知识是否成立的判断。当代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确认“知识声称”是否成立的标准就是社会规范(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社会规范),在社会规范之外不存在什么认识论上的标准。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者则认为,所有的“声称”都同样有效,没有哪种“声称”可以被确认为优于其他声称,他们甚至否认社会规范的作用[27]。

不管这些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如何否认知识标准的存在,一个很难否认的事实是:人类社会始终都在对个人或团体的认识成果做“知识”和“非知识”的判断。在科学研究领域,正是这样的判断维持着知识生产和知识增长的相对有序性。承认知识标准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承认所有知识都是正确的,在一定时期被确定为知识的产品,随着新信息的出现可能不再被人接受。

2. 知识的种类

根据知识与其主体的关系,可以将知识分为两大类: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主观知识是指寓于个人意识之中的、依存于个人大脑的知识。客观知识是指以语言、文字、图像等符号表达的、记录在实物载体(如书本、磁盘)上的知识。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依附于大脑的主观知识一旦以语言或文字的形式加以表达、记录,就转化为客观知识,而已经形成的客观知识与主体的经验相结合又会形成新的主观知识[28]。

同样,根据知识与主体的关系,也有人将知识分为意会型知识(tacit knowledge)和编码型知识(codified knowledge)[29,30]。意会型知识有时也被称作隐性知识;编码知识也被称作显性知识。意会型知识是指个人在长期的经历中缓慢积累的经验的升华,如技术工人通过学徒积累的操作知识、教师通过长期的教学经历积累的教学知识等。编码型知识是通过语言或其他符号表达的、可交流的知识。与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这对概念相比,意会型知识和编码型知识的对比,不仅反映了知识在存在形态上的差异,也反映了它们在可分享性方面的差异。意会型知识被认为是与个人的经验紧密交融的知识,较难进行编码,因而也较难与人分享。正因为如此,在有些时候,意会型知识在决定组织的竞争力方面,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那些试图通过知识资源的管理和开发来增强竞争力的机构来说,意会型知识和编码型知识同样重要。

四、从数据到知识的等级链

从数据到知识首先是一个转化过程的递进链。数据是形成信息的原材料,信息是形成知识的原材料。数据来源于我们对外部事物的感知和观察。信息是在一定的背景下对数据进行整理而形成的思维产品,是原始数据、背景和整理过程的结合。这种结合的结果是赋予数据一定的意义,从而使数据转化为信息。知识是从

信息和个人经验中提炼出的认识、见解，是信息、经验、背景、思维加工过程的结合，这种结合的结果是赋予生成的知识以抽象性、洞察性、解释性和预见性[31,32]，从而实现从信息向知识的转化。

从数据到知识还是一个加工、组织程度的等级链。数据要转化为信息就必须经过判读、解码、转化、排列、解释等复杂的认知活动；需要信息的组织加工者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一个不懂英文的人无法判读以英文文字形式存在的数据，即使具备了判读一组数据的基本能力，也可能因为相关知识的不足而判读失误。例如，面对法国18世纪画家格瑞兹的绘画《破壶》，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断定作者画的是一个平民少女，懂得绘画艺术的人还可能判读出画家采用的古典主义手法，但是，只有了解18世纪法国社会并懂得"破壶"这一法国民间俗语的人，才可能判读出作品中的伦理含义[33]。信息向知识的转化需要更加复杂的思维活动，更深层次的加工，它需要主体根据自身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相关信息进行分析、筛选、总结和概括，所以，知识是人脑精细加工的结果，位于组织、加工程度的最高级。

不同的加工深度也赋予数据、信息和知识不同的价值。从数据到知识，其价值依次提高[34~36]。数据的价值在于它是信息的原材料，但是，由于数据是未经整理的、最原始的认知材料，对于指导决策和行为而言，数据也是价值最低的材料。信息是有意义的数据，它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它是知识的原材料，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信息也能成为决策和行为的依据，例如，广告之于购物决策和购买行为，就具有一定的决策价值。但是，与知识相比，信息也具有很大的局限。首先，信息是对事物或现象的简单描述，这种描述尚未被赋予洞察力(insight)[37]；其次，信息是对特定的具体事物或现象的描述，不具有对其他事物或现象的预见力(predicative understanding)。例如，在上文提到的电子期刊利用率的例子中，经过对原始数据的整理而形成的信息仅仅是对特定用户行为的描述，这样的行为特征是否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信息本身不能提供答案。显然，缺少洞察力和预见性，信息将不足以支持决策、指导行为。因此，信息虽然比数据更重要，但它的价值依然是有限的。真正赋予信息更大价值的，是信息向知识的转化过程。

由于知识是思维深度加工的结果，它比信息具有更强的抽象性、洞察性、解释性和预见性。同时，由于知识是经过了一定认识论标准"筛选"、"认证"的产品，它也比信息、观点、猜测等一般观念形态的东西具有更可信赖的有效性，能更有效地指导实践，解决问题[38,39]。再以电子资源的使用为例，掌握了有关用户利用率增长模式知识的图书馆员，就可以更好地安排引进新资源前后的服务活动，如引进之前加大宣传力度，在引进之后(特别是倒"S"型的第一次陡然上升期)加大用户支持力度，以期最大程度地促进资源的利用。

正是由于信息和知识，特别是知识，对人的行为的指导作用，当人们在决定行动计划(购物、选择电视频道、确定研究课题、制定政策等)的时候，就需要寻求信息

和知识的支持，而知识和信息只有在成为决策和行为执行者需求的对象之后，才可能实现其对决策和行为的指导价值。被特定的需求者寻求的知识和信息就成为情报。知识和信息向情报的转化是它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一环。

五、情　报

情报是汉语拥有的一个独特概念，在英文中不存在与其完全吻合的对应术语。它最早是指“军中集种种报告，并预见之机兆，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这种含义的白话表达是“情报是对敌情和其他有关对敌斗争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活动的重要依据，亦泛指一切重要情况的报道”。后来的情报学虽然将情报的外延扩大到非军事领域，但大都保留了它的目标明确性的内涵，即情报是被已知的需求者所寻求的知识或信息，如“情报是传播中的知识”，“情报是意志、决策、部署、规划、行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智慧”，“情报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40]。所以，情报既不等同于信息也不等同于知识，它是有明确的接受对象的那部分信息或知识。不管是知识还是信息，在特定的场合下都可能成为情报。例如，一份化妆品广告是信息而不是知识，但对于求购化妆品的人来说，它就成为一条情报。图书馆的图书所记载的是信息或知识，若被特定用户所需要，那么图书中的知识就成为该用户的情报。图书馆、情报工作的功能之一就是把信息和知识转化为情报，沟通知识、信息记录和它们的需求者。

第二节　文　献

一、文献的概念

文献是指为了表达思想、学习、参考、贮存、交流的需要，通过一定的记录方式将知识或信息记录在某种实物载体上形成的产品[41~44]。图书、图像、录音带、互联网上的资源都是文献的例子。

在我国，文献的概念起源于春秋时代，最早见诸《论语·八佾》，原指典籍和有知识的贤者，由此引申，后世用“文献”指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文字和图像资料[45]。直到今天，“文献”一词还常常表达这一含义，如“文献馆”、“文献研究室”。需要指出的是，如此界定的“文献”比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定义的“文献”概念，范围要窄得多。

在西方，文献(document)原指文字记录(textual record)，后来又指一切人类思想的表述[46]。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文献运动”(documentation)曾试图将“文献”的概念扩大到包括一切能给人带来信息、知识、证据的物品，包括实物，但是这样宽泛的“文献”定义遭到了谢拉和阮冈纳赞等著名图书馆学家的批判，始终未能成为“文献”概念的主流定义。

二、文献的基本要素

知识或信息内容、实物载体和记录方式是文献得以形成的基本要素。记录方式是将主观形态的信息或知识物化到人工附载物上,或把客观形态的知识或信息从一种人工附载物复制或转移到另外一种人工附载物的方式。文献记录方式的进步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文献记录方式,按其形式分,有文字型、声频型、视频型、代码型;按刻录方法分,有手写、印刷、光感、机录等[47]。

文献的实物载体是指用来记载知识或信息的人工附载物。历史上,竹简、绵帛、羊皮纸、泥板、纸莎草都曾经充当过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但是,人类发明的最杰出的文献载体,也是迄今最常用的文献载体是我国汉代发明的纸。

文献承载的知识或信息是人们希望通过文献加以长期保存或广泛传播的对象,也是人们在利用文献的过程中参考、研究和学习的目标。与知识或信息内容相比,文献的记录方式和文献的实物载体本身只有在特定的背景下才成为人们研究、考察的对象。

三、文献的种类

根据文献的任何一个构成要素都可以对文献进行不同角度的划分,每一种划分都能产生若干种文献类型。因而,图书馆学文献中存在着很多表达文献类型的概念,如纸张型文献、视听型文献、数字化文献等。本节将着重介绍两组文献划分方法和由此形成的文献类型。一是根据文献的加工程度,将文献分为一次文献、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二是根据文献内容的性质,将文献分为学术文献和非学术文献。一次文献是指作者创作的原始文献,如图书、论文等;二次文献是对一次文献的描述,如索引、文摘、题录等;三次文献是对一次文献和二次文献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加工、浓缩而形成的文献,如综述、指南、百科全书等。

学术文献(scholarly literature)指那些面向专业人员报道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献,如学术专著、学术期刊、研究报告等。非学术文献指学术文献以外的其他文献类型,如通俗读物、行业出版物等。与非学术文献相比,学术文献具有若干突出特点。首先,它是传递研究成果的载体,包含着知识创新的结晶。其次,学术文献通常需要遵循学术文献的写作规范,包括话语(discourse)规范、引文规范、结构规范等。例如,在话语规范方面,起源于自然科学研究传统的规范(有时被称为实证主义规范)通常要求作者用客观、清晰,以及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的话语陈述事实。在这种规范看来,第一人称、表达情感的话语被认为是不妥的。在结构方面,学术文献通常包括题名、文摘、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部分。第三,大部分学术文献都要经过“同行审评”(peer review)。同行审评是科学交流系统久经考验的质量控制机制,虽然不同国家的学术团体采用的“同行审评”模式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特征

包括：①匿名审评；②每份文献至少由两位专家审评；③采用比较一致的审评标准，这些标准通常涵盖研究方法、数据分析、表述清晰度、成果创新程度等方面。

四、文献的演化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献是文字与天然实物载体结合的产物。尽管人们难以断定文字出现的确切时间，但是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古代埃及、中国以及两河流域是最早产生文字的地方。通过文字把语言刻录在某种实物上(如中国的甲骨、埃及的纸莎草、泥板等)，就形成了文献。最初的文献主要是记录政令、法令、外交文书、征供纳税、宗教仪式的文件。

继文字之后，文献演化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纸张发明带来的载体革命。纸张发明于我国东汉时期，它为文献的生产提供了相对廉价又便于携带的人工附载物，此后，各种天然文献载体就陆续退出了文献生产的历史舞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纸张几乎是惟一的文献载体形态。

继纸张之后，文献演化史上的又一次变革是印刷术带来的文献记录方式的革命。我国隋、唐时期开始使用雕版印刷技术，北宋时期发明活字印刷技术，西方 15 世纪时出现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印刷术的出现不仅使图书这种古老的文献形式迅速增长，而且促进了其他纸质文献形式的出现。17 世纪出现了学术期刊和报纸，19 世纪出现了文摘、索引性刊物。直到今天，印刷式图书、期刊、报纸等文献形式依然是人类采用的主要文献形式。

进入 20 世纪后，文献形式进一步多样化。20 世纪初期，以光学缩摄技术为记录方式，以感光材料为载体的缩微制品成为一种重要的文献形式。这种文献可以将大量纸质文献按原样缩制在胶卷或胶片上，使用时，再利用缩微阅读器将其在屏幕上放大或复印成纸质文献。这种文献不仅密度高、容量大，而且价格低廉、操作简单、易于保管，是贮存大型连续性出版物，如大型报纸、连续编号的科研报告等的首选文献形式。20 世纪 40 年代，经计算机处理并记录于计算机存储介质上的数字化文献开始出现。早期的数字化文献主要是纸质文献被打印或出版前的临时形式，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数字化文献作为用来交流的最终文献形式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

数字化文献是文献演化过程中一次深刻的革命。它不仅大大提高了文献传播速度和效率，而且使知识和信息可以通过多媒体文献形式(包括文字、图像、声音和其他虚拟信息)加以传播。同时，借助网络技术，它还使文献的远程利用成为可能。不少图书馆界人士(如美国学者兰卡斯特)预言数字化文献将彻底取代纸质文献，但即使是最乐观的“无纸论”者也无法预测纸质文献何时消失。

五、作　　品

相对于文献来说，作品(work)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虽然不少早期的图书馆职业论著已经隐含了这个概念，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才有人将它明确提出。20世纪中叶以后，作品被用来指一个作者的特定智力成果(intellectual work)。它与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文献是一种物理实体(physical entity)，作品则是智力的结晶(intellectual entity)；文献是载体(medium)，作品是信息(message)[48]。一份作品经常对应着若干份独立的实体文献。例如，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它的故事、思想等)是一部作品，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其他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36集电视剧《红楼梦》以及电影《红楼梦》都是作品"红楼梦"的文献。在图书馆中，同一作品的不同文献经常因管理的需要被存放于不同的物理空间，但图书馆工作必须保证用户在任何时候都能方便地查询到同一作品的所有文献，即必须在概念上实现同一份作品的文献的聚合。在现实中，文献与作品的对应关系往往成为有争议的问题，从而为知识、信息的组织带来困难。例如，电影《红楼梦》和图书《红楼梦》真的包含了基本相同的内容吗？英文版《红楼梦》和中文版《红楼梦》可以视作同一作品的不同文献吗？图书馆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往往决定着用户能否查询到他们真正需要的文献、知识或信息。

作品概念的引入进一步表明，图书馆文献加工处理的实质是对文献中包含的知识与信息(recorded knowledge or information)的组织整理。图书馆对文献的分类事实上是对作为智力成果的作品的分类；图书馆对文献的揭示报道事实上是对其智力成果的报道。图书馆职业活动的对象首先是作品，其次才是文献实体。

第三节　图　书　馆

一、理解图书馆概念的角度

"今天，好像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图书馆了"[49,50]，这是近年来图书馆学文献中经常看到的一种感叹。这种概念上的混乱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图书馆"这个一向与物理处所、实体机构不可分割的概念，越来越多地与反映非物理世界的术语，如"数字化"、"虚拟"、"无墙"等连用，由此出现的新型"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无墙图书馆——经常令业已形成的对图书馆概念的理解无所适从。

有鉴于此，本节将首先尝试对这一概念进行初步分析，然后提出一个临时性定义。本节主要从以下方面来理解"图书馆"概念：文献生产与传递中的图书馆、知识组织整理与交流中的图书馆、"数字化图书馆"中的图书馆。前两个方面旨在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理解这个概念，第三个方面旨在分析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对"图书馆"

概念的冲击以及如何在这种冲击下调整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

二、文献生产与传递中的图书馆

如上所述，文献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交流需要增长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从文献的生产到利用的过程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活动，围绕着文献的生产和传递存在着一系列的社会分工。从文献创作开始，这一过程涉及的主要分工依次为：①作者；②文献出版机构；③发行机构；④整理、保管、传递机构。

作者的基本职责是按特定创作规范，如学术文献的话语规范、引文规范、结构规范等，以未来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所要传递的知识或信息。有些时候（如科学家之间的通信、参加学术会议），作者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文献直接传递给它的接受者。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作者需要依赖其他的社会分工才能实现文献的广泛传播。

文献出版机构的基本职责是将作者创作的文献以适合其传播的方式“转录”在一定的文献载体上并加以复制和包装，从而实现文献的批量生产。在学术文献领域，出版活动通常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联络作者，确保作者的创作遵循学术写作规范；第二步是生产文献物理实体，对于纸质文献来说，这一阶段通常包括版面设计、印刷、装订等；第三步是营销，其目标是使已经出版的文献占有尽可能大的市场[51]。

文献发行机构的另一基本职责是把文献按其出版时的状态向个人或其他社会机构广泛传播。当代社会中最常见的文献发行机构是文献零售机构（如书店）和图书馆代理商（subscription agent）。图书馆代理商的职责是接受图书馆委托，从不同出版机构汇集图书馆选购的书刊。借助图书馆代理商的中介作用，图书馆就可免去与出版机构一一交易之劳。这种分工在我国还比较少见，但是，直到目前，它还是西方图书馆界采购文献的主要渠道。

文献的整理、保管及传递机构指承担文献的揭示报道、贮存保管、提供利用中的一项或多项职责的机构，如文摘索引机构、图书馆、档案馆和各类情报（信息）机构。现代图书馆活动涉及上述全部职责。具体说来，图书馆的任务包括根据用户需求，向文献出版发行机构采购相关文献；采用当时最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整理保管这些文献，为之配备有效的查检手段，使之成为便于获取和利用的集合；以适当的形式向用户提供这些文献，并辅助他们利用这些文献。

过去 20 多年中，文献生产及传递领域的最大变化就是电子出版物（数字化出版物）的出现。最初（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电子出版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领域，由图书馆专业人员或专家学者承担。图书馆专业人员希望通过电子出版，寻求新的更经济的文献传递渠道；各领域的学者则希望通过电子出版加速学术交流的速度。传统出版机构，由于不能确定电子出版物的市场前景，同时也由于当时的信息

技术尚不能产生既美观又便于阅读的出版物,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始终都在徘徊、观望。这样的格局一度使人们相信,科学研究团体终于可以越过传统的出版机构、发行机构,甚至图书馆信息机构,自行承担从文献生产到文献传递的完整过程。

传统出版机构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对电子出版表现出更加浓厚的兴趣。从 90 年代初开始,不少学术出版商,如 Elsevier, Springer, Academic Press,都参加了一个甚至多个电子出版物的研究开发项目。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经过了若干年的观望之后,传统出版商终于开始大规模地进入电子期刊市场,开始对已有的印刷式刊物实施双轨出版,即同时出版印刷版和电子版,电子版一般保留着印刷版的一切外部特征。经济因素决定双轨出版只能是一种过渡模式。不少人相信,至少学术出版物将最终走向电子化[52],只是过渡期需要多长还无法确知。不管怎样,出版机构似乎已经在数字化世界里立稳了脚跟,承担了它们在印刷世界的分工。

随着电子出版物的增加,很多传统的图书馆代理商(如 EBSCO)也开始从事电子出版物的代理业务,与此同时,专门从事电子出版物代理的机构,如英国的 NESLI,欧洲的 SwetsNet,也已出现。这些代理商的共同职能是充当图书馆与电子出版商之间的中介,省去了图书馆与不同出版商一一谈判出版物使用许可的烦琐过程。可以说,文献发行机构也同样在数字化世界里承担着它们在印刷世界的分工。

图书馆早在出版机构、发行机构大规模进入电子出版之前,就已经开始收集数字化文献。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图书馆收集的数字化文献主要是 CD - ROM、计算机磁盘等实体文献形式。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电子出版物被作为远程文献,通过授权的形式加以收集。当前,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把授权使用的远程文献视作图书馆文献体系的组成部分,与馆内文献进行一体化的加工、处理、提供利用。这种对各种文献形式和各种信息技术兼收并蓄,可同时检索多种形式文献、同时获取馆内文献和远程文献的图书馆被称作复合图书馆(hybrid library)。

总之,尽管数字化文献的出现给原有的从文献生产到文献传递的社会分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改变了几乎所有机构的运行方式,但是,它却基本保持了源自印刷式文献的分工模式。

三、知识和信息组织、整理、交流中的图书馆

由于知识和信息是文献的重要构成要素,围绕着文献而出现的社会分工,同时也可以视作围绕着知识和信息生产、组织和交流而出现的分工。从这一角度看,文献的创作者同时也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文献所报道的都是作者智力活动的成果。

出版者的功能是将作者生产的信息或知识以适合其传播的方式,"转录"在一定的载体上并加以复制和包装,这种包装一般仅限于物理实体方面(如版面设计和

复制）。尽管在出版阶段，出版机构会对文献内容的质量做出评判，有时甚至会要求作者对知识或信息本身进行修改，但一般情况下，出版者本身不负责知识或信息内容的加工。

传统上，发行机构主要负责把已经物化的知识或信息，按其出版时的内容和物理状态向个人或其他社会机构广泛散发，这一过程通常既不涉及文献内容的加工，也不涉及文献物理实体的加工。近年来，尽管一些图书馆代理商有时也接受图书馆的委托，对文献进行初步处理，形成描述文献内容和外部特征的书目产品[53]，但是，这种小范围的承包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发行中介的分工。

长期以来，图书馆被很多人误认为只对文献进行收藏保管和借借还还的机构，与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无涉。尽管这种误解直到今天依然相当普遍，但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作品”等概念的提出以及各种交流学说的出现（这些学说都试图从知识或信息的交流过程看图书馆活动的本质，详见第五章），图书馆在知识和信息生产、组织整理、传递利用中的分工也更加明朗。图书馆对知识和信息生产、组织、交流过程的参与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它通过对作品进行分类、分析、描述等加工手段，形成反映作品主题的新的信息产品，如书目、索引、文摘等。其次，它通过这种加工提供着从概念、学科入手查询知识和信息的途径，使知识和信息查询不再完全依赖于文献实体的特征。例如，一个查询克隆知识的用户即使事先不知道任何相关文献，依然可以查到他（她）需要的知识。再次，它通过揭示作品之间的关系，实现着相同或相似作品的聚合，不同作品的分离，由此实现对整个人类知识的组织。此外，不少图书馆（特别是研究机构的图书馆或其他专业图书馆）还经常对文献包含的知识进行评价、筛选、汇总、提炼，形成针对用户提问的答案、综述、汇编、知识地图、讲稿等，这种加工整理虽然并不形成新的知识，却无疑是较高层次的知识组织整理。

总之，图书馆是知识及信息生产、组织、交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机构，它通过对文献和作品的组织、整理、分析、描述，实现着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组织，促进着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尽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这一机构所采取的知识和信息组织方法经常受到批评，但是，至到目前，还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完全取代图书馆所采用的知识和信息组织方法。不仅如此，很多传统方法还被用于组织互联网上的信息，使源于图书馆职业的技术和方法在网络时代焕发出更大的生机。

四、“数字图书馆”中的图书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很少有人否认，由上述分工所定义的“图书馆”是一种具有确定的物理形态的社会机构。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种单一的图书馆存在形态，使上述分工经常可以在无纸的或虚拟的环境中实现，这就导致了“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概念的出现。这些变化不可避

免地动摇了已经建立的对图书馆概念的理解。以下评论就显示了数字化所引起的"图书馆"概念的混乱:

> 近来,"图书馆"这一术语似乎失去了它原有的清晰含义。"数字图书馆中"的"数字"二字让人联想到精、准的含义,而其中的"图书馆"一词则越来越模糊。今天的"图书馆"一词可以用来指未经整理的数据,或这组数据经过整理后形成的信息,或这组信息的承载物,如图书或其他载体,或承载物之承载物,即对图书或其他文献进行组织、保管和提供利用的社会机构[54][原文4]。

正是这种理解上的混乱使英国图书馆学家布罗费(Peter Brophy)感叹:"今天,好像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图书馆了。"[55]

"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本身都是非常含糊且歧义横生的概念。图书馆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文献对这些术语的交替使用更增加了它们的模糊性。我国不少学者试图将这三个概念区分开来,赋予每个概念以确切的含义[56]。事实上,这种区分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这几个术语的关系,正如杨宗英[57]和黄宗忠[58]等学者所解释的,是同义关系,寓指同样的事物。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的文献频繁地交替使用这些术语,而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文献使用"数字图书馆"。开始于 1994 年的英国"电子图书馆项目"(electronic Library Programme, e-Lib Programme)和美国"数字图书馆创始项目"(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就是性质相同、名称相异的研究项目。英国的 e-Lib 项目,由于更全面地考虑了技术、社会、文化、人性等因素,给数字图书馆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被不少国家视作数字图书馆研究的典型,应该说比美国的"数字图书馆创始项目"的一期研究具有更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试图区分"电子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概念,我国不少学者在介绍国外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现状时,都忽略英国的"电子图书馆项目"。

即使把"电子图书馆"视作"数字图书馆"的同义词,这个概念还是存在很多歧义。根据美国学者施瓦茨(Schwartz)的考察,在 2000 年学术界大约存在 64 种关于"数字图书馆"的不同定义[59]。有人用"数字图书馆"泛指所有可通过网络存取的数据库,有人用来指一组相互连接的分布式数字化资源甚至整个互联网,也有人用来特指以收集、整理、传播数字化资源为主旨的机构或服务[60]。

产生这些歧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学科交叉领域,吸引了图书馆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的研究者。这些不同背景的学

[原文 4] Recently, however, the term libraries, seems to have lost its clarity of definition. The term digital has come to symbolize exactness and precision, while the term libraries has become imprecise. The term libraries, today, can refer to unorganized data, or to that same data organized as information; or to containers of that information, such as books and other media; or to the containers of the containers themselves, that is, social institutions that house, organize, and provide both the books and other media and their information.

者往往赋予“数字图书馆”一词不尽相同的含义。来自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学者经常用“数字图书馆”泛指数字化的信息系统。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这样的“数字图书馆”其实更接近于出版商、发行商、图书馆代理、数据库开发商的电子产品，对应着纸质环境下的一套期刊、一套出版物等。事实上，很多被认为是“数字图书馆”的系统，如 Elsevier 的 ScienceDirect、EBSCO 数据库，正是出版商或发行商所经营的纸质文献的电子版本，它们是社会分工意义上的“图书馆”收集、整理、提供利用的对象。显然，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因“数字图书馆”等概念而引起的“图书馆”概念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数字图书馆”一词语义上的模糊性。

图书馆职业人员更倾向于根据图书馆在整个社会交流系统中的独特分工，来理解和描述“数字图书馆”的概念，认为数字图书馆应该在数字化世界里承担起传统图书馆在印刷世界里承担的分工[61,62]。根据这样的理解，数字图书馆应该是具有下列基本特征的机构或服务：

(1) 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手段，以数字化资源为加工、整理提供利用的对象。

(2) 具有概念化或虚拟化边界：边界之内的资源和服务区别于边界之外的资源和服务，边界之内是经过选择的、整理的、稳定的资源；是秉承图书馆服务精神的服务；在很多时候，进入边界或使用边界以内的部分资源时，需要身份验证。美国学者哈特(Harter)[61]和阿特金森(Atkinson)[62]称边界以内为“控制区”(controlled zone)。

(3) 其资源体系既包含各种形式的原始资源，也包含它们的替代品(如目录)和其他查询工具。

(4) 有确定的用户群体。

在总结上述特征时，哈特(Harter)对“数字图书馆”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数字图书馆就是“一个控制区，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组控制区。在这里可以找到经专家筛选的、高质量的资料，可以利用从增值性标引、编目、分类中产生的精细的检索工具和文献替代品，从而实现真正意义的知识获取。这样的数字图书馆关注它收集的信息资源的时效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其他问题，向它们的用户群体提供切实的服务，当这些服务无法由计算机实现时，数字图书馆的馆员将亲自提供”[65][原文5]。

[原文 5] a control zone, or perhaps more realistically, a collection of control zones. Here would be found high quality material, selected by specialists. True intellectual access would be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fine-grained search tools and object surrogates constructed using the value-added processes of indexing,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Such digital libraries would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the currency, accuracy, and integrity of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found within them, and would address the other concerns identified here as well. They would offer actual services to their user populations. Where these cannot be accomplished by computer software, they would be performed by human beings-the librarians of the digital library.

从存在形态来说，具有上述特征的数字图书馆既可能是一个基本上只收集电子格式的资料，并对它们进行有效管理的机构，也可能是非机构化的、履行图书馆功能的服务。机构化的数字图书馆目前已不罕见。在很多企业或研究机构的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66]。不少学者认为，今天以收集纸质文献为主的图书馆必将转化为基本上只收集数字化文献的机构，只是这一转化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尚无法确定[67]。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现的很多新型机构（不少是商业性的）从一开始就是专门收集、处理、传递数字化文献的机构。例如，2000 年开始运行的 ebrary.com、XanEdu 和 2001 年初开始运行的 Questia，以及我国的超星数字图书馆都是面向终端用户的商业化数字图书馆。这些数字图书馆正在发展为颇有影响的机构：它们拥有稳定的图书馆员队伍、一定的组织结构、不断增长的馆藏和已知的用户群体（通过订购和注册成为该馆用户）。除了赢利的目的以外，它们在工作性质和工作原理等方面与一般图书馆并无本质不同。尽管图书馆界对于这些商业化的新兴机构是否属于自己的同类还在犹豫[68]，但是很少有人否认它们具有数字图书馆的基本特征。

由于数字化资源的收集、加工、整理、利用均不再依存于特定的物理空间，从理论上说，图书馆承担的社会分工完全可以独立于特定的机构框架，在非机构化的分布状态下完成，这就意味着有些数字图书馆可能表现为一种服务而非机构。美国学者凯斯勒（Kessler）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意义上的图书馆将越来越普遍，"'图书馆'，特别是数字图书馆，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图书馆服务——把情报传递给它的用户的服务，而非信息承载物或承载物之承载物"[69][原文6]。从目前的发展来看，这种形态的数字图书馆至少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传统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化资源及相关服务，例如现有大学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化服务。这类服务的引入无疑改变了现有机构的模式（将传统图书馆转化为复合图书馆），但它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机构。另外一种是由在空间上分布的机构，向分布的用户提供的分布式资源和服务。例如，英国的人民网资源和分布式国家电子资源（distributed national electronic resource，DNER）就是具有数字图书馆特征的分布式服务。人民网资源是一个由英国公共图书馆共同维护和提供的分布式服务；DNER 则是为全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分布式服务。非机构化的数字图书馆的出现是数字时代对传统"图书馆"概念（即图书馆是一种社会机构）的真正挑战，新时期对图书馆概念的理解必须反映这种变化。

[原文 6] Increasingly, particularly in its digital incarnation, the term libraries is used to mean library service - not a thing or its container or the container of its container, but libraries as the function of getting information to its user. Online services are developing that help users find and use online digital information regardless of where the users, these library service providers, or the information itself are physically located.

五、图书馆：一个临时定义

根据上述理解，图书馆应该是这样一种社会机构或服务：对文献进行系统收集、加工、保管、传递，对文献中的知识或信息进行组织、整理、交流，以便用户能够从文献实体（physical）、书目信息（bibliographical）及知识（intellectual）三个层面上获取它的资源[70]。

图书馆这一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任何定义只能反映一定时期的“图书馆”概念的含义，以上理解也不例外。

第四节　图书馆职业与图书馆学

一、专业化的图书馆职业（library profession）

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在定义专业化的图书馆职业时说，要了解图书馆职业，我们必须了解：①什么是专业化的职业；②图书馆职业是什么样的职业；③图书馆职业与其他职业的根本区分。可以说，本书的所有后继章节都从不同侧面回答着这些问题，其中，第五、第六两章还将专门讨论图书馆职业化问题。本节仅从专业化职业的一般特征入手，来讨论图书馆职业的构成及其专业化地位的确立。

关于什么是专业化职业的问题，社会学研究中存在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解释认为，专业化职业是由掌握和运用高深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组成的、具有下列特征的行业：①有比较系统的专业知识体系；②有比较正规的、大学水平的专业教育系统；③有较为正规的行业协会；④有比较明确、系统的职业道德规范。一般情况下，行业协会负责行业成员的资格考核或认证，有时也负责专业教育系统的认定，行业协会还和职业道德一起，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从业人员的行为。正是这些特征赋予专业化职业较高的社会地位。医生、律师是比较典型的专业化职业[71,72]。

图书馆职业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类知识的交流与利用为己任的职业[73,74]。跟其他职业一样，专业化的图书馆职业包括三大活动领域：实践活动、研究和教育[75]。图书馆职业的实践活动旨在运用图书馆学的专业知识对文献进行加工、处理、保管、传递，对人类知识和信息进行组织、整理，促进其交流和利用；图书馆学研究的职责是丰富和发展职业的专业知识体系，指导图书馆实践；图书馆学教育则负责传授从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培养行业精神，为职业的三大活动领域培养新成员。这三大领域虽然职责分明，但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专业人员都有可能同时从事两种甚至全部职业活动。

虽然图书馆与图书馆工作有着久远的历史，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工作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形成专业化的职业。图书馆工作职业化的首要标志是行业

协会的出现。1876 年,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专业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在该协会的成立大会上,著名图书馆学家麦维尔·杜威宣布:"图书馆工作成为专业化职业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今天的图书馆员可以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工作称作职业。"[76][原文7]一年之后,即 1877 年,英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国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于 1925 年,世界性图书馆协会——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IFLA)成立于 1927 年。

图书馆工作职业化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兴起。早在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前,俄国、意大利等国就已经在酝酿正规的大学水平的图书馆员教育[77]。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后不久,杜威就开始推行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他先后在其任职的图书馆举办了数期图书馆员培训班。1887 年,在争得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认可和支持后,杜威在哥伦比亚学院成立了第一所正规的图书馆学校——The Columbia College 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并于 1889 年开始授予科学学士学位。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科学、教育的迅速发展,其他国家也很快认识到文献增长对新型专业馆员的需要,纷纷兴办大学水平的图书馆员教育。在我国,第一所正规的图书馆学校出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昌文化图书馆专科学校。

总之,至 19 世纪末,图书馆工作已具备了专业化职业的基本特征。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图书馆职业化的特征更是日益突出:图书馆工作所依赖的知识和技能越来越复杂;图书馆学教育始终占据大学殿堂一隅;图书馆协会也始终吸引着大批从业人员。然而,与医生、律师等传统职业相比,图书馆职业始终未能获得它应有的社会地位。为此,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专业人员把提升职业地位视作职业发展的重要内容。美国学者罗玛·哈里斯(Roma Harris)曾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提出,图书馆职业之所以未能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是因为传统上这是一个女性占多数的职业,图书馆职业地位问题事实上是由男性控制的世界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只有真正解决了男女平等这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才能解决图书馆职业的地位问题[78]。不管哈里斯的分析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比较肯定的,即目前图书馆职业地位之相对低下,在更大的程度上归因于社会环境因素,而非图书馆职业自身的质量和价值。

二、专业馆员(professional librarian)与非专业馆员(para-professional librarian)

作为专业化职业,图书馆职业要求它的成员必须经过图书馆学专业知识、技能

[原文7] The time has at last come when a librarian may, without assumption, speak of his occupation as a profession.

和职业精神的培训。在这样的培训之后，新成员往往还需要经过特定的资格认证，才能正式成为图书馆职业的成员。这种受过图书馆学专业培训的，具有专业馆员资格的人员被称作“专业馆员”。

不同国家认定专业馆员资格的方式不尽相同。在美国，专业馆员必须在美国图书馆协会认定的图书馆学系取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在英国，专业馆员不仅需要在图书馆协会（自 2002 年 4 月 1 日起成为“注册图书馆及情报专业人员协会”）认定的学校获得专业学位，而且要经过图书馆协会的专门资格认定，凡获得资格认定的馆员称作注册馆员（chartered librarian）。我国目前不实行馆员资格认定程序，而是通过图书馆员职称系列（助理馆员、馆员、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确认图书馆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

由于图书馆业务涉及大量事务性工作，所以，在实际工作领域，图书馆职业还依赖一支颇具规模的辅助人员队伍。这些人员被称为非专业馆员（para-professional librarian）。在美国公共图书馆界，非专业馆员约占所有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的 77%[79]；在英国公共图书馆界，这一比例约为 75%[80]。

传统上，专业馆员和非专业馆员具有比较明确的分工。专业馆员从事专业性较强的文献选择、文献分类、编目、参考咨询、用户培训等工作；非专业馆员从事文献物理实体的加工（如书脊标签）、保管（如上架）和流通以及其他事务性活动。随着图书馆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专业馆员和非专业馆员之间的重新分工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趋势。这种重新分工的主要特征是非专业馆员开始承担某些过去由专业馆员完成的工作，如文献的书目性加工，而专业馆员则更集中于文献的选择、学科的专业化服务、管理工作、业务指导工作[81,82]。

三、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是图书馆职业所依赖的专业知识的来源，如同医学是医生专业知识的来源，法学是律师专业知识的来源。19 世纪初德国图书馆员施莱廷格是最早提出“图书馆学”概念的人。他将“图书馆学”定义为“图书馆实施有目的的组织所需要的理论准则的概括”。一个多世纪以后，美国图书馆协会将之定义为：“为满足用户群体的信息需求，对信息记录进行选择、获取、组织、利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83][原文8]我国学者刘国均先生曾将图书馆学定义为：“关于图书馆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各个组成要素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和设备、工作方法。”[84]吴慰慈教授则将它定义为：“研究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的科学。”[85]

[原文 8]　The knowledge and skill by which recorded information is selected, acquired, organized, and utilized in meeting the information demands and needs of a community of users.

从以上定义来看,图书馆职业对于"什么是图书馆学"并不存在确定一致的答案,分歧似乎主要产生于人们对图书馆学(学科)和图书馆(机构)关系的不同理解。在有些学者看来,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淡化它与图书馆这一机构的关系。例如美国图书馆学家巴克兰德(Buckland)就曾这样评论:"在其他职业和职业教育中很少见到如此显著的对机构的强调。记者不会得到一个'报纸学位',农民也不会进入'农场学校'。我们不会称教师资格为'学校学位',更不会称培养教师的学校为'学校的学校'。这样看来,图书馆学多少有些个别。"[86][原文9]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这种"淡化机构身份"的倾向在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领域已相当强烈。在上述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定义中,就已经没有了"图书馆"这一机构的界定,这或许就是"淡化机构"倾向的反映。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图书馆学必须研究图书馆事业,否则就不是图书馆学了"[87]。

在这一问题上,本书认为,作为一门学科,图书馆学与图书馆既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图书馆学之于图书馆的相对独立性是指它的内容并非单纯关于图书馆及其要素,也并非仅仅适用于图书馆机构或其群体。图书馆学内容所反映的社会实践,如文献的选择、加工以及知识和信息的组织整理,虽然在古代主要集中于图书馆,但在现代却已成为相当普遍的人类活动。20世纪以来,图书馆学已经多次将它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了"图书馆"机构以外。20世纪初的文献运动(documentation)就是在传统图书馆以外运用图书馆职业技术处理科技文献的例子。近年来,图书馆学在"馆外"得以应用的最成功例子是对互联网资源的组织整理。这些例子表明,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并不仅限于图书馆机构或其群体的活动。

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不可分割。这是因为各类型图书馆为图书馆职业活动提供了最重要的机构框架和活动舞台,因而也为图书馆学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材料和应用场所。图书馆之于图书馆职业的作用,包含了工厂之于企业、市场之于商业、法庭之于律师、医院之于医生、学校之于教师、农场之于农民的所有作用。虽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不断有人预言图书馆职业的"非机构化"[88],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图书馆职业会脱离他们的基本活动舞台,变成非机构化的信息管理者队伍。图书馆学要指导图书馆职业实践,就不能对这一机构本身的问题——管理问题、发展问题、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甚至建筑与布局问题视而不见。

正是根据图书馆学与图书馆的这种独特关系,克雷思特斯(Michael Keresztesi)将图书馆学定义为包括三种成分的学科:①对图书馆作为一个组织的

[原文9] This heavy emphasis on an institution is less marked in other professions and professional schools. Journalists don't get a "newspaper degree" nor do would be farmers enroll in "farm school". We do not refer to teachers as holding a "school degree" and attending a school sounds bizarre. Librarianship, it seems, is somewhat out of line.

研究，如它的服务与管理；②图书馆职业政治学，即对图书馆职业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方面的研究；③对书目科学的研究[89]。同样，福特(Ford)也认为，图书馆学一方面必须解释信息如何被记录、保管、贮存、检索、如何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必须包括对图书馆这一社会机构的研究[90]。

这也正是本书对图书馆学的理解。在本书中，图书馆学被理解为研究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整理方法，以及通过图书馆这一机构或服务实现知识与信息传递的学问。

参 考 文 献

1 Bohn R E. Measuring and managing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94 , 26 (1): 61～73

2 Haywood T. Info-rich info-poor : access and exchange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 Bowker-Saur, 1995

3 Zack M H. Managing codified knowledge.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99, 40 (4): 45～58

4 Raymond B. Paradigms in conflict. In: Apostle R and Raymond B, ed. Librarianship and the information paradigm.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7: 1～36

5 Buckland M. Information As Th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991, 42 (5): 351～360

6 Dervin B. On studying information seeking methodologically: the implications of connecting metatheory to metho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1999, 35: 727～750, 738

7 申农．见孟广均等，信息资源管理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8 维纳．见孟广均等，信息资源管理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9 孟广均等．信息资源管理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10 Buckland M. Information As Th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991, 42 (5): 351～360

11 Dervin B. Mass communication: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audience. In: Rice R E, Paisley W J,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81: 71～87

12 Alfino M, Pierce L. Information ethics for librarians. Jefferson N C: McFarland & Co, 1997

13 Raymond B. Paradigms in conflict. In: Apostle R and Raymond B, ed. Librarianship and the information paradigm.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7: 1～36

14 Budd J M. The library and its users: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New York : Greenwood Press, 1992. 12

15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16 Haywood T. Info-rich info-poor : access and exchange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Bowker-Saur, 1995

17 Alfino M, Pierce L. Information ethics for librarians. Jefferson N C: McFarland & Co, 1997

18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19 Friedman, Michael. 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philosophical agenda. Stud. Hist. Phil. Sci, 1998 , 29 (2): 239～271

20 乌家培．正确认识信息与知识及其相互关系．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15 ～18

21 Alfino M, Pierce L. Information ethics for librarians. Jefferson N C: McFarland & Co, 1997
22 Kock N, McQueen R.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organizations: an analysis of core, support and improvement process. Knowledge and Process Management, 1998, 5 (1):29~40
23 Knapp E. Know-how's not easy: how to keep knowledge management from flickering out. Computer World (Leadership Series), 1997
24 Buckland M. Information As Th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991, 42(5): 351~360
25 Churchman C W. The design of inquiring systems: basic concepts of systems and organizations. New York: Bencis Books, 1971
26 Blumentritt R, Johnston R. Towards a strategy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1999, 11 (3): 287~300
27 Friedman M. 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philosophical agenda. Stud. Hist. Phil. Sci., 1998, 29 (2) : 239~271
28 宓浩等. 图书馆学原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9 乌家培. 正确认识信息与知识及其相互关系.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15~18
30 Shin M, Holden T, Schmidt R A. From knowledge theory to management practice: toward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2001,37: 338~339
31 Kock N, McQueen R.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organizations: an analysis of core, support and improvement process. Knowledge and Process Management, 1998, 5 (1):29~40
32 Murray P C.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document management technology. KM Magazine, 1997, 1 (2). http://www.ktic.com/topic6/12 INFKM.HTM(2003/3/21)
33 朱伯雄. 外国美术名作欣赏.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4 Alfino M, Pierce L. Information ethics for librarians. Jefferson, N C: McFarland & Co, 1997
35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36 Haywood T. Info-rich info-poor: access and exchange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 Bowker-Saur, 1995
37 Kock N, McQueen R.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organizations: an analysis of core, support and improvement process. Knowledge and Process Management, 1998, 5 (1):29~40
38 Bohn R E. Measuring and managing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94 , 26 (1): 61~73
39 Haywood T. Info-rich info-poor : access and exchange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 Bowker-Saur, 1995
40 郭小刚. 试论情报信息知识的关系. 图书馆学刊 2001(2):57~58
41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 理论图书馆学教程.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42 宓浩等. 图书馆学原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43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Wiley-Becker and Hayes, 1972
44 Buckland M. What is a "docu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7, 48 (9): 804~809
45 来新夏.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词典.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46 Buckland M. What is a "docu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7, 48 (9): 804~809

47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 理论图书馆学教程.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48 Svenonius E.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49 Brophy P. The libra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service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 Library Association, 2000

50 Kessler J. Internet digital libraries: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Boston: Artech House, 1996,xii

51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52 Line, Maurice,et. al. Discussion: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Information Services & Use, 1999, 19 (2): 171~172

53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54 Kessler J. Internet digital libraries: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Boston: Artech House, 1996,xii

55 Brophy P. The libra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service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 Library Association, 2000

56 吴慰慈,董炎. 图书馆学概论.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57 杨宗英. 引自 李玉安,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实践述评.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6(6):76~81

58 黄宗忠. 论 21 世纪的图书馆. 图书与情报. 1996 (2):40

59 Schwartz C. Digital Libraries: an overview,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00, 26(6): 385~393

60 Brophy P. Digital Library Research Review: final report. Manchester: Center for Research in Library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999

61 Harter S P.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gital lib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Journal of Digital information, 1997, 1 (1):http://jodi.ecs.soton.ac.uk/Articles/v01/i01/Harter/(2003/3/21)

62 Atkinson R. Library Functions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Digital Library: laying claim to the control zone.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6, 66 (July): 248~253

63 Harter S P.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gital Lib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Journal of Digital information, 1997, 1 (1):http://jodi.ecs.soton.ac.uk/Articles/v01/i01/Harter/ (2003/3/21)

64 Atkinson R. Library functions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digital Library: laying claim to the control zone.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6, 66 (July): 248~253

65 Harter S P.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gital lib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Journal of Digital information, 1997, 1 (1):http://jodi.ecs.soton.ac.uk/Articles/v01/i01/Harter/ (2003/3/21)

66 Brophy P. Digital library research review: final Report. Manchester: Center for Research in Library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999

67 Line M, et al. Discussion: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Information Services & Use, 1999, 19 (2): 171~172

68 Dolphin P. Free Pork pies for all?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Record, 2001, 103 (2): 104~105

69 Kessler J. Internet digital libraries: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Boston: Artech House, 1996,xii

70 Young H. The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hicago: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3

71 Eisenbeis K.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fession and discipline. In: Pemberton J M and Prentice A, e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ntext. New York : Neal-Schuman, 1990: 154~170

72 Harris R M. Librarianship : the erosion of a woman's profession. Norwood N J: Ablex Pub. Corp., 1992

73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Wiley-Becker and Hayes, 1972

74 Winter M F. The culture and control of expertise: toward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librarianship.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8

75 Eisenbeis K.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fession and discipline. In: Pemberton J M, Prentice A e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ntext. New York: Neal-Schuman, 1990: 154～170
76 Dewey M. Cited in Harris R M, Librarianship : the erosion of a woman's profession. Norwood N J: Ablex Pub. Corp, 1992. 4
77 Loriene R. Personality, tradition and library spirit: a brief history of librarian education. In: Loriene R, Brooke S 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Washington D C: Mansell, 1998
78 Harris R M. Librarianship: the erosion of a woman's profession. Norwood N J: Ablex Pub. Corp, 1992
79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Public Library Trends Analysis, Fiscal Years 1992～1996.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1
80 LISU.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atistic Tables. Loughborough: LISU, 2002
81 Gerrod P. New Skills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Information UK Outlooks, 1997(22)
82 Winter M F. Specialization, territoriality, and jurisdiction: librarianship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knowledge. Library Trends, 1996, 45(2): 343～363
83 Young H. The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hicago: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3
84 刘国均. 什么是图书馆学.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1),1～5
85 吴慰慈,董炎. 图书馆学概论.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86 Buckland M K. Library services in theory and context.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3. 18
87 吴慰慈,董炎. 图书馆学概论.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88 兰卡斯特著,郑登理,陈珍成译. 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8
89 Keresztesi M. The science of bibliography: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 In: Oberman C, Stauch K ed. Theories of bibliographic education, designs for teaching. New York: Bowker, 1982
90 Ford B. The library as locus. In: Pemberton J M, Prentice A ed.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ntext. New York : Neal-Schuman, 1990. 115～131

第二章　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整理

第一节　对知识和信息进行组织整理的原因

一、查询、利用和传承知识的需要

人们在从事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的时候经常需要利用已有的知识和信息。这些知识和信息一部分来自头脑，即个人在教育、阅读、人际交往、亲身实践中吸收的知识；另外一部分来自人类知识和信息的记录，即文献。这就意味着人们经常需要从众多文献中准确地查询所需的情报。当文献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实现这种检索，就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文献集合必须具有一定的秩序；第二，必须具备快速查检这一集合的手段。这就如同在词典中查找具体的词汇，若非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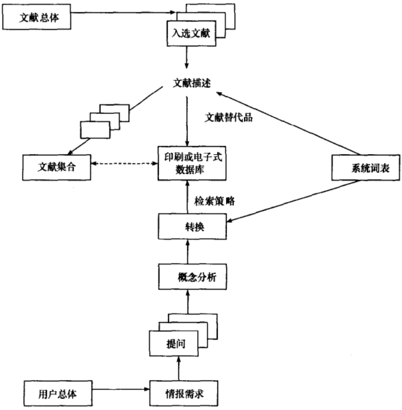


图 2.1　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整理及查询[1,2]

有词汇按一定顺序排列,并附有一种或多种查字法,就不可能快捷地找到需要的词汇。文献集合的有序化和检索手段的形成都是知识组织整理的结果,因而,为了便捷地查询和利用知识,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组织整理。图 2.1 所示是根据美国图书馆学家兰卡斯特的著述整理的知识组织与知识查询的关系。

在查询利用知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传承知识。人类知识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对文献的长期保存。有效的文献保存也依赖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将文献安排成便于保管的有序集合;第二,维护一个准确、可靠的文献清单(即文献目录)。如前所述,文献的有序集合和目录的形成都是知识组织整理的结果,因而,为了知识的传承和保管,必须对知识及其记录进行组织整理。

二、文献离散性导致的查询困难

对知识和信息进行组织整理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记录人类知识的文献若不加以组织整理,就会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趋向分散、无序,导致知识查询、保管和利用的困难。

导致文献趋向分散无序的首要因素是文献生产和分布的离散性。从事文献创作的知识分子队伍和从事文献生产的出版队伍构成了庞大、复杂的文献生产分工。每个作者创作什么,以及选择什么渠道出版其成果都具有极大的自主性和不可控性;出版商生产什么也就因此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其结果就是造成文献分布的离散性。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就发现,一个学科的学术论文总是相对集中在少数的专业期刊,即核心期刊中,而另一些论文则分散在数量较多的相关或边缘期刊上。在刊登等量论文的条件下,核心期刊区与后续的几个区域的期刊数量之比为:$1:N:N^2$[3]。显然,若不对相同或相关作品进行人为的聚合,文献的这种离散现象必然会给知识及信息的查询带来困难。

导致文献趋于分散和无序的第二个因素是文献载体的多样性。由于存在着从印刷式到声像型再到数字式多种载体,内容相同或相关的作品经常采用不同的载体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这些不同的载体往往具有不同的生产渠道、不同的保管要求和不同的使用方法,所以,在文献集合中,它们经常被分散在不同的物理空间,分别保管,造成内容相同或相关但载体不同的文献的分散。若不加以特别组织,并通过文献替代品来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这种分散性也可能给相关内容的查询造成困难。

导致文献趋于分散和无序的第三个因素是文献语言的多样性和模糊性。语言的多样性会造成内容相同但语言相异的文献的分散;语言的模糊性,如用不同词汇命名相同事物或用相同词汇命名不同事物的现象,则可能造成内容相同但术语相异的文献的分散。例如,一篇关于“digital library”的英文文献和一篇关于“数字图书馆”的中文文献,若不加以组织,就可能被查询系统当作非相关文献;一篇关于

"数字图书馆"的文献和一篇关于"电子图书馆"的文献,若不加以组织,也可能被视作非相关文献。

三、文献增长加剧的查询困难

19 世纪末以来,上文讨论的知识查询困难由于文献的快速增长而日益加剧,从而对知识的组织整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知识生产领域,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为学术期刊的增加。麦德斯通过汇总不同领域的文献计量结果,得出了科学技术期刊种类每 15 年翻一番的结论。他同时还发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学术期刊的平均页数和每页的平均字数都有很大程度的增长(表 2.1,表 2.2)[4]。

表 2.1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世界学术期刊大致种数

年代	期刊种数
1951	10 000
1959	15 000
1970	40 000
1980	62 000
1987	71 000

表 2.2　学术期刊每卷平均页数

学科领域	1960	1970
科技	602	1060
社会科学	352	408
人文科学	382	399

人类知识与知识记录在 20 世纪的迅速增长源于很多因素。首先,随着世界人口总数的增长和受教育人口比例的提高,现代社会中从事知识生产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人均科研生产率保持不变,社会的知识与知识记录总量也会迅速增长[5],何况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科研条件(如数据分析手段、文字处理手段、出版发行手段)一直在不断改善,带动着人均科研生产率的提高。其次,由于知识在国家和企业竞争力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政府和企业对科研的投资迅速增长。再次,20 世纪后半叶,在世界很多国家,商业文化和效率观念日益影响科研领域,科研产出率在科研人员的业绩评估和晋升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指标,这种趋势迫使科研人员比以往更加追求科研成果的数量[6]。

与知识相比,信息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知识的创新需要依赖丰富的经验数据和可靠的理性分析;知识声称(如论文稿件)需经过严格的同行审评,在有些学科,主要期刊的稿件拒绝率可高达 90%[7],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知识和知识记录的增长速度。信息则不同,任何数据被赋予一定的意义时就成为信息;信息依附于一定的载体时,就成为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一般不需要经过特定的"社会认证"。这意味着,信息在生成过程中和进入交流系统时都比知识受到更少的限制,其增长速度也因此受到较小的制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数据收集手段的进步、载体技术的进步(如无线电技术、数字化技术)都极大地刺激了信息的生产,形成了信息的爆炸性增长。

第二节 知识、信息组织整理的智力活动基础

一、概 述

如前所述，对知识和信息进行组织整理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它们日后的检索利用。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及信息的组织整理和检索利用往往由不同的人承担：图书馆及相关职业承担着知识组织整理的责任，他们向社会的其他成员提供着知识查询的手段，如图书馆目录、索引数据库；广大社会成员则根据自己的需求，利用图书馆职业提供的检索手段实现知识查询(参见图 2.1)。这样的分工意味着，图书馆职业提供的知识查询手段必须符合用户的智力活动和查询习惯，才能为用户所用，否则，无论多么复杂严密的手段都将失去意义。

对事物进行类分是人类最早的智力活动，以此为基础，人们很早就形成了“依类查询”的习惯[8]。17 世纪以后，由于知识分类被广泛用于组织科学研究活动和教学活动，按学科门类查询的习惯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就使分类理论和方法成为现代图书馆职业进行知识组织整理的重要基础。

描述也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智力活动。描述(description)是关于事物特征及事物之间关系的陈述[9]。以描述为基础，人们很早就产生了“依字(词)查询”的习惯。例如，在古代宗教活动中，神职人员便常常需要按字词从宗教经典中查出相关段落，加以诵读。与“依类查询”不同，依字(词)查询是从描述主题概念的词汇入手查出包含着相同词汇的文献。这种习惯使描述原理与方法也成为现代图书馆职业从事知识组织整理活动的重要基础。

知识的利用本身也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智力活动。在现代科学研究中，这种活动建构了错综复杂的文献引用网。到 20 世纪中叶，这种引用网已经在广大科学研究工作者中培育了根据引用关系进行查询的习惯，从而使知识引用关系成为图书馆职业组织整理知识的又一重要基础。

与图书馆职业活动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种智力活动是编码。编码是指将数据转换成机器(如计算机)可以识别、接受和处理的代码的过程。由此生成的代码虽然很少直接用于查询，但由于它可以大大提高查询效率和效果，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已在图书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使编码技术成为图书馆实现知识组织整理自动化的基础。

二、分 类

1. 一般分类

分类是根据事物的异同或其他标准把事物聚合成类的过程，它是人类最早的智力活动之一。从类分可食食物与不可食食物、危险信号与安全信号开始，人类就

开始了初步的分类活动。有学者认为，分类能力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10]。

最早的系统的分类理论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要对事物进行分类首先必须对它们的特征进行精确的描述，分类过程必须以事物在这些特征上的异同为根据，归于同类的事物必须具有共性，由此建立的分类体系应该是一个从一般到具体的等级体系。

直到20世纪中叶，这种古典分类理论一直都是人们建立各种分类体系的主要理论基础，但是20世纪中叶以后，这种理论受到很多现代分类理论，如"家族相像理论"(family resemblance)、"模糊集合理论"(fuzzy set theory)、"典型分类理论"(prototype theory)等的批评[11]。模糊集合理论认为，并非所有的分类标准都如古典分类理论认为的那样可以被精确表述，我们经常需要采用模糊的标准对事物进行分类。典型分类理论进一步提出，人们常常按某种典型(而非精确的标准)对事物进行归类，而"典型"的确立又常常因分类者所处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一个1.7米的人所确立的"高"的典型与一个1.8米的人确立的"高"的典型就可能不同。所有这些分类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古典分类理论，共同指导着日益复杂的人类分类活动。

2. 知识分类

知识分类是根据知识领域之间的实际关系或假定关系，确立这些领域的正式结构的活动[12]。

知识分类首先把人类知识划分为若干大类。这种划分在哲学界有悠久的历史。亚里士多德是较早对知识进行分类的哲学家之一。他将知识分为三类：理论哲学(theoretical philosophy，包括哲学、物理、数学)、实践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包括伦理学、政治学)、实用艺术(useful arts，包括各种制作工艺)。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将人类知识分为记忆的科学(如历史)、推理的(reason)科学(如哲学、逻辑)和想象的科学(如诗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也同样把人类知识划分为记忆、推理和想象三大类。德国学者谢勒将知识分为工具性知识(instrumental knowledge)、求知型知识(intellectual knowledge)和宗教知识(spiritual knowledge)[13]。当代美国学者马克鲁普(Fritz Machlup)则将知识分为实用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求知型知识(intellectual knowledge)、消遣型知识(past－time knowledge)、宗教知识(spiritual knowledge)和无用知识(unwanted or useless knowledge)[14]。在我国，毛泽东主席曾将人类知识划分为三大类：生产斗争的知识、阶级斗争的知识和哲学。他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是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知识分类还需要对知识大类进行细分。17世纪以前，这种细分十分有限，那时的人类知识活动基本上都围绕着知识大类进行[15]。17世纪以后，知识分类体

系逐渐细化。例如在化学领域,化学首先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接着又出现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分支学科。这种细化主要源于 17 世纪以后科学研究领域和教学领域出现的两大发展趋势:学科分化和学科交叉。在研究领域,由于文献的增长,原有较大学科的研究人员需要处理的文献越来越多。当文献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科学家发现他们已无法吸收本学科产生的所有文献。为了有效吸收文献中的知识,他们只好将自己的研究兴趣缩小到一个可以应付的范围,这就使得科学研究领域越分越细。在教育领域,老师和学生同样面临着知识增长速度与知识吸收能力的冲突。知识增长的压力迫使教学活动不得不采用更细的学科为组织单位。此外,大学教师对教授职位的竞争以及就业市场对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教学活动的专业化[16]。

与学科的分化相伴而行的是学科的交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学科越是分化,它们就越需要交叉,因为在分化了的学科之间往往存在一些边缘领域需要各学科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结果经常导致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的出现。例如在生物和化学的交叉点上,就产生了生物化学学科。交叉学科的出现经常对知识划分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知识分类体系往往对那些在学科交叉点上出现的新学科感到难定归属。例如心理学被认为是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其归属就曾引起很大争议。

从 17 世纪以来,学科的分化和交叉已经使现代科学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分类体系。由于这一体系植根于知识生产(科研)及知识传授(教育),因而它是广大科研人员、教师、学生以及其他用户经常采用的知识查询途径,为图书馆职业的知识组织整理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三、描　述

描述是人类最常见的智力活动之一。我们在观察事物,研究事物,介绍事物,求索事物,确认事物的时候都需要描述。

人类描述活动采用的基本工具是自然语言。自然语言包含词汇、语义和句法等基本要素。词汇是一种语言中所有词和固定词组的总汇,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同一词汇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如汉语中的全称、简称,英语中的单数、复数都属于同词异型现象。语义是词语的意义,有些词具有不同的语义,如“上下”可以表示方位,也可以表示运动方向,这种现象叫做一词多义;也有一些不同的词语事实上表示同样的语义,如“互联网”与“因特网”就具有同样的语义,这种现象叫做一义多词或同义词。句法指一个句子中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和次序,表达同样含义的句子(深层结构)可能具有不同的句子结构(表层结构),如“熊猫追赶那个人”和“那个人被熊猫追赶”,就以不同的句子结构表达着同样的含义;而具有相同成分和结构的句子也可能表达不同的含义,如“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可以指“飞行

中的飞机会很危险”，也可以指“开飞机会很危险”[17]。在特定背景下，选择适当的词汇、语义和句法来表述一件事物，就形成对该事物的描述。

绝大部分人类知识都是通过自然语言加以描述的，也有一些知识采用人工语言（如数学公式、化学元素名称、计算机语言等）。很多人工语言也包括词汇、语义和句法三大要素。此外，知识描述还经常采用非语言形式，如图表、图像、模拟等。这种描述往往比自然语言描述更浓缩。

知识描述是知识生产、知识交流和利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智力活动。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作者只有对获得的知识进行描述，赋予知识一定的符号外壳，才能使之成为可交流、可传递、可共享的人类知识。在知识的查询和利用过程中，不仅知识本身需要经过描述才能被查询，就连用户对知识的需求也需要经过描述才能被交流系统所理解，才能与系统中的知识描述进行匹配，从而实现知识查询。正是由于描述在知识查询中的重要作用，图书馆职业十分重视对知识描述方法的研究和应用。以描述这一智力活动为基础，图书馆职业形成了一系列知识组织整理方法。

四、编　码

从广义上讲，“编码是将某种信息用规定的一组代码来表示的过程”（《辞海》“编码”词条）。广义的编码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人类智力活动。用结绳记录信息、用语言表达信息、用文字描述信息、用烽火传递战情，都属于广义上的编码活动。知识管理领域将知识分为意会型知识和编码型知识，也是在广义上使用“编码”的概念。

从狭义上来说，编码是指将数据转换成机器（如计算机）可以识别、接受和处理的代码的过程[18]。在现代社会，狭义的编码也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智力活动。例如，在通信领域，电报的传送过程就依赖狭义编码。它把字母、数字、标点等形式表达的数据转换成电码，以便发报机辨认和接受。在计算机技术领域，编码更是必不可少。人与计算机之间的所有交互过程都是通过编码实现的。人向计算机输入的指令和信息中的字母、数字、符号都需要转换为特定的代码，才能被计算机辨认和接受，ASCII 便是实现这种转换的一种编码标准。除了这种最基本的编码，大多数计算机系统在处理特定信息时还要求采用特殊的编码。例如，在利用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的时候，我们经常需要把定类变量（如性别、民族、颜色等）转换为数字代码，以便计算机进行高效复杂的数理统计；在进行文献交换的时候，我们也经常需要对文献的结构和特征进行编码，以便不同的计算机能够判读彼此生成的文献。

五、知 识 引 用

知识引用是指知识的创造者在研究过程中引用已有知识的活动。当知识的创造者通过学术文献报道其研究成果时，这种引用经常体现为引文。引文即文章或

专著后面所附的参考文献,是期刊论文和学术专著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文献中的引文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表明科学研究中的继承关系,确认被继承者的领先地位;二是保证被引文献的查询,使感兴趣的读者能追溯性地找到被引文献的出处。在现代社会,第一个功能随着人们版权意识的增强而备受关注;第二个功能则随出版物的激增、文献检索难度的增大而日益重要。这就使论文后的参考文献越来越长,著录项目越来越详细,著录格式越来越规范[19]。引文数量的增加和著录事项的标准化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引文关系检索到大量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在学术团体内,根据引文检索文献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知识查询习惯[20~22]。20世纪80年代末,它曾被英国学者辛普森(Simpson)确定为学者们最经常使用的检索途径,即使在自动化检索更加普及的20世纪90年代,根据引文进行的查询依然被视作与数据库检索同样重要的途径[23,24]。这种习惯使引文关系成为图书馆情报职业组织知识的重要途径。

第三节　图书馆职业知识组织整理的基本方法

一、图书馆职业知识组织整理方法概述

为了实现知识的有效保管、查询、利用,在长期的实践中,图书馆职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组织整理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方法包括分类法、描述法、编码法、引文法。分类方法是指图书馆职业对人类知识体系进行系统的划分,并根据由此建立的知识体系和其他原则,类分具体作品及文献的方法。描述法是指用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描述作品的内容特征及文献的实体特征的方法。编码法是将有关作品内容特征和文献实体特征的数据译成计算机可辨认、接受、处理的代码的方法。引文法是按知识的引用关系揭示不同作品/文献之间关系的方法。

知识组织整理方法是图书馆学最富有生命力和动态性的领域之一。从杜威十进分类法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分类体系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却能够在数字化的时代里依然宝刀不老;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机读目录(MARC)开始,编码方法不过几十年的历史,却已彻底改变了图书馆知识组织整理的面貌,并成为驾驭数字化知识、信息资源的重要方法。这个领域的生机和活力令里士满(Richmond)充满了这样的乐观:

> 20世纪60年代的梦想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今天的梦想会成为明天的现实。我们今天拥有更优越的条件来尝试像Smalltalk-80这种以分类理论为基础的多功能系统。在已有的分类法、参照系统、索引、叙词表等技术之外,我们完全有可能增添处理更难问题的更复杂的方法[25][原文1]。

二、图书馆职业的知识分类

1. 图书馆职业知识分类的含义

分类方法指图书馆职业对人类知识体系进行系统划分，并根据由此建立的知识体系和其他原则，类分具体作品及文献的方法。从根本上说，图书馆职业的知识分类法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类法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是根据特定标准将全部人类知识组织成有秩序的系统的方法。大多数图书馆知识分类体系事实上就建立在一般知识分类的基础之上。与一般知识分类不同的是，图书馆职业的知识分类除了考虑知识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必须同时考虑知识的载体——文献的特征。它首先必须考虑文献实体的物理空间性，在任何时候，一份文献在空间上只能归于一处，不管它的内容跨越几个学科。其次，它要考虑各知识领域文献生产的实际状况(如文献多寡)，并根据文献生产的实际情况设置知识类目。在图书馆知识分类中，这种根据文献生产的实际情况设置类目的原则被称为文献保障原则(literary warrant)。再次，它还要考虑文献的形式特征，既要集中相同内容的文献，又要区分不同形式的文献。例如，在同一学科之内，将参考工具书与专著区分开来。此外，它还要考虑到文献实体分类排架的需要，尽可能保持体系的稳定，避免因体系调整造成文献实体的重新分类和重新排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图书馆职业的知识分类比一般知识分类更加复杂。

2. 图书馆职业知识分类体系

图书馆是最早对人类知识进行分类组织的机构。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曾根据文献内容将知识分为近十个大类，同类文献存放在同一个书篮里，同一个书篮里的文献再按作者名称字顺排列[26]。在我国汉代进行的文献整理工作中，刘向、刘歆父子曾将知识分为七大类，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这些早期图书馆的知识分类大都根据已有文献设置类目，是文献保障原则的不自觉的利用。中世纪时的大学图书馆有时也根据大学的课程设置来划分知识类别和组织文献。16 世纪以后，图书馆界开始出现一些比较复杂的知识分类体系，有些体系已开始主动靠近哲学家们提出的知识分类。从 19 世纪末直到 20

[原文 1] The dreams of the 1960s are the realities of today,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think that today's dreams cannot also materialize. We are in a much better situation now to experiment with systems like Smalltalk-80, which is based on fundamental classification theory and yet is flexible enough to meet a variety of needs. To schedules, cross-references, and indexes, not to mention thesauri, we may yet add a relatively sophisticated means of getting a tough job done.

世纪,这种系统的分类体系日趋成熟,出现了一些对图书馆职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分类方法,如以培根知识分类为基础形成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以印度吠陀(Vedic)哲学为基础形成的《冒号分类法》;以毛泽东知识分类理论为基础形成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

《杜威十进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DDC)由美国图书馆学家麦维尔·杜威编制,初版于1876年。该分类体系将全部人类知识分为十大类,包括总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言、自然科学和数学、技术、艺术、文学和修辞、地理和历史,每大类再划分成若干子类,子类之下再按学科的等级进行层层细分。所有类目都被赋予特定的号码,以000～900分别表示十个大类,如总论为000,哲学为100,各级子类则被赋予数值位于其上位类数值范围内的号码。例如,600代表技术或应用科学;640代表有关家庭生活的技术;641则代表有关食品和饮料的技术;645代表有关家居装饰的技术[27]。在641、645等同级类目之后,杜威用小数点表示进一步的细分。如此细分,就形成一个层层递进的等级制分类体系。根据这一体系,图书馆可以将浩如烟海、纷繁复杂、不断增长的文献分门别类地组织成线性的序列,大大简化了图书的整理和查找。杜威十进分类法出版之后,很快就广为流传,目前有130多个国家的图书馆采用它[28]。

《国际十进分类法》(UDC)由19世纪比利时文献学家拉方丹和奥特勒发起编制,以1885年版《杜威十进分类法》为基础。与《杜威十进分类法》相比,UDC采用多种辅助标记符号,如语言辅助标记、形式辅助标记、地名辅助标记、时间辅助标记、属性辅助标记、材料辅助标记等。根据这一体系类分作品时,可以将辅助符号加在主要分类号后,更灵活地组配成新的主题概念。

《冒号分类法》由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编制于20世纪30年代。其基本特征是采用分面分析法和分面标记法。所谓分面分析法是将人类知识的基本大类分成若干侧面,如本体、物质、能量、空间、时间,每一侧面再分成若干焦点。在对作品进行分类时,图书馆员可以将作品所讨论的焦点的符号组配起来,以此表达完整的作品内容[29]。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由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倡议,全国36家单位共同编制,初版于1975年。整个分类体系包括5大部类、22个大类。所有类目均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混合类号表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5大部类如下:

-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哲学、宗教
- 社会科学
- 自然科学
- 综合性图书

它的 22 个大类如图 2.2 所示。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B 哲学、宗教
C 社会科学总论
D 政治、法律
E 军事
F 经济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地理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
U 交通运输
V 航空、航天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Z 综合性图书

图 2.2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 22 个大类

3. 分类方法在知识组织整理中的应用

在知识组织整理中，分类方法有许多实际用途。首先，它经常被用来组织文献实体，将图书馆或其他机构收集的文献排列成有序的集合。按类排列的文献集合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辅助知识的查找。首先，它可以帮助用户从文献集合中快捷地找到已知文献的位置。假定一个用户需要从 200 万册的、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组织的馆藏中找到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他(她)只需找到历史学(K类)文献的位置，再找到中国历史类就可以比较快地找到所需文献了。对于熟悉这一分类体系的用户来说，这个过程只需很短的时间。其次，按分类体系排列的文献集合还有助于用户发现与其需求相关的未知文献。例如，在查找范文澜《中国通史》的时候，用户会发现位于该书周围的、讨论同样内容的著作，这就可能将用户的注意力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扩展到其他相关著作。很多研究都发现，这种按类浏览以期发现有用情报的方法是用户常用的查找方法[30,31]，被称为意外情报发现法(information search by serendipity)。

分类法的第二个基本用途是用来组织网上虚拟文献。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互联网上的很多检索工具都采用这种方法，其目的是辅助用户按类浏览相关资源。很多系统选用成熟的图书馆分类法作为分类依据，但也有一些系统采用自编分类法。目前用于组织网上文献的分类法大致包括以下类型(表 2.3)[32]：

- 国际通用分类法，如杜威十进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
- 国家通用分类法，如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 专门学科分类法，如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分类法
- 自编分类法，如 Yahoo 采用的自编分类法

表 2.3　分类法在网上资源组织整理中的应用举例

分类法	系统举例
杜威十进分类法	Canadian Information by Subject. Ottawa: National Library of Canada. <URL:http://www.nlc－bnc.ca/caninfo/esub.htm> • CyberDewey: a Catalogue for the World Wide Web. David A Mundie <URL:http://ivory.lm.com/~mundie/DDHC/CyberDewey.html> • The Internet Resource.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Library. <URL:http://www.napier.ac.uk/depts/library/intres/ir000999.html> • Internet Resources in Dewey Decimal Order with DDC Subjects. Independence, Mo.: Mid－Continent Public Library <URL:http://www.mcpl.lib.mo.us/dewey.htm> • Biz/ed. Bristol: University of Bristol <URL:http://www.bized.ac.uk/>
国际十进分类法	BUBL:<URL:http://www.bubl.bath.ac.uk/BUBL/home.html> • GERHARD:<URL:http://gerhard.bis.uni－oldenburg.de/> • NISS Information Gateway: <URL:http://www.niss.ac.uk/subject/index.html> • OMNI:<URL:http://www.omni.ac.uk/> • SOSIG:<URL:http://sosig.ac.uk/>
国家通用分类法	Nederlandse Basisclassificatie Web <URL:http://www.konbib.nl/basisclas/basisclas.html>
专门学科分类法	OMNI (Organising Medical Networked Information) service: <URL:http://www.omni.ac.uk/>.
自编分类法	Yohoo

分类方法的第三个基本用途是提供描述作品内容的语言，即分类语言。自19世纪末以来，这种分类语言一般都采用分类号的形式。作为知识描述语言，分类号是独立于自然语言的人工语言，因而可以被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及不同语言的检索软件所解读。例如，一个了解杜威十进分类法的用户，即使不懂英文，也能判断一份标有“025”分类号的英文文献的大致内容。同样，一个跨语言检索系统，即使不具备翻译功能，也能断定一份标有“025”杜威分类号的英文文献和一份标有G20《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分类号的中文文献是相关文献。

分类方法的第四个基本用途是提供从分类即学科角度查询文献和知识的检索工具。关于分类法的这一用途，将在下小节详细阐述。

三、图书馆职业的知识描述

1. 图书馆职业知识描述的含义

图书馆职业的知识描述是对作品的主题内容及其物化形式(即文献的实体特征)进行揭示的方法[33]。对作品内容的描述揭示着作品的知识属性(intellectual attribute),为用户提供从概念或学科入手检索文献的途径;对文献实体特征的描述揭示着文献生产过程的属性(如作者、出版者)和存在状态的属性(如大小、网址),为用户提供从概念以外的其他因素入手检索文献的途径。这两种描述共同构成图书馆职业的知识描述。

图书馆职业知识描述的结果是形成用来检索文献集合的书目记录(bibliographic record)。有些图书馆学文献也将这种记录称为原始文献替代品(surrogate)[34]。正是通过对原始文献及其替代品的组织,图书馆职业实现着"聚合相同或相似知识、区分不同知识"的目标。

2. 作品主题描述

图书馆职业对作品进行描述的目的不是简单重复作者的描述,而是采用图书馆职业的特殊语言对作品的内容特征(aboutness)做出高度浓缩的概括性描述。图书馆职业用于知识描述的特殊语言称为情报检索语言。这种语言与自然语言有共同之处。它们也以词汇为基本建筑材料,而且大多数词汇都选自自然语言,词汇的语义也以它们在自然语言中的语义为依据,因而情报检索语言中的词汇无论从外形还是从语义都与自然语言中的词汇相似。但是,与一般自然语言不同,情报检索语言较少使用句法。所以,对于特定的作品内容,图书馆职业做出的描述通常是一组特别选择的词汇或短语,而不是一组句子。20 世纪 60～70 年代,很多机构采用计算机辅助编制印刷式书目工具,为了保证由此形成的知识描述具有更加明确、单纯的含义,这段时间出现的一些情报检索语言(如保持上下文索引语言,简称 PRICIS)曾大量采用句法要素,严格规定不同词汇的结构和次序,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情报检索语言的句法数量和复杂程度也无法与自然语言的句法相比。情报检索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大多数情报检索语言都对它们选择的词汇和语义进行规范化处理,以消除自然语言中的模糊和歧义现象。

根据情报检索语言对其词汇和语义的规范化程度,可以将图书馆职业的描述语言分为自然语言和受控语言。自然语言指按作者选用的词汇及其语义,从文献中择取反映作品主题的词汇或短语,不经规范化处理,直接用来描述作品内容的语言。关键词语言就是图书馆职业采用的比较典型的自然语言。由于不需要对词型词义进行规范化处理,用自然语言进行的知识和信息描述不仅速度快、效率高,而且比较容易实现自动化。因此,自然语言描述方法在当代知识和信息的组织整理

中应用非常广泛。

但是,自然语言的最大局限是它的歧义性和模糊性。自然语言中的绝大多数词汇都具有不同的语义,可以指代不同的事物;同样,现实中的很多事物也可能具有不同的称谓。在知识交流过程中,这种歧义性和模糊性意味着,不同作者之间、不同图书馆专业人员之间、图书馆专业人员与作者之间、用户与作者之间、用户与图书馆专业人员之间都可能出现知识描述的分歧。利用这样的描述进行知识查询,用户就可能因一词多义查出无关文献,或因一义多词或一词多型而漏检相关文献。例如用英语查询有关土耳其(Turkey)的知识,可能得到大量有关火鸡(Turkey)的信息;用"印度尼西亚"查询有关这个国家的知识,可能遗漏那些使用简称"印尼"的文献;用"互联网"查询相关知识可能遗漏使用"Internet"或"因特网"的文献。互联网上的很多搜索引擎(如 Yahoo)都使用自然语言描述法,检索效果经常令人失望。

受控语言指采用经过规范化处理的词汇及语义描述作品内容的语言。受控语言的规范化包括若干方面。首先要规范词汇的词型,例如全称及简称的规范化、英文中单数及复数的规范化等;其次要规范同义词和同型异义词,如 Turkey(国家)与 Turkey(鸟)的规范,使每个选用的词汇都具有确切无误的含义;再次要对词汇在语义网中的位置进行揭示,显示每个词汇与其他词汇的上下隶属关系和相关关系。这种规范的目的是为了聚合相近、相关知识,保证用户在其知识查询中能查出与需求相近、相关的知识,例如保证查询巴以冲突的用户能查到有关中东局势的文献。图书馆职业采用的受控语言通常都以受控词表(controlled vocabulary)的方式固定下来,作为图书馆职业人员描述作品主题时的依据。图 2.3 列出了一份受控词表的片段。

按词汇形式,受控语言又可分为分类语言、标题语言和叙词语言等。分类语言采用分类号描述作品内容,规范分类语言的词表就是上节所讨论的各种分类法,如《杜威十进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在采用分类语言描述作品主题的时候,图书馆专业人员首先要分析作品的主题,再根据作品主题并对照选用的分类法,将作品归入分类体系的适当位置,然后将标志这一位置的类号赋予该作品,由此形成对该作品的分类描述。

标题语言是从通用自然语言中选择比较定型的词、词组或短语,并对这些词、词组或短语进行词性和语义的规范化处理而形成的,用来表达作品主题的描述语言[35]。规范标题语言的受控词表称为标题表。在利用标题语言描述作品主题时,图书馆专业人员首先要分析作品主题,再对照标题表中的标题词和非标题词(即可用标题词和不可用标题词),将适当的标题词赋予被描述的作品。当前国际上较有影响的标题词表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标题表》("*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LCSH*)、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医学标题表》等。《国会图书馆标题

表》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了组织自己的馆藏资源于 19 世纪末编制的。该标题表收录的标题涵盖所有学科领域，标题类型包括单一名词或术语、带形容词的名词、带介词的词组、复合词组或连词词组、短语或短句[36]。

片段 1

普查
Census
　D 全面调查
　F 快速普查
　　人口普查
　　设备普查
　　牲畜普查
　　物资普查
　S 专门调查
　Z 统计调查
　C 标准时点
　　非全面调查
　　基本统计

片段 2

生产资本
Productive capital
　D 生产资本的循环
　F 不变资本
　　固定资本
　　可变资本
　　流动资本
　S 产业资本
　Z 资本
　C 货币资本
　　商品资本

片段 3

农村金融
Agrarian finance
　F 农贷
　　信用合作社
　S 金融
　Z 部门经济

农村集市贸易
Rural village fair trade
　Y 集市贸易

图 2.3　受控词表例示

注：选自《汉语主题词表》第一卷 社会科学 第一分卷 主表，1980 年。在《汉语主题词表》中，D 代表代项符号；F 代表分项符号；S 代表属项符号；Z 代表族项符号；C 代表参项符号；* 代表族首词符号；Y 表示从非正式主题词指引到正式主题词

叙词语言是从自然语言中选取词或词组，对这些词或词组进行规范化处理，并通过这些词或词组之间的组配来描述作品主题的情报检索语言。对叙词语言进行规范化处理的受控词表称叙词表。在利用叙词语言描述作品主题时，图书馆专业人员首先要分析作品主题，再对照叙词表的规定，将若干适当的叙词赋予被描述的作品。查询知识时，再将不同的叙词组配起来，按这些叙词间的组配关系查出相关文献。《汉语主题词表》是我国编制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叙词表。该表编制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当时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组织和主持编制，自 1980 年出版以来，始终是我国图书馆界情报界描述知识的重要工具。

3. 文献实体特征的描述

文献实体特征的描述是采用规范化的描述语言，对文献生产过程的特征（如文献的作者、出版者、文献题名）以及文献的状态特征（如文献的长度和印刷式文献的开本等）的描述。这种描述的目的是为用户提供检索、确认和获取文献的途径。

为了帮助用户准确地检索、确认和获取文献，文献实体特征的描述也需做到规范、系统、一致。不一致的描述将导致知识查询困难。例如，如果作品“红楼梦”有时被描述为《红楼梦》，有时被描述为《石头记》，用户就无法查到该作品的所有文献；同样，如果作者“苏东坡”有时被描述为“苏东坡”，有时被描述为“苏轼”，用户也

无法查到该作者的所有文献。

对文献描述进行规范化处理是"文献著录条例"的一项基本功能。著录条例是由图书馆职业团体制订的,据以记录文献内容和外部特征的规则。它对文献描述进行的规范化包括若干方面。首先,它规定着一份描述应该包括的事项(即著录事项),这相当于情报检索语言中所收录的词汇;其次,它规定着每个事项应该采用的形式,如可以采用的著者姓名(真实姓名或常用的笔名)、题名(例如用《红楼梦》而不用《石头记》)、出版商名称等(如用"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而不用"LA Publishing"),这相当于情报检索语言中的词型控制;第三,著录条例规定着对被选用的事项名称进行限定的方法,例如在作者名称后加注释,使用户确知"苏轼 = 苏东坡","John Smith(1950)"不同于" John Smith (1930)"等,这相当于情报检索语言中的语义控制;第四,著录条例规定着著录事项之间的结构和次序,如作者和题名的先后次序,作者的姓和名的先后次序,这相当于情报检索语言中的句法控制。

当前,在世界图书馆界较有影响的文献描述语言有"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英美编目条例"(AACR2)等。英美编目条例是一套描述英文文献的规则及其操作方法,由英、美、加三国图书馆协会协商制定,1967 年出版第一版(AACR);1978 年出版第二版。第二版条例对第一版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并改称 AACR2[37]。AACR2 首先规定了各类著录事项的选用规则、事项含义的限定方法、事项次序;其次规定了这些规则在描述不同文献类型(如图书、小册子、地图)时的操作方法。

在我国图书馆界应用比较广泛的文献描述语言是《文献著录总则》及其分则。《文献著录总则》及其分则由全国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委员会提出,并由该委员会第六分会起草制定,是我国文献著录的国家标准。总则于 1983 年发布,1984 年 4 月开始实施,各分则在此后陆续发布和实施。总则规定了著录事项的选用、著录格式等一般原则;分则规定了这些原则在描述不同文献类型时的操作方法。

4. 描述方法在知识组织整理中的应用

在知识组织整理中,描述方法的首要用途是生成和组织书目记录,提供检索入口。如前所述,书目记录是揭示原始文献内容及外部特征的记录,每条书目记录都对应着一份或一组特定的文献。检索入口是用来检索书目记录的描述事项,如著者姓名、题名或概念、分类号等。

作品内容的描述分别提供着从学科和概念(主题)入手查询知识的途径,当分类语言(即分类号)作为检索入口时,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给出的分类号,查出与此分类号相匹配的所有作品及其文献,或辅助用户浏览特定类目下的所有文献,直到找到相关文献。当主题语言作为检索入口时,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给出的关键词、标题词或叙词,查出与给定概念或概念组合相匹配的所有作品及其文献。与分类语言

检索入口相比,主题语言检索入口可以同时查出分散在不同学科领域的、有关同一主题的作品和文献。例如,用“转基因食品”作为检索入口,可以同时查出分散在农业、经济、食品加工、伦理、医学等领域的相关文献。所以,分类语言和主题语言作为检索入口,可以相互补充,提高检索效率。

文献实体特征的描述提供着从文献题名、作者、出版者等角度查找文献的途径。这样的检索入口不仅可以帮助用户较快地检索出已知的具体文献,而且可以集中检索出一个作者的所有作品,一部作品的所有文献,或一份文献的所有版本等。

描述方法在知识组织整理中的第二个用途是帮助用户确认和获取文献,即帮助用户确定查出的文献是否确实满足他(她)的需要:内容是否相关、载体是否合适、版本是否正确等。

四、图书馆职业的知识和信息编码

1. 图书馆职业知识及信息编码的含义

图书馆职业的知识与信息编码是指将描述作品主题内容和文献实体特征的数据转换为机器(如计算机)可以识别、接受和处理的代码[38]。在计算机文献编目和查询中,编码可以保证每个数据要素都能被置于计算机生成的书目记录的合适位置,并保证计算机能在用户指定的范围内进行查询。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之所以允许用户指定检索范围(如全面检索、作者检索、主题检索),并能将相关文献的书目数据按特定格式加以显示,就是因为图书馆专业人员已经将这些书目数据转化成了计算机可以识别的代码。编码是图书馆实现知识组织整理自动化的基础。

20 世纪 40 年代出现的穿孔卡片技术可以说是图书馆职业编码技术的雏形。这种技术的基本原理是用卡片上特定方位的孔洞代表作品主题,检索时以手工或机械装置穿过孔洞的方法来实现相关文献的检索。20 世纪 40 年代末,在英国出现的 Mooers Zator 穿孔卡检索系统就是按这种编码原理设计的。在这个系统中,每一条书目记录(卡片)的周围都打有两种孔洞(代码),每个孔洞代表一个类目。其中与作品内容对应的类目被打成带豁口的孔洞,而其他类目则被打成圆形孔洞。这样,当检索装置穿过相关作品的类目孔时,卡片就会掉落。掉落卡片上所描述的文献就是检索出的相关文献[39]。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种编码技术很快便被适用于计算机的编码技术所取代了。

2. 当代图书馆职业的编码技术

(1) 机读目录编码技术。继穿孔卡片技术之后,20 世纪 60 年代,图书馆职业又研制出了运用计算机编制图书馆目录的编码技术——机读目录(machine readable catalog,MARC)格式。这是一种以编码形式按特定结构将书目信息记录在磁

带等计算机存储介质上，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书目记录的格式。它是当代图书馆用户十分熟悉的联机公共目录(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 OPAC)的幕后形态。

世界上最早的机读目录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于20世纪60年代末研制的USMARC。在USMARC问世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根据USMARC的技术，制定了本国的机读目录格式。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介绍USMARC技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进美国国会图书馆MARC磁带。1986年，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制定了《中国机读目录通信格式》，开始了我国机读目录的生产和应用[40]。

机读目录格式通常用三位十进制数字组成的标识符(称作Tag)来标识书目数据的性质(如100表示作者)，这些标识符，加上其他的指示符号(如书目数据要素的间隔符号)就构成了机读目录的标识(即编码)系统。在向计算机输入书目数据的时候，只要把相应的标识符赋予每项书目数据，计算机就可以分辨书目数据的性质。当用户使用联机公共目录获得一定检索结果的时候，计算机就可以根据事先确定的著录规则(如AACR2)，将各项书目数据分别放置到合适的位置，以用户可以阅读和理解的方式加以显示。图2.4所列是一条取自英国拉夫堡大学图书馆目录数据库的UKMARC书目数据，图2.5是这条记录在联机公共目录终端的显示。

FMT	BK
LDR	nx 22 zn 4500
001	0872871738
005	20020618135137.0
008	760616s1976 xxu a 0 eng
020	|a 0872871738
08204	|a 020
089	|a 020
1001	|a Shera, Jesse Hauk
24510	|a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b basic elements of library service
260	|a Littleton, Colo : |b Libraries Unlimited, |c 1976
300	|a 208 p ; |c 24 cm
4900	|a Library science text series
504	|a Includes bibliographies and index
65000	|a Library science
65000	|a Libraries
65000	|a Information services
LKR	|a UP |b 000697752 |r 787 |n Library science text series |m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OWN	|a PUBLIC
CAT	|c 20010617 |l LBO01 |h 2214
CAT	|a LBMMB |b 00 |c 20020618 |l LBO01 |h 1351
SYS	000266127

图2.4 一份文献的MARC编码

ISBN/ISSN	0872871738
Main Entry	Shera, Jesse Hauk
Title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 basic elements of library service
Imprint	Littleton, Colo : Libraries Unlimited, 1976
Series	(Library science text series)
Note	Includes bibliographies and index
Location	020/SHE :
Uplink	Library science text series

图 2.5　图 2.4 中的文献在联机公共目录中的显示格式

MARC 技术对图书馆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仅实现了编目过程本身的自动化，而且为其他图书馆活动的自动化奠定了基础。文献流通、期刊管理等的自动化都要求图书馆拥有一套完整、准确的机读目录。此外，机读目录的出现还为图书馆编目的合作组织，如 OCLC，提供了规范化的计算机编目格式，从联机合作编目开始，图书馆合作翻开了新的一页：合作区域日益扩大，合作内容也日益广泛[41]。

(2) 元数据编码技术。在很多文献中，元数据被定义为关于数据的数据。元数据是随着数字化资源而出现的概念，所以，图书馆职业所说的元数据事实上指揭示和描述数字化资源的一组书目记录。典型的元数据要素包括 HTTP，著者、题目、著作日期、关键词等。元数据格式(metadata format)就是用来规定数字化资源的描述事项并用特定代码标识这些事项的标准，是机读目录格式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延伸。目前存在许多描述数字化文献的元数据格式，较有影响的包括 Dublin Core，MARC，TEI 等。

Dublin Core(我国译作都柏林核心集)是由图书馆界、出版界、计算机领域、网络通讯领域的专家于 1995 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的 Dublin 共同制定的元数据格式。制定 Dublin Core 的目的是寻求一套简单灵活、便于非图书馆专业人员使用的描述网络信息的格式。Dublin Core 标识的书目数据包括文献题名、著者、主题和关键词、出版者、文章的摘要或图像的内容、来源、与其他作品的关联、出版日期、作品公开发表的日期、语种、作品格式等基本内容。

1992 年，鉴于当时的 USMARC 尚不能充分描述日益增长的数字化资源，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图书馆协会和 OCLC 的专家提出了在 USMARC 中增加"电子定位与存取"字段的建议。此项提议于 1993 年获得通过，将 MARC 的适用范围从印刷式资源扩大到数字化资源，也使 MARC 成为数字化环境下一种重要的元数据格式。MARC 比 Dublin Core 复杂得多，但也严谨得多。目前主要被图书馆职业人员用于组织数字化资源。

(3) 文献编码技术。文献编码技术是对电子文献的内容要素和结构等特征进行标识，以便计算机能够辨认和适当处理这些特征的技术。图 2.6 所列是一段用

可扩展标识语言(XML)编码的文献。文献中采用的代码,如"＜title＞新时期大学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创新＜/title＞"中的"＜title＞,＜/title＞"被称为标识符(Tag)。

```
<? xml versioin="1.0" encoding="gb2312"? >
<article>
<title>新时期大学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创新</title>
<author>
<affiliation>南开大学</ affiliation>
<name>于良芝,郝玉峰</name>
</author>
<abstract>
本文综述了过去十年英美等国大学图书馆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而进行的教育功能的创新。研究发现,教育功能的创新已经使英美等国的大学图书馆更直接、更主动、更全面地参与到教学过程,除了继续履行其文献保障功能外,图书馆还是大学开展终身教育、传授通用技能、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
</abstract>
<keyword>高校图书馆;教育功能</keyword>
```

图 2.6 XML 文档例示

标准通用标识语言(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SGML)、可扩展标识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XML)和超文本标识语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是目前最常见的文献编码技术。SGML 是一组对文献的要素和结构进行标识的国际通用规则,是 ISO 在 1986 年颁布的国际标准(ISO 8879)。与各种应用系统(如文字处理系统或出版系统)中的标识不同,SGML 本身不是一种标识语言,而是生成这种语言的规则。它的"文档类型定义"性能允许用户自由定义文档中的数据要素。例如,对于一份关于学生成绩的文献,SGML 可以通过"文档类型定义"来确立文档中的学生姓名、班级、科目等要素。根据这一定义,计算机就能够识别文档中各要素的含义。因此,SGML 具有强大的语义描述功能。对于图书馆职业来说,这种语义描述功能的用途是显而易见的:文献用户可以针对任何要素进行全文检索,也可以通过数据要素的组配实现更加精确复杂的全文查询。

XML 和 HTML 都是从 SGML 派生的电子文献标识语言,XML 继承了 SGML 的基本原理,可以自由定义数据要素,因而也具有强大的数据描述功能,但比 SGML 简单得多,适用于万维网网页的制作。HTML 是 XML 出现之前专为万维网网页制作而设计的。与 SGML 和 XML 可以自由定义数据要素不同,HTML 的标识符是固定的,因而数据描述功能和查询功能远不如 SGML 和 XML。

五、引文索引法

如前所述,知识之间的引用是一种普遍的智力活动。在学术文献中,知识的引用关系通常表现为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因而,在引用与被引用文献之间一般存在主题关联性,正是这种关联性,使引文成为一种有效的检索入口[42]。

引文索引法就是根据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组织整理知识的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从曾经发表的特定文献中摘录著者引用或参考过的资料，加以编排，形成从引文、被引文献和其他书目数据入手检索相关文献的工具。20 世纪 50～60 年代，著名情报学家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首先将这种方法用于组织正式的情报检索系统。那时，加菲尔德受聘于美国 Armed Forces Medical Library（今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集中研究计算机自动生成文献索引的技术。在这项研究中，加菲尔德越来越相信引文对于知识查询具有很大的价值。60 年代初，加菲尔德与同事们建立了两个试验型引文索引系统：一个是化学专利引文索引库，另一个是基因学文献引文索引库。1963 年，由加菲尔德领导建立的 ISI(The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开始发行科学引文索引(SCI)，1972 年开始发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最初的 SCI 和 SSCI 均为印刷式，目前它们各有许多版本，包括 CD－ROM 版、联机版和网络版。随着网络版的问世，ISI 的产品已可以将用户从引文直接导向被引用的原始文献（假定该文献已存在电子版，而且用户也具有使用权），更增强了引文法对于知识组织整理的价值。

第四节　知识组织整理的产品

一、文献有序集合

在对作品和文献进行分类、描述等组织整理之后，图书馆专业人员按特定标准将文献实体有秩序地安排在一定的物理空间内，就形成了文献实体的有序集合。正如字词的查询有赖于词汇的有序排列，知识的查询也有赖于文献实体的有序排列。

作品的学科类别是图书馆职业最普遍采用的文献排列标准。在分类过程中，图书馆专业人员根据每份作品的内容确定了它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并赋予该作品及其文献适当的分类号。在组织文献实体的时候，图书馆工作人员就可以按照文献分类号的大小，依次将文献安排在适当的物理空间上，并将新入藏的文献对号入座地归入适当位置。这样安排的结果就会使同一学科内容的文献集中在同一物理空间上。检索文献时，用户可以依号找到需要的文献。由于在空间上实现了相同或相关作品的聚合，按分类排列的文献集合可以帮助用户在浏览中发现相关文献。

文献题名或作者的名称字顺也经常被用做排列文献实体的依据，如公共图书馆的小说馆藏一般按作者的姓名字顺排列。有些文献集合也可能按文献类型排列，例如参考馆藏经常按文献类型分别集中百科全书、字典词典、索引等；有些文献集合可能按文献序号排列，例如专利文献经常按专利号排列。

二、图书馆目录(library catalogue)

图书馆目录是揭示、报道、检索馆藏文献的工具。图书馆员是按一定原则对图书馆收集的作品和文献进行描述,生成书目记录并按一定次序编排这些书目记录,即可形成图书馆目录。正如不同的查字法能查出指定词汇并揭示该词汇在字典中的确切位置,在知识查询中,图书馆目录可以检索出用户所需的文献,并揭示该文献在馆藏文献中的确切位置。

作为知识组织整理的产物和知识查询的工具,图书馆目录具有多重功能。最早对图书馆目录的功能进行系统表述的是19世纪著名美国图书馆员卡特[43]。卡特将图书馆目录的功能归纳为三个方面:查询功能,即保证用户能够查询到已知作者、题名或主题的图书;聚合功能,即揭示图书馆对于某一特定作者、某一特定主题或某一类型的文献拥有哪些馆藏;选择功能,即帮助用户根据图书的版本或其他特征选择图书。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卢贝茨基(Lubetzky)以"作品(work)"的概念代替卡特的"图书"概念,将作品(而非图书)确定为"同则聚,异则分"的基点[44]。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更替,它使图书馆目录的知识组织功能更加突出。1997年,考虑到非印刷式文献的增长趋势,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重新表述了图书馆目录的功能,特别增加了获取功能,即从书目数据获取文献全文的功能。2000年美国学者斯文诺纳斯(Svenonius)在讨论信息组织整理的原理时又增加了导航(navigate)功能,即通过书目数据间的等同、相关、等级关系从已知作品导向其他作品的功能。这样,图书馆目录的功能就扩展为以下几个方面[45]:

- 确认:确认目录所描述的作品或文献是否确为查询的对象。
- 聚合:即揭示图书馆对于某一特定作者、某一特定主题或某一类型的文献拥有哪些馆藏。
- 选择:选择能满足用户需求的作品或文献,排除与用户需求无关的作品或文献。
- 获取:通过文献购置,文献传输,数字化文献的存取获得文献。
- 导航:通过书目数据间的等同、相关、等级关系从已知作品导向其他相关作品。

最早的图书馆目录多是手写的书单。随着文献的增长和印刷技术的出现,这种书单又演化成印刷式的书本目录。由于书本式目录的编制、维护和更新都很费时费力,到20世纪初,除了涉及多个图书馆的联合目录仍保留书本形式外,一般图书馆都逐渐采用卡片式目录。卡片式目录相对于书本式目录具有很多优点。首先,同一张卡片可以经多次复制后,按不同的检索入口排列成不同种类的目录,因而编制起来相对容易;其次,新文献的目录卡片可以随时插进已有卡片系列的合适位置,因而更新和维护起来也相对容易。20世纪60～70年代,不少西方图书馆还

使用过一段时间的缩微胶片目录，但这种目录很快就被联机公共目录所取代。在联机公共目录中，经过编码的书目数据要素被贮存在计算机存储介质上，检索时，用户可以从任何数据要素（检索入口）入手进行查询，检索结果则以便于用户阅读的格式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起初，这种联机公共目录还只能在图书馆的局域网上使用，用户查询目录必须亲自到图书馆查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图书馆通过互联网向本馆和远程用户提供联机公共目录查询。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通过互联网查询的联机公共目录一般都采用万维网界面。互联网和万维网环境下的联机公共目录不仅可以揭示本馆贮存的文献，而且可以将本馆授权使用的远程文献和经本馆专业人员筛选的网上文献纳入图书馆目录体系；不仅支持各种资源的一体化检索，而且可以从书目数据将用户直接导向全文电子文献。

随着远程查询成为可能，不同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的标准化（如检索方法和显示格式等的标准化）就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目前，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化还远未实现，但是，Z39.50 协议（一个支持远程跨数据库检索的网络协议，通常用于书目数据库的检索）已经使用户可以在同一用户界面下查询不同图书馆的联机公共目录。只要查询端和被查询端皆安装了 Z39.50 协议，用户就可以用本地联机目录的检索指令远程地查询其他图书馆的联机目录，而不必知晓对方联机目录的检索指令。

三、书目、索引、文摘

书目（bibliography）是对一批相关文献进行著录并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检索工具[46]。一般情况下，同一份书目所报道的文献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关性：它们或者关于同一主题，或产生于同一作者，或属于特定的时代，或出于同一出版者，或因其他因素而相关。

索引（index）是用来揭示文献的主题（topic）或特征（feature），以便于用户能够检索文献或文献组成部分的系统的指南[47]。与其他检索工具相比，索引主要被用于揭示那些在一份实体文献中包含了若干作品的文献类型（期刊或文集），索引描述的对象是这些文献中包含的独立的作品（如期刊论文）及其出处。在索引中，每一份描述被称为一条索引款目。尽管有些索引也揭示、报道完整的实体文献，但索引的主体通常是揭示文献组成部分的款目。

文摘（abstract）是对一份作品的内容所做的简略、准确的描述。在用于检索目的时，特定作品的文摘一般与其索引款目结合使用，文摘型检索工具就是由文摘和索引款目共同构成的检索系统。在这种系统中，用户既可以针对索引款目也可以针对文摘或同时针对两者进行检索，对于检索出的文献，用户可根据文摘中的描述确认文献相关性，根据索引款目中的描述确定文献出处。

书目、索引和文摘检索工具均有印刷式和电子式两种形态，但自 20 世纪 60 年

代以来,电子式的书目、索引和文摘工具越来越普遍。目前的电子式又有两种主要版本:CD-ROM 版和网络版。很多书目、索引和文摘工具都同时发行 CD-ROM 版和网络版。

与图书馆目录不同,书目、索引、文摘揭示的文献通常不限于特定的图书馆,因而,它们可以把在空间上分散的作品和文献加以集中揭示。正因为如此,书目、文摘、索引是图书馆员和用户进行知识查询的重要工具。

四、全文数据库

全文数据库是贮存全文文献并支持全文自然语言检索的数据库。全文数据库中每份文献的记录一般包括标题信息(header)和全文文献。标题信息描述该文献的书目数据和文摘,全文文献则是以文本形式或图像形式存在的作品的全文。利用全文数据库检索时,用户既可以针对标题信息进行检索(这样的检索相当于使用索引文摘型数据库),也可将自己的需求表达为词语或词语的组配形式,然后在全文部分检索。所有文本形式的全文数据库都支持全文检索。由于全文检索比标题信息检索速度慢,而且检索过程使用的自然语言往往影响检索效果,因而,即使在全文数据库中,标题信息检索依然是重要的检索途径。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大型电子期刊项目"TULIP"的发现之一,就是在 TULIP 的全文数据库中,用户对标题信息的利用率大大超过对全文的利用率[48]。

参 考 文 献

1 兰卡斯特. 情报检索系统——特性、试验、评价. 陈光祚等译.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2 Lancaster F W. Indexing and abstract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1998

3 宓浩等. 图书馆学原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4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15~17

5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6 Pedersen S. Where, when and why: academic authorship in the UK? Journa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1998

7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8 Taylor A G.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Englewood, 1999

9 Svenonius E.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10 Richmond P A. General theory of classification. In: Bengtson B G, Hill J S ed. Classification of library materials: current and future potential for providing access.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0: 17~26

11 Taylor A G.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Englewood: Libraries Unlimited 1999

12 Taylor A G.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Englewood: Libraries Unlimited 1999

13 Scheler M. Cited in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 Wiley, 1972

14 Machlup F.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15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16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17 克里斯特尔,戴维著,沈家煊译. 现代语言学词典. 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

18 Young H. The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hicago: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3

19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20 Simpson A. Academic Journal Usage. British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1988,3(1): 25~36

21 Jenkins C. User studies: electronic journals and user response to new modes of information delivery. Library Acquisitions: Practice and theory, 1997, 21 (3): 355~363

22 Tenopir C, King D W. Designing electronic journals with 30 years of lessons from print. Journal of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98, 4 (2)

23 Jenkins C. User Studies: Electronic journals and user response to new modes of information delivery. Library Acquisitions: Practice and theory, 1997, 21 (3): 355~363

24 Tenopir C, King D W. Designing electronic journals with 30 years of lessons from Print, Journal of Electronic publishing , 1998, 4 (2). http://www.press.umich.edu/jep/04-02/king.html (2003/3/22)

25 Richmond P A. General theory of classification. In: Bengtson B G, Hill J S, ed. Classification of library materials: current and future potential for providing access.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0: 17~26, 18

26 Taylor A G.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Englewood: Libraries Unlimited 1999

27 Taylor A G.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Englewood: Libraries Unlimited 1999

28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Web site, Introduction to the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2003. http://www.oclc.org/dewey/about/about the ddc.htm (2003/3/5)

29 阮冈纳赞著,宋克强, 许培基译. 冒号分类法解说及类表.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30 Goodall D. Browsing in public librarie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atistics Unit. Loughborough, UK. 1989

31 Eason K, Richardson S, Yu L. Patterns of use of electronic journal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0, 56 (5): 477~504

32 Brümmer A, et al. The role of classification schemes in Internet 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discovery, 1997. http//: www.ukoln.ac.uk/metadata/desire/classification/ classification.pdf (2002/10/22)

33 Svenonius E.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34 Taylor A G.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Englewood: Libraries Unlimited 1999

35 Rubin R.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8

36 Rubin R.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8

37 来新夏主编.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词典.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38 Young H. The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hicago: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3

39 兰卡斯特. 情报检索系统——特性、试验、评价. 陈光祚等译.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40 傅守灿,陈文广. 图书馆自动化基础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1 Borgman C L. From acting Locally to thinking globally: a brief history of library automation. Library Quarterly, 1997,67(3):215~249

42 Garfield Eugene. Citation indexing, it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Philadelphia : ISI Press, 1983

43 Svenonius E.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44 Svenonius E.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45 Svenonius E.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46 来新夏.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词典.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47 Rubin R.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8
48 Borghuis M, et al. Tulip final report. 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1996

第三章　图书馆的发展

第一节　图书馆的演化

一、与档案馆一体化的古代图书馆

很难确切断定图书馆具体始于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用文字在天然实物(如甲骨、纸莎草、泥板等)上记事，就产生了文献。最初的文献主要用来记录政令、法令、外交文书、征供纳税、宗教仪式等，因而主要集中于王宫（或政教合一的寺庙）。文献一经积累就需要专门的收藏处所和专门的管理人员，这就产生了最早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

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3800年～前3500年时的古埃及，以及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苏美尔都设有书库文牍、文献管理员(masters of the books, keepers of the tablets)一类的职务，说明那时已有专事文献管理的机构和人员[1,2]。

在美索不达米亚附近发现的公元前30世纪时的苏美尔寺院图书馆是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图书馆[3]。根据文献猜测，该馆可能是一个收藏商业记录、宗教文献和部分医药、数学书籍的档案馆。在开罗附近的阿马拉(也译作阿玛尔那)出土的埃及18王朝(公元前1567～前1320)时的王宫图书馆也是人类历史上较早的图书馆。该馆收藏着用楔形文字记录的埃及与古巴比伦、亚述等国交往的外交文件[4]。1889年，在我国河南的安阳挖掘出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书机构，也是世界上较早的图书馆。除此之外，在小亚细亚一带，还发现了古赫梯(Hittie)王国的国家图书馆，里面藏有年表、法典、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外交文书等[5]。在巴格达附近还发现了公元前10世纪时的泥版文书收藏机构的遗址。

这些历史遗迹表明，人类早期的图书馆主要收藏以天然物质(如纸莎草、泥板、甲骨)为载体、以政令、法令、征供纳税、宗教仪式等为内容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实际上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档案资料，所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也是最早的档案馆；图书馆和档案馆一体，依附于王宫或寺庙，文献的利用范围极其狭小。

二、独立意义上的古代图书馆

1. 独立意义的古代图书馆的形成

独立意义的古代图书馆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图书馆：以收藏学术文献为主、充当学术研究中心、向一般社会成员开放、可以为私人所拥有。这些特征已与档案馆的特征相去甚远，因而可以视作独立意义上的图书馆的特征。没有人能确切断定古

代图书馆在什么时候脱去了档案馆的色彩而成为独立意义上的图书馆，但根据图书馆史研究似乎可以断定，公元前最后几百年，在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两河流域，古埃及和中国）出现的图书馆已经明显具备独立意义的图书馆的特征。

公元前600年左右，亚述国王阿舒尔巴尼拔在首都尼尼微建立了一座皇宫图书馆——史称尼尼微图书馆。尼尼微图书馆建立之时，阿舒尔巴尼拔下令广搜文献，供奴隶主、官吏、学者使用，使馆藏泥板图书多达3万多块，是当时收藏泥板藏书最多的图书馆。该图书馆已开始按照粗略的主题分门别类安排图书，把不同主题的图书放在不同的房间里，房间的墙壁上刻有粗略的排架目录，以供查检，我国学者杨威理把它称作第一所"真正的古代图书馆"，"一所像样的图书馆"[6]。

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也是当时的世界学术中心。该馆始建于公元前308年，至托勒密二世时建成[7]。托勒密历届王朝都十分重视收集图书。传说托勒密二世曾向四方收集手稿，一旦获得手稿，就责人抄写，然后把复本还给原主[8]。这样，至鼎盛时期，该图书馆收藏着70多万卷纸莎草图书，几乎包括所有古希腊的著作和一部分东方典籍，吸引了各地的学者来此研究和学习。

根据史书记载，中国周朝设守藏室。守藏室收藏的主要是各国的史书，老子曾担任过周守藏室之史，其图书资料已对外提供参考，相传孔子撰写《春秋》时就到此查询过资料[9]。到了秦代，藏书机构更加完整、藏书也更加丰富，在秦始皇下令焚毁的书籍中，就包括非秦国的史书、诗歌、文学书籍及诸子百家的书籍[10]。从这些记载来看，我国周、秦时代的藏书机构虽然还保存着大量的档案，但是，它们的主要功能也已经演变为收藏各类学术书籍并在一定范围内提供给人利用。

随着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发展，社会上受教育的特权阶层也开始建立私人图书馆。据考古发现，古罗马一个私人图书馆拥有纸莎草藏书1700多卷[11]。亚里士多德也是著名的私人藏书家。我国春秋战国时的很多学者也有丰富的藏书，相传墨子每次游学，都需以车拉书，这些私人藏书构成了独立意义的古代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2．独立意义的古代图书馆的发展

从公元前1世纪前后至公元5世纪，独立意义的古代图书馆在西方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罗马帝国，出现了很多私人图书馆及向普通学者开放的"公共图书馆"[12]。遗憾的是，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476年），西方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思想的专制和政治的动荡几乎摧毁了古罗马遗留的图书馆。从那时直到13世纪，寺院图书馆几乎成为西方惟一的图书馆形式。这些寺院图书馆是僧侣们保存宗教典籍、誊写书稿和灵修的地方。正是凭借着这些寺院图书馆，一些古代文化典籍才得以在西方保存流传。

就在西罗马帝国走向衰落之时，位于中东的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国家，却日益

强大。东罗马帝国比较注重教育和文化,因而图书馆事业也比较发达。公元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座著名的皇家图书馆,到5世纪中叶,藏书已经发展到10万多件,内容包括基督教书籍、拉丁文学及古希腊典籍。除了皇家图书馆,在君士坦丁堡还有著名的寺院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建于9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大学图书馆尤为著名。在同期的阿拉伯国家,皇家图书馆、面向学者的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私人图书馆都很发达。例如,7世纪时的大马士革皇家图书馆及后来的巴格达大学图书馆都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图书馆。正是这些中东图书馆保存了大量的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很多学者都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图书馆的杰出贡献,就不会有后来的文艺复兴[13~15]。

中世纪末期(12～13世纪),大学在西方兴起。大学的兴起引起了对教学用书的需求。最初,学生都是自己向书商购买图书或向他人借用图书。后来,随着大学的发展,不少私人藏书家和毕业生把自己的图书捐赠给大学,在这些藏书的基础上,形成了最早的大学图书馆。例如巴黎大学图书馆就是在教父德·索帮(Robert de Sorbonne)赠书的基础上形成的。牛津大学总馆和不少学院图书馆也是在赠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图书馆大都按学科划分藏书,将图书放置在书架上,图书馆对学生和老师开放,允许阅览和外借。但是,早期的大学图书馆没有专职馆员,工作人员一般由教师和学生兼任,开放时间很短,借阅限制也很多,有些图书馆为了防止图书遗失,甚至将图书锁在书架上。

文艺复兴运动(14～16世纪)带来了西方思想与文化的空前活跃,激励了私人藏书的热情。例如,14～15世纪统治佛罗伦萨的美迪奇家族,连续数代热衷于收藏图书,建有闻名欧洲的大图书馆。在美迪奇家族的影响下,很多意大利贵族、学者都成为热心的图书收藏家,诗人彼得拉克(Petrarca)和小说家薄伽丘(Boccaccio)也在其列[16]。

与西方曲折跌宕的图书馆发展过程不同,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自周、秦以来,虽历经战乱,但基本上呈持续稳定的发展。汉代几朝皇帝(汉惠帝、汉武帝、汉成帝)都注意从民间广泛征集图书,使国家藏书的数量大增。西汉时国家藏书达13 000多篇卷,建成了麒麟、天禄等多处国家藏书,还开创了按分类整理图书的方法[17]。汉代除国家藏书以外,还有发达的私人藏书,不少大臣和学者都拥有比较丰富的藏书。到了东汉(也有人认为是魏、晋),随着佛教寺院的兴建与译经活动的开展,寺院藏书也开始出现[18]。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朝代更替频繁,政治比较动荡,但几乎所有朝代在建国之后都比较注意收集图书,建设国家藏书。由于纸质图书开始逐渐取代简书、帛书,图书数量继续迅速增长,私人藏书也因此得到更大发展。到了唐代,除了国家藏书、寺院藏书和私人藏书继续发展外,还出现了书院藏书。书院是我国唐代以后出现的民办或官办讲学肄业之所,书院藏书是私办公助的藏书机构,这样就初步形成了官府藏书、寺院藏书、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四大古代藏

书系统。宋代以后，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刻书机构日益增多，四大系统的藏书都得到迅速发展。明清两代，书院藏书略有减少，但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都达到全盛。建于明代的私人藏书——宁波天一阁一直保存到今天。

三、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

现代意义的图书馆是20世纪的用户所熟悉的图书馆形态——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大学图书馆、作为国家总书库并承担其他职能的国家图书馆、为所有人服务的公共图书馆，以及为各类专门机构服务的专业图书馆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区别于古代图书馆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更加重视文献利用，为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文献的管理和传递服务。

现代意义的图书馆的形成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很难为它划出一个明确的时间断限，但是，考察图书馆的演化历史不难发现，文艺复兴以后的三个世纪（即17～19世纪）是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加速形成的时期。

首先，在这段时间里，大学图书馆日益正规化、规范化，并开始占据"大学心脏"的位置。现代自然科学在17世纪的飞速发展以及培根知识组织思想的出现，对西方大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专业的细化和研究的活跃[19]。大学的发展也带动了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到18世纪时，在专业化和研究两方面均领先世界的德国，大学图书馆已非常接近今天大学图书馆的模式——管理规范、开放时间长、注重服务。当时最为著名的一所大学图书馆是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该馆馆藏丰富，有明确的采购方针，馆藏按分类排列，有较详细的编目。19世纪很多欧洲和美国大学图书馆都效仿该馆实践[20]。到19世纪中叶，图书馆在大学已经拥有核心地位。1873年，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在写给校长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的信中说："[学校里的]任何其他事物都可以被替代，甚至或缺，但是没有图书馆，学校就会失去其最重要的特征，甚至失去其个性。"[21][原文1]

其次，17世纪以后，现代意义的国家图书馆也在各国陆续出现。国家图书馆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担负着全面、系统保存一个国家出版的所有文献的使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出现于17世纪的英、德、法、丹麦等国。在英国，17世纪初建成的英国牛津大学博得利图书馆，在托马斯·博得利的领导下成为英国第一所呈缴本贮存馆（收藏出版商按规定提交的在英国公开出版的所有著作）。1753年，英国国会又通过了建立大英博物馆的法令，这个博物馆也是英国的国家图书馆，它的宗旨是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心。该图书馆直到1972年才根据不列颠图书馆法（British Library Act）从大英博物馆独立出来，并与其他几所全国性图书情报机

［原文1］ Everything else may admit of a substitute, or may be dispensed with, but without the library the school would lose its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and indeed, its identity.

构合并成为今天的英国国家图书馆，即不列颠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法国的国家图书馆由原来的皇家图书馆发展而来。17世纪中叶，法国皇家图书馆采用当时在欧洲颇有影响的马扎林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又根据培根知识组织与分类的思想对图书进行分类，18世纪中期又扩大了馆舍。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上台的资产阶级政府立即宣布把原来的皇家图书馆收归"国有"，然后，一面把革命期间失散到各地的图书收集起来充实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一面制定和实施了便于普通公众使用的各项规则。在英法等国家的影响下，奥地利、意大利、挪威等国也陆续建立了各自的国家图书馆。

第三，19世纪中叶，公共图书馆几乎同时在英国和美国出现，成为现代意义的图书馆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标志。在英国，有两个人物对公共图书馆的出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国会议员埃德沃特(William Edwart)，另一个是图书馆活动家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当时，在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掠夺中强大起来的英国正在进行各个方面的社会改革(如普及教育)，希望通过这些改革在英国本土创建更有秩序的社会。埃德沃特就是这样一个支持改革的政治家，他在公共图书馆的概念中看见了这个孕育中的新事物对实现其政治抱负的作用。爱德华兹则是一个瓦工出身的自学成材的馆员。他从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建立了对图书馆价值的坚定信念。由于他们的积极游说，英国国会于1850年通过了公共图书馆法案(Public Libraries Act)，该法案允许(但不是强制性要求)人口在10 000人以上的城镇建立一所图书馆，地方政府可以按1英镑固定资产交纳半便士税款的比例征收财产税，用以支持公共图书馆的建设，由此建立的图书馆应免费为当地居民服务[22]。1850年以后，公共图书馆在各地迅速建立，至1860年，全国已有28所公共图书馆[23]。从那时直到今天，英国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和功能虽然不断扩大，但其依赖公共税收和向辖区内所有成员免费开放的基本特征始终保持不变。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与英国的公共图书馆几乎同时出现，但是，与英国的公共图书馆不同，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不是按国会的统一法令建立，而是由各州自行其是。美国最早的公共性质的图书馆是1803年在康涅狄格州的索尔兹伯里镇建立的儿童图书馆。随后，1827年，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镇也建立了一家儿童图书馆，由镇政府支付建馆费用。1833年，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博罗镇议会决定从州政府拨给的教育经费中抽出一定数额，建立一所向全镇居民免费开放的图书馆。此后，类似的公共图书馆陆续在美国各州建立起来。

在我国，虽然古代图书馆经历了比其西方同类更加稳定的发展过程，但是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却比西方晚得多。1902年，浙江古越藏书楼对外开放，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1912年，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的开放标志着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在我国的出现。

四、数字图书馆

1. 数字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

如第一章所述,数字图书馆是一个歧义很多的概念,但是,从图书馆职业的角度看,"数字图书馆"指根据一定的采购方针和标准收集电子格式的文献,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环境下对这些文献进行加工、整理、保管,并提供给特定用户群体存取利用的机构或服务。

尽管"数字图书馆"一词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但是,作为图书馆的一种存在形式,"数字图书馆"的概念却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孕育和发展。关于"数字图书馆"的设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1945年,当时的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布什(Vannevar Bush)在一篇题为《诚若所思》("*As We May Think*")的论文中对未来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检索进行了展望[24]。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利克莱德(Licklider)又在一部题为《未来图书馆》("*Libraries Of The Future*")的书中,详细描述了未来图书馆的特征[25]。这些展望在后来的数字图书馆研究中大都成为现实。1975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出版了《电子图书馆:书目数据库:1975~1976》一书,首次使用"电子图书馆"这一术语[26]。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著名图书情报学家兰卡斯特(Lancaster)在其《走向无纸情报系统》和《电子时代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员》中进一步描述了未来社会图书馆的形态[27,28]。

在这些学者为"数字图书馆"进行着理论与舆论准备的同时,计算机技术被迅速应用于文献处理,数字图书馆的雏形也随之出现。较完整的数字图书馆模型(即通过网络向特定用户群体提供全文文献的模型)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项目"(electronic information exchange system project, EIES)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开发部资助的"拉夫堡-伯明翰电子网络发展项目"(Birmingham and Loughborough Electronic Network Development, BLEND)分别实验了通过网络向终端用户提供电子期刊论文的系统。简单地说,这是一次将数字图书馆嵌入动态的科学交流过程的尝试。其基本构思是:论文作者以电子格式提交论文,审评专家通过电子网络审评论文,可以发表的论文被存入论文库,再通过网络向特定的终端用户提供存取[29]。这些早期尝试由于计算机处理能力的限制和用户界面技术的落后,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得制约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技术因素迅速得到解决。首先是微型计算机的普及和用户友好界面技术的出现。这两项技术的结合使数据获取变得直观、容易。只要具备适当的网络设施,用户就可以在办公室或家里自行开展文献检索,不像早期的联机数据库那样需要馆员的帮助。其次是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提高,它使快捷的全文检索和多媒体全文文献的生产成为可

能。再次是计算机之间的广泛互联,它使数字化文献作为用来交流的最终文献形式日益变得普遍。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数字图书馆技术的成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由单个课题组分散开发的数字图书馆项目日益增多,构思也更加复杂。美国卡内基梅林大学的 Mercury Project 和英国德蒙福特大学(Demontford University)的 ELINOR 项目是这时期出现的两个较有影响的校园数字图书馆项目。Mercury Project 旨在为卡内基梅林大学建立一个数字图书馆模型,1991年,该模型历时五年终于建成,其中包括若干数字化的教科书和学术期刊。ELINOR 旨在为英国 Demontford 大学的数所分布式校区建立一个数字图书馆模型。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图书馆和不列颠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也开始为它们各自的重要馆藏(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历届总统文稿)建立数字图书馆。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美等发达国家进入大规模的、协调性开发数字图书馆的阶段,这种大规模的全国性行动以美国的数字图书馆创始项目(DLI)和英国的电子图书馆项目(e-Lib Programme)为代表。DLI 一期项目从1994年开始,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部高级技术局和国家宇航局共同资助,旨在探索先进的知识组织整理技术,项目包括6个子课题。二期项目从1998年开始,包括了更多的子课题,涉及更广的技术方面,同时也更多地考虑了文化与人性因素。英国的电子图书馆项目从1994年开始酝酿,1995年开始实施,由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该项目从一开始就立足当前技术条件,旨在开发适用于不同需要的实用型数字图书馆,希望以此探索改善英国大学图书馆功能的途径。项目包括电子短期借阅(旨在提供需求量大的数字化教学参考书)、电子期刊、数字化处理等十多个领域,60多个课题。

到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开发的数字图书馆服务,例如电子期刊系统、电子教科书系统、电子试卷系统,开始大规模地进入现有的图书馆服务,由此出现了所谓复合图书馆的概念。复合图书馆是介于传统图书馆和纯粹的数字图书馆之间的一种机构形态,在复合图书馆中,数字化资料与印刷式文献共存,各种信息技术共存,可以支持用户对各种形式的文献、本馆与远程文献实行一体化检索。在复合图书馆迅速发展的同时,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开发工作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解决版权问题、资源的整合和兼容问题、文献的长期保存问题。

我国的数字图书馆研究起步较晚,大致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7年,国家计委批准立项了由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多家公共图书馆联合承担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目标是建立多馆协作、互为补充、联合一致的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研制一套初步成形的数字图书馆实现技术,并建设一个规范化的分布式数字资源库。同年,国家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组"(即863-306组)开始跟踪国际数字图书馆研究动态。1999年863-306组先后设立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组(专门对数字图书馆涉及的技术、管

理、运营、法律等问题展开研究),支持了重大应用课题"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系统"以及"知识网络——数字图书馆系统工程"项目的研究。

1998年11月,国家计委批准立项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保障系统"(CALIS)。这是一个依赖网络环境开展资源共享的组织,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数字化资源的共建共享。在立项后短短几年里,CALIS组织开发了成员馆之间的电子文献传输系统(即基于ISO 10160/10161协议的馆际互借系统),建成了一系列全文或二次文献数据库、特色库和网上文献导航库,用集团购买的方式引进了多种国外全文或二次文献数据库,极大地推进了成员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CALIS二期工程("十五"期间)的目标包括建成若干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数字图书馆基地、课程指定参考书数据库、古籍特藏数据库和数据存储系统。

迄今为止,我国最大的数字图书馆项目是"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该项目酝酿于1998年。当年7月,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向文化部提出立项申请。1999年1月,文化部在国家图书馆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申请立项"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及成立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并按程序正式向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申报。1999年3月,国家图书馆文献数字化中心成立。2000年1月,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完成注册。2000年4月5日,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图书馆召开,标志着"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历经几年的筹备,终于正式启动。数字图书馆工程将建成一个超大规模的分布式系统。该系统将通过多方合作和市场运行建设海量信息资源库,并在国家图书馆内建设具有工业化生产能力的多媒体资源制作系统。通过这样的建设模式,"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希望把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带入一个良性循环[30]。

2. 数字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的变革

通过数字化资源和网络环境而进行的知识传递与依赖纸质文献和物理空间进行的知识传递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已经形成了对传统图书馆的深刻变革。数字图书馆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数字图书馆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带来了用户的根本解放。传统图书馆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对用户行为有很多客观的或人为的(即政策性的)限制。首先,在传统图书馆背景下,用户若要使用图书馆,就必须亲自到图书馆去,对很多用户来说(如公共图书馆的用户或大学图书馆的半工半读用户),这往往意味着几个小时的路程;其次,传统图书馆要求用户必须在指定的时间访问图书馆,很多用户会因为开馆时间与他们的工作时间相冲突而无法利用图书馆服务;第三,用户向传统图书馆提出的借阅需求,只有当文献在架时(没有错架或被其他用户借走),才能得到满足,即使是服务质量很好的图书馆,也无法保证所有的用户需求都能得到即时满足;第四,为了兼顾所有用户的利益,图书馆必须限制一次性借阅的文献数

量及借阅时间,如果需求大于限额,用户通常只能割爱。在数字图书馆中,虽然用户行为还将受到其他因素,如版权协定,网络性能等的限制,但因文献时空而造成的限制将大大减弱,甚至消失。

(2) 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交流是以获取而非拥有为基础的交流。传统图书馆若要实现知识交流,必须购进并长期贮存文献。如此购进的文献一经进入图书馆,就成为该馆的财产,图书馆对这类文献具有所有权,该馆用户对它们具有无限使用权,因此,通过这些文献而进行的知识交流是以拥有为基础的交流。传统图书馆虽然也从事少量不依赖文献所有权的交流,如通过馆际互借进行的交流,但这种交流十分有限。在数字图书馆中,大部分数字化文献并不贮存于图书馆,图书馆在"采购"过程中得到的是对这些文献的远程获取权,而非永久拥有权。所以,数字图书馆所支持的交流是以获取为基础的交流。随着"拥有"意识的淡薄,更多信息将通过即时方式(just-in-time)获取,即图书馆在收到用户对本馆既不拥有也未授权的文献的申请后,即时地从专门的文献传递机构获取需求的文献。

(3) 数字图书馆支持一体化的文献检索、文献获取、文献利用过程。在利用传统图书馆时,文献的检索、获取和利用是三个不同的过程。这些步骤不仅泾渭分明,而且经常发生在不同场合。例如很多研究都发现,用户利用传统的期刊文献的过程可以分为查找、复印、阅读三部曲[31,32]。查找的过程是根据二次文献数据库、引文或同事推荐确定相关文献的过程;复印是从图书馆获得文献全文的过程;而阅读则是在家里、办公室等地点吸收文献内容的过程。在数字图书馆中,用户经常可以从检索结果直接浏览全文,对于相关文献,用户可以直接下载文献的书目数据或拷贝相关段落作为引文。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同一地点、同一过程进行。数字图书馆通过支持这种一体化的知识利用过程,更好地支持着知识创新。

(4) 数字图书馆改变了图书馆的活动内容与方法。随着时空限制的突破、服务基础从拥有到获取的转移以及用户知识查询与利用过程之间界限的模糊,图书馆的工作内容与方法也在经历深刻变化。一些传统的工作内容,如图书修缮、期刊装订、书刊上架、排架等可能消失[33];新的工作内容,如网络导航(即对网上资源进行评价、筛选、分类、描述,形成便于本馆用户利用的导航库)、用户技术支持(即解决用户使用数字图书馆时遇到的硬件、软件和网络问题),将日益重要;更多的工作内容将启用新的手段或方法。例如,在知识的组织整理方面,用元数据编码技术补充原有的知识组织整理技术;在用户服务方面,用即时文献传递服务、虚拟参考咨询等补充传统用户服务;在图书馆绩效评估方面,用反映数字图书馆特点的绩效指标补充传统指标(如文献流通率指标、用户访问次数指标等)。

3.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带来的职业问题

作为图书馆演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数字图书馆的出现不可避免地

向图书馆职业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以下所列只是其中较受关注的几个例子。

(1) 双重馆藏问题:尽管不少人相信,数字图书馆比传统图书馆更代表着图书馆的未来,但是没有人确知从传统向纯粹数字化的转变需要多长时间。过渡期的长度不仅取决于技术的进步,而且取决于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英国 e-Lib 的几个课题都发现,对于纸质文献的喜爱和印刷文化的崇尚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34],这一观念会使很多用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要求图书馆收藏纸质文献。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出版商开始同时出版期刊的印刷版和电子版(双轨出版),已经订购印刷版的图书馆通常只需额外交纳一定比例的费用,即可获得电子版的使用权。这种局面使很多图书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由双重馆藏引起的问题:对于那些实行双轨出版的文献,哪些应该同时收藏电子版与印刷版?哪些应该保留印刷版?哪些应该转向电子版?数字化文献与纸质应该如何实现一体化的组织整理和提供利用?

(2) 数字化资源的计价模型(pricing model)。传统图书馆在文献采购过程中一般以册、卷、期或类似的文献单位为计价单位。在数字图书馆中,由于文献的物理实体本身已不存在,文献单位也变得更加模糊。这就要求数字图书馆采用不同于传统图书馆的计价模型。计价模型涉及出版商、图书馆、用户等多方面的利益,成功的计价模型必须均衡各方利益,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目前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存在着不同的计价模型,如将期刊打包计价(即将若干种期刊组合成套,依套计价),按期刊种类计价,按论文使用次数计价等。数字式文献究竟应该如何计价,不同的计价方式对图书馆来说意味着什么,图书馆职业应该如何影响计价模型的形成等,目前依然是图书馆职业面临的难题。

(3) 空间(library as a place)图书馆的设计。由于数字图书馆的大部分文献将是远程存取的分布式资源,资源本身不再需要很多贮存空间,又由于文献的利用将主要依赖于计算机和网络传输,很多用户会选择在家里或办公室使用图书馆资源,因此,很多学者将数字图书馆设想为无墙图书馆。根据美国一些大学的观察,数字化资源的增长的确伴随着到馆访问人次的急剧下降[35]。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一所大学的图书馆,甚至一个国家的国家图书馆究竟该如何设计它的馆舍?虽然这样的问题早已引起数字图书馆研究者的关注,但目前尚不存在确切的答案。不管是对,是错,是明智,还是盲目,在很多地区,作为标志性建筑的大型图书馆依然在拔地而起,很多大学依然在更新甚至扩大它们的馆舍。

(4) 数字图书馆的公平存取(equitable access)问题。数字化资源的利用依赖于对计算机和网络设施的拥有。事实上,只有当用户在办公室或家里拥有这些设备的时候,他们才能充分享受数字图书馆带来的解放。但是,截至目前,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拥有电脑和网络设施的人口依然是社会的少数群体,而且电脑和网络的分布随收入、教育、性别、种族等因素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36]。这意味着,数字

图书馆的利用比传统图书馆的利用在更大程度上关乎社会的平等问题。一向坚持信息平等价值观的图书馆职业应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

(5) 数字图书馆的用户服务和支撑(user support)问题。数字图书馆的大部分用户是分布式的远程用户,为这样一个用户群体提供服务和支撑已经向图书馆职业队伍提出了很多难题。近年来,图书馆专业人员经常遇到的一个用户支撑问题就是数字图书馆中的身份验证问题。数字图书馆的很多资源都是分布式的远程资源,一个数字图书馆经常包含来自不同供应者(出版商、经纪商,其他数字图书馆)的资源,而不同的供应者往往要求不同的身份验证。研究发现,记忆太多密码的压力很容易成为用户使用数字化资源的障碍[37],使用 IP 验证又会限制用户使用数字图书馆的处所,从而限制数字图书馆的潜力。从长远来看,数字图书馆必须寻求方便实用的身份验证方法。近年来出现的另外一个用户支撑问题就是如何协调相关机构,解决用户在使用数字图书馆时遇到的硬件、软件、网络(包括服务器、客户机、传输线路等)问题。研究发现,用户遇到的技术问题是阻碍他们利用数字化资源的最大障碍之一[38]。过去十多年中,英、美等国的很多图书馆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化图书馆发展的需要,已经实现了与计算机中心、网络中心的合并[39],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彻底解决数字图书馆中的用户遇到的技术问题,如发生在服务器和传输线路上的问题。

(6)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问题。数字图书馆中的版权涉及很多人的利益,其中最主要的利益权人(stakeholder)有作者、出版商(包括数据库生产商和经纪商)、图书馆职业队伍和用户。由于数字化资源很容易被复制和传播,以出版商为代表的版权人(copyright holder)从一开始就担心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会削弱他们对数字化资源的控制,损害他们的利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电子资源的出版商始终在向政策和法律争取最大程度的版权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版权法(如《欧盟版权令》已经给予了版权人更大程度的保护[40]。严格的版权保护虽然能鼓励文献的作者和出版者积极参与数字化文献的生产,但也不可避免地制约数字图书馆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如对纸质文献的数字化处理,对数字化资源的提供利用)。英国的“e－Lib项目”的“短期借阅”和“即时出版”课题都发现,版权许可的申请是建设教学参考书资源库过程中最困难的一环[41]。因而,在新形势下,图书馆职业应该如何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促进数字化文献的传播和利用,是现代图书馆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7) 文献资料的长期保存问题。传统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长期保存人类知识记录。在数字图书馆中,这一最古老的图书馆职能却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首先,数字图书馆的大部分文献是通过远程获取而被传递和利用的,图书馆并不收藏它的物理实体,这就使保存知识记录的使命失去了物质基础——图书馆如何为“身在异处”的资源承担起长期保存的使命?第二,在数字图书馆中,图书馆通常只

具有文献的使用权而非拥有权，因而，图书馆无法对发生在出版商一方的行为（如数据的损失或更改）负责。已有个案显示，图书馆向出版商成批购买使用权的期刊，每年的期刊种类都可能有所变动，大大削弱了图书馆馆藏的系统性和稳定性[42]。第三，由于计算机技术更新速度快，今天的文献很快就会成为新一代技术的"盲文"，要保证每一时期的文献都能被阅读、利用，不仅需要保存文献本身，还需要保存阅读这些文献的硬件及软件设备，或者在新技术更新之时，对过去生产的所有文献进行更新换代，这意味着，数字化文献的保存需要巨大的技术投资，这种投资往往超出了图书馆的能力。第四，在数字图书馆中，文献的生产者可以对同一份文献的内容进行无数次修改而不改变文献的实体特征，例如，同一份网页的内容可以不留痕迹地经过任意次修改，这种易变性无疑增加了文献保存的困难——对于致力于数字式文献长期保存的图书馆来说，哪个文献版本应该被长期保存？

这些问题表明，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必然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法律，甚至文化问题，这就要求人们对数字图书馆进行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在研制数字图书馆系统时，不仅需要考虑技术因素，而且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和人文因素。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阿姆斯（Arms）有一段很中肯的警告：

> 数字图书馆是以技术为依托的事物，一些人因而希望能通过技术解决所有问题，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只要制定出新的法律，则万事可及。这两种观点都有局限。技术有助于解决问题，但对经济或社会问题却无能为力。改变法律亦可能有所裨益，但不当的法律比没有法律更糟。只有当法律制定的框架能被人理解和乐意接受时，法律才具有效力。同样，电子信息的商业模式只有兼顾了各方利益才有成功的可能。当前的挑战是要建立一种能被人们广泛理解和遵从的、利用信息的社会习惯，如果这些习惯能让人顺利工作，人们就会遵从它们，而经济和法律的框架就会随之而至[43][原文2]。

第二节　促进图书馆演化的重大社会历史变革

一、文字和文献的产生

人类最早的文字产生于两河流域、埃及和中国。公元前3000年左右，两河流

[原文2] Because digital libraries are based on technology, some people hope for technical solutions to all problems. Other people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can be achieved by passing new laws. Both approaches are flawed. Technology can contribute to the solutions, but it cannot resolve economic or social issues. Changes in laws may be helpful, but bad laws are worse than no laws. Laws are effective only when they codify a framework that people understand and are willing to accept. In the same manner, business models for electronic information will fail unless they appeal to the interests of all interested parties. The underlying challenge is to establish social customs for using information that are widely understood and generally followed. If those customs allow reasonable people to carry out their work, reasonable people will observe them. The economic and legal frameworks will follow.

域的苏美尔人就创造了楔形文字。这是一种笔画呈楔状，形似钉头或箭头的文字。多刻在石头和泥板上。这一地区稍后出现的文明，如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波斯人等，都使用这种文字记录自己的语言。在古代埃及，比较复杂的刻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千年。公元前 3500 年左右，埃及人又发明了象形文字，这是模拟实物形状的文字，主要书写在纸莎草上。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系统的文字记录是殷商时期（公元前 1200 年左右）的甲骨文，但汉文字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44]。文字的出现是人类交流史上的重大飞跃，它创造了把声音语言（包括表达抽象情感和意义的语言）转化为视觉形式，永久刻录在实物载体上的途径。文字使人类交流彻底突破了时空限制，大大扩大了交流范围；它也使交流过程突破了人脑记忆力的限制，提高了交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外交、贸易、教育、研究成果的传播等复杂交流过程，只有在文字产生以后才成为可能。

用文字在纸莎草、甲骨等天然实物上记事，就形成了人类最早的文献。当各种文献增长到一定数量时，就需要建立一种社会性的文献保障机构，于是便出现了专事文献收藏整理和保管的社会分工。文字和文献出现最早的地方——两河流域，埃及和中国，也是图书馆的发源地，文字和文献的产生是图书馆产生的必要前提。

二、学术研究活动和正规教育的兴起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人类最早的、系统的学术研究活动起于何时，但是从早期出土的典籍来看，最早的学术研究中心集中于王宫和寺庙，不少国王本人就是造诣很深的学者。到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研究不仅跨出了王宫寺院，而且在上流社会蔚然成风。公元前 5 世纪时的雅典学院就是当时学者们讨论哲学问题（哲学是当时惟一的学科）的场所。他们的讨论往往被抄成手稿，得以传阅和保存，足见当时学术研究之活跃。在我国，当时无论是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如老子的道德经）还是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如孔子的礼）都达到鼎盛，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究气氛。

人类的正规教育（学校教育）起源于公元前 3500 年左右的两河流域。至公元前 2500 年左右，位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也建立了类似的学校。当时的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高级僧侣和政府官员，接受教育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出现了更为系统的、机构化的教育活动。教育对象也扩大到所有自由人的子弟。公元前 5 世纪时，雅典的统治者梭伦曾发布命令，要求每一个男孩都要学习识字和游泳，还对上学和放学时间做了规定[45]。当时的基础教育涉及数学、音乐和体育，高等教育则主要学习哲学。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纷争，需要大量的受过教育的人才，教育也迅速发展，不仅有官学，还出现了私学，传说墨子有学生 80 人，孔子有学生 3000 人。

学术研究和正规教育的兴起，一方面引起社会对学术文献需求的增长，另一方

面引发学术文献生产量的增长。这两种增长都必然激发以学术文献为对象的文献收集活动。馆藏当中学术文献比例的增加和馆藏资源向学者的开放,使早期的图书馆作为档案馆的功能越来越弱,而图书馆的功能越来越强,这种趋势最终导致了图书馆与档案馆的分离,导致了独立意义的古代图书馆的产生。在学术研究和正规教育刚刚兴起的时候,王宫和政教合一的寺院还是学术活动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学术文献最集中的地方,因而在王宫和寺院便产生了最早的独立意义的图书馆,如尼尼微图书馆和亚历山大图书馆。随着学术研究和教育跨出王宫,不少显贵和学者也开始建立私人馆藏,从而带动了私人图书馆的发展,使私人图书馆成为独立意义的古代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独立意义上的古代图书馆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术研究的活跃和正规教育的兴起。

三、造纸技术

根据前人考证,我国在西汉时就有了类似纸的纤维薄片[46]。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工艺,开始用比较便宜的树皮作为造纸原料。根据史书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竹简书、帛书向纸质图书过渡的时期。到东晋以后,纸张就完全取代了竹简。公元 8 世纪造纸技术传入阿拉伯地区,后经阿拉伯地区于 12 世纪初进入西欧。造纸技术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纸张既便宜又便于书写,还便于携带,它的发明自然极大地促进了文献的生产,改善了人类交流条件。它同时还是印刷技术和整个出版业的基础,如果没有纸张的发明,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印刷术和出版业。此外,纸张的发明还促进了教育和阅读能力的普及,而这种阅读能力是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走向成熟的基础。因而,可以说,纸张奠定了现代知识交流系统的最早的基础。高尔(Gaur)在谈到造纸技术的影响时认为:

> 造纸术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印刷术的快速传播、教育的普及,以及依靠政府和办公系统的管理而运转的整个工业化社会,若没有大量的、廉价的纸张,将是不可想象的。到 20 世纪初,没有人怀疑纸张将存在下去,它是最重要、高效的、不可取代的现代信息存储媒介[47][原文3]。

四、印刷技术

纸张发明以后,人们很快就发现,可以将纸张附在某种刻有文字的面上进行拓印。中国隋、唐时期在拓印的基础上开始使用雕版印刷技术。北宋时,毕昇发明活

[原文 3] The influence of paper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been enormous. The quick spread of prin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education, our whole industrial society depending on administration not only at government but at office level, is in retrospect unthinkable without easy access to almost unlimited quantities of cheap paper.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20h century nobody would have been in any doubt that paper was here to stay, that i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efficient and totally irreplaceable medium of modern information storage.

字印刷。活字印刷用的刻字可以根据文献的内容自由组合,这就免去了为每一种文献内容专门制作雕版的费时工序,更大程度地提高了文献的生产速度。毕昇的活字印刷技术后来也被朝鲜人采用,但未能西传。西方直到15世纪才出现了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这是一种将单独的拉丁字母刻在铅片上,由一个机械装置移动铅片,并将铅片上的字母形状打印在一个平面上,拼成文字,再通过墨汁印刷在纸张上的工艺。由于文字上的优势,古登堡技术比我国的活字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印刷术的发明对图书馆的演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首先,印刷术引发了出版业的发展,并通过出版业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图书馆的发展。我国宋、明两代繁荣的书业得益于活字印刷的发明自不必说,在西方,在谷登堡死后不到15年的时间里,出版印刷机构迅速兴盛起来[48]。与此相适应,不管是官府藏书、寺院藏书,还是私人藏书,其规模都在不断扩大,图书馆的文献加工处理(分类、编目)方法也趋于复杂化。第二,印刷术的发明还带动了新型文献的出现,在印刷术发明后的两个世纪里,报纸、期刊等文献形式相继出现。第三,由于印刷术解决了文献的快速生产问题,在教育领域,它强化了以课本为基础的教学模式,促进了教育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的传播,使更多的人具备了阅读能力;在学术研究方面,它加快了研究成果的传播速度,改善了知识的交流途径,刺激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广泛的阅读能力和现代科学的产生都为图书馆更大程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现代意义的图书馆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五、大学的兴起

大学出现于12世纪末期的西欧诸国,如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最初,这些大学不过是一些学生和老师自发形成的松散组织,没有预定课程和规章制度。到了12世纪末,很多这样的组织都设置了专门的科目、比较固定的课程和规章制度,并得到教皇或各国国王的批准,成为正式大学。位于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都是这一时期成立的大学。根据杨威理的研究[49],大学在这个时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十字军东征、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发达都激发了人们追求知识的欲望,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往往离开家乡,慕名求学于当时有名望的学者,当学生和老师增加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出现了比较松散的师生组织。如上所述,这些松散的组织就成为大学的基础。

对图书馆演化过程而言,大学出现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大学图书馆的出现。哈里斯称中世纪的大学图书馆为最早的现代图书馆。此外,大学的兴起还打破了教会对学术的垄断,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现代科学的产生,正如谢拉所言,“就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中世纪的大学是连接着从中世纪末期向古典文化复兴,即著名的文艺复兴这一过渡时期的桥梁。这些大学及其图书馆尽管尚不完善,但为文艺复兴

奠定基础的文化正是出自这里”[50]。

六、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14～16世纪出现在欧洲的文化和思想运动，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然后逐渐扩展到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这场运动的基本主题是以复兴古希腊文化为契机，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教会对人的思想束缚，肯定人的理性，强调人的尊严，主张个性解放。文艺复兴的最突出的成就是在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弘扬了人文主义，在神学领域推动了宗教改革，在自然科学领域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的研究兴趣。其结果是带来了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的空前活跃。到15世纪末叶，欧洲已经出版了大量科学、文学和艺术著作。借助因商业活动而发展起来的交通运输系统，这些著作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各类图书馆收藏的对象。同时，对知识和世俗文化的追求，还使上流社会中兴起了广收藏书的时尚，很多学者和贵族到处求访古希腊和罗马的典籍，并以拥有丰富的藏书为地位的象征，私人藏书在这段时间得以迅速发展。

七、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是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化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卢梭等。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特征是反对当时的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启蒙运动者认为存在一个稳定、一致、有认知能力的自我，自我的这种认知能力(即理性)，而非神赋灵性，才是人类了解宇宙和自我改善的力量，具有理性的人追求的目标就是知识、自由与幸福。高举理性的旗帜，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最初用自然神论，后来又用无神论来反对宗教迷信，以机械唯物论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以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以社会契约论反对王权神授，用科学、知识抵制人们的愚昧无知[51]。正如恩格斯在评价启蒙运动时所说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和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52]

启蒙运动对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通过对理性、知识和科学的追求，启蒙运动促进了科学研究和交流活动的活跃，这一方面促进了学术文献的增长，另一方面促进了对知识的分类和组织[53]。例如，在启蒙运动中出现的百科全书学派就对人类知识进行过系统的组织，对图书馆职业的知识组织整理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其次，因启蒙运动而发扬光大的西方“现代性”(modernity)十分重视各类文化机构的作用，视它们为创造知识、传承知识和宏扬理性的重要社会机制。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追随启蒙运动的政治家、思想家便对图书馆在传播人类知

识方面的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使很多图书馆员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了信心[54]。19 世纪末，这样的政治家和图书馆活动家的合作终于推动了新型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出现。

八、工 业 革 命

15 世纪以后的地理大发现刺激了世界贸易的发展。随着世界市场的日益扩大，原有的工场手工业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开始尝试着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18 世纪，英国率先从纺织业开始采用大机器生产，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随后，英国在冶金、机器制造和运输等部门也进行了工业革命。19 世纪，美、法、德、日等国也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

从图书馆职业的角度看，工业革命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变化。首先，由于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社会构成上，一个相对富裕的中产阶层迅速扩大起来。这个阶层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较充裕的闲暇时间，因而，具有较强的阅读需求。在公共图书馆出现之后，这种需求曾经是刺激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大机器生产的出现，要求工人具有基本的识字和阅读能力，以便于他们学习和掌握更加复杂的生产技能。在英国，对工人进行教育的需要曾经导致了“机械师学院图书馆”(Mechanics' Institute Library)的出现。这些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为工人补习班提供辅助学习资料。这些图书馆成为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先声。第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社会财富的积累，在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资产阶级逐渐推行了一些教育、法律等领域的改革，大众教育由此兴起，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口迅速增加，图书馆读者队伍迅速壮大。第四，工业革命也造就了一批富裕的企业家，其中少数人成为活跃的慈善家，为社会的公益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美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家卡内基的捐助。安德鲁·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后来移居美国并成为美国最成功的钢铁企业家。在他所著的《财富论》(“*The Gospel of Wealth*”)一书中，卡内基明确提出富人有义务捐赠他们的财富。他个人捐赠资助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他希望公共图书馆能够成为被所有人自由、无偿使用的教育机构。20 世纪初，他的捐赠使 2509 所公共图书馆得以建立起来[55]。

九、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

1. 计算机技术

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出现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最初仅用于科学研究中的数字计算，但即使在计算机技术的起步阶段，一些科学家，如布什(Bush)，就已开始设想将计算机用于文献处理。20 世纪 50 年代，已有不少研究者尝试着将计算机用于

二次文献的处理,即贮存和检索科学技术文献的篇名、著者、主题等书目数据。这些研究显示了计算机处理书目数据的两大优势:一方面,它可以在很小的空间里贮存大量文献信息;另一方面,它可以非常快速地编排和查找这些信息。20世纪60到70年代,计算机在这一领域的应用,孕育了一批活跃的商业化数据库开发商和提供商。60年代由美国的洛克希德导弹与空间公司建立的DIALOG国际联机情报检索服务就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数据库提供商。它通过电信网络与世界各地的用户终端机连接,当时主要提供书目数据检索服务。到20世纪80年代初,DIALOG提供的数据库已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十几个学科门类。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计算机领域出现了若干重大的技术进步。首先是借助通信网络,计算机开始彼此连接,使计算机之间共享数据成为可能;80年代初,微型计算机出现,带来了计算机技术的迅速普及;与此同时,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迅速增强,促进了计算机在一次文献处理,即全文文献的编辑、贮存、检索等方面的应用;接着只读光盘技术(CD－ROM)和图像式用户接口技术也出现了,前者为数字化文献的贮存提供了高密度的介质,后者大大简化了计算机的使用,促进了面向终端用户的数据库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和万维网技术迅速普及,大大促进了计算机之间更广泛的互联和多媒体文献的网上交流。

虽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速度常常让图书馆职业感到应接不暇,但图书馆职业始终站在应用新技术的前列。20世纪60年代,图书馆界成功地将计算机运用于处理馆内书目数据,开始了计算机编目的时代。70年代,很多图书馆都引进了大型商业性书目数据库,开始向用户提供联机检索服务。80年代,图书馆界一方面开始了集成式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应用,另一方面开始了面向终端用户的数据库的引进和服务,其中已有不少数据库提供全文文献。90年代,得益于计算机、互联网和万维网技术的结合,图书馆界又迎来了数字图书馆的革命。

总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几乎改变了图书馆工作的所有方面,在文献体系建设方面,它带来了各类型数字化文献的增长;在知识的组织整理方面,它引发了机读目录格式和元数据格式等编码技术的应用;在文献检索服务方面,它首先引进了以图书馆员为中介的联机检索服务,又促进了面向终端用户的检索技术的发展;在图书馆管理方面,它引导了集成化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应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上述技术积累为基础,数字图书馆迅速发展起来。

2. 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

在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网络技术也日新月异。20世纪末期网络技术的发展不能不归因于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始建于1969年,最初它只是美国一个国防信息网,简称ARPANET。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防部用于支持ARPANET的投入开始减少。1984年,ARPANET与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

dation,NSF)达成协议,由 NSF 利用 ARPANET 的技术建成一个民用网,支持大型科研机构之间的快速通信,这个民用网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很快就延伸到科研机构之外,成为渗透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全球性网络,提供包括电子邮件、文件传输、电子公告板、联机目录查询等服务在内的各种通信服务。90 年代,美国政府率先提出以互联网为雏形建成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由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可以带动包括干线技术(光纤、电缆、微波等)、数据服务设施(如超级计算机等)、用户设施(计算机、电话、电视等)、内容源(如数据库)等在内的庞大信息产业,因而,它从一开始就被视作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策略。继美国之后,各国政府也纷纷把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提到最高议事日程,使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性的重大政治经济课题,也使因信息设施水平差异而形成的国家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通常被称为数字鸿沟)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国于 1994 年加入互联网,有 7 个互联网国际出口,分别属于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原邮电部和原电子工业部四大系统。2000 年 11 月 16 日,由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承担的中国网通宽带高速互联网(CNCnet)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贯通了东南部 17 个重点城市:北京、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福州、厦门、广州、深圳、长沙、武汉、南昌、郑州、石家庄,标志着我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图书馆职业的角度来看,网络技术的影响十分深远。首先,它为研究人员通过网络直接交流研究成果提供了条件,这就使数字化文献作为最终的文献形式成为可能。同时,它也为一般用户远程获取文献提供了网络环境。数字化文献作为最终文献形式以及在网络环境下远程获取文献的可能,皆是数字图书馆发展的必备条件。其次,网络技术极大地带动了数字化资源的建设。一方面,互联网为个人、团体和政府部门提供了发布信息的快捷媒体;另一方面,它也为传统的出版机构提供了新的出版和发行渠道。这些不同的信息生产者带来了数字化资源的飞速增长。此外,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网上暴力、色情问题以及数字鸿沟问题,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引起图书馆职业对其哲学问题(如信息平等、信息自由等)的重新思考。

3. 万维网

万维网(world wide web,WWW)是 1989 年由 CERN(位于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的科学家编程的一种信息查询系统,它也可以被直观地理解为互联网的用户界面和导航工具。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 Java、Javascript、HTML、XML 等技术为互联网提供一个超文本环境,使互联网上分布的资源能够相互连接,以便于人们对网上资源进行组织和查询。万维网的技术环境还使多媒体资源(包括文本、声

音、图像等)的传播成为可能。

除了与互联网一起将数字图书馆革命引向深入以外,万维网还对图书馆职业产生了很多独特的影响。采用超文本技术,万维网既可以通过超文本标识语言标志文献地址,又可以使用户通过超级链接远程使用文献,从而大大方便了网上文献的传递和查询。万维网的灵活、易用的特性意味着,任何人经过一些基本的培训都可以在网上发表文献,这就难免使网上资源变得异常庞杂。帮助用户评价和组织这些资源就成为图书馆职业的重要职责。为此,很多图书馆建立了自己的网页,并以此为平台将经过馆员筛选的、高质量的网上资源介绍给用户。这种服务在我国一般被称为网络导航。在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由于图书馆员熟悉网络资源和技术,他们还经常参与以万维网为平台的教学软件和虚拟学习环境的开发,发挥着更直接的教学支持作用。这些新型服务表明,万维网已经成为当代图书馆不可或缺的服务工具,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图书馆的功能。

第三节　图书馆发展环境和条件

一、图书馆发展环境

从上节的分析不难看出,图书馆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一个社会的图书馆历史,或者要影响图书馆的未来发展,就必须了解制约图书馆发展的环境因素。在图书馆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上,谢拉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论断在今天依然精辟中肯,“图书馆是一个社会部门,在社会中起着媒介作用。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社会是图书馆的支柱,反过来,图书馆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并对其负有责任。因此,要了解图书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社会性质本身以及支配这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体系”[56]。

很多环境因素都会对图书馆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但是,从上节的分析来看,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科学与教育、交流设施似乎构成了图书馆发展的基本环境,它们与图书馆发展之间的联系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普遍存在于所有社会。

1. 社会文化

文化的概念有许多定义,但无论如何定义文化,人们一般不会否认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等。正因为如此,社会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社团及组织具有巨大的塑造作用。对于图书馆来说,社会文化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图书馆职业文化的特征,“如果图书馆脱离自己(社会)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太远,肯定会遇到麻烦”[57]。因此,社会文化的不同经常使不同国家图书馆职业在行为方式、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等方面表

现出差异。其次,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成员对图书馆这一机构或服务的态度。在面临闲暇时间的竞争时,社会文化将决定着大多数成员对娱乐方式,如阅读、看电视、打牌等的选择;当面临公共经费的短缺时,社会文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成员对不同公共开支,如治安、环保、图书馆等的取向。文化的不同使不同国家的图书馆经常面临非常不同的社会支持。在英国,有大约60%的社会成员是公共图书馆的注册(持证)用户[58],"访问图书馆"名列英国社会的第三或第四大娱乐方式[59];在美国,一项调研发现65%家庭在过去的一年中使用过公共图书馆[60]。与我国千分之五的人口持有公共图书馆阅览证相比[61],英、美的数字显然反映了一种更有利于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社会文化。20世纪英、美两国开展的数次调研,如40年代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研究》("*Public Library Inquiry*")[62],英国的《麦克考文报告》("*McColvin Report*")[63],近年来美国的《本顿报告》("*Benton Report*")[64],英国的《科米迪亚报告》("*Comedia Report*")[65]也都显示了图书馆在这些国家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2. 经济

图书馆的发展也与社会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这是因为:首先,图书馆的发展依赖于社会提供的资金和物力保障,因此一个社会的经济水平决定它对图书馆的投入量;其次,经济发展水平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教育水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阅读能力和阅读需求量;第三,经济生活的活跃程度决定着它对信息交流系统的依赖程度,经济生活越是活跃,对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情报交流机构的要求就越高,就越可能刺激图书馆的发展[66]。

3. 政治

一个社会的政治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即统治阶级组织政权的形式,二是维持这一制度运行的国家机器,特别是政府的行为。这两个方面均对图书馆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民主、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行为有利于图书馆的发展,专制、动荡的政治制度和国家行为会阻碍图书馆的发展;其次还表现在,政府行为往往直接决定图书馆的发展状况。在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政府对图书馆可能采取以下任何一种行为,从而对图书馆的发展带来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①政府明确认为图书馆的职能远离当前政治重心或它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不具备优先支持条件;②政府不了解图书馆职能对于它的政治目标的价值,在短期内可能不考虑优先支持图书馆的发展;③政府了解而且重视图书馆对它的政治目标的价值,主动扶持图书馆的发展。

当今社会,信息和知识日益成为社会、企业和个人的财富,拥有知识和信息往往意味着拥有政治利益(如参与和影响决策)和经济利益(如买卖知识信息而产生

的利润)。围绕着文献的生产、传递和利用而形成的利益关系也越来越尖锐。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利益关系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在图书馆事务上的行为,这构成了当代图书馆政治环境的突出特点。美国学者席勒(Schiller)认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图书馆的政治环境突出地表现为政府与私营部门的联合,政府为了维护私营部门的利益,经常遏制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发展[67,68]。英国学者莱恩(Line)在谈到20世纪80～90年代英国公共图书馆的政治环境时认为,这段时间英国公共图书馆的政治环境体现着三种相互关联的政府动机:意识形态动机(奉行减少政府干预的新保守主义)、经济动机(减少公共开支,扶持私营部门利益)和政治动机(减少税收,争取选民)[69]。

4. 科学研究与教育

科学研究是图书馆发展的直接外部环境,对图书馆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科学研究的规模和水平不仅决定着社会情报需求量,而且决定着知识和文献的增长速度、知识的分化程度,以及文献载体的质量和种类,从而决定着知识和信息组织整理的复杂程度。此外,科学研究的水平还决定着图书馆知识组织整理及传递的手段,例如,计算机作为知识和信息组织整理的手段只有在高科技的时代才开始出现,科学越发达,它为图书馆提供的技术手段也就越先进。

教育对图书馆的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社会教育决定着公众的文化水平,因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阅读需要量;第二,教育方式和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成员成年以后的阅读习惯,研究表明,早期阅读教育对于培养一个人的终生阅读习惯至关重要[70];第三,围绕教育活动而产生的文献资源(如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研究活动产生的科学文献,各类教学活动产生的教科书)是图书馆的重要文献来源,围绕教育活动产生的对图书馆的需求是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高等学校图书馆存在的重要依据;第四,教育水平还决定着图书馆员队伍的素质。

5. 交流系统

社会的交流系统指从事知识和信息交流传递的各类机构组成的整体。图书馆是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例如,图书馆一方面是出版发行机构的重要市场(对于很多学术文献和特种文献来说,图书馆几乎是其惟一的市场),图书馆的购买力是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支柱;但另一方面,图书馆所支持的对同一文献的重复利用又常常被出版商,甚至文献创作者,视作对自身利益的威胁,因此,出版商的某些行为,如对版权的过于苛刻的限制、对出版物的垄断式提价等,经常成为阻碍图书馆发展的因素。图书馆与其他交流机构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很多机构既是图书馆发展

的条件也是图书馆发展的竞争对手，它们经常与图书馆竞争投资，用户需求和人才。例如大众传播媒体就时刻与图书馆竞争着社会成员的闲暇时间；各种信息咨询机构、网络信息提供者、个体书社、读书俱乐部则与图书馆竞争着用户需求。正是通过这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社会的交流系统构成了图书馆发展的最直接的外部环境。它对图书馆的影响表现在，第一，任何交流手段的进步，如出版技术的革新、通信技术的进步，都能促进图书馆的发展；第二，其他交流机构的分化、综合、兴盛、衰落都不可避免地波及图书馆的发展。

二、图书馆发展的条件

一个社会的图书馆是否兴旺发达取决于很多条件。根据哈里斯(Harris)、切尼契(Chernick)、罗杰斯(Rogers)等人的观点，促进图书馆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包括：

(1) 一个具有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注重文化修养和自我完善的人口。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具有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注重文化修养和自我完善时，这个社会就可能产生巨大的阅读需求量。这种阅读需求既是体现图书馆职业价值、激励图书馆发展的因素，也是督促政府或其他主管部门增加图书馆经费的社会力量。需要指出的是，阅读能力本身未必引发阅读兴趣，阅读兴趣也未必引发阅读行为。这是因为，人们在培养阅读能力时所接受的教育模式或其他经历，有可能消极地影响他们对阅读的态度。儿时不快的记忆可能使一个人终生视阅读为苦差而非乐趣，从而使阅读兴趣与阅读能力脱节。此外，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经常面临很多娱乐形式，各种娱乐形式必然与阅读活动竞争人们的闲暇时间。图 3.1 揭示了阅读能力、阅读兴趣和阅读行为的关系。现代图书馆职业队伍深谙阅读兴趣需要培养、需要与其他娱乐活动进行竞争的道理，始终把阅读促进活动视为图书馆职业的崇高职责。

(2) 相对稳定、集中的居住环境。哈里斯(Harris)和鲁宾(Rubin)都认为[74,75]，城、镇、学校、修道院等具有相对稳定和集中人口的地方适合图书馆的发展，而游牧部落或人口过于稀少的偏远地区很难有发达的图书馆。传统图书馆由于受物理空间的局限，对稳定、集中的人口尤为依赖，数字图书馆的利用虽然能够突破空间的束缚，但也依赖于特定的信息基础设施。在这一点上，至少截至目前，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还远远落后于城镇[76]。

(3) 经济的繁荣。只有当经济达到足够的繁荣，社会才能在维持其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储备足够的剩余财富。只有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社会才有可能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富足的财政支持。此外，经济的繁荣也是产生慈善家的重要条件。慈善家的捐助往往能对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西方图书馆发展史上，安德鲁·卡内基和比尔·盖茨都是对图书馆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慈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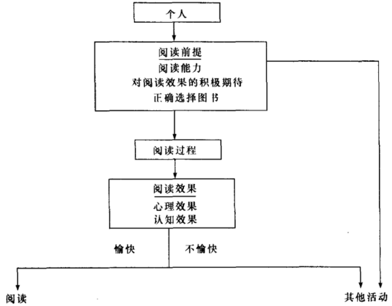


图 3.1　个人阅读行为的形成[77]

(4) 政治的稳定和开明。开明、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图书馆的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开明、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政府和社会成员比较关注知识的积累和创造、科学和教育的发展、民众素质的提高,这一切都有可能引导他们关注图书馆的作用,从而支持图书馆的发展;另一方面,稳定的政治环境必然促进经济的发展,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财富积累。

(5) 科学研究与教育的发展。科学研究的发展一方面导致社会情报需求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导致文献生产量的增加,两者都可能刺激图书馆的发展。同样,教育的发展一方面能够提高公众的文化水平和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导致与教育活动相关的文献和需求的增长。

(6) 交流手段的改进。图书馆是整个社会交流系统的子系统,因而,社会交流手段的进步,如造纸技术、印刷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出现,都会促进图书馆的发展。

第四节　图书馆发展策略

一、谋求图书馆发展策略的必要性

图书馆职业早就认识到,即使在上述发展条件都具备或基本具备的环境下,也未必一定能产生发达的图书馆事业。事实表明,在经济条件、政治氛围、文化背景

都很相似的国家,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却经常存在着差异[78]。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并不奇怪。图书馆服务是一种需要较高投入,但不直接产生财富的事业。与其他类似事业(如城市治安、卫生)相比,它满足的又是一种较高层次的人生需要。所以,在很多国家或地区,当预算感到紧张时,图书馆经费往往会成政府或图书馆主管部门削减开支的首要对象。即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欧洲诸国,图书馆经费的削减也是图书馆职业需要经常面对的现实。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纵然具备了图书馆发展的有利条件,也需要图书馆职业积极、主动、不懈地谋求图书馆的发展。

现代图书馆管理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美国学者怀特(Herbert White)曾经援引德鲁克(Drucker)的话鼓励图书馆职业积极主动地谋求自身发展,"在经费匮乏的时候,总是有经费去成就那些重要得不得不做的事情"[79][原文4]。这段乐观的论断首先表明,在相同条件下,积极主动地谋求图书馆发展与消极被动地运行图书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同时还表明,谋求图书馆发展的关键是从观念和现实两个方面证明图书馆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从而最大程度地赢得政府及社会的支持和投入。

二、图书馆发展策略

1. 观念策略

观念策略指图书馆职业调整自己的理念、思想、价值观等,使职业观念和目标在特定时期或从长远来看能赢得最大的社会共鸣和支持,从而促进图书馆的发展。新观念的确立往往要求图书馆职业从根本上反思职业的性质、使命,因而观念的改变往往引起图书馆哲学基础的深层变革,经常伴随着职业内部的彷徨、困惑甚至冲突。正因为如此,观念策略的运用或许不像其他策略那样常见,但是,它的采用往往会给图书馆的发展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现代图书馆职业出现以后,为谋求图书馆发展而实施的第一次观念策略是确立小说作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藏书成分,并将小说的外借阅览确定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内容。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尽管新兴的图书馆职业竭力要使公共图书馆成为高雅文化的传播者,并曾为此试图抑制小说的流通,但是,公共图书馆小说的流通率却事与愿违地直线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连美国政府都认为小说的阅读能产生很多有益的影响,例如,给士兵带来某种精神的慰藉[80]。在这种背景下,恪守严格的"高雅文化和排斥小说"的观念显然很难赢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图书馆职业经过思考,终于做出了观念上的调整,将消遣类读物的收集和提供确定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基本内容。图书馆职业运用观念策略谋求发展

[原文4] In the absence of money there is always money for anything that is important enough so that it should be done.

的另外一个突出的例子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当时，借助卡内基财团的支持而形成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势头已经见缓，图书馆职业认识到，要维持自身的持续发展，公共图书馆就必须扮演与社会需求相关的角色。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究竟什么样的角色是“相关角色?”。为了合理定义公共图书馆在战后美国的使命，美国图书馆协会组织了一批业外人士(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这就是著名的“公共图书馆研究项目”(Public Library Inquiry)。作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负责这一课题的学者提出了区分服务的观念，认为公共图书馆应该重点服务那些“文化活跃、认真使用图书馆资料的少数派”[81]。这一区分服务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公共图书馆界是另外的问题，此处的引述在于说明，观念的变革一向是图书馆职业十分重视的发展策略。在“Public Library Inquiry”以后的岁月里，世界图书馆界提出的为弱势群体服务的观念、用户至上的观念，都可以视作图书馆职业为谋求自身发展而实施的观念策略。

2. 管理策略

管理策略指通过建设和协调图书馆的各种资源(设备、文献、人员)、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来增加图书馆发展活力的策略。改善管理向来是图书馆职业谋求发展的重要策略。从一定意义上说，越是在政府投入或其他外来资源衰弱的时候，图书馆越要依赖管理策略谋求发展。在现代图书馆发展史上，运用这种策略的例子不胜枚举。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图书馆界对新技术的采用、对质量管理的关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外一些大学图书馆与计算机中心的联姻甚至合并都是图书馆通过管理策略增强自身发展力的例子。

3. 政治策略

政治策略指利用图书馆对于政府或主管部门实现其目标的价值来影响决策，从而促使政府或主管机构制定有利于图书馆发展的政策，并使图书馆在公共预算或部门预算中赢得尽可能大份额的策略。如前所述，在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图书馆在政府或主管部门的决策中可能面临三种不同的状况。第一种状况是图书馆的现有职能偏离政府或主管部门的战略目标，并因此在政府或主管部门的预算中失去青睐。要改变现状，图书馆往往需要适当改变职能，使自己的职能更好地服务于政府或主管部门的中心目标。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学图书馆教学功能的加强、西方公共图书馆对社会包容职能的强调、专业图书馆向知识管理功能的过渡，都是图书馆运用政治策略影响主管部门决策的例子。在第二种状况中，图书馆的职能虽比较贴近政府或主管部门的战略目标，但其价值尚未得到他们的认可，因而未能得到足够的支持力度。要改变这一现状，图书馆职业往往需要采用一系列的价值彰显策略，赢得政府或主管部门的理解和支持。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在英、

美等国家出现的关于图书馆影响效果的评估就带有明显的价值彰显意图，其目的是让政府和主管部门不仅了解图书馆的显性绩效，而且了解图书馆对用户产生的实际价值。在第三种状况中，图书馆的职能接近政府或主管部门的战略目标，而且其价值也已得到政府或主管部门的重视，其发展深得他们的支持。这种背景下的图书馆职业往往需要通过改善管理、服务创新等措施创造出物当其值的效果，从而维持政府对图书馆较强的支持力度。

4. 公共关系策略

公共关系策略即通过宣传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和服务最大程度地赢得社会捐赠和公众舆论支持的策略。图书馆发展史表明，社会捐助和舆论支持是图书馆发展的重要资源。例如，在美国，卡内基的捐赠就曾对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起过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82]。社会捐赠和舆论支持的前提是支持者对图书馆职业的使命和价值有充分的了解和同情。这就要求图书馆通过各种公共关系手段(如组织用户活动、参与社区活动、大众传媒等)宣传自身的使命和价值[83]。

5. 经济策略

经济策略即通过图书馆开展的有偿服务或其他渠道，增加图书馆创收，补充图书馆发展所需经费的策略。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出版物数量和价格的增长以及专业馆员工资的提高，维持图书馆发展所需的费用急剧增长[84]。这种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政府或其他主管部门对图书馆的投入，很多图书馆不得不开展一些有偿服务来弥补图书馆经费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有偿服务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图书馆的收入，但也有可能排斥一部分用户，限制图书馆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的发挥，从而削弱其他发展策略的作用。因此，很多图书馆都对有偿服务采取谨慎态度，将有偿服务限制在少数非核心服务领域，有些图书馆甚至在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以后，取消了某些原有的用户费用，以期能吸引更多的用户[85]。

参 考 文 献

1 杨子竟. 外国图书馆史简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3
2 Rubin R.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8
3 Rubin R.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8
4 杨子竟. 外国图书馆史简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5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
6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6
7 杨子竟. 外国图书馆史简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8 谢拉著,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

9 来新夏.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0
10 来新夏.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4
11 杨子竟. 外国图书馆史简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16
12 谢拉著,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
13 哈里斯著,吴靳萍译. 西方图书馆史.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113
14 谢拉著,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
15 Rubin R.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8
16 杨子竟. 外国图书馆史简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17 来新夏.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8 徐建华.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初探.《佛学研究》,1998 (7)
19 杨子竟. 外国图书馆史简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20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1998. 6
21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2. 143
22 Sturgess P. Conceptulizing the public library 1850～1919. In: Kinnell M, Sturgess P, ed.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library: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 institution.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1996. 29～47
23 杨子竟. 外国图书馆史简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24 Bush V. As We May Think. The Atlantic Monthly,1945,176(1): 101～108
25 Licklider J C R. Libraries of the Future. MIT Press, 1965
26 Christian R W. Electronic library: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1975～1976. White Plains N Y: Knowledge Industry Publications, 1975
27 Lancaster F W. 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28 兰卡斯特著, 郑登理, 陈珍成译校. 电子时代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员.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
29 Mcknight C. Digital library research at Loughborough: the last fifteen yea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Digital Libraries'95. The 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Libraries, June 11～13, 1995 ～ Austin, Texas, USA. http://www.csdl.tamu.edu/DL95/papers/mcknight/mcknight.html(2003/3/15)
30 刘晓白, 孙 卫, 镇锡惠. 中国数字图书馆系统工程的宏观分析. 2000. http://www5.nlc.gov.cn/shuzi/forum4.htm(2003/3/15)
31 Pullinger D. Attitudes to traditional journal procedures. Electronic publishing review, 1983,3(3): 213～222
32 Simpson A. Academic journal usage. British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1988, 3(1): 25～36
33 汪冰. 数字图书馆:定义、影响和相关问题.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6):6～17
34 ESYS Project Team. Summative evaluation of phases 1 and 2 of the e-Lib initiative. Surrey: ESYS Ltd, 2000
35 Carlson S. Do libraries really need book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2
36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1999. 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fttn99/contents.html(2003/3/19)
37 Eason K, Richardson S, Yu L. Patterns of use of electronic journal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0, 56 (5): 477～504
38 Eason K, Richardson S, Yu L. Patterns of use of electronic journal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0, 56 (5): 477～504
39 于良芝,郝玉峰. 大学图书馆教育功能的创新:英美经验的分析. 津图学刊,2002(1): 1～6
40 European Copyright Directive. Last ditch battle.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record, 2001, 103 (3): 133

41 ESYS Project Team. Summative evaluation of phases 1 and 2 of the e-Lib initiative. Surrey: ESYS Ltd, 2000

42 Buschman J. Notes on a critical and skeptical overview of electronic publishing and librarianship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law and technology JILT, 1997 (3)

43 Arms W Y. Digital librar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99

44 滕大春,戴本博. 外国教育通史.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45 来新夏.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46 来新夏.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47 Gaur. Cited in Haywood T, Info-rich info-poor : access and exchange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Bowker-Saur, 1995,51

48 Haywood T. Info-rich info-poor : access and exchange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 Bowker-Saur, 1995,52

49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0 谢拉著,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20

51 启蒙运动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758

52 引自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77

53 Rogers A R, McChesney K. The library in society. Littleton, Colo : Libraries Unlimited, 1984

54 Day M T. Transformational discourse: ideologie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the academic library. Library Trends, 1998,46 (4): 635~667

55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The Carnegie Legacy, 2002. http://www.carnegie.org/sub/kids/legacy.html(2002/7/13)

56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9

57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70

58 LISU.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atistic Tables. Loughborough: LISU, 2002

59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 New library: the people's network. Lond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 1997

60 Rubin R.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8

61 文化部网站,全国公共图书馆书架单层总长度增加,发放借书证略有上升,2002. http://www.ccnt.gov.cn/whcy/? nav=whcy01&id=1009676194(2003.2.23)

62 Raber Douglas. Librarianship and legitimacy: the ideology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quir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7

63 McColvin Lionel R. The public library system of the Great Britain: a report on its present condition, with proposals for post-war re-organisation. (McColvin Report) London: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1942

64 Benton F. Buildings, books and bytes: libraries and communities in the digital age. A report on the public's opinion of library leaders' visions for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Benton Foundation,1996

65 Comedia. Borrowed time? The futur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K. Bournes Green, Gloucs. England: Comedia, 1993

66 宓浩等. 图书馆学原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67 Schiller H, Schiller A. Libraries,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erce. In: Mosco A, Wasko J,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146~166

68 Schiller H I. The context of our work. In: Nordenstreng K, Schiller H I ed.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3: 465~471

69 Line M. et al. Discussion: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Information Services & Use, 1999, 19 (2), 171～172

70 Vakkari, Pertti. Social strcuture, book reading and the func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In: Kaegbein P et al, ed. Studies on research in reading and libraries. Approaches and result from several countries. Munchen: K. G. Saur, 1991: 259～279

71 哈里斯著,吴靳萍译. 西方图书馆史.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72 Chernik B E.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ervices. 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92

73 Rogers A R, McChesney K. The library in society. Littleton,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84

74 哈里斯著,吴靳萍译. 西方图书馆史.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75 Rubin R.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8

76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1999. 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fttn99/contents.html(2003/3/22)

77 NELL V. Lost in a boo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8

78 Buckland M K. Library services in theory and context.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3

79 Drucker. Cited in White H S, Librarianship—quo vadis: opportunities and dangers as we face the new millennium. 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2000, xxvi

80 Wiegand Wayne A. 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what the past tells us about the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9, 69 (1), 1～31

81 Raber D. Librarianship and legitimacy : the ideology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quiry.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97, 138

82 Rubin Richard.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8

83 Bradley J. Illinois library public relations at its best. Illinois Libraries, 2000, 82 (1): 22～27

84 Follett Report, Joint Funding Councils's Libraries Review Group: Report. Bristol, England: HEFCE, 1993

85 Oder, Norman, Alberta PL Cuts Fees, Sees Growth, Library Journal, 2001, 126 (9): 20

第四章　现代各类型图书馆

第一节　图书馆类型的划分

一、区分图书馆类型的要素

1．图书馆要素的确定

图书馆的要素指维持图书馆运行所需要的物质或非物质方面的成分。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将图书馆的基本要素定义为书、人、法三要素：书指包括图书在内的一切文化记载；人指阅览者；法包括图书馆的设备、管理方法、管理人才[1]。稍后，刘国均先生在其著作《图书馆学要旨》中提出，“图书馆成立的要素若加以分析可以说有四种：图书、人员、设备和方法”[2]。1957 年，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中，刘国均先生又进一步提出，图书馆事业有五项组成要素：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和设备、工作方法。他认为五者之中缺少任何一项，就不能够有图书馆的存在[3]。

划分图书馆要素可以满足图书馆职业的不同需要。第一个可能的需要是为了学科建设，即帮助图书馆学者确定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第二个可能的需要是为了管理的便利，即帮助图书馆管理者在明确图书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合理分配资源，并对各要素的运行状况进行统计、评估；第三个可能的需要是为了图书馆的发展，即帮助决策者和管理者在明确图书馆要素及其作用的基础上，制定出有利于图书馆发展的方针政策。在分析图书馆要素的时候，随着观察者的目的不同，他（她）所确定的要素种类也可能有所不同。

本节以理解图书馆的类型为目的，着重讨论那些对图书馆具有区分、聚合作用的要素，主要包括：图书馆的文献体系、用户群体、管理体制以及图书馆的目标、活动内容及功能。

2．图书馆的文献体系

图书馆的文献体系(library holding)指图书馆为其目标用户提供的文献总合，它是图书馆根据用户需求和事先确定的馆藏建设方针(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y)，通过采购、捐赠、交换等形式建立的，图书馆享有拥有权(ownership)或使用权(license)的所有文献。

当代图书馆的文献体系通常包括不同载体的文献，常见的载体类型有印刷型、缩微型、视听型及数字式等。每种载体又包括不同的文献形式或种类。综合考虑

载体形态与文献形式，一个典型的当代图书馆可能拥有表 4.1 所列的各种文献。

表 4.1　当代图书馆文献体系的构成

印刷型文献	缩微型文献	视听型文献	电子格式文献	
图书 连续出版物 政府出版物 专利文献 科技报告 会议录 参考工具书 非公开出版物	缩微胶卷 缩微胶片	录音带 录像带	实体入馆的电子文献（如 CD-ROM、磁盘） 授权使用的电子资源 本地数字化的资源 经馆员筛选、评价、组织的网上文献	书目数据库 事实数据库 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 电子报纸 电子政府出版物

3. 图书馆的用户群

图书馆的用户群（user community or user group）指图书馆服务的目标对象或其他实际使用图书馆服务的人，例如，一所大学图书馆的目标对象包括该校教师、科研人员、学生和管理人员，他们构成这所大学图书馆用户群的主体。同时，学校以外的其他用户，如大学附近的科研机构、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大学的用户，也可能通过某种安排成为实际使用图书馆服务的用户，他们也构成该校图书馆用户群的一部分。

用户群中那些实际使用图书馆馆藏和服务的成员通常被称为现实用户或用户；不使用图书馆馆藏或服务的成员称为潜在用户或非用户（non-users）[4]。事实上，用户和非用户的区分是很模糊的，因为“实际使用”与“不使用”之间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一个偶尔到图书馆咨询问题或偶尔到图书馆观看展览的社会成员是否在实际使用图书馆？应该把他们视作图书馆的用户还是非用户？一个远程使用图书馆目录或其他资源的用户应该视作用户还是非用户？为了避免概念的模糊，在有些场合（如图书馆统计过程中），图书馆用户通常仅指那些在图书馆注册的，即持有图书馆借阅证的成员。

4. 图书馆管理体制

所谓图书馆管理体制是指对各类型图书馆实施控制、监督、指导、操作的机构安排以及这些机构间的权力义务关系，也称图书馆治理（library governance）。具体地说，图书馆管理体制决定着谁负责制定图书馆的方针、政策、标准；谁负责对图书馆给予财政拨款；谁决定它的发展规划；谁对它进行监督约束；谁在业务上对它进行指导；谁组织实施图书馆服务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学者巴德（Budd）将这种权力义务关系叫做权力链（authority chain）[5]。

如果把图书馆管理体制看成一个权力与责任链，则该链条一般包含以下结构因素：

(1) 主管部门(governing authority)。图书馆的主管部门是向图书馆提供经费、委以责任并要求图书馆向之汇报履职情况的机构，一般是图书馆所属的母体机构或其他专门建立的管理机构。通常情况下，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图书馆的方针、政策，提供图书馆正常运行所需经费，审核图书馆预算，任命图书馆管理及监督机构(如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等。图书馆主管部门向社会公众或政府负责。

(2) 图书馆管理部门(administrative authority)。为了便于对所负责的图书馆实施管理，有些图书馆的主管部门还会成立专门的图书馆管理机构，并责成该管理机构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对图书馆的管理监督权力，范围的大小由主管部门决定。大多数图书馆管理机构的职责包括聘任馆长、制定和监督执行一般性政策、向主管部门建议重大决策。至于"一般"和"重大"的区分由图书馆主管部门决定，通常以书面协议的形式加以明确。图书馆管理机构向主管部门负责。

(3) 馆长及其领导班子。受图书馆主管部门或管理机构的聘任，馆长负责组建班子、招聘馆员来实施主管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和图书馆总目标，协助图书馆管理机构制定新的政策，管理图书馆的日常运行。馆长向主管部门或其成立的图书馆管理机构负责。

除了这些基本结构要素，图书馆管理体制有时也包括其他要素。比较常见的其他要素有全国性或地区性图书馆协调委员会、图书馆发展委员会、图书馆资助委员会、图书馆顾问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或者负责不同类型图书馆间的协作协调(如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成立的全国和地区性图书馆中心)；或负责规划领导各类型图书馆的发展(如今天英国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委员会)；或负责资助各类型图书馆的研发和创新(如美国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研究所)；或负责为各类型图书馆提供专业指导(如我国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

5. 图书馆组织结构

"图书馆组织"是指图书馆馆长根据图书馆的总目标，确定具体目标，并根据具体目标设计相应的组织结构，再聘任合适的人才来承担不同责任，共同完成图书馆任务的过程[6]。图书馆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其组织结构也往往不同。大型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一般具有复杂的组织结构，而小型学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可能只有几个粗略划分的部门。不少图书馆只有一个馆员负责全面工作，这种图书馆通常被称为"单人图书馆"(one person library)。本章将着重介绍大型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组织结构。

6. 图书馆目标、活动与功能

在图书馆学文献，特别是英文图书馆学文献中，用来表述目标、服务、功能这几个概念的术语非常繁多，例如表述目标的术语包括 library purpose，objective，goal，mission；表述图书馆服务的术语有 library operation，activity，service；表述功能的术语有 function，role。更为混乱的是，很多图书馆学文献交替使用 library purpose，objective，goal，mission，function，role 来表示同一个概念。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关于图书馆目标的规定来自于政府或其他管理机构发布的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常常并不严格区分上述不同术语，而是交替地使用它们来表达对图书馆最终状态，即图书馆目标的期望。

在本章中，图书馆目标(goal)指图书馆"对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状态的设想"[7]。这是一个从目标管理理论借来的定义，但同样适用于各类型图书馆。任何图书馆，无论它们当前是否实行目标管理，若要成为真正有价值的机构就必须清楚它期望实现的是什么，例如一个公共图书馆可能期望满足一个地区的情报需要、教育需要、娱乐需要，甚至更多；一个大学图书馆可能期望满足教学科研过程对文献资料的需求。图书馆目标是图书馆分配资源和制订行动计划的基础。缺少这样的目标，图书馆在安排工作和分配资源时就难免出现随意和混乱；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就难免无所适从；当政府、社会和主管部门要对它进行评价的时候，就难免无所依据。

图书馆活动指图书馆为实现其预定目标而开展的所有业务活动，包括图书馆技术活动(如文献分类、描述)和公共服务活动两大类。图书馆活动必须根据图书馆的目标进行设计和安排。

图书馆功能指若干相互关联的活动共同产生的作用，例如，在合理的文献体系建设、开放的阅览环境、形式多样的用户项目等活动的综合作用下，公共图书馆就可以发挥社区中心的功能。

二、图书馆类型的划分

根据上述要素可以对图书馆进行不同角度的划分。现行图书馆划分标准一般都综合考虑多种要素。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1974 年颁布的"国际图书馆统计标准"(ISO 2789)将图书馆类型划分为国家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其他主要的非专门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六大类型。国家图书馆指按照法律或其他安排，负责收集和保管国内出版的所有的重要出版物的副本，并起贮藏图书馆作用的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指主要为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和学生提供服务的图书馆；其他主要的非专门图书馆指具有学术特征的非专门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指中小学的图书馆；专业图书馆指由协会、政府部门、议会、研究

机构、学术性学会、专业性协会、博物馆、商业公司、工业企业商会或其他有组织的集团所支持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指那些免费或只收少量费用，为一个团体或区域的公众服务的图书馆，既包括为一般公众服务的图书馆，也包括为专门类别的公众，如儿童、囚犯等服务的图书馆[8]。

我国图书馆界通常按照图书馆的管理体制，结合图书馆的目标、功能、用户群体等要素，将图书馆划分为：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科学与专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工会图书馆、盲人图书馆、军队图书馆等[9]。我国的国家图书馆是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指那些业务上由文化部负责协调指导、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各级图书馆，包括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县(省辖市、地、州、盟)图书馆、街道(乡镇)图书馆。有些地区在公共图书馆之外另设儿童图书馆，但很多文献把儿童图书馆视作公共图书馆的组成部分[10]。高等学校图书馆指隶属于特定大学、学院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为学校的教师、学生、专职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情报需求服务的机构。我国的科学与专业图书馆主要包括中国科学院及其分院的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中国农业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中国地质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政府部门图书馆、公司、企业、学会、协会等机构的图书馆[11]。学校图书馆是在中小学中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图书馆。

第二节　公共图书馆

一、公共图书馆概述

如第一节所述，公共图书馆区别于其他图书馆的最根本特征，一是它的经费来源；二是它的用户范围。公共图书馆的经费主要来自地方公共财政，这就决定了公共图书馆是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维持的公益性事业。近年来，尽管由于经费的压力，各国公共图书馆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补贴地方财政拨款之不足，但是，地方财政始终是图书馆经费的基本来源。根据 1998 年的统计，美国公共图书馆经费中，地方政府、州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投入分别占 78%、13% 和 1%，其他经费(如捐赠、罚款、有偿服务的收入)占 9%[12]；根据英国的统计，从 1994 年到 1998 年，尽管有偿服务费所占比例略有上升，但尚未超过 6.3%[13]。我国最新统计显示，2000 年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拨款占图书馆总收入的 85.1%[14]。公共图书馆区别于其他图书馆的另外一个基本特征是它的用户范围。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面向该地区的所有社会成员的，无论他们的年龄、性别、种族、社会阶层如何。关于这一点，下一小节将详细讨论。

我国公共图书馆是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 年，我国共有县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 2698 所[15]，每千人拥有借书证为 5 个[16]。

二、公共图书馆的用户群体

几乎所有的公共图书馆标准或文件(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公共图书馆指南》)都将公共图书馆的用户定义为一个地区的所有社会成员。这意味着公共图书馆的用户群体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广泛性和多样性。公共图书馆的用户群,从年龄上看,包括从幼儿到老年的所有年龄段;从社会阶层来看,包括各种经济能力和政治地位的成员;从职业来看,包括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学生、离退休及失业人员等各行各业人员;从需求来看,包括寻求科研情报、决策情报、日常生活情报、娱乐信息等的各种需求者。公共图书馆用户成分的无与伦比的包容性是它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重要特征,也是公共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巨大政治资本。社会越是分化,公共图书馆的这一特征和资本便越是突出和可贵。

一个多世纪以来,公共图书馆员队伍始终不懈地维护着公共图书馆用户成分的包容性。公共图书馆员对用户成分包容性的坚持,首先决定了他们对偶尔出现的区分服务观念的冷漠。20 世纪 40 年代在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研究"(Public Library Inquiry)中,承担这一项目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曾认为美国公共图书馆应该把文化活跃的中产阶层定为重点服务对象[17],但这种"区分服务"之声很快就被来自图书馆职业内部的"社会责任"大讨论所淹没了,公共图书馆对于社会的弱势阶层所承担的责任是这场讨论的核心内容。其次,对包容性的坚持也决定了很多公共图书馆员对有偿服务及其背后的商业文化的抵制。在抵制有偿服务的众多理由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图书馆一旦实施有偿服务,就会由于对用户经济能力的要求而在客观上排斥一部分社会成员。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这种抵制不断受到日益加剧的信息商品化的冲击,但大多数公共图书馆还是成功地将有偿服务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如联机检索、复印等)。第三,对包容性的坚持还促使公共图书馆员十分关注他们吸收辖区内社会成员的程度,将现实用户与潜在用户(或总人口)的比例视作衡量图书馆服务效果的重要指标[18]。例如,在英国,公共图书馆持证用户占整个人口的比例,始终是公共图书馆界引以为骄傲的数字。根据英国图书情报统计中心的资料,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公共图书馆注册用户占整个英国人口的比例始终维持在 60%左右[19]。正如斯特奇斯(Sturgess)等人所评论的,当今英国社会中,很少有其他机构拥有如此庞大的社会基础[20]。

三、公共图书馆的目标

1. 各国对公共图书馆目标的界定

如第三章所述,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出现于 19 世纪中叶的英国和美国。鉴于一百多年来世界公共图书馆界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人们也

许会认为，早期公共图书馆的创立者对于他们要实现的目标一定有着明确的认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他们倡导的史无前例的事业，公共图书馆的先驱们的认识常常是模糊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例如，1849 年，爱德华兹曾这样定义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是从公共经费中获得全部或部分资助的图书馆，我认为公共图书馆还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21]（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1850 年的英国公共图书馆法也含有许多这样模糊的表述[22]。正如英国学者斯特奇斯在谈到这段彷徨、摸索的阶段时所评论的：

> 我们切莫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从而认为图书馆的性质和职责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事实上，那些负责创建公共图书馆的立法人员、公务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对公共图书馆到底该是什么样的所知甚少。不仅如此，那些负责管理图书馆服务的图书馆员，同样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23][原文1]。

继 1850 年的公共图书馆法之后，英国 1919 年的公共图书馆法、1964 年的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法，以及这期间及之后出现的政府或图书馆协会的报告——最著名的有 20 世纪 20 年代的《凯尼恩报告》（"*Kenyon Report*"）、40 年代的《麦克考文报告》（"*McColvin Report*"）、50 年代的《罗伯茨委员会报告》（"*Roberts Committee Report*"）、20 世纪 90 年代的《科米迪亚报告》（"*Comedia Report*"），——都对公共图书馆的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义。其中，1964 年的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法规定，公共图书馆的目标是"向需要图书馆服务的所有人提供全面、高效的图书馆服务，并为此聘任合适的工作人员来提供和维护合适的建筑、设备、图书和其他资料，开展合适的活动"[24][原文2]。配合后来颁布的各种标准，1964 年的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法今天依然是英国公共图书馆提供服务的基本依据。

在美国，美国图书馆协会是公共图书馆目标的主要定义者。从 1876 年成立至今，美国图书馆协会曾多次对公共图书馆的目标做出阐释，其中较有影响的阐释包括 20 世纪 40 年代的《公共图书馆标准》（"*Standards For Public Libraries*"）、20 世纪 60 年代的《公共图书馆系统最低标准》（"*Minimum Standards For Public Library Systems*"）、20 世纪 70 年代的《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及其服务的必要性》

[原文 1] We should not allow hindsight to convince us that is has always been clear what a public library was, or what it was supposed to do. The legislators, civil servants, local politicians and administrators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setting up of public libraries very definitely had limited visions of what a public library should be. What is more, the librarians themselves, whose task it was to manage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were almost equally unsure of just what they should aim to achieve.

[原文 2] The provision of a comprehensive and efficient library service for all persons desiring to make use thereof, and for that purpose to employ such officers, to provide and maintain such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and such books and other materials, and to do such other thins, as may be requisite.

(“*Public Library Mission Statement And Its Imperatives For Service*”)、20世纪80年代的《公共图书馆的计划制定和职能界定》(“*Planning And Role Setting For Public Libraries*”)。切尼契(Chernick)将美国公共图书馆目标的演化分为六个阶段:强调图书馆的教育目标时期(1850～1875),增加娱乐和参考服务目标时期(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重新强调教育目标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50年代末)、关注社会责任目标时期(20世纪60～70年代)、因地制宜地确定目标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25]。

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也都多次对公共图书馆的目标做出界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公共图书馆目标的定义见于1942年、1972年和1994年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1994年修订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定义了公共图书馆四个方面的目标:情报(information)、读写(literacy)、教育(education)和文化(culture)。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对公共图书馆目标的界定主要见诸它1973年、1977年、1986年和2000年公布的《公共图书馆标准》(1986年和2000年版称为《公共图书馆指南》)。2000年的《公共图书馆指南》将公共图书馆的目标定义为:满足社会的教育需求、情报需求、个人发展需求(如个人创造力和兴趣爱好等)、满足儿童和青少年的需求、社区文化发展需求。在该指南和其他有关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中,社区(community)的概念指图书馆所辖地区及其居民,其含义来自“社区”一词的下述语义:“社区是一个特定的区域或地方及其居民”(a particular area or place considered together with its inhabitants)[26]。本书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社区”概念。

建国以后,我国文化部曾先后在1978年11月颁布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工作条例》和1982年颁布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中,以“图书馆的任务”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目标。1982年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规定,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担负的基本任务包括:① 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向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② 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书刊资料;③ 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④ 搜集、整理与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⑤ 开展图书馆学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研究,对市(地)、县(区)图书馆进行业务辅导;⑥ 在省(市、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推动本地区各系统图书馆间的协作和协调。

2. 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目标

从各国公共图书馆的目标定义不难看出,现实中并不存在一组超越政治和文化背景、适用于所有公共图书馆的一般目标。这不仅因为公共图书馆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一个清晰易断的问题,而且因为各国图书馆都会根据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需求以及自身的条件确定出与当地情况相适应的目标。尽管如此,考察不同

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公共图书馆目标的规定[27,28,29]，还是可以确定一组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目标，这些目标不仅被大多数公共图书馆所重视，而且具有比较悠久的传统，它们对社会的价值也因此经历了更广泛、更长时间的考验。这些目标包括：

• 满足本地区公众的教育需求：这包括社会成员在维持基本的阅读写作能力、从事有计划的自学或正规教育时产生的对图书馆文献资料、服务和空间等的需求。

• 满足本地区公众的情报需求：这包括社会成员或组织在从事职业活动、日常生活、兴趣爱好时产生的对各类知识和信息（如科学技术知识、商业经济信息、政府政策信息、本地区设施及服务信息等）及相关服务的需求。

• 满足本地区公众的研究需求：这包括社会成员在从事职业性或业余性（如地方史、家史等）研究活动时所产生的对相关知识、信息、文献及服务的需求。

• 满足本地区公众的文化需求：这包括公众为提高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开阔眼界、增长阅历、了解文化遗产等而产生的对各类资料和相关服务（如各种展览、书评、讲座）的需求。

• 满足本地区公众的娱乐需求：这包括公众为积极地、创造性地使用闲暇时间而产生的对各类文献资料和相关服务（如故事会、阅读俱乐部活动等）的需求。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的公共图书馆普遍面临日益严重的经费压力，对于具体的图书馆来说，试图全面、均衡地实现上述所有基本目标常常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很多图书馆不得不根据本地需要，选择一种或几种目标作为自己的重点目标，以便集中利用资源。197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及其服务的必要性》（“*Public Library Mission Statement And Its Imperatives For Service*”）就是根据这一精神制定的。它希望各地区公共图书馆根据它所推荐的目标，形成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目标。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这种取舍策略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公共图书馆的明智之举。继美国图书馆协会倡导的取舍策略之后，1993年英国的《科米迪亚报告》（“*Comedia Report*”）也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具体图书馆来说，试图为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将越来越不可行，为了自身的发展，公共图书馆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明确重点目标，以求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效果[30]。

四、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体系

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体系需要密切反映公共图书馆的目标。以教育为主要目标的图书馆需要建立丰富的、能够支持成人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文献；以文化和娱乐为主要目标的图书馆需要建设丰富的通俗读物馆藏；以满足情报需求为主要目标的图书馆需要拥有丰富的参考馆藏。有些公共图书馆还可能根据它们的主要目标建设一些特藏，例如商业信息特藏，成人教育特藏等。

除了体现图书馆的主要目标，公共图书馆的馆藏通常还体现着“大众化”的特点。一般说来，公共图书馆的通俗读物（如小说、传记）和实用读物（如家居、旅游）比例较高，载体种类也比较多样，不仅包括图书、期刊、报纸，还包括大量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载体。此外，公共图书馆一般比较注重收集反映地方特色的馆藏。很多公共图书馆还承担着收集、陈列和提供地方政府的政策、文件、报告等职责。这些特点使公共图书馆在馆藏体系方面明显区别于其他类型图书馆。这从表 4.2 所示的英国公共图书馆 1999～2000 年度藏书体系中可略见一斑。

表 4.2 英国公共图书馆 1999～2000 年度各类馆藏文献比例[31]

文献类别	1999～2000 年度入藏比例/%	1999～2000 年度馆藏比例/%
成人小说类	35.0	28.0
成人非小说类	21.7	28.0
儿童图书类	27.1	21.0
参考书类	4.2	15.8
声像资料类	11.9	7.2

五、公共图书馆的主要活动

公共图书馆活动是图书馆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而开展的各种专业活动。由于服务对象构成复杂，需求多样，公共图书馆的活动内容比任何其他类型图书馆的活动都广泛、多样，一本图书馆职业的入门书很难穷举所有公共图书馆的活动，以下所列是一些比较常见的公共图书馆活动：

1. 专业技术活动

图书馆的专业技术活动（technical service）通常指包括文献收集、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整理、文献实体的加工处理及保管、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实施及维护等业务活动。公共图书馆的专业技术活动涵盖上述所有方面。

（1）文献体系建设（collection development）。文献体系建设是根据图书馆的主要目标、用户需求和图书馆的能力，依据事先制定的采购方针，从出版发行的文献中选择文献，加以收集，形成图书馆的藏书体系，并采用科学的方法保管和维护这一体系的过程。对于传统的印刷式文献，这一活动的大致程序如下：① 图书馆员评价文献内容，并根据文献收集方针选定入藏文献，在这一过程中，图书馆一般都会通过一种或多种渠道听取用户意见；② 通过图书馆代理商或直接从出版机构获取文献，在这一过程中，图书馆获得对文献的长期拥有权（ownership），其用户获得对文献资料的无限使用权；③ 排列、保管文献实体，使之成为便于使用的有序集

合;④ 采用科学的文献保护方法(如防虫、防潮、修缮等)维持文献实体的物理状态,采用科学的馆藏维护方法(如调研、统计、剔旧等)维护整个体系的有用性。

数字化的馆藏建设模式目前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如第三章所述,在数字化背景下,无论是文献的收集过程,还是文献的长期保存过程,都充满了未决的难题。成熟的采购模式和长期保存模式尚待图书馆与代理商、出版机构之间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研究和协商才能形成,但不管最终模式如何,数字化文献的采购模式都将在很多方面区别于印刷式文献的采购模式。第三章里提到的从拥有权到使用权的转化、从本地拥有到远程获取的转化,即时采购模式的增长,都体现着数字化革命对馆藏建设的变革。

(2) 组织整理知识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凡是图书馆收集的文献资料,都需要依据它们本身的特征,运用图书馆职业的知识组织整理方法,进行组织整理。对于印刷式文献和图书馆拥有其物理实体的其他文献(如声像资料、CD-ROM),图书馆员要采用特定的知识分类体系(如《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特定的作品和文献描述标准(如 AACR2)、特定的书目数据编码格式,对作品内容和文献的实体特征进行揭示;对书目数据进行组织;对经过描述的文献实体进行排序,由此形成查找文献的检索工具集合(如联机目录)和文献本身的集合。对于图书馆授权使用(licensed)的数字化文献,如电子版全文期刊、电子图书,一般图书馆也视作馆藏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加以分类、描述,并将它们的书目数据纳入图书馆的联机目录体系。有些图书馆还在目录体系和全文数据库之间建立超级链接,以便用户能从查询结果直接获取全文文献。但是,由于数字化文献具有很多不同于印刷式文献的特征,如存取地址(即 URL)、存取方式(如 EMAIL,FTP,HTTP 等)、存取权限等,所以,图书馆在处理数字化文献时通常采用与印刷式文献不尽相同的描述标准及编码格式。元数据格式就是用来描述数字化文献的标准及格式的总称。对于网上自由存取的文献,很多图书馆也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组织、整理,便于用户从瑕瑜混杂、数量庞大的网上文献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由此形成的检索工具通常被称为网上资源导航库。

2. 公共服务活动

图书馆的公共服务活动(public service)指那些需要与用户直接接触的图书馆业务,包括流通、阅览、情报服务、复制及其他类似的活动。由于用户需求的多样性,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服务活动十分丰富。

(1) 外借、阅览、送书上门等文献提供活动。这是一组向用户提供文献,促进文献流通的活动。外借就是允许注册用户(或称持证用户)将一定数量的文献带到馆外使用,并在一定时间内归还给图书馆的活动。对于传统图书、声像资料、CD-ROM 盘等,"带到馆外"就意味着将文献实体带到馆外,一般图书馆对此都规定着

可借阅的文献种类、数量、期限、过期罚款办法、文献遗失补偿办法等规定；对于迅速增长的电子图书(e-book)，目前还不存在成熟统一的借阅办法。一般说来，对于预先装载在阅读器上(e-book reader)的电子图书(如南开大学津科电子的"翰林"电子图书)，目前较常见的流通办法是把每份阅读器连同预先装载的内容视作单本书流通，而对于可随时下载的远程电子图书文档，一般由出版商和图书馆协商确定"外借"模式。目前不少出版商都试图推行类似于传统图书的"一次一用户"的外借模式。依据这样的模式，图书馆购买的每一个"复本"，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允许一个用户下载到自己的阅读器上。在被下载的文档从该用户的阅读器上删除之前，该文档不能被其他用户下载；如果图书馆希望同一份电子图书文档同时被不同用户存取，就得购买多个复本[32]。这种"回归传统"的借阅方法无疑会限制电子图书潜能的发挥。如何平衡出版商利益与电子图书潜能的冲突是当代公共图书馆面临的一个难题。

阅览服务是向注册或非注册用户提供文献和空间以便他们能在馆内使用文献的服务。公共图书馆的阅览服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献提供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阅览甚至比外借更重要。这是因为，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公共图书馆用户属于"随入(walk-in)用户"，他们虽然不是图书馆的持证用户，却希望能够自由进出图书馆的大门，或随意翻阅报刊新闻，或寻求日常生活所需信息，或仅仅感受图书馆的文化氛围，公共图书馆必须有足够的开放空间和开放馆藏满足这部分用户的需求；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的有些功能(如作为社区中心的功能)必须依赖于一个开放、友好、自由、安全的阅览空间，一个处处需要持证进入的公共图书馆很难成为社区中心。

近年来，馆内阅览的一种特殊形式就是利用图书馆的设备进行网上浏览(在我国，提供这种服务的空间被称为电子阅览室)。互联网发展之迅速，网上资源之丰富，使任何公共图书馆都不能忽视这种服务。2000 年，美国提供馆内上网服务的公共图书馆比例为 98%[33]；2002 年底完成的"人民网工程"已经使所有英国公共图书馆都能提供这种服务。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提供电子阅览服务的状况还缺乏具体的统计资料，但从近年来人们对"电子阅览室"建设的兴趣看，这是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领域。电子阅览给公共图书馆的阅览服务提出了很多挑战，例如，使用电子阅览室的费用问题，图书馆员对于不当信息内容(如色情、暴力)的责任问题等。

送书上门活动是图书馆通过流动图书馆、邮寄或专人递送等方式为不能亲自到馆的用户(如障残用户、老年用户、医院用户、监狱用户)提供文献的活动。公共图书馆是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服务的惟一图书馆类型，所以，很多公共图书馆视送书上门为重要的文献提供形式。

人们很容易把图书馆的文献提供活动视作一种简单操作。业外人士对图书馆工作的很多误解也往往因此而生。诚然，如果图书馆制定了完整的、合理的、系统

的借阅规章,提供文献的操作过程并不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外借阅览的工作常常由非专业馆员承担,并且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图书馆纳入自助服务范围的原因。但事实上,在有关外借阅览活动的决策背后,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常常面临复杂的哲学抉择。20 世纪 60～70 年代,当声像资料大量进入公共图书馆的时候,图书馆职业就曾面临这样的抉择。由于当时声像资料价格高于普通印刷式资料,不少图书馆担心无偿外借声像资料会增加图书馆的经费压力。最后,有些国家(如英国和我国)的公共图书馆选择了有偿提供,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如美国)的公共图书馆选择了无偿提供。反思这次抉择,很多英国图书馆员认为他们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是公共图书馆在社会包容和信息平等原则上的退步[34]。9·11 事件以后,美国一些公共图书馆出于安全的考虑,开始限制人们进馆阅览时可携带提包的体积,这意味着从前可以自由进出公共图书馆的街头流浪者将无法将他们的全部家当带入图书馆。有人担心这样会剥夺无家可归者利用图书馆的权力,是公共图书馆向排斥性服务迈出的又一步。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在进行当中[35],这场讨论使美国公共图书馆又一次面临着重大的哲学抉择。

(2) 情报服务活动。这是向用户提供具体的知识或信息,满足其情报需求的服务。公共图书馆的情报服务活动可以有多种形式,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向用户提供一个丰富的、供馆内使用的参考馆藏,以便用户能容易地查到他们需要的情报内容。

在更多的时候,公共图书馆需要通过参考咨询服务直接为用户提供所需情报。这包括帮助用户查找和确定馆藏资料的位置;帮助用户解释查到的资料;利用参考馆藏和网上资源解答用户提出的问题;对图书馆无法解答的复杂问题,将用户指向能解答其问题的其他机构,如由社会志愿者、地方政府、专业协会或组织等运行的无偿或有偿咨询机构。根据公共图书馆的总目标,公共图书馆应该是社区成员寻求情报服务的第一选择。这意味着,来自用户的一切提问,甚至那些表面看来荒诞不经的用户提问,都应该得到参考咨询馆员的认真关注。参考咨询解答数量是反映一个图书馆情报服务功能的重要指标。表 4.3 所列是英、美等国公共图书馆近年解答咨询的数量。

表 4.3　欧美公共图书馆解答咨询问题的数量[36~38]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美国(人均次)	1.0	1.1	1.1	1.1	1.1	1.1	1.1
英国(总量,百万人次)	568.9	551.4	538.2	517.8	497.9	613.7	595.9
欧洲(总量,亿人次)	23.5	23.4	23.9	23.7	23.4		

公共图书馆情报服务的另外一种形式是提供社区情报服务(community information service)。这是为用户收集、整理和提供有关社区生活所有方面的信息的服务,如关于社区内的娱乐设施,学习机会(各种培训机会)、政治生活(如地方选举)等方面的信息。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员开始创造性地使用互联网改善情报服务,使公共图书馆的情报服务活动发生了很多引人注目的变化。首先,由于信息丰富,检索方便,互联网为图书馆解答咨询提供了快捷的途径。从机构地址、邮政编码、列车时刻表到各类统计数据再到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几乎所有的信息类别都有对应的网上资源。尽管网上搜索引擎目前还存在查准率过低等局限,但其检索速度毕竟比手工查找快捷。这些优势正在使互联网成为参考咨询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次,利用电子邮件或专门网页为用户解答问题的虚拟咨询服务(virtual reference desk)开始涌现。利用这种服务,用户可以把提问写成电子邮件发给馆员或"贴到"虚拟咨询服务的网页上,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任何地方(家庭或办公室)发出提问,虚拟咨询馆员一般会在特定时间内(如48小时)对用户提问做出回答。第三,互联网也为馆员之间在参考咨询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可能,专业讨论组(mailing list)就是馆员开展互助解答咨询问题的重要渠道。第四,在很多国家,互联网已经被广泛用于改善社区情报服务。在90年代初的美国,这种尝试曾发展为引人注目的社区联网运动(community networking movement),促使很多社区积累了丰富的网上社区情报源。它的推动者们(包括图书馆员、一部分计算机专家和社区活动家)把它视为改善社区民主参与能力的运动[39]。

(3) 阅读促进活动。阅读促进活动(reading promotion)是以故事会、推荐书目、作家讲座、读书俱乐部、书展、书签等形式向社会成员宣传图书、促进阅读的活动,目的在于培养和推动社会的读书氛围,形成爱书、读书的社区文化。阅读促进活动在公共图书馆有着悠久的历史。19世纪公共图书馆先驱们就是阅读促进活动的积极倡导者。怀着对人的可教化性和图书之教化育人功能的坚定信念,这些图书馆员试图通过培养人们的阅读兴趣把他们从酒吧、赌场等不良场所吸引到图书馆来[40]。从那时直到今天,阅读促进活动始终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活动内容。现代公共图书馆的阅读促进活动虽然不乏功利的目的(如改善图书馆流通率等绩效指标),但是,对知识和图书的信念依然是图书馆员从事阅读促进活动的重要的激情源泉。

(4) 社区活动项目。这是为图书馆辖区成员组织的集体活动项目,如故事会、音乐会、各类展览等。社区活动项目一般按用户类别组织。为儿童和青少年组织的活动项目经常包括故事会、读书俱乐部、有奖读书活动、家教辅导服务,计算机培训服务,甚至各类表演(如木偶表演、动物表演等)等。为成人提供的活动项目经常包括讲座、培训(手工、烹饪、体操、摄影等)、读书俱乐部、各类展览等。很多公共图

书馆还为社区群众团体(如集邮爱好者、天文爱好者等)的自发活动提供活动场地。这些活动虽然经常与文献资料的利用无涉,却是公共图书馆满足社区成员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5) 特殊需求服务(special needs service)。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障残法的颁布和实施,很多公共图书馆把为残疾人服务提到更高的议事日程,在建筑设计、网站设计、馆内指示标志设计、文献体系建设、设备配置等方面开始考虑视听障残、行动不便的用户的特殊需要。表4.4是英国公共图书馆2000年为视力障残读者提供的特殊服务。

表4.4　英国公共图书馆为视障用户提供的特殊服务[41]

服务内容	提供服务的图书馆当局*/数量	提供服务的图书馆当局的比例/%
可带助盲犬进馆	129	93
上门服务	128	93
自动门	97	70
从书架上代取资料	74	54
提供有关图书馆服务的大字本信息	52	38
提供盲文或大字本目录	51	37
提供特殊路标	43	31
提供特殊阅读设备使用指导	42	30
将本馆资料录成磁带	36	26
将本馆资料制成盲文	26	19
提供大字本/盲文本用户登记表	13	9
馆内带路	9	7
提供交通	4	3

* 英国的图书馆当局指负责提供图书馆服务的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所有公共图书馆,一个当局通常包括一个中心馆、若干分馆和流动图书馆等。

六、公共图书馆的功能

公共图书馆各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赋予公共图书馆强大的社会功能。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图书馆协会为了帮助公共图书馆进行角色设计,以便集中使用有限的经费,特将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归纳为八个大类[42]。20世纪90年代,

欧美公共图书馆为了充分彰显自身价值，再次发起对公共图书馆功能的研究[43,44]。这些文献将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大致总结为：

• 社区记忆功能：通过系统收藏和保管与本地区相关的文献，公共图书馆可以比其他机构更完整地保存地方历史记录，供当代和未来用户使用。

• 信息产品消费功能：公共图书馆每年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购买各种文献资料、软件和设备，对于这些产品来说，公共图书馆是一个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是惟一的市场。

• 社区活动中心功能：通过为社区成员组织各类活动、为社区民间组织提供活动场所、为所有成员提供开放、友好、安全的阅览空间，公共图书馆发挥着社区中心的功能（community activities center 或 community focal point）。

• 情报中心功能：通过提供丰富的参考馆藏、专业化的参考咨询服务，以及对社区情报的收集、整理和提供，公共图书馆发挥着社区情报中心的功能。

• 正规教育支撑中心功能：通过为各层次在校学生提供参考资料、课外读物、家教辅导，通过支持学校图书馆的工作，公共图书馆发挥着正规教育支撑中心的功能。

• 自主学习中心功能：为社区成员的进修计划、自学活动、继续教育活动、技能培训活动以及其他终身教育活动提供文献资料、学习空间、设备及相关服务。

• 大众文化资料中心功能：为社区成员的休闲生活收集、整理、提供各种载体的娱乐性资料。

• 研究支撑功能：大型公共图书馆有时还为社区内的研究活动，特别是那些未被高等学校图书馆和大型科研中心图书馆服务所涵盖的研究活动提供文献资料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些功能是公共图书馆较常见的功能，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公共图书馆因经费限制而采取的目标取舍策略已经使大多数公共图书馆无法同时具备上述所有功能。重要的是，无论是目标的界定、活动的设计还是功能的形成，都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从而保证公共图书馆能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最大的影响。

七、公共图书馆标准

为了确保公共图书馆功能的发挥，很多国家都制定了指导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标准。这些标准一方面对公共图书馆的目标、活动、功能做出正式的规定，另一方面对这些规定给出指导性的可操作标准。表 4.5 列出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公共图书馆标准及其主要内容。

表 4.5　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公共图书馆标准

国别	标准	主要规定
中国	1978 年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工作条例》 1982 年的《省(自治区、市)公共图书馆工作条例》	规定了公共图书馆的性质、任务、管理体制、活动内容等
美国	1943 年的《公共图书馆标准》 *Standards for public libraries*	提出了公共图书馆向所有人免费提供服务的原则、公共图书馆的目标、服务内容等
	1966 年的《公共图书馆最低标准》 *Minimum standard for public libraries*	提出了建立公共图书馆的最低人口标准、建立地区性图书馆系统的意见等
	1980 年的《公共图书馆计划过程》 *A planning process for public libraries*	提出了公共图书馆根据当地情况确定图书馆目标和职能的基本框架
	1987 年的《公共图书馆的计划与职能确定》 *Planning and role setting for public libraries*	进一步阐述了公共图书馆根据当地情况确定图书馆目标和职能的基本框架
英国	1962 年的《英格兰、威尔士公共图书馆标准》 *Standards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 in England and Wales*	规定了图书馆藏书规模、人员水平等方面的大致标准
	2001 年的《公共图书馆标准》 *Public library standards*	首次根据 1964 年的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法的原则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标准。例如,住所距图书馆不超过 1 英里(1 英里 = 1.609 34 公里)的家庭比例、不超过 2 英里的家庭比例、开放时间、每万人计算机数量、拒借率、馆际互借满足率、满意用户比例等
IFLA	1973 年的《公共图书馆标准》 *Standards for Public Libraries* 1986 年的《公共图书馆指南》 *Guidelines for Public Libraries* 2000 年的《公共图书馆指南》 *Guidelines for Public Libraries*	确定了图书馆治理、管理、馆藏、服务、建筑、经费等方面标准的制定原则

八、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

由于公共图书馆的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并由地方政府的特定部门(如文化、艺术或教育部门)负责其发展、管理、监督,因而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体制与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管理系统存在很大关联。这就使不同国家的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体制存在很大不同。

在英国,公共图书馆的主管部门是地方政府。根据 1964 年的公共图书馆与博

物馆法的规定，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图书馆发展所需经费，保证图书馆功能的正常发挥。在有些地区，地方政府专门设有负责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的部门；在另外的地区，地方政府在教育部或文化、娱乐及旅游部下设分管公共图书馆工作的委员会。分管图书馆工作的部门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审核图书馆规划、预算，制定图书馆政策，聘任馆长等。根据1964年的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法的规定，在全国范围内，负责全国公共图书馆协调、监督、指导的中央政府部门是文化、体育及传媒部。该法令规定，文化、体育、传媒部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行使两个方面的职权，第一，监督地方政府对公共图书馆的支持和管理情况，对不能有效支持和管理当地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政府，文化、体育及传媒部有权给予责罚，文化大臣亲自行使这一权利。不过，自1964年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法公布以来，这个权力还很少被使用过。第二，扶持领导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文化、体育和媒体部设有负责这项工作的专门机构，目前这一机构的名称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委员会(2000年以前是图书馆情报工作委员会)。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委员会的具体职责包括：为图书馆事业提供战略指导、在全国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强化图书馆事业力量、促进事业创新和变革。在这一职责之下，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领域的研究开发活动、统计活动和其他需要资助的活动；确定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事业未来发展方向和战略性发展重点；确定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最大程度地实现其战略重点的途径；收集有关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价值及影响的证据，向政策制定者和资助者宣传它们的价值；指导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工作实践；确定各个工作领域(如人员培训)的最优化实践。

在美国，虽然各州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体制存在一定差异，但比较普遍的体制是地方政府通过图书馆董事会(Board of Trustees)管理图书馆。董事会负责一般规划及政策的制定，但重大的图书馆投资项目由当地民众投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负责领导和扶持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机构有两个：博物馆及图书馆研究所(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IMLS)和图书馆情报科学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这两个机构的职责还同时涵盖公共图书馆之外的其他图书馆类型。IMLS是一个代表联邦政府向图书馆提供财政支持的机构，每年都向各类型图书馆提供份额不等的财政补贴。根据1992～1998年的统计，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通过IMLS向公共图书馆提供的经费占公共图书馆全部收入的1%左右[45]。图书馆情报科学委员会是一个就图书馆情报政策向行政及立法部门提供咨询指导的机构，它同时负责向IMLS提供政策方面的指导。与英国不同，美国没有就公共图书馆事务对地方政府实施监督的全国性机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商业文化的影响和效率目标的驱使下，英、美一些地区已开始尝试其他管理体制模式。承包(outsourcing)模式便是较引人注目的新模式之一。这种模式与以前局部范围的业务承包(如后勤工作的承包)不同，它将整

个图书馆的运行都承包给私营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公共图书馆的主管部门仍然是地方政府或图书馆董事会,但很多决策和所有日常工作都移交给承包图书馆的私营公司。因而,完全的承包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图书馆的管理体制。1995年,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曾委托 CPI(一家独立的研究咨询公司)考察将公共图书馆承包给私营机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该研究对完全承包的管理体制提出了基本否定的结论。1997 年上台的工党政府虽然未曾推翻这一结论,但却多次表明,政府所重视的是服务质量和效果,而不是由谁提供服务。这样的措辞意味着,如果各公共图书馆不能提供令用户或政府满意的服务,政府不排除将公共图书馆以及属于公共图书馆的经费交给私营机构运营的可能。

近年来,国外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出现的另一新的动态就是联合图书馆(joint librarie)的增加,即由原来不同的图书馆资助机构(如负责公共图书馆的文化部门与负责学校图书馆的教育部门)共同拨款,在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协调下,形成同时为两组不同用户群体服务的统一的图书馆。到目前为止,最常见的联合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或当地的学院图书馆)一体的图书馆。这样的管理体制在公共图书馆界虽然早有尝试,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图书馆似乎对这一模式重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1 年,在 LIS-PUB-LIBS@JISCMAIL 的讨论中,有五个英国大中城市介绍了当地联合公共/学院图书馆的管理体制模式。

在管理体制方面所进行的上述尝试,在整个图书馆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承包"(有人称之为"私有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哲学基础的层面上,即私营部门的价值观是否能与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服务精神相兼容。对联合图书馆模式的争议则主要集中在它的操作难度和它的实际效果上。联合图书馆模式需要极其缜密的计划与磋商。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如图书馆员的伤患保障,都有可能引起两个母体机构间的分歧;而任何一个用户共处的场所(儿童与教学人员)都有可能造成服务上的难度[46]。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的主管部门是每一级地方政府的文化厅或文化局。文化厅(局)负责管理地方政府对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拨款、人事安排;制定本地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战略和重大方针政策。大部分文化厅(局)都通过分管图书馆工作的某个处对图书馆实施具体领导。文化厅(局)或分管图书馆工作的处聘任图书馆馆长主持图书馆的日常工作。馆长的职责包括领导全馆日常运行中的行政及业务工作,制订全馆的工作计划,制订图书馆的预算,进行工作总结,参与聘用馆员。

到目前为止,这种"文化厅(局)—分管图书馆工作的处—图书馆馆长"的管理体制依然是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最普遍的管理体制模式,但是,近年来,一些图书馆也在尝试新的模式。上海图书馆就是其中一例。1995 年,上海市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所合并之后,归上海市宣传部主管。即将投入使用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泰达图书馆也将采用全新的管理体制模式。泰达图书馆是一个集公共图书

馆、泰达科技情报中心、泰达学院图书馆为一体的新型图书馆。该馆由天津开发区文教卫生局主管，馆长及其领导班子负责图书馆服务的实施及日常管理。

在全国范围内负责公共图书馆协调、指导工作的是文化部的社会文化及图书馆司。该司负责研究拟定全国群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少年儿童文化、各类图书馆等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图书文献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推进图书馆间协作和标准化、现代化建设，指导图书文献保护工作。

九、公共图书馆的组织结构

公共图书馆的组织一般按活动内容进行，即首先按活动内容将图书馆分成不同的单元(unit)，再将这些单元组成责权分明的等级式结构。一般现代大型图书馆的基本单元包括负责文献收集的采访部门、负责文献加工整理的编目部门、负责文献保管的典藏部门、负责文献传递的流通部门、负责情报需求的咨询部门(越来越普遍地被称为信息服务部门)等。大多数公共图书馆都将这些部门组成两大部分：公共服务部和技术服务部。公共服务部包括所有与图书馆用户直接接触的部门，如流通和参考咨询部；技术服务部包括所有从事“幕后”活动(如采购、编目、系统维护等)的部门，由此形成从馆长到两大部门再到它们各自的分部门的等级式组织结构，如图 4.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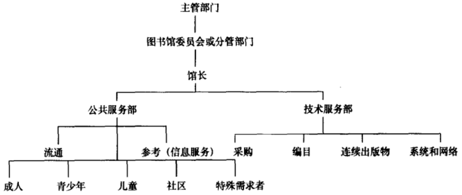


图 4.1　公共图书馆基本组织结构图[47]

以这个基本的等级结构为基础，不同的图书馆常常按自己的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有些图书馆可能根据需要在技术服务部和公共服务部以外增加其他部门，如分馆和流动图书馆部、特殊需求服务部等。有些图书馆可能并不明确设置公共服务部和技术服务部，而是设置若干大的部门(如将典藏和流通合起来设为典藏流通部；将采购和分类、编目合起来设为采编部)，各部主任直接向馆长负责。我国的大多数公共图书馆都采取这种组织结构。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国外很多图书馆还尝试着对这种传统的等级式结构进行彻底改革。他们认为这种结构的主要弊端是决策过于集中、管理环节过多、机构对外界的变化反映不够灵敏，不能适应现代图书馆所处的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在这种改革中出现的最常见的组织结构是工作组式(team-based)的结构。这是一种按服务对象、服务区域或其他标准组成工作组的组织方式。每个工作组内包含了与目标对象或区域相关的所有业务，不适合归进任何工作组的业务再组成支撑组(support team)。工作组的组长不仅参与全馆决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独立决策权。所以，工作组式结构的指导思想就是使图书馆组织结构扁平化；决策过程分散化。

十、公共图书馆的绩效评估

1. 绩效测度的基本概念

根据麦肯基的定义，图书馆的绩效测度(performance measurement)是对图书馆在特定时间实现其目标的程度的系统测度，是对图书馆工作的“好坏程度”(goodness)的总体评价[48]。

绩效测度具有多方面的用途。首先，它可以帮助图书馆管理者制定计划和进行决策。20 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文献生产量的急剧增长，文献载体的日益多样，文献价格的与日俱增，以及图书馆经费的相对缓慢增长，图书馆管理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合理、更科学地分配资源，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效果。这就要求管理者了解图书馆的优势与劣势，确知现有资源已经产生的效果，明确用户需求与实际服务的差距等。为此，图书馆常常需要借助绩效评估体系对自身的服务做出定量化描述。其次，绩效测度可以帮助图书馆彰显自身价值。20 世纪后半叶以来，这一用途随责任制观念(accountability)在公共部门的渗透而倍受图书馆界的关注。责任制观念的渗透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分配公共经费时，日益注重投入的回报，即资金所能产生的政治经济效果，效益性(value for money)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地方政府分配公共经费的基本准则[49]。图书馆职业深谙政府运行中的效益价值观，十分重视通过绩效测度充分展现自身价值，希望以确凿的事实向图书馆的权益人(如政府和公众)表明，公共图书馆在振兴经济、丰富文化、稳定社会、培养人才，以及为当地企业吸引投资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从而证明政府对图书馆的投入物当其值。此外，绩效测度还可以帮助图书馆观察工作进度，确定计划实施中的问题，以便及时调整工作重点。

绩效量度(performance measure)和绩效指标(performance indicator)是用来进行绩效测度的基本工具。绩效量度是对图书馆规模、资源、过程或输出等特征的直接的、定量的描述，例如图书馆所服务的人口的数量、图书馆藏书数量、图书馆借出的文献数量。绩效量度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图书馆的绩效水平，但是，在缺少

其他背景信息的情况下,绩效度量本身传递的含义是有限的。知道一个图书馆的藏书量为200万册无助于评价这个图书馆的绩效,因为这个数字的绩效寓意对于一个服务着800万人口的公共图书馆和一个服务着200万人口的公共图书馆来说,显然是不同的。要进行图书馆绩效的测度,还经常需要把几种量度结合起来使用,例如,把图书馆所服务的人口的数量与文献拥有量结合使用,把文献拥有量和文献借阅量结合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量度相结合得到的新的指标通常被称为图书馆的绩效指标[50]。与直接的量度相比,绩效指标对于评价图书馆的绩效具有更明确的含义,因而也具有更大的决策价值。例如,将辖区人口数量与文献拥有量结合得出的人均文献拥有量,就比直接的文献拥有量更明确地反映着一个图书馆的文献保障率;将文献拥有量和借阅量结合得出的文献流通率(turnover rate),也比直接的借阅量更明确地反映着一个图书馆的文献利用率。

图书馆绩效评估中的测度目标包括三个方面:输入(input)、输出(output)、成果(outcome)。输入测度指支持图书馆活动和产品的资源,如经费数量、设备数量、工作人员数量、馆藏数量等。输出测度指输入与图书馆运作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如参考咨询正确解答率、文献借阅满足率等。成果测度指图书馆服务的结果,即用户在使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后产生的变化,如学生成绩的变化[51]。成果测度有时也被称作影响测度(impact)。近十多年来,图书馆绩效测度方法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日益重视成果测度,这不仅反映了公共图书馆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也反映了图书馆适应责任制观念,力图全面展现自身价值的尝试。

绩效测度的评价对象也包括三个方面:服务全面性(extensiveness)、服务效率(efficiency)及服务效益(effectiveness)。简单地说,全面性指图书馆服务的范围;效率指服务的程度或数量,效益指有用服务的程度或数量。以文献的收集为例,全面性指文献的类别范围,效率指文献的数量,而效益指能真正满足用户需求的那部分文献的数量[52]。

图书馆一旦获得了所需的相关测度,它往往还需要将这种测度与某种标准进行比较,才能最后得出关于图书馆好坏程度(goodness)的结论。取决于开展绩效评估的目的,图书馆可以将测度结果与以下一种或几种标准进行比较,目的不同,选择的标准也可能不同:

- 图书馆制订的计划或目标
- 图书馆过去的绩效
- 图书馆标准
- 标杆基准(benchmarking),即图书馆认为可作为自身榜样的、优秀图书馆的绩效[53]
- 正式的质量认证标准,如ISO9000

2. 公共图书馆绩效测度

尽管一般的图书馆统计在公共图书馆界早有应用(例如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统计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54]、但系统的绩效测度体系在20世纪后半叶才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国外公共图书馆界比较有影响的公共图书馆绩效测度体系有1987年美国图书馆协会颁布的《美国公共图书馆输出量度》("*US Output measures for public libraries*");90年代初King Research Institute为英国公共图书馆制定的《成功的关键:公共图书馆绩效指标》("*Keys to succes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public libraries*"),英国保守党政府制定的"公民章程"("*Citizen's Charter*")的相关条款,90年代末英国工党政府采用的"最优价值体系"("*Best Value*")中的相关条款。我国文化部社会文化与图书馆司于90年代中期制订的《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体系》是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界采用的评估体系。

其中,美国图书馆协会颁布的《美国公共图书馆输出量度》包括五个方面的指标:图书馆利用指标(如人均图书馆访问次数——library visits per capita)、文献资料利用指标(如人均文献流通率——number of items circulated per capita)、资料获取(access)指标(如所求文献题名满足率——title fill rate)、参考服务指标(如问题解答率——reference completion rate)。英国《成功的关键:公共图书馆绩效指标》包括四大类绩效量度(measure)和四类绩效指标(indicator)。四类量度分别是:服务输入成本量度(service input cost measure)、服务输出量度(service output measure)、服务效益量度(service effective measure)、服务区域量度(service domain measure)。四类绩效指标分别是:运行绩效指标、效益指标、成本效益指标、影响指标。我国1994年开始的《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六类指标,这些指标涉及图书馆的服务、图书馆工作、图书馆设备等方面,整个体系包括55个定量指标和17个定性指标。

20世纪90年代,公共图书馆与其他类型图书馆一起经历了数字化革命的冲击。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服务尽管起步较晚(1994年时,仅有21%的美国公共图书馆,1995年时仅有3%的英国公共图书馆与互联网连接[55]),但发展速度很快(到2000年,美国已有98%的公共图书馆与互联网连接;到2002年底100%的英国图书馆与互联网相连)。随着数字化革命的深入,公共图书馆与所有其他图书馆一样,迫切需要能够测度其数字化服务的绩效指标。

20世纪90年代末期涌现了一大批旨在建立数字化服务绩效指标的研究课题。除了一些综合性的、面向各类型图书馆的课题(如欧盟的EQUINOX、国际图书馆联盟联合会的《网上索引、文摘、全文资源使用情况统计指标指南》("*Guidelines for Statistical Measures of Usage of Web-based Indexed, Abstracted, and Full Text Resources*")外,还有很多面向公共图书馆的专门课题,例如,美国博物馆与图

书馆服务研究所(IMLS) 资助的“公共图书馆网络服务统计与绩效测度(“*Statistics and Performance Measures for Public Library Networked Services*”)就是专为公共图书馆提出的数字化服务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以容量(capacity)、使用(use)和影响(impact)为核心指标[56]。英国的“图书馆网络服务影响测度体系”(“*Longitude: Library Networking Impact Toolkit for a User-driven Environment*”)也是基于公共图书馆背景的绩效评估体系研究。该体系旨在建立一套考察和展示人民网(2002 年底建成的全英公共图书馆网)资源和公共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利用效果的定性指标体系。2000 年 9 月～2001 年 8 月间,Longitude 课题组在若干公共图书馆对初步建成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实验。目前,课题组正在根据实验结果对 longitude 体系进行修订,以期将来能推广应用[57]。

近年来,美国的国家图书馆情报科学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和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都已开始在公共图书馆中尝试使用标准化的网络资源利用情况的统计指标。

第三节 高等学校图书馆

一、高等学校图书馆概述

高等学校图书馆指隶属于特定高等教育机构,为该机构的教师、学生、科研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服务的图书馆。高等教育机构一般指高中水平以上的教育机构,英、美等国也称之为第三级教育机构。

截至 1998 年,我国有高等学校图书馆 1123 个,从业人员 3.8 万[58]。

二、高等学校图书馆的用户群体

高等学校图书馆的用户包括若干特色鲜明的群体:本科生、研究生、研究人员、教师、管理人员以及一部分校外人员,但是,真正影响图书馆决策和活动的主要是前四类用户。

过去,本科生是一个具有较大共性的群体,其共性主要表现在他们年龄相仿,都经过了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选拔,都接受着风格相似的全日制教育,都按学期、期末、假期的节奏安排自己的生活。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终身教育的兴起,这种共性也在逐渐减弱。在新的高等教育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经常需要面对在年龄、来源、素质、学习模式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的本科生用户,这些用户往往会对图书馆服务提出不同的要求。

本科生需求的形成取决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内容和模式。例如,课程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所需文献的类别;阅读书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所

需文献的种类(篇目);阅读书目的多寡决定着他们的需求量和对图书馆的依赖程度。一个单纯依赖课本的教师很难在学生中培养出对图书馆的依赖。这些教学过程中的因素导致本科生用户的需求具有某些鲜明的特点。首先,本科生的文献需求通常以教学参考书为主;其次,在特定时间里,他们往往表现出对特定教学参考资料的高度集中的需求;再次,本科生的需求一般是在主讲教师引导下形成的目标明确的需求[59]。此外,本科生还对图书馆的空间(如自修空间)、设施(如复印设备、计算机)以及图书馆员的帮助具有较强烈的需求。

研究生的需求与本科生需求具有某些共性,如对特定文献的集中需求,对学习空间的需求等,但他们的需求同时也具有研究人员的特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一般需要承担较具体的、处于学科前沿的课题,因而需要全面获取和跟踪本领域的最新文献,这就导致他们对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文献形式(如期刊、研究报告)、专业化检索工具、馆际互借或文献传递系统比较依赖。在这方面,专职研究人员(如研究助理、研究员)具有同样的需求。

很多教师同时承担着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教师因教学活动而产生的对图书馆的需求非常广泛,如要求图书馆为之提供较全面的教学参考资料、核对阅读书目、准备阅读书目中的文献、保证这些文献能够被学生方便地获取、核实教学用资料的版权限制、为开发教学软件提供文献和技术方面的支持等。教师因科研任务而产生的需求与专职研究人员的需求具有共性。

三、高等学校图书馆的目标

高等学校图书馆的基本目标是协助所在学校实现其总体目标。一般高等学校的总目标都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学校性质不同,其目标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例如,美国设有博士生课程的四年制大学与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在办学目标上就存在很大差异;英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大学和技术学院之间也有很大不同。在这两对对比中,前者都代表了所谓的"研究型"大学的模式,这是一种源于 19 世纪中叶德国的办学模式,其特点是注重科研目标,强调以科研促教学;后者则代表了非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其特点是注重教学,视科研为边缘目标。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由于我国的科学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院(所),大学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这种背景使我国大学的目标与研究型大学的目标颇有差距。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国际渗透的加剧,我国的很多大学都开始向"研究型大学"模式转化,这种转化必然带来办学目标的调整。

高等学校图书馆的目标必须与所在学校的目标保持一致。学校目标一旦调整,图书馆的目标也需随之调整。在我国新型的研究型大学中,随着"研究目标"比重的加大,图书馆也需相应加强为"研究"服务的能力,这对习惯于接受统一的《普通高校图书馆工作条例》指导的我国高等学校图书馆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

四、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文献体系

高等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体系需密切反映图书馆的目标,也就是学校的总体目标。学校的教学目标要求图书馆拥有一个丰富的教学参考书及专著馆藏;要求教学参考书具有适量的复本。“适量”标准的确定是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一个复杂问题。复本量过小难以满足学生高度集中的文献需求;较多的复本量又会影响其他文献资源(如支撑研究的文献)的收集。

学校的研究目标要求图书馆全面系统地收集反映最新科研动态的文献类型,如学术期刊、研究报告以及全面、权威的文献检索系统。维持这样一个馆藏令几乎所有高校图书馆都感到捉襟见肘。在整个 20 世纪,学术期刊的总信息量——期刊种类、出版频率、每期页数、每页字数——迅速增长[60]。这种增长,再加上学术出版领域独特的垄断现象(每一份出版物都是独特的,因而学术出版商之间事实上不存在竞争),使学术期刊的价格以远远超过图书馆经费的速度增长着。根据英国 Follett 报告的统计,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学术期刊的价格增长了 300%,而同期英国高校图书馆的期刊经费只增长了 111%[61]。最近几年,很多学术刊物的双轨出版(即同时出版印刷版和电子版)更使图书馆的经费预算雪上加霜。所有这一切,都使高等学校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文献体系建设成为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活动。

五、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活动

1. 专业技术活动

在专业技术活动领域,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活动与公共图书馆的活动具有很多共性。例如,在文献收集领域,高等学校图书馆同样要经过类似的从筛选到订购的过程;在知识组织整理和文献加工领域,高等学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采用着同样的方法和技术;目前它们也同样面临着把传统的实体文献、授权的数字化文献和经过筛选的网上文献加以整合的挑战。

2. 公共服务活动

(1) 文献提供。与公共图书馆一样,高等学校图书馆文献提供的主要方式也是外借、阅览。但是,高校图书馆用户的特殊需求,特别是对文献资料的集中需求,经常要求图书馆采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文献提供形式。传统上,高等学校图书馆一般采用馆内阅览和短期借阅的形式来解决集中需求问题。馆内阅览是将需求量大的教学参考书集中起来,仅供馆内阅览。短期借阅则对需求量大的文献严格限制借阅期限(如 24 小时)。收入馆内阅览或短期借阅部的文献一般都是教师指定的教学参考书,因而处于经常变动之中。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很多图书馆都开始探

索通过数字化手段解决集中需求问题的途径，希望将需求量大的文献加以数字化，然后通过计算机网络传递给用户，彻底突破时空和复本率的限制。1994～1998年间，英国电子图书馆项目(e-Lib Programme)将电子短期借阅的实现技术和版权问题确定为该项目的重点研究领域。尽管这些研究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但是，迄今为止，教学参考书的大规模网上提供还受到数字化技术(digitization)和版权许可的限制。

即时文献提供也是常见于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文献提供方式。这是指图书馆从本馆的合作馆或商业化的文献传递机构为用户获取本馆未收藏的文献的服务。传统上，这种形式的文献提供主要采用邮寄方式，但是越来越多的文献传递开始采用电子传递。

(2) 参考咨询服务。高等学校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很多图书馆称之为信息服务)是图书馆日常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常处理的问题包括：① 有关图书馆使用过程的问题，如确定馆藏文献的位置，解决硬件、软件和网络问题等。随着数字化文献的增长，用户使用图书馆时遇到的硬件、软件和网络问题日益突出。处理这类问题时，咨询馆员经常需要向其他方面寻求帮助，但图书馆应该是用户解决问题的入口。② 用户工作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如统计资料、历史事实、人物、事件等。处理这类问题时，馆员往往需要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地从浩如烟海的各类文献中查出用户需要的知识或信息，并加以分析综合后提供给用户。③ 有些图书馆也承担一些较复杂的文献查询或调研任务，如具体课题的文献查新和文献综述。表4.6列出了美国伊利诺斯州 Moraine Valley 社区学院图书馆在半个工作日里解答的用户提问。

(3) 直接的教学支持服务。传统上，高等学校图书馆对教学过程的支持和参与主要表现为为教学活动提供参考资料和咨询服务，但是近二十年来，高校图书馆参与教学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对教学活动的支持也更加直接[63]。当代高校图书馆经常通过以下活动参与教学过程：

• 在馆内提供各种教学用设施，如视听室、电脑实验室、研讨室等。

• 提供教学空间(如教室)，为那些需要在讲授过程中利用图书馆的课程提供便利条件。

• 参与课程设计，将信息素质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或单独开设。

• 参与学校的教学指导委员会，更多地就文献保障、信息素质课程等问题参与学校的教学决策。

• 参与远程教育，如在图书馆内设专人(远程教育协调员)负责远程教育服务，包括用户培训、邮寄书刊、电话咨询、电子邮件咨询、维护远程教育网页等。

• 辅助通用技能的培养：除了以各种形式传授信息技能以外，高等学校图书馆还通过特藏建设、讲座、用户培训等活动参与其他通用技能的培养，如研究方法

技能、写作技能、口头交流技能、计算机技能等。

• 参与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的开发：在这方面，图书馆员的主要职责是评价、组织高质量的网络资源，形成嵌入课件的超级连接；设计检索图书馆电子资源的用户界面；提供虚拟咨询台；承担课件开发中的版权申请和管理任务等[64]。

表 4.6　高等学校图书馆咨询问题案例[62]

用户提问	解答时间(分)
◆ What type of psychology journals do you hold?	5
◆ I need to find the dividend per share of Wal-Mart stock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5
◆ How do I cite electronic resources for my paper?	10
◆ Where can I locate a book?	0.5
◆ I need books on global warming.	2
◆ I need articles on a business.	2
◆ We need advertising costs per week and box-office receipts to make a comparison of return on investment for a business class.	45
◆ I want to find a Chicago Tribune article on racial profiling.	3
◆ I want to find videos about seat belts to use as a visual aid for a speech class.	15
◆ I want to find newspaper articles on seat-belt laws.	4
◆ I want to find information about holistic medicine and nursing in nursing journals.	9
◆ How do I insert clip art into a Microsoft Word document?	4
◆ I need inform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hours practicing free throws and the proportion of successful throws in a basketball game.	60
◆ I want to find two books cited in this article.	7
◆ I need help e-mailing this article I found on a Web site.	5
◆ I want to find national breast-cancer statistics for women.	20
◆ I ne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litary training of airborne troopers.	7
◆ I need literary criticism about the poetry of Adrienne Rich.	15
◆ Which Cajun restaurant in Blue Island, Ill., is supposed to be haunted?	45
◆ I need a particular article about smallpox from an academic publication.	5

(4) 社区服务。不少高等学校图书馆还为所在社区提供一定程度的服务，这包括在一定范围内向社区成员开放阅览馆藏、辅助性服务(如复印服务)，为社区内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或文献查询等。

六、当代高等学校图书馆的主要功能

近年来出现的关于高等教育和高校图书馆功能的调研报告，如英国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高等教育报告《麦克法雷报告》(“*MacFarlane Report*”)[65]、英国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授命撰写的《高等教育图书馆调研报告》(即著名的 Follet 报告)[66]、澳大利亚的《罗斯报告》(“*Ross Report*”)[67]一致显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学生自主学习比重日益加大、高等教育的全球性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对图书馆功能的依赖明显增强。在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图书馆的功能大致可以归纳为:

- 支撑研究过程的功能:通过建设相对全面的期刊馆藏、各类型数据库、高效率的馆际互借系统和文献传递服务、专业化的参考咨询及其他相关服务,满足教师、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科研需求,帮助学校提高其科研生产率。
- 支撑教学过程的功能:通过建设相对全面的教学参考资料馆藏、加强与系所的联系、参与课件开发及远程教育、提供教学设施等活动,为各系的教学提供支撑服务。
- 实施教学过程的功能:通过参与课程设计、讲授信息素质课和其他通用技能课程,直接实施教学功能。
- 支撑自主学习过程的功能:通过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及利用文献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个人或小组提供合适的自学场所、解答学生自学中遇到的问题等活动,高等学校图书馆支撑着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培养着他们终身学习的能力。
- 开展图书馆学研究的功能:通过承担图书馆学研究项目,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来源。

七、高等学校图书馆标准

高等学校图书馆标准是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图书馆协会或其他机构为了指导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服务而制定的,适用于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图书馆工作标准,其内容大都涉及高等学校图书馆的目标、管理、服务内容、馆藏、馆员、设备、经费等方面[68]。例如,美国的学院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于 1973 年采用《两年制学院学习资源项目指南》(“*Guidelines for Two-year College Learning Resources Programs*”);1975 年采用《学院图书馆标准》(“*Standards for College Libraries*”);1979 年采用《大学图书馆标准》(“*Standard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69];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1986 年出版《大学图书馆标准》(“*Standards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1981 年,我国教育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1987 年该条例经过修订,改名为《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2002 年,教育部再次对该章程进行了修订,并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主要规定了高等学校图书馆活动和管理方面的定性标准,仅对开馆时间和人员构成规定了少量的定量标准。与 1987 年的《规程》相比,2002 年

的修订版更多地考虑了数字化革命对图书馆实践的影响。这是我国目前指导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的主要文件。

八、高等学校图书馆的管理体制

1. 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体制

高等学校图书馆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要理解高校图书馆的管理体制,就需要先了解高等教育机构本身的管理体制。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不同,各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也不尽相同。在美国,虽然学校之间在经费来源、学位授予档次、学制年限、办学目标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但大多数学校都采用大致相同的管理体制。位于管理体制最高层的是学校董事会,负责制定学校的方针政策;位于董事会之下的是学校校长,负责学校的日常运行;校长之下是分管学校教学、科研、财务等事务的主管[70]。在英国,大学的最高管理组织是学校理事会。理事会由部分学校管理人员、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当地民众代表等组成。理事会的具体职责包括接受当年的账目汇报,选举校长和副校长、接受校长对学校事务的汇报等。学校的具体执行工作由学校委员会负责,校委员会的具体职责包括学校的日常管理、收入和财产管理以及学校一般事务的管理。在校委员会之外,另有一个负责教学科研事务的组织,叫做学校评议会。校长、副校长和各学院院长都是评议会的当然成员。英国高校的管理体制如图 4.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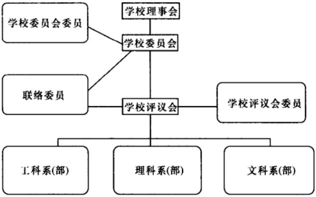


图 4.2　英国大学管理体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英美大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大学设置了副校长级的专门的信息主管,其职责是负责全校的信息规划、协调、管理,职责范围包括图书馆、计算机及网络中心、媒体中心、内部邮政系统等。通过这种安排,学校将信息工作从教学科研工作中独立出来,不仅在规划、投资和管理等方面单独考虑,而且,由于信息主管行政职务的提升,他可以直接参加学校高层决策会议,为

学校信息资源的发展争取更好的条件。

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种类繁多,包括教育部直属普通高校、各部(委、局)高校、地方院校、民办高校。教育部负责各类高校的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这主要包括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提出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参与拟定、筹措教育经费,管理高等教育经费,监督全国经费使用情况;制定高等学校设置标准,审核高等学校的设置、更名、撤销与调整;制订学科专业目录、教学基本文件,指导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高等教育评估工作;规划并指导高等学校的党建工作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定教师资格标准,提出各级各类学校的编制标准,规划教师队伍建设;统筹管理各类高校招生考试工作,制订各类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拟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组织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工作;统筹规划学位工作,起草有关学位工作的法规,负责实施国家的学位制度;规划并指导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协调、指导教育系统的外事工作、出国留学及来华留学生工作等。

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主管部门是教育部。对于这类高校,教育部负责提供财政支持、决定其主要的人事任免和机构设置、审核经费预算、监督资本运营。一般情况下,这些学校还不同程度地得到其所在地政府的支持,包括财政支持。地方院校的主管部门是地方政府的教育委员会(教育厅),对于这类高校,当地政府负责提供财政支持、决定其主要的人事任免和机构设置、审核经费预算、监督资本运营。民办高校的主管部门是这些高校的校董事会,校董事会负责提名校长或主要行政负责人的人选,决定教育机构发展、经费筹措、经费预算决算等重大事项。没有董事会的学校由其主办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直接管理。

在教育部的宏观管理和各自主管部门领导下,各高校的行政及业务工作由校长负责,这包括学校的发展规划、经费分配、学科发展方向以及其他类似的与学校发展相关的决定。校长之下是分管教学及科研、财务、后勤、外事等的副校长。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学院或系为单位组织进行。

2. 高等学校图书馆的管理体制

英、美高校图书馆一般由特定的副校长分管,并在该副校长主持下,设有图书馆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的职责随学校不同而不同,比较典型的职责包括:向相应的更高管理层(美国的学校董事会和英国的校委员会和评议会)推荐图书馆馆长人选,评估图书馆服务并就图书馆事宜提出推荐意见。

我国高等学校图书馆的主管部门是图书馆所在的高等院校,一般情况下,图书馆由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校长负责。大多数分管副校长会聘请各学院(系)的代表组成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负责制定图书馆的长远规划、审核图书馆预算等。

负责图书馆日常运行的是图书馆馆长及其领导班子,这个班子实行馆长负责

制。馆长的主要责任包括负责图书馆日常运行中的业务决策，制定全馆的工作计划，制定图书馆预算，进行工作总结，参与聘用馆员。图书馆馆长直接向分管图书馆工作的副校长负责。

在全国范围内负责高等学校图书馆管理、协调工作的是教育部。文化大革命以后，教育部先后制定了若干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等，以指导各高校图书馆工作。此外，教育部还成立了负责指导图书馆业务工作的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章程》的规定，该委员会是在教育部领导下对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事业进行咨询、研究、协调和业务指导的专家组织。它的具体职责包括：调研高等学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提供业务咨询、促进资源共建共享、组织高等学校图书馆系统的人员培训、安排图书馆工作评估等。

九、高等学校图书馆的组织结构

就组织结构而言，高校图书馆与大型公共图书馆的结构相似。目前最常见的组织结构是按业务活动组织的、由馆长到公共服务（技术服务）部再到它们的分部的等级结构。在高校图书馆中，这一结构通常表现为（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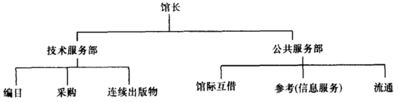


图 4.3　高等学校图书馆基本组织结构图[71]

另外一种常见的组织结构是工作组式（team-based）的扁平结构。如前所述，这是一种按服务对象、服务区域或其他标准组成工作组的组织方式。每个工作组下包含了与目标对象相关的所有业务，不适合归进任何工作组的业务再组成支撑组（support team）。英国的拉夫堡大学图书馆就实行这种结构。全馆共分为科学组、工程组、社会科学和人文组、管理组、流通组、馆际互借组、上架组、支撑组、系统组、晚间及周末组、学校档案组。每组负责与其领域相关的所有业务，如科学组、工程组、社会科学及人文组分别负责与之相关的学科的所有图书馆业务，包括与各系保持联络、安排和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处理各系提供的阅读书目、订购各系教师提出的欲订书目、分编相关领域的图书、解答相关领域的咨询、支持和辅导各领域的电子信息的利用。各组组长接受馆长（University Librarian）直接领导，具有较强的自主权。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高校图书馆组织结构方面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图书馆与计算机中心的联合或合并。很多学校把图书馆与计算机中心以及其他机构合并为学校的学习资源中心(Learning Resource Centre)。这种调整的目的是整合这些机构的技术力量和服务力量,克服图书馆与计算机中心、网络中心因工作交叉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截至1997年,英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大学和其他机构合并为学习资源中心[72]。在没有进行正式合并的学校,图书馆也都加强了与其他信息机构的合作。英国伯明翰大学图书馆是较早与其他机构合并的图书馆。1995年该大学将原有的校图书馆、计算机中心、校电视台、印刷服务中心、教室管理中心合并为一个学习资源中心。合并后的中心包括五个分部:① 公共服务部,负责外借、阅览、咨询服务与出版业务;② 信息计算与支持部,负责电子邮件系统管理、网络服务及版权管理业务等;③ 计划与行政管理部,负责人事管理、规划、建筑维修等;④ 资源建设部,负责文献采购、编目、特藏管理及装订;⑤ 学习与研究支持部,负责各学院的计算机服务与图书馆联络、计算机技术培训、网络教学支持、电视台以及教室管理[73]。

十、高等学校图书馆的绩效评估

与公共图书馆一样,高等学校图书馆虽然很早就开始收集统计数据作为管理和决策的依据,但系统的绩效评估体系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出现。目前在世界高等学校图书馆界较有影响的绩效测度体系除了ISO 11620(图书馆绩效指标)以外,还有1990年由美国学者奇尔德斯(Childers)和凡郝斯(Van House)提出的《测度高等学校图书馆的绩效:实用途径》和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的大学图书馆与一般研究图书馆部制定的《测度质量:高等学校图书馆绩效测度国际指南》("*Measuring Quality: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Academic Libraries*")等。奇尔德斯和凡郝斯体系是目前北美高等学校图书馆采用较多的绩效测度体系。该体系包括15个量度,以输出为主要测度方面,适用于所有规模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和研究图书馆[74]。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的《测度质量:高等学校图书馆绩效测度国际指南》包括馆藏相关性、用户满意度、开放时间、新书上架时间、所求图书满足率等方面的测度。自1996年出版以来,该指南已被译成德文、法文等不同语种。近年来,由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根据商业领域的SERVQUAL质量评价体系设计的LIBQUA+也是高等学校图书馆界备受关注的绩效评价体系。与一般的绩效评估体系不同,LIBQUA+是一个面向用户的图书馆质量评价体系,以用户对图书馆的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的满意度为测度目标[75,76]。截至2002年春季,已有200多所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参加了LIBQUA+的实验性应用[77]。

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数字化服务的迅速崛起,高等学校图书馆也在积极

探索测度数字化服务绩效的指标体系，除了上节已经提到的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外，高等学校图书馆也开展了一些针对本系统数字化服务的绩效评估研究。例如，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的“电子资源测度项目”(E-Metrics Project)就是旨在为高等学校和研究图书馆的数字化服务建立绩效测度体系的研究项目。自1996年酝酿以来，该项目已经提出并实验了一系列与数字化服务相关的指标，包括资源保障方面的指标(如全文电子期刊数量)、网络设施与资源利用方面的指标(如登录各类型数据库的人次)、网络资源或设施方面的投入指标(如全文期刊费用)、资源数字化(digitization)指标(如本馆自建的数字化资源数量)、虚拟参考咨询数量等。目前，这些指标已经在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的成员馆中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78]。

第四节　其他类型图书馆

一、国家图书馆

《国际图书馆统计标准》将国家图书馆定义为：按照法律或其他安排，负责收集和保管国内出版的所有的重要出版物的副本，并起贮藏图书馆的作用，不管其名称如何，都是国家图书馆。该标准之所以强调“不管名称如何”，是因为不同国家的国家图书馆往往因其起源的不同而在名称、性质和功能方面存在差异。有些国家图书馆由过去的皇家图书馆发展而来(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有些由政府投资专门建立(如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有些则由政府指定某个现存馆来承担(例如北欧的一些大学图书馆)。有些国家图书馆虽不以“国家图书馆”命名，但却是事实上的国家图书馆；相反，很多冠以“国家”、“国立”(national)名称的图书馆，如英国的“国立盲人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For The Blind)，事实上并不是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的目标一般包括完整地保存本国的知识及文化遗产和满足全国科学研究活动的情报需要。此外，根据国情的不同，有些国家图书馆也将满足普通公众的文化和情报需求作为自身目标的一部分。我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就同时承担着为中央国家领导机关、重点科研、教育、生产单位和社会公众服务的任务。近年来，英国工党政府也曾试图促使不列颠图书馆在保持其“服务于科研”的传统的同时，承担一定的为民众终身教育服务的任务，但这种督促至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不列颠图书馆的目标陈述。

比较常见的国家图书馆功能包括：

• 完整系统地收集本国主要出版物，充当国家总书库；有重点地收藏国外出版物，拥有一个丰富的外国文献馆藏，起到全国图书情报中心的作用。保障国家图书馆能充当国家总书库的重要机制是呈缴本制度。呈缴本制度是以法律形式(如出版法)规定的，要求正式出版单位出版的任何一种新出版物，均应向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指定的图书馆或其他机构，免费缴送一定数量的样本的制度[79]。

• 编制国家书目、联合目录、回溯性书目等大型书目控制资源，充当国家书目中心。

• 负责研究推广图书馆现代化技术，成为图书馆新技术中心。

• 组织、从事和带动图书馆学研究，推动全国图书馆学发展，成为图书馆学的学术中心。

• 代表本国图书馆界和读者的利益参加国际图书馆组织和学术交流活动，成为本国图书馆界对外交流中心。

很多国家的国家图书馆，如不列颠图书馆、南非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都是按照国家图书馆法对国家图书馆实施治理。例如，根据南非国家图书馆法的规定，南非国家图书馆的主管部门是艺术、文化、科学技术部。实际管理国家图书馆的是部长任命的国家图书馆董事会。国家图书馆馆长是董事会的当然成员。董事会与部长协商制定国家图书馆的方针、政策，审核国家图书馆的预算，任命图书馆馆长，规定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待遇。图书馆馆长负责管理图书馆的日常运行，向董事会直接负责。在英国，根据 1972 年的“不列颠图书馆法”（“*British Library Act*”），英国国家图书馆由专门成立的国家图书馆董事会（British Library Board）管理。该董事会的构成通常包括 8～13 个委员。董事长由国务大臣任命，委员中，一位由女王任命，其余的由国务大臣任命。董事会负责制定国家图书馆的政策，审定预算，任命馆长等。图书馆馆长（Executive Officer of British Library）是董事会的当然成员，负责图书馆的日常管理工作。图 4.4 所示为不列颠图书馆的部分组织结构图。

建国以后，我国国家图书馆始终直属文化部。文化部直接负责国家图书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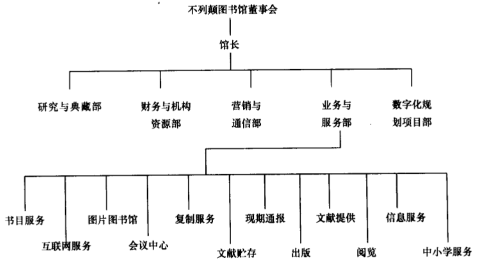


图 4.4　不列颠图书馆组织结构图（部分）

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等。图书馆馆长负责管理图书馆的日常业务及行政工作。

由于功能复杂、人员众多,国家图书馆的组织一般都很复杂。

二、科学与专业图书馆

科学与专业图书馆是由各种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学会、协会、博物馆、商业公司、企业商会或其他组织所支持的图书馆。它们通常以其母体机构的目标为目标,例如,研究机构的图书馆的目标就是支持母体机构的研究活动;公司企业的图书馆的目标就是帮助其母体机构赢得利润。

与其他图书馆的文献体系一样,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文献体系一般也与母体机构的目标密切一致,但是与其他图书馆相比,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文献来源更加复杂,不仅包括公开出版的文献,也包括很多非公开出版的文献(如会议交流论文、内部交流文件等)。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活动具有明显的专业化、深层化、个性化的特点。在文献处理方面,科学与专业图书馆通常需要对文献进行深层加工,这包括对图书章节和文献论文进行深度标引、出版现期通报、编写专题文摘等。在用户服务方面,科学与专业图书馆需要提供非常个性化的深层服务。例如,在文献检索方面,科学与专业馆的馆员常常在完成文献检索之后,继续承担文献综述和研究背景的撰写,或提供定题服务(即根据用户的特殊需求,定期检索最新文献,将满足不同需求的文献分送不同用户)。近年来,专业图书馆已开始涉足知识管理活动,对其所在机构的各类知识资源(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进行组织和开发,以利机构内部的知识共享[80]。

在我国,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主管部门是它们各自的母体机构,例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主管部门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主管部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向分管图书情报工作的机构领导直接负责。在全国范围内,中国科学院出版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负责科学院系统图书馆的业务指导和协调。

三、学校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是指设在中、小学校的图书馆。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一些中小学校率先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扩大到文献资料以外的其他媒体设施(如电教设备),在已经设有独立的图书馆和媒体中心的学校,也实施了这两个部门的合并。因此,60 年代以后,美国的学校图书馆以及仿照美国模式建立的学校图书馆更多地称作"学校媒体中心"、"学校图书馆电教中心"或"学习资源中心"[81]。

学校图书馆或媒体中心的目标与学校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问题是,学校的总体目标往往不如想象的那样容易界定。传统上,中、小学的教育目标一般被定义为系统地传授知识(而这往往意味着课本上的知识)。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

种目标界定不断受到新的教育理念的冲击。至20世纪60～70年代,至少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中、小学的教育目标经常被确定为"为将来的社会培养合格公民"[82]。

在系统传授知识的教育目标下,图书馆的作用十分有限。由于系统的知识往往意味着课本上的知识,这种目标引导下的教学方法主要依赖老师讲解和学生记忆。很少有学校认为它们需要图书馆的支撑。即使在建有图书馆的学校,图书馆的活动内容也非常单一——保管和提供为数不多的课本或课本辅导材料(有时也包括少量课外读物)。

只有在新的教育目标下,学校图书馆才得以展现自己不可或缺的作用。培养合格的公民重在培养学生的素质,而素质则是知识、技能、品质、个性等的综合条件,因而,要实现新的教育目标,仅仅依赖课本的传授和记忆是不够的,必须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这样的教育一方面要求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以外,为课堂活动做大量前期准备(文献查询、阅读、甚至调研),另一方面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小型研究项目(如综述一个地区宗教生活历史)或技能项目(制作一份科普教学录像)。这就要求老师和学生经常对各种文献进行查询、分析、综合,要求学校为其提供小组活动基地和实验空间,要求专业馆员和媒体专家为其提供各种可能的帮助。

新型学校图书馆(或称媒体中心或学习资源中心)的活动内容便是根据新的教育目标和新的用户需求设计的。在媒体中心里,图书馆员(更经常地称为媒体专家)不仅要收集和组织文献和教学设备,如计算机、录像机、摄像机、电视等,而且要对教师和学生进行信息素质方面的教育,辅导教师和学生的文献查询、设备操作,参加课程设计和教学活动。因而,就功能而言,新型学校图书馆(媒体中心)是课堂教学的伙伴,承担着实施信息素质教育和支撑各学科教育的双重功能。图4.5所示是美国中小学媒体中心比较典型的组织结构图[83]。

学校图书馆的主管部门是其所在的学校。在我国,教育部的基础教育司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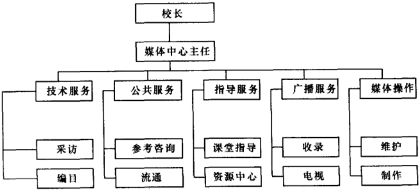


图4.5　美国中小学媒体中心组织结构图

着全国学校图书馆的业务指导和协调工作。

我国学校图书馆一般规模较小,组织结构也比较简单。在有些国家,如美国,由于学校图书馆通常是传统图书馆与电教中心等部门合成的一体化媒体中心,其组织结构要相对复杂一些。

第五节 图书馆合作与图书馆网(联盟)

一、图书馆合作、图书馆网、图书馆联盟

图书馆合作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书馆,为了改进服务及/或减少成本,本着互利原则而开展的文献、书目、人员、服务、发展规划等的交换或安排[84],有时也称"资源共享"。图书馆合作可以是非正式的资源共享活动,也可以是按正式协议或合同组织的合作;合作时间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合作区域可以是地方性的、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当一组图书馆按正式协议或合同组织合作时,其组织形式通常被称为图书馆网、图书馆联盟、编目组织等。

图书馆界开展的很多活动,从表面上看很像图书馆合作,也经常被误认为图书馆合作,但事实上并不属于图书馆合作的范畴。第一类是馆员个人之间偶尔开展的相互帮助,如咨询馆员就某一用户提问向同行求助。第二类活动是图书馆向其他图书馆提供的收费服务项目,例如,不列颠图书馆的文献提供中心(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就是一个专门从事文献提供业务的机构,满足着英国绝大多数图书馆的馆际互借申请,经常被人们当作图书馆合作的样板,但是,由于该中心提供的服务属于收费服务,因而不属于互利原则下的馆际合作。同样,从合作编目起家的美国联机图书馆中心(OCLC),目前开展的很多活动也是按商业性原则(而非互利原则)运行的,这些活动也不构成图书馆合作[85]。

图书馆界的合作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学者伍德沃斯(Woodsworth)[86]将这一历史追溯到13世纪。有事实表明,13世纪的寺院图书馆之间已经存在手稿联合目录。18~19世纪,德国不少大学图书馆都开展了相当正规的合作项目,包括编制联合目录和交换出版物。19世纪末,现代图书馆职业的形成更推动了图书馆合作的开展,新成立的图书馆协会和图书馆专业杂志都成为图书馆合作的积极倡导者。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很多图书馆都开展了以编制联合目录、馆际互借为内容的合作,有些图书馆还开展了联合采购的合作。

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开始应用于图书馆,并迅速成为图书馆合作的新契机,使60到70年代成为图书馆合作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最有影响的合作组织是成立于1966年的OCLC(最初叫做俄亥俄学院图书馆中心,即Ohio College Library Center,1972年改名为联机图书馆中心,即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简称不变)。OCLC成立的最初目的是推动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在具

有丰富联机编目经验的契尔格(Fred Kilgour)的领导下,OCLC 迅速发展为一个计算机联合编目网络,其成员馆也从俄亥俄州延伸到美国全国并进而延伸到全世界。由于 OCLC 是通过地方性图书馆合作组织开展服务的,很多地区的图书馆为了利用 OCLC 的服务,便建立了地方性图书馆合作组织。这样,OCLC 不仅自身成为图书馆合作的旗帜,也促进了各地区内部图书馆的合作。

20 世纪 80～90 年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再一次为图书馆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从 80 年代开始,很多图书馆都将自己的联机目录连接到互联网上,使远程用户也能检索本馆馆藏,这为馆际互借的开展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使图书馆之间传递文献的速度大为提高,至少从理论上说,把文本文件和经扫描形成的图像文件传递给馆际互借的申请馆,只需很短的时间。此外,日益增多的数字化文献,使图书馆面临越来越多的"大宗"采购(如大型全文数据库),迫使图书馆不得不考虑集团购买的优势。这一切都极大地促进了图书馆合作的普及。到 20 世纪末,不仅各种图书馆合作组织的数量大幅度增长,而且,任何一个具体的馆都可能同时参加几个甚至更多的图书馆合作组织。

图书馆网和图书馆联盟是图书馆合作的组织形式。图书馆网是由若干成员馆组成的、在一个中心机构的协调和管理下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程序,通过一定的信息传递结构,执行一项或多项馆际合作功能的图书馆联合组织[87]。

图书馆联盟是以地域、图书馆类型、学科领域等为基础建立的,在一个中心机构的协调和管理下,协同性地执行一项或多项资源共享计划的正式图书馆合作组织[88]。

与图书馆网相比,图书馆联盟是一种更加紧凑的合作形式,其活动内容具有更大程度的协同性。协同行动指在某一特定时刻由联盟的所有成员共同参与的活动,当这一活动发生在对外关系的背景下,活动的主体往往是整个联盟,而不是分散的图书馆。以合作性采购为例,当代图书馆联盟经常采用协同性更强的"集团式"采购,而不是"分工式"采购。前者指图书馆合作组织统一购买特定文献资源的使用权,使用权涵盖所有成员馆;后者指参加合作的图书馆按既定分工分头采购某些不常使用的文献,使用过程中互通有无。除了"集团式"文献采购,图书馆联盟还经常协同性采用同一自动化管理系统、共建联合目录、共享服务器、共建共享同一数字图书馆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合作中的协同行动大大增加,因而近年来出现的图书馆合作组织更经常地叫做图书馆联盟而不是图书馆网。

但是,图书馆网与图书馆联盟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很多早期建立的图书馆网,都增加了协同行动的合作内容,但依然保留着"图书馆网"的名称,所以,很多图书馆学文献和图书馆合作组织都把"图书馆网"和"图书馆联盟"视为同义词使用[89]。

二、图书馆网(联盟)的目标

图书馆网/联盟的目标是帮助成员馆更经济、更高效地实现各自的目标,使信息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和利用,使用户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使整体效果大于部分(独立状态下的各图书馆)效果之合。

三、图书馆网(联盟)的活动内容

由于图书馆网(联盟)的规模和正式程度不同,因而图书馆网(联盟)的活动内容往往存在很大差异。比较正式的、大型的图书馆网(联盟)一般从事多方面的合作内容;非正式的、小型的图书馆网(联盟)可能只从事其中一部分内容;专门化(单一功能)的图书馆网/联盟(如合作编目组织)可能只从事单项合作。同一个图书馆网(联盟)的活动内容也可能因其成员馆或环境因素的改变而改变。例如,在成为非赢利性集团之前,OCLC 曾经仅仅是一个合作编目组织,20 世纪 70 年代末又将合作内容扩大到馆际互借等广泛领域。

经常被图书馆网(联盟)列入合作范围的内容包括:

(1) 合作建设馆藏。这是指网络(联盟)在调研成员馆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根据各成员馆的资源优势和网络整体资源的薄弱领域,实行分工采购、联合采购和协同采购等合作采购计划,以期既强化各成员馆的馆藏优势,又优化整体资源。"分工采购"、"联合采购"、"协同采购"是本章人为的划分,目的是反映合作建设馆藏的多样形式。此处的分工采购是指每个成员馆根据事先确定的分工,主要收藏自己承担的学科、语种、出版地区的文献,并与其他成员馆共享文献的合作活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分工采购计划当属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于 1942 年发起的,旨在分工采购外国文献的"法明顿"计划。该计划运行 30 余年,后来由于经费和协调上的困难,于 1972 年停止。联合采购指成员馆集资购买昂贵的或非经常性使用的文献的活动[90]。协同采购指网络/联盟利用规模购买的优势,对成员馆普遍需求的文献,实行统一价格谈判,统一购买的合作采购方式。例如对于使用率高的数据库,网络/联盟就可以统一购买其使用权,授权范围涵盖所有成员馆用户,这种采购方式也叫集团购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数字化资源的增长已经促使越来越多的网络/联盟采用协同采购的合作方式。

(2) 合作开展馆藏文献数字化。目前,对印刷式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的技术主要是扫描技术。这种技术条件下的数字化过程既烦琐、又昂贵,由此产生的费用再加上数字化过程中的其他费用(如版权费),使单个图书馆很难独立承担馆藏文献的数字化。对于那些具有较大数字化处理意义的文献,如善本文献、高等学校用户集中需求的文献,图书馆网/联盟可以开展分工数字化或集中数字化的形式,建立共同的数字化馆藏。

（3）合作编目。在手工操作的时代，编目是图书馆业务中最费工时的领域，即使在采用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以后，编目工作依然很耗费人力资源，所以，合作编目是图书馆为提高工作效率而开展的最早的合作内容之一。这种合作也有多种形式。其中一种形式是分享编目成果，即对任何一份具体文献，只由一个成员馆（通常是最早获得该文献的馆）进行初始编目，其他馆只需将已有的编目记录纳入自己的目录体系即可，必要时可根据本馆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另外一种形式的合作编目是由网络/联盟集中进行编目，向各成员馆发放编目记录。第三种形式是网络/联盟以整体身份参加更大的编目组织（如 OCLC），共同分享该编目组织的编目成果。

（4）共同组织整理网络资源。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有价值的文献，但是网络文献的特点之一是内容庞大、良莠混杂，因此，组织整理网上文献不仅涉及通常的文献分类、描述，而且涉及文献筛选及质量评价。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为此，很多网络/联盟都组织其成员馆共同组织网络资源，共建共享网上文献导航库。1998 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CALIS）就组织共建了多种学科的网上资源导航库。

（5）馆际互借（interlibrary loan services）。指图书馆根据用户的特定需求，从其他图书馆借阅本馆未入藏的资料，并根据互惠原则在其他馆提出借阅申请时，向申请馆出借文献的活动。很多图书馆网（联盟），特别是区域性网（联盟）都建立了专门的馆际互借传递设施，也有图书馆网依靠邮政系统。目前，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利用网络技术传递期刊论文等篇幅较短的文献。Ariel 和 Prospero 就是用来支持这种传递方式的软件。Ariel 是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开发的文献传递系统。它能够把申请馆的借阅申请从网上传递到收藏相关文献的收藏馆，并支持后者将所需文献扫描，然后利用 FTP 或邮件系统将扫描的文件传递给申请馆，最后支持申请馆将扫描文件打印后提供给用户。Prospero 是 Ariel 的延伸，它可以将 Ariel 环境下扫描的文件转换成 PDF 格式，从网上传递给终端用户。

（6）互借馆藏（reciprocal borrowing）。互借馆藏是指图书馆根据协议或事先约定，向网络（联盟）内的其他馆的用户直接出借本馆文献的合作活动，常见于地区性或专业性图书馆网（联盟）。互借馆藏协议通常需要就如何注册、如何催书、如何罚款、如何赔偿遗失图书、互借权范围（包括用户类型和文献类型）等做出明确规定，有些网络（联盟）规定用户必须先在本馆借阅，只有当本馆藏书不能满足其需求时才能使用互借权。

（7）合作解答咨询。在合作解答咨询的活动中，图书馆可以将本馆馆员无法解答的用户咨询转给其他图书馆，请求对方帮助解答。从事这一活动的网络（联盟）通常规定着转移问题的等级结构，要求咨询问题必须先在本地协作馆内尝试解答，本地图书馆无法解答的问题再逐级向上提交，直到问题得到解决。例如，美国

和加拿大的医学图书馆之间就建立了这样的问题解答链，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是最后一环[91]。

(8) 合作贮存文献。合作贮存文献的最常见形式是共同建立贮存图书馆，以便贮存、保管和提供利用那些利用率低、成员馆无力或无意长期保存的文献。除了为这些文献提供一个集中收藏的场所，贮存图书馆还开展基于其馆藏文献的复印、咨询、阅览等服务，也经常从事缩微胶卷(胶片)的制作业务。

(9) 联合培训馆员。图书馆网(联盟)通过设置专门的培训职务，或聘请外部专家，定期为成员馆组织培训班、研讨会等。

(10) 合作开展研究开发项目。对于图书馆无力独立承担的研究项目、技术或产品开发项目、新技术和方法的试验项目，图书馆网(联盟)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共同承担。对于一些难度较大的研究开发项目，图书馆网(联盟)可以集资招标，委托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例如英国的医学图书馆组织每年都委托英国图书馆信息统计中心对其成员馆的活动进行统计分析。

(11) 信息发布。图书馆网(联盟)可以通过网络(联盟)通信、电子邮件、电子公告版等形式向成员馆通报有关图书馆职业、图书馆网(联盟)、图书馆技术与产品等的最新动态，以支持其成员馆的独立决策。

四、图书馆网(联盟)的功能

上述活动表明，一个活跃的图书馆网联盟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首先是一个资源共建组织，通过合作采购文献、联合开展馆藏数字化、合作编目和共建目录体系、联合组织网上资源和馆员培训、共建文献贮存馆、共同开发信息产品等活动，图书馆网(联盟)可以建立起支撑所有成员馆服务的网络(联盟)资源体系，这个体系无论从数量、质量、功能来看，都应该大于孤立状态下各图书馆资源之和。资源共建是为了共享，因而，图书馆网(联盟)同时还是一个资源共享组织。通过馆际互借、相互开放馆藏、共享贮存馆、共享研究开发成果，图书馆网(联盟)保证成员馆之间能够共享资源。图书馆网(联盟)也是一个联合创新、风险共担的组织。通过共同支持研究开发项目、尝试新技术、新方法，图书馆网(联盟)不仅可以拥有孤立状态下的图书馆望尘莫及的创新功能，而且能够带动各成员馆的创新能力，同时降低每个成员馆承担的失败风险。

五、当代图书馆网(联盟)的运行环境

图书馆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很多方面，当代图书馆网(联盟)继承了以往图书馆合作的传统，但是，与20世纪上半叶以前的图书馆合作相比，今天的图书馆网(联盟)的运行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对图书馆合作产生新的影响。要保证图书馆合作的成功，当代图书馆网(联盟)的管理者以及参加合作的

图书馆就不能不关注这些变化。

当代图书馆网(联盟)所处环境的最显著变化是它们所依赖的技术基础的进步,特别是由互联网带来的进步。互联网第一次使真正意义的图书馆的互联成为可能。这种技术基础的变化很容易被直观地解读为图书馆合作条件的改善。互联网的进步无疑为图书馆网(联盟)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它对图书馆网(联盟)的影响远比这种直观的解读复杂得多。用户直接从其他图书馆获取文献的可能性、从网上传递文献的安全性、网上传递文献涉及的版权的复杂性、联网的图书馆和非联网图书馆之间的数字鸿沟、跨国合作的法律框架等,都是新的技术条件下图书馆网(联盟)必须考虑的复杂问题。以馆际互借中的文献传递技术为例,通过网络传递的馆际互借无疑可以大大改善馆际互借的效率,缩短用户等待文献的时间,但是,网络传递也向图书馆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因为,网络传递开启了用户直接向文献收藏馆索取文献的可能,依赖网络环境,用户可以直接查阅其他图书馆的目录和联合目录,确定特定文献的收藏馆,并直接向文献的收藏馆提出请求。从技术的角度看,文献的收藏馆完全可以将扫描的文献直接传递给用户。尽管目前这种直接的传递并不普遍,但已有学者相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必将改变馆际互借这一最基本的图书馆网(联盟)活动内容[92]。

当代图书馆网(联盟)所处环境的第二个显著变化是知识和信息作为资源的概念的确立和商业文化的渗透。对图书馆合作来说,这种变化正在带来很多深刻的影响。首先,随着信息商品化的加剧,在传统的图书馆合作领域已经出现了很多商业化的途径。例如,在文献的远程传输领域,一些商业化的文献传递机构已开始提供以前由馆际互借提供的服务,美国的 UNCOVER 公司就是专门从事文献传递业务的机构,大型数据库提供商,如 DIALOGUE,也已将业务扩展到这一领域[93]。对图书馆来说,有的时候,使用商业化服务可能得到成本更低,质量更高的服务。商业活动的扩展,有可能使某些传统的图书馆合作项目最终失去其存在意义[94]。第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知识和信息作为资源的概念,已经在不少图书馆主管部门的决策者中孕育了相当程度的商业化思路。按这种思路看待图书馆合作,决策者必然鼓励图书馆之间的交换按商业原则进行,要求交换的收入至少应该抵消成本。在这种背景下,图书馆主管部门可能越来越不情愿为图书馆合作活动提供资助,这就难免促使一些图书馆在传统的合作领域开始收费[95]。第三,由于很多商业机构涉足文献处理和文献传递,图书馆与这些机构的合作也必然增加,这可能使得图书馆网(联盟)的概念日益模糊。

图书馆网(联盟)运行环境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法律环境,特别是版权法的变化。在过去的十多年内,随着数字化文献的增长,版权也越来越倾向于保护而非利用,这就难免加大图书馆合作的难度和复杂性。例如,英国在实施《欧盟版权令》(“*European Copyright Directive*”)之后,凡从商业性组织承担的研究课题,将不再

享受合理使用(fair use)待遇(即版权法规定的无需申请版权许可的文献复制行为)[96],这意味着,图书馆网(联盟)的成员馆在有些协作活动中(如馆际互借及互借馆藏),可能面对不同的版权许可范围,这对图书馆网/联盟制定合作协议和实际开展合作活动都难免造成困难。

六、图书馆网(联盟)的管理体制

要保证图书馆网或图书馆联盟自身的健康发展并同时促进其成员馆的发展,图书馆网(联盟)和独立的图书馆一样需要合理的管理体制。一般说来,图书馆网的管理体制包括以下层次:

(1) 主管组织(governing group)。主管组织的责任是确保图书馆网能够执行它的使命,完成它的既定目标,确保图书馆网的运行符合政府和公众的利益[97]。主管组织的具体职责包括:确定图书馆网(联盟)的使命和运行政策、制定财务政策、管理网络经费、为具体的合作项目提供活动经费、负责网络执行官的任免、保证成员馆交流渠道的畅通、确保合作章程或协定的执行。在国外,图书馆网(联盟)的主管组织一般是专门成立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主要从成员馆中选举产生,但大多数董事会也包括成员馆之外的图书馆员代表,有些董事会甚至包括图书馆职业以外的代表,如来自政府部门的代表或公司企业的代表。在我国,图书馆网(联盟)的主管部门一般是图书馆主管部门之主管部门(如高校图书馆网/联盟的主管部门一般是教育部)或专门成立(或指定)的协调组织,如20世纪50年代的地区中心图书馆。

(2) 常务委员会:大多数图书馆网(联盟)在董事会之下设常务委员会,以便于成员馆之间更大程度的交流、沟通和决策。根据伍德沃斯的观察[98],国外图书馆网络(联盟)中比较常见的常务委员会有网络工作人员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 of officers)、任命委员会(nominating committee)、财务委员会(finance committee)。

(3) 指导委员会或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很多图书馆网(联盟)的主管部门会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对图书馆网/联盟的政策制定、会员费标准和协作项目的确定等进行咨询指导。指导委员会通常对图书馆网/联盟不负有法律或财务职责。

(4) 成员馆。在图书馆协作事宜上,图书馆成员馆需接受网络(联盟)主管部门的领导。一般成员馆都设有专门处理图书馆合作事务的馆员职位,负责与网络/联盟的交流以及合作项目的实施。在董事会制的管理体制模式中,成员馆有权选举代表它们利益的董事会成员。

七、图书馆网(联盟)的组织结构

根据图书馆网(联盟)的联络、信息、资源等的流动方向,可以将图书馆网(联盟)的组织结构分为两大类:有总部的图书馆网(联盟)和无总部的图书馆网(联盟)[99],其组织结构如图 4.6 所示。在有总部的图书馆网(联盟)中,成员馆通过总部的直接规划、领导和协调实现合作。我国的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CALIS)就是这样的图书馆联盟,其总部设在北京大学。在无总部的图书馆网(联盟)中,两个或多个成员馆根据网络协议直接开展合作。美国的研究图书馆组织(Research Library Group)就采用这样的组织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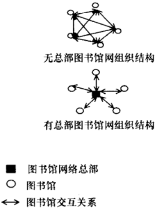


图 4.6　图书馆网络(联盟)组织结构图[100]

八、图书馆网(联盟)的绩效评估

由于图书馆网(联盟)可以从事单个图书馆无法承担的活动,发挥孤立状态下图书馆无法奢望的功能,图书馆合作、图书馆网、图书馆联盟很容易被认为具有内在的优越性。正如著名英国图书馆学家莱恩所指出的[101],这是一种相当有害的误解。

对于任何图书馆来说,参加图书馆网(联盟)不仅仅意味着共享资源的权利,还意味着投入和义务。图书馆网(联盟)首先需要它的成员馆投入经费,在一般情况下,成员馆都需要定期交纳会员费,有的时候,成员馆还需要集资支持共同的项目或资源建设,这种投入可能耗去图书馆事业发展费的相当比例;其次,图书馆还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负责图书馆网(联盟)规定的活动,有的时候,来自网络(联盟)的活动可能给图书馆本已紧张的人力资源造成很大压力;再次,参加图书馆网(联盟)的图书馆必须准备放弃一定的自主权,因为,无论是分工采购、协同采购,还是编目标准,都需要图书馆服从网络整体的决定,有的时候,这种自主权的限制,可能为图书馆自身的规划带来不便,在图书馆的主管部门不理解或不支持网络(联盟)决定的时候,图书馆还可能面临尴尬的决策冲突。此外,网络(联盟)的活动,也难免增加图书馆管理上的难度。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不成功的图书馆网(联盟)不仅不能为其成员馆带来益处,甚至可能成为它们的包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莱恩(Line)认为图书馆网(联盟)并不具有内在的优越性。这就要求图书馆网(联盟)经常对自己的活动做出评价,让成员馆充分了解图书馆网(联盟)的效率和效益,并向

潜在的成员馆及其主管部门彰显自身的价值。

评价图书馆网(联盟)的方法之一是测度图书馆网(联盟)给成员馆节省的经费,例如通过采用现成的编目记录而节省的编目经费、因馆际互借而节省的书刊订购费用、因共同培训而节省的馆员培训费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经济核算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图书馆网(联盟)的经济价值,但是无法测度图书馆网(联盟)产生的实际收益,如有多少未满足的用户需求通过网络(联盟)得到了满足。此外,经费的计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计算不当就会影响评价结果。例如,在图书馆合作过程中有很多隐性成本需要考虑,如馆际互借中核查本馆馆藏情况的成本、检索联合目录(或其他馆目录)的成本、填写馆际互借申请单的成本、传递申请单的成本、借出馆核查馆藏的成本、从架上索取资料的成本等,忽略其中任何一种成本都会歪曲网络(联盟)带来的经费节省情况[102]。

第二种评价方法是为具体的合作活动制定绩效评估指标。图洛克(Turock)[103]和莱恩(Line)[104]先后为馆际互借活动提出了一系列评估指标,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互借申请满足率、反馈时间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从用户的角度评价网络(联盟)效果的方法也日益受到重视。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直接调研终端用户,收集用户对图书馆合作活动的态度等定性数据,以用户满意度为主要评价标准。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着采用以用户满意度为核心指标的 SERVQUAL 评估体系测度馆际互借的质量[105,106]。

参 考 文 献

1 杜定友.图书馆管理方法之新观点.浙江图书馆月刊,1932,1(9)

2 刘国均.图书馆学要旨.上海:中华书局,1934

3 刘国均.什么是图书馆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1):1~5

4 Young H. The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hicago: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3

5 Budd J M. The academic library : its context, its purpose, and its operation, Englewood, Colo : Libraries Unlimited, 1998

6 吴廷华.目标管理与图书情报工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7 邓肯著,赵亚麟等译.伟大的管理思想.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119

8 吴慰慈.董炎.图书馆学概论(修订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9 吴慰慈.董炎.图书馆学概论(修订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0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11 吴慰慈.董炎.图书馆学概论(修订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2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Public Library Trends Analysis, Fiscal Years 1992~1996.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1

13 LIBECON Project 网站:http://www.libecon.org/default.asp (2003/3/22)

14 文化部. 2000 年全国主要文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项构成情况, 2002. http://www.ccnt.gov.cn/whcy/? nav = whcy01&id = tongji53 (2003.2.23)

15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3.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302280214.htm(2003/3/19)

16 文化部. 全国公共图书馆书架单层总长度增加, 发放借书证略有上升, 2002. http://www.ccnt.gov.cn/whcy/? nav = whcy01&id = 1009676194(2003/2/23)

17 Raber D. Librarianship and legitimacy : the ideology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quiry.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97

18 King Research Ltd. Keys to success :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public libraries : a manual of performance measures and indicators. London: HMSO, 1990

19 Library and Statistics Uni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atistics table. Loughborough, UK: LISU, 2002

20 Sturgess P. Conceptulizing the public library 1850～1919. In: Kinnell M, Sturgess P, ed.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library: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 institution.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1996: 29～47

21 Edwards E. Cited in Sturgess P. Conceptulizing the public library 1850～1919. In: Kinnell M, Sturgess P, ed.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library: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 institution.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1996: 29～47, 31

22 Corbett E V. Fundamentals of library organis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 a practical guide. New Delhi: Oxford & IBH, 1978

23 Sturgess P. Conceptulizing the public library 1850～1919. In: Kinnell M, Sturgess P ed.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library: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 institution.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1996: 29～47, 34

24 Corbett E V. Fundamentals of library organis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 a practical guide. New Delhi: Oxford & IBH, 1978, 63

25 Chernik B E.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ervices. 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92

26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371

27 Sturgess P. Conceptulizing the public library 1850～1919. In: Kinnell M, Sturgess P, ed.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library: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 institution.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1996: 29～47

28 Comedia. Borrowed time? The futur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K. Bournes Green, Gloucs. England: Comedia, 1993

29 Rubin R.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8

30 Comedia. Borrowed time? The futur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K. Bournes Green, Gloucs. England: Comedia, 1993

31 Library and Statistics Unit.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atistics table. Loughborough, UK: LISU, 2001

32 Ormes S.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and I feel fin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e-book, Ariadne, 2001, Issue 26

33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iscal Year 2000.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2

34 Ormes S. Public libraries corner: commercial partnerships in the Public Library, Ariadne, 1996, Issue 5. http://www.ariadne.ac.uk/issue5/public-libraries/ (2003/3/17 查阅)

35 Eggert D. Popular with homeless: Tacoma library sets limit on stuff you can bring in.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Thursday, May 16, 2002

36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Public Library Trends Analysis, Fiscal Years 1992～1996.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1

37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iscal Year 1998.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1

38 LIBECON Project 网站:http://www.libecon.org/default.asp. (2002/10/22 查阅)

39 Yu L, Dempsey L and Ormes S. Community networking and public libraries.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99, 31 (2): 71～83

40 Snape R. Leisure and the rise of the public library.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5

41 Kinnell M, Yu L, Creaser C.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Loughborough: LISU,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2000

42 McClure C R, et al. Planning and role setting for public libraries: a manual of options and procedures, prepared for the Public Library Development Project.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7

43 Comedia, Borrowed time? The futur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K. Bournes Green, Gloucs. England: Comedia, 1993

44 Kerslake E, Kinnell M.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public libraries and social inclusion. Libri 48 (1), 1998: 1～12

45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iscal Year 2000.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2

46 Dunford H. Cooperation, compromise, commitment: a joint use library in an isolated area of Tasmania. APLIS, 1998, 11 (4): 179～181.

47 Chernik B E.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ervices. 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92

48 Mackenzie A G.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Maurice B L, ed. Academic library management : edited papers of a British Council sponsored course, 15～27 January 1989, Birmingham, 196～205. London : Library Association, 1990

49 Eve J, Brophy P. The value and impact of end-user IT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London: Resource: the Council for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2001

50 King Research Ltd. Keys to success :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public libraries: a manual of performance measures and indicators. London: HMSO, 1990

51 Cullen R. Setting standards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outcomes, and service qu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Northumbr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Meaningful Measures for Emerging Realitie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ittsburgh, PA 13 August 2001

52 Mackenzie A G.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Maurice B L, ed. Academic library management: edited papers of a British Council sponsored course, 15～27 January 1989, Birmingham. London : Library Association, 1990: 196～205

53 Lynch Beverly.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4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ugust 16-August 21, 1998

54 Liu Yan Qu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ational public library statistical systems and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2nd IFLA General Conference-Conference Pro-

ceedings-August 25－31, 1996

55 Ormes S, McClure C. A comparison of public library internet connectivity in the USA and UK. In: Ormes S, Dempsey L, ed. The Internet, networking and the public library.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1997: 24～40

56 Bertot J C. Statistics and performance measures for public library networked services. Chicago, IL :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1

57 Yeates R. LONGITUDE. London: Resource: the council for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2001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总第21期.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 1999,1092

59 Brophy P. The academic library. London : Library Association Pub., 2000

60 Meadows A Jack.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61 Follett Report. Joint Funding Councils's Libraries Review Group: Report. Bristol, England: HEFCE, 1993

62 Carlson S. Do libraries really need book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sue dated July 12, 2002

63 Court S. When is a librarian a teacher?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Record, 2001, 103 (4): 234～235

64 McPherson M. Practising the paradigm shift: real world experience of on-line suppor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tworked Learner Support 23rd-24th June 1997. Sheffield, England: New services, roles and partnerships for the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1997

65 MacFarlane Report.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n expanding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port of a working party of the Committee of Scottish University Principals, 1992

66 Follett Report. Joint Funding Councils's Libraries Review Group: Report. Bristol, England: HEFCE, 1993

67 Ross Report. Library provis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anberra: National Board of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990

68 Brophy P, Coulling K. Quality management for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managers.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Brookfield, Vt. : Aslib Gower, 1996

69 Chernik B E.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ervices. 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92

70 Budd J M. The academic library : its context, its purpose, and its operation. 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98

71 Budd J M. The academic library : its context, its purpose, and its operation. 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98, 169

72 Court S. When is a librarian a teacher?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Record, 2001, 103 (4): 234～235

73 Biddiscombe R. Managing the new learning agenda in a converged service environment. IATUL proceedings: the future of libraries in human communication.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Crete, Chania, Greece, 17th May～21st May, 1999

74 Brophy P, Coulling K. Quality management for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managers,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Brookfield, Vt. : Aslib Gower, 1996

75 Cook, Colleen. Higher-Order Factor Analytic Perspectives on Users' Perceptions of Library Service Quality.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00, 22 (4): 393～404

76 Cook, Colleen, et al. The search for new measures: the ARL LibQUAL + Project-A Preliminary Report. portal: Libraries and the Academy, 2001, 1(1): 65～74

77 Waller, Consuella Askew. Using LibQUAL + TM and Developing a Culture of Assessment in Libraries. ARL Bimonthly Report 221, April 2002. http://www.arl.org/newsltr/221libqarl.html(2003/3/17 查阅)

78 Measures for Electronic Resources (E－Metrics), 2003. http://www.arl.org/stats/newmeas/emetrics (2003/3/19 查阅)

79 来新夏主编.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词典.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

80 Lemon, Nancy. Climbing the Value Chain: a Case Study in Rethinking the Corporate Library Function. Online, November 1996

81 Chernik B E.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ervices. 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92

82 Chernik B E.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ervices. 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92

83 Chernik B E.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ervices, 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92, 62

84 Line M B. Co-operation: the triumph of hope over experience? Interlending & Document Supply, 1997, 25 (2): 64

85 Line M B. Co-operation: the triumph of hope over experience? Interlending & Document Supply, 1997, 25 (2): 64

86 Woodsworth A. Library cooperation and networks: a basic reader. New York :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1.

87 宓浩等. 图书馆学原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88 Young Hertsill. The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hicago: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3

89 Bostick S L, D R E.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library consorti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overview.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01, 27, (2): 128～130

90 Woodsworth A. Library cooperation and networks: a basic reader. New York :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1

91 Woodsworth Anne. Library cooperation and networks: a basic reader. New York :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1

92 Woodsworth Anne. Library cooperation and networks: a basic reader. New York :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1

93 Price S P, Morris A, Davies J E. An overview of commercial electronic document delivery suppliers and services. The electronic library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minicomputer, microcomputer, and software applications in libraries, 1996, 14 (6): 523

94 Line M B. Co-operation: the triumph of hope over experience? Interlending & Document Supply, 1997, 25 (2): 64

95 Line M B. Co-operation: the triumph of hope over experience? Interlending & Document Supply, 1997, 25 (2): 64

96 Copyright, Commercial copying blow. Library Association Record, 2002, 104 (1), 3

97 Woodsworth A. Library cooperation and networks: a basic reader. New York :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1

98 Woodsworth Anne. Library cooperation and networks: a basic reader. New York :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1

99 Patrick. Cited in Woodsworth A, Library cooperation and networks: a basic reader. New York :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1

100 Patrick. Cited in Woodsworth A, Library cooperation and networks: a basic reader. New York :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1, 16

101 Line M B. Co-operation: the triumph of hope over experience? Interlending & Document Supply, 1997, 25 (2): 64

102 Line M B.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document supply systems. Interlending and Document Supply, 1988, 16:81～88

103 Turock B J. Performance factors in multitype library networking. Resource sharing and information networks, 1987, 3(1), 15～38

104 Line M B.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document supply systems. Interlending and Document Supply, 1988,16:81～88

105 Stein Joan. Feedback from a Captive Audience: reflections on the results of a SERVQUAL survey of interlibrary loan services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2nd Northumbr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Newcastle upon Tyne, England;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Library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 1998: 207～222

106 Hebert, Francoise. Service Quality: an unobtrusive investigation of interlibrary loan in large public libraries in Canada.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94, 16: 3～21

第五章　图书馆职业的学科建设

第一节　图书馆学的产生

一、作为科学分支的图书馆学

在人类语言中，“科学”这个象征着严谨和准确的术语，偏偏本身既模糊又多歧义。在一些英语国家，对“科学”(science)一词的理解取决于它是否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人文科学”(humanities)并列使用。与“社会科学”并列时，它通常仅指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列时，它通常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有时它也可能指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整个人类知识体系。在我国，科学一般被定义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指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整个人类知识体系。

以研究知识在经济中的作用而著称的美国学者马克鲁普(Machlup)曾试图更具体地界定“科学”的含义，他指出：“科学是通过一定方法形成的、关于一个正统或经验领域、自然或文化领域的系统的、连贯的知识体系，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以经得起检验的、诚实的、认真的研究为基础，并且具有非专业人员难以理喻的见解；②它是为了探索知识或一般实践而形成的，而不是为了特定情景下的即时应用而形成的。”[1][原文1]

这个定义揭示了科学的若干基本特征：首先，构成“科学”的基本成分是知识，即思维对经验材料进行概括和升华的结果，它既不是个人的观点(opinion)，也不是事实的堆砌，更不是单纯的消息报道，而是具有一定抽象性、规律性和洞察力的认识；第二，科学是由关于确定领域的、彼此关联的知识组成的、具有一定内在结构的体系，这一特征决定了科学研究活动虽然经常表现为个人或团体的行为，但是，其结果却构成整个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第三，科学需以正规、可靠的方法为基础，这些方法一般需要经过严格的、较长时间的训练才能掌握，因而科学研究一般由相对少数的专业人员承担。

本节便是根据上述“科学”的含义来理解作为科学分支的图书馆学。如此理

[原文1]　Science is a body of coherent, systematic knowledge of any subject, formal or empirical, natural or cultural, arrived at by any method whatever, provided it (1) is based on hard, honest and serious study and research and reaches insights not available to laymen or superficial observers and (2) is designed for either intellectual or general-pragmatic purposes, but not for immediate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a concrete case or situation.

解，图书馆学还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在此之前，图书馆虽然已有几千年历史，但是关于图书馆的认识长期停留于对具体工作方法的描述，或对个人观点的陈述。把图书馆活动当成一种社会实践加以科学研究，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还是一个陌生的观念。

二、图书馆学的孕育

不能否认，从保存宫廷档案的古代图书馆到19世纪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随着文献的增长，管理图书馆藏书所需的技巧也日趋复杂。特别是在馆藏的"利用"能够抗衡"收藏"的重要性的时候，图书馆员在日常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如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职业价值与伦理问题等，就更加复杂。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很多图书馆员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管理藏书以及处理其他问题的经验。有些馆员还开始对自己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例如，我国南宋时的程俱就将其积累的管理国家藏书的经验总结为比较系统的著述《麟台故事》。这部著作不仅阐述了程俱对国家藏书的使命和价值的理解，还提出了关于图书馆建筑设计、图书的选择和校勘、图书馆员的管理和待遇等方面的意见，其影响及于清代[2]。17世纪，法国图书馆活动家诺德所著的《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书》也是他多年图书馆工作经验的总结。在这部意见书中，诺德详细地描述了图书馆的设立、图书的收集、分类、目录的编制、图书的排架与修缮等技术，同时还讨论了图书馆之于赞助者和全社会的意义。这部著作在当时的欧洲曾广为流传，诺德的经验也为很多图书馆管理者所效仿。19世纪初期，德国图书馆活动家施莱廷格将他40余年的图书馆工作经验整理为更加系统的著述，这就是《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施莱廷格是第一位使用"图书馆学"术语的图书馆员。在这部书中，他不仅详细地总结了自己在图书收集、分类、编目等方面的经验，而且尝试着定义了他提出的图书馆学的概念，认为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实施有目的的组织所需要的理论准则的概括"[3]。与诺德的《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书》一样，施莱廷格的著作也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

至19世纪后半叶，有些图书馆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复杂的程度。例如，在分类技术方面，当时已有《杜威十进分类法》(DDC)这样复杂、实用的分类体系；在图书馆目录方面，已有卡特提出的系统、完整的目录编制原则。这些技术都对后来的图书馆职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末，在经过了欧、美等国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洗礼之后，图书馆职业作为一个现代职业，终于羽翼丰满。为适应这个新职业对人才的需要，在俄国、美国、意大利等国，都出现了对图书馆员进行培训的活动。例如，在美国，杜威就曾多次在其任职的图书馆举办馆员培训班。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之后，他又多方呼吁建立专门的图书馆学校。1887年，世界上第一所图书馆学院终于在哥伦比亚大学建

立。这是一所职业培训性质的学院，以技术操作与管理为主要内容，与后来建立的、以图书馆学研究为主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性质有很大不同。哥伦比亚图书馆学院成立之后，在美国各地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学校，到1919年，已有十多所比较正规的图书馆学校[4]。这些学校有的设在大学，有的设在技术学院，有的设在公共图书馆，但其培训内容大都模仿哥伦比亚图书馆学院。这些培训项目与图书馆员之间的经验交流一起，孕育了以后正式图书馆学的诞生。

三、现代图书馆学的形成

19世纪末期，图书馆教育已经在很多国家起步。在美国，由于杜威等人的竭力推动，图书馆教育迅速发展。但是，1915年以后，图书馆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的不足渐渐暴露。图书馆界批评图书馆学校的课程缺少统一规范和标准，教师及毕业生质量太差。在这种背景下，卡内基基金会于1919年委托威廉姆森（Williamson）对美国图书馆教育的现状进行调查，并于1923年出版了反映这次调查结果的《威廉姆森报告》。该报告建议图书馆职业模仿其他专业化职业的教育模式，在综合性大学内设图书馆学研究生院。1928年，根据《威廉姆森报告》的建议设置的第一所图书馆学学院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与以往的图书馆学校不同，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以研究为主，只招收研究生。

从很多意义上都可以说芝加哥大学打造了正在孕育中的图书馆学，使它作为现代科学分支的地位得以确立。首先，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第一次明确提出，图书馆活动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实践领域，这意味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的创始教授之一巴特勒（Butler）在其所著的《图书馆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中特别谈到图书馆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位置，"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必须包括对这一机构（图书馆）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理解。因而图书馆事业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众多现象的组成部分。"[5][原文2]第二，芝加哥大学的成立改变了过去技校式的图书馆教育，使图书馆学教育从此按其他专业化职业的教育模式来组织，既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也注重理论的培养。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看来，"理论"指那些通过对经验数据的分析和概括而形成的，可以按一定程序被经验数据检验的科学发现。对理论建设的关注是这个新成立的学院所倡导的图书馆学"科学化"的重要内容。为了促进图书馆学理论的建设，巴特勒曾尖锐地批评以前的图书馆专业人员对理论建设的漠然："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专业人员相比，图书馆员对自己职业的理论方面充满了令

[原文2] Any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must include an explanation of this social element (the library) and of its function in communal life. Thus librarianship takes its place among the phenomena to be discussed in any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

人费解的冷漠。对于那种驱使现代人将自己的探索汇入人类生活主流的好奇心，图书馆员似乎天生缺乏。"[6][原文3]由于巴特勒、韦普尔(Douglus Waple)等教授的推动，芝加哥大学很快就成为当时阅读理论研究的大本营。第三，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为图书馆学引进了正规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是美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实证方法(即定量方法)应用基地。实证方法的基本模式是根据已有的理论提出假设，确定变量，收集数据，证实或否定假设，肯定或发展已有理论，这是一种从自然科学移植过来的研究模式。图书馆学院的创院教师之一韦普尔就是这种方法的传道者，他不仅严格按实证方法研究阅读现象，提出了许多可以指导图书馆实践的阅读行为规律，而且还严格地训练他的学生采用同样的方法，为20世纪40～60年代的美国图书馆学培养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实证研究者。巴特勒也是图书馆学"科学化"的积极倡导者，并因其《图书馆学导论》等著作，对图书馆学的"科学化"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他比韦普尔更注意采用人文主义精神纠正实证方法的"过度科学化"(事实上，对实证研究方法的不同看法后来导致了他和韦普尔之间最大的职业和个人冲突)，但是，在图书馆学"科学化"目标上，他与韦普尔却是一致的。芝加哥大学所进行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在图书馆领域开创了崭新的研究风气，使图书馆学的研究活动得以按科学研究的规范进行。由于芝加哥图书馆学院的贡献，它成为世界图书馆学发展史上一个当之无愧的里程碑，标志着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在世界范围的诞生。

第二节　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

一、图书馆学发展主线的确定

把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确定为现代图书馆学形成的标志，就很难避免把西方图书馆学视作世界图书馆学主流的发展观。这种观点可能会遇到一些学者的非议，但是，不能否认，20世纪20年代以来，尽管在前苏联、中国、印度，都出现过有影响的图书馆思想，图书馆学知识创新的主流却在西方。这首先是因为芝加哥学院开创的图书馆学科学化进程为西方国家图书馆学的知识创新提供了规范和工具。这种规范和工具或许不是最好的，但是，正如哈里斯在20世纪80年代末所说的，它们毕竟使西方图书馆学研究告别了主观和臆想，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这样的研究使西方图书馆学在技术应用和理论建设方面，都走在世界前面，出现了一批对世界图书馆学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如以韦普尔的研究为代表的阅

[原文3] Unlike his colleagues in other fields of social activity the librarian is strangely uninterested in th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his profession. He seems to possess a unique immunity to that curiosity which elsewhere drives modern man to attempt, somehow, an orientation of his particular labors with the main stream of human life.

读理论、威尔逊(Tom Wilson)等的研究为代表的用户行为理论、以怀特(Herbert White)等的研究为代表的管理理论、以兰卡斯特的研究为代表的情报检索理论、以麦德斯(Jack Meadows)的研究为代表的科学交流理论。其次,20 世纪 40 年代之后,西方国家陆续出现了较多类似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学院。除了芝加哥大学,美国西部预备大学、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拉夫堡大学、丹麦的皇家图书馆学院等都成为世界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的发展,扩大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队伍,活跃了图书馆学的研究活动,产生了大量有影响的成果,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图书馆学的发展。再次,在西方国家图书馆学研究腾飞之时,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学研究却或者经历着过度的意识形态化(如苏联),或者经历着战乱和其他政治风云的干扰(如中国),使已经存在的图书馆学研究的差距更加明显。此外,英语作为世界科学语言的优势,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西方图书馆学的主流地位。

有鉴于此,本节将以西方图书馆学的发展为主线,简单介绍世界图书馆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并以此为参照,介绍图书馆学在其他国家,特别是我国的发展过程。由于系统介绍图书馆学发展历史的著作较少,本节的介绍主要根据谢拉[7]、哈里斯(Harris)[8]、威甘德(Wiegand)[9]、沃纳(Warner)[10]等人提供的材料和其他著作中零星的介绍综述而成。表 5.1 是在沃纳分析的基础上,融进哈里斯、威甘德等人的观点而成的图书馆学及相关学科发展列表。根据这些作者的介绍,西方图书馆学似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20～60 年代初为一元化深入发展时期,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为多元化冲突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为困惑与整合的时期。

表 5.1　图书馆学及相关学科发展列表

时间	其他领域	图书馆学情报学	
		情报学	图书馆学
1945～		控制论、信息论	
1950 年代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强调实验研究	谢拉等社会认识论、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抵制
1960 年代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辩论	图书馆学、情报学见于同一教育或研究机构	图书馆学、情报学见于同一教育或研究机构
1970 年代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辩论;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讨论	开始考虑采用社会科学研究模式;更大程度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一体化	
1980 年代	信息社会概念的扩散;计算机技术的普及	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教育与研究使命的反思	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教育与研究使命的反思;人文主义对技术的抵制减弱
1990 年代	计算机科学领域对情报检索的研究	一些地区出现学科危机;关于信息社会的讨论声音黯然;英国的情报科学家协会考虑与图书馆协会联合或与计算机学会联合	一些地区出现学科危机;关于信息社会的讨论声音黯然

二、20 世纪 20～60 年代的图书馆学

1. 西方图书馆学

这段时间的西方图书馆学基本上呈现一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一元化”指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拥有比较公认的领袖人物，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采用了相对一致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就领袖人物而言，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图书馆学家是巴特勒、谢拉和阮冈纳赞。巴特勒是芝加哥图书馆学研究生院的第一批教师之一，他对图书馆学的最杰出贡献在于领导了图书馆学的“科学化”。他不仅令人信服地证明图书馆学是当代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分支，承担着图书馆职业知识创新和理论建设的使命，而且界定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他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视角应该是由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构成的社会科学视角；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遵循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这在当时主要是仿照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规范。“图书馆学只有从根本上遵循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成为科学。它所有的知识总结都应该从客观现象开始。这些现象应该通过严谨的科学观察法仔细观察，使要素得以明晰，要素的功能得以确定。要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分离[被观察的]活动并获得它们的定量测度。”[11][原文4]这些思想奠定了这一时期一元化图书馆学的基本模式。

谢拉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也是图书馆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2]。他对图书馆学的最主要的贡献，一是吸收了新生的情报学的成果，明确了图书馆作为社会交流系统组成部分的性质，以对交流过程的关注弥补了对图书馆这一机构的关注，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二是提出了社会认识论的框架。他设想的社会认识论是关于社会整体和知识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为了弥补传统认识论只注意个体认识过程的不足而提出的。虽然他本人未能将这一概念展开，却使人们开始注意传统认识论在解释整个社会如何获取、积累、利用知识方面的不足。

阮冈纳赞虽然是一位印度图书馆学家，但是包括谢拉在内的西方图书馆学家都十分推崇他的成就，视他为世界图书馆界的领袖，认为他的思想对西方图书馆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阮冈纳赞不仅仅属于印度图书馆学。阮冈纳赞对图书馆学最主要的贡献是他的“图书馆五法则”和《冒号分类法》。“图书馆五法则”——书是为了用的；书是为所有人用的；每本书有其读者；节省读者的时间；图书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是图书馆哲学思想的最精练的表述（详见

[原文 4]　Librarianship, in particular, will become scientific only as it conforms in essentials to the habitual methods of thought in the modern temper. Every line in its intellectual synthesis must start with all the rigor of scientific observation. Elements will be identified and their functions determined. Every possible device will be utilized for the isolation of activities and their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

下一章)。他的《冒号分类法》体现着他的吠陀(Vedic)文化背景对人类知识的理解,这种理解与杜威的思路完全不同,为知识的组织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他的辉煌成就为这一时期西方图书馆学的一元化深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就研究领域和内容而言,这时期的研究主要是把图书馆作为沟通人类知识记录及其利用者的社会设施,探索与这一功能相关的理论和技术。阅读行为理论、图书馆管理理论(包括藏书建设理论)、图书分类编目理论、图书馆史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核心研究内容。20世纪30～40年代,阅读行为研究曾是芝加哥图书馆学研究生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韦普尔(Waple)等人的领导下,学院承担了一批又一批关于阅读行为的研究课题,用大量的社会调查数据,细致地分析了影响阅读兴趣和行为的各种因素[13]。这包括韦普尔本人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社会群体与阅读兴趣之间关系的理论。图书馆管理也曾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热点(以该院曰长威尔逊为中心),后来成为图书馆学经久不衰的研究内容。对分类编目理论及技术的研究更是吸引了大量的研究兴趣。在这方面,20世纪30年代末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提出的与杜威完全不同的吠陀(Vedic)思路,以及五六十年代计算机技术在文献加工方面的尝试性应用,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对分类编目理论的研究热情。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分类法小组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就研究视角和方法而言,这时期的西方图书馆学基本上采用社会科学(主要是社会学、历史学及人文学)视角。这种视角的基本特征是把图书馆看成对个人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的社会机构,把图书馆活动看成人类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把图书馆的发展看成与社会整体的发展密不可分的过程。对于这种视角,谢拉有过精辟的表述,"很明显,图书馆是一种社会部门,在社会中起着媒介作用。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社会是图书馆的支柱,反过来,图书馆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并对其负有责任。因此,要了解图书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社会性质本身以及支配这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体系"[14]。在研究方法方面,这时期的图书馆学除了采用历史方法以外,主要采用从自然科学模仿来的定量方法(也称实证方法)。这种方法的推广,受到当时整个社会科学实证潮流的影响和图书馆学内部韦普尔及其学生的推动。本章的下一节将较详细地讨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在此,我们不妨引证哈里斯的评论以显示实证方法对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必须指出的是,自30年代以后,采用这种新的实证主义的图书馆专业人员是一组为数甚少的精英人物。他们大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和另外十几所仿照芝加哥模式建立的有博士生课程的图书馆学院。这些人从数量上来说从未逾千,但是,由于他们占据着今天美国绝大多数图书馆学院的教学位置,

又生产着美国绝大多数图书馆学研究成果，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15][原文5]

2．20 世纪 20 到 60 年代的苏联图书馆学

前苏联的图书馆学几乎与现代西方图书馆学同时发展起来。如果说西方图书馆学是沿着芝加哥图书馆学院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前苏联图书馆学则主要建立在列宁关于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的论述之上。列宁是历史上少有的对图书馆事业做过大量论述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关于图书馆的使命、功能以及图书馆事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它们经过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整理，奠定了苏联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由于列宁更加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图书馆实践，而不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在列宁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苏联图书馆学，虽然带着历史唯物主义式的、探索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热情，却没能自觉地追求图书馆学研究过程的科学化。此外，列宁在建国初期对图书馆意识形态功能的关注也被后来的图书馆学家夸大，使苏联图书馆学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化之间，更多地选择了前者。以下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图书馆学的意识形态化："评价图书并不容易，一个人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担当这份工作。所以，图书馆工作的每一步都让图书馆员感受到他们是多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多么需要热情地向他们的读者提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6][原文6]

3．20 世纪 20 到 60 年代的我国图书馆学

我国现代图书馆学也开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1920 年，曾进修过图书馆学的美国学者韦棣华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了图书科，开始了我国图书馆职业教育。1929 年，即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成立后的第二年，文华大学图书科独立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学校按中西结合的原则办学，西方影响主要来自美国[17]。然而，30 年代中期以后，即巴特勒等人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和第一批研究生陆续毕业并开始产生影响的时候，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来自西方的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及其影响，也使我国图书馆学在起步阶段就错过了给西方图书馆学带来深刻影响的"图书馆学科学化"。所以，尽

[原文 5] It must be made clear that the segment of the profession that adopted this new positivism from the thirties onward represented a highly select elite. Made up of the graduates of the GLS and the dozen doctoral programs in library science that were cloned off of the GLS model, this group has never numbered much over a thousand. Nevertheless, they have proven of great significanc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staff most of 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s in the country today, and that they are the producers of most of the research being conducted in the field.

[原文 6] It is no simple matter to evaluate a book properly and one must be a good Marxist to tackle it. Thus with every step do librarians feel how much they need to study Marxism-Leninism and everywhere in the country to passionately offer their readers th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管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图书馆学教育家、图书馆活动家，如沈祖荣、胡庆生、刘国均、杜定友，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著述，以及图书分类法方面的成果，但是，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这些学者还停留在杜威时代。

由于日本的侵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苏联一致，也由于西方诸国的敌意和封锁，我国社会科学便主要接受了来自苏联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图书馆学就很难避免苏联式的"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18]。从20世纪50～60年代初，我国又一次出现了大批图书馆学学者和著述，除了依然活跃的刘国均、杜定友等人外，还有周文俊、黄宗忠、彭斐章等，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学者的研究活动大都带着苏联图书馆学的色彩。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因此又一次错过了科学化的改造。

三、20世纪70～80年代的图书馆学

1. 西方图书馆学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图书馆学目睹了很多注定要影响它本身发展的学术界变化。这时期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学术界变化包括情报学的形成、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方法大辩论。

情报学是研究情报的产生、组织、传输及利用的科学[19]，与图书馆学相比，它更关注情报本身而不是情报的载体(如文献)；更关注情报过程而不是这一过程中的机构(如图书馆)；此外，它从一开始就比图书馆学更关注新技术的应用，更注意从数学、通讯科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汲取理论成果[20]。

关于情报学的起源有不同说法。但一般认为，它的职业活动基础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专业图书馆活动及文献运动[21]，而作为独立的科学领域，情报学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1958年，世界科技情报大会在美国召开，1968年，美国文献学会更名为美国情报学会，其会刊更名为美国情报学会会刊，标志着情报学的正式形成[22]。由于与图书馆学有着非常相似的职业基础，并且分享着很多共同的研究领域，情报学产生不久就引发了很多学者对图书馆学的重新定义。尽管源于芝加哥大学的理解——即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这一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分支——依然很有影响，但很多人已开始把图书馆学定义为研究图书馆中的情报交流过程的学科。根据这一定义，图书馆学在语义上与情报学已很难区分，所以有些人认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应该共同构成一个学科整体；还有人认为，图书馆学应该被界定为情报学的分支学科[23]。不管学术界如何定义，很多原来的图书馆学系都开始开设图书馆学、情报学一体化的课程，院(系)名称也相应改为图书馆学情报学院(系)。

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是这段时间影响西方图书馆学的第二大因素。如

第二章所述,图书馆界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构思应用计算机技术[24]。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效率、节省费用。当时,图书馆工作中成本最高的工作是文献编目,编目工作因此成为最早尝试计算机技术的领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带领下,图书馆界于20世纪60年代开发了计算机可以阅读的编目格式(MARC)。根据这种格式,计算机可以自动输出以磁带形式记录的编目数据,从这些磁带,就可以很容易地打印出用于手工检索的编目卡片。在图书馆界研制MARC的同时,计算机技术开始广泛用于处理二次文献。最初,这种处理也是为了生成用于手工检索的书本式索引,但是,人们很快认识到,计算机处理的二次文献可以直接用于检索。这种可能又很快吸引了商业兴趣,到20世纪70年代初,大型的商业化二次文献数据库已相当普遍,很多图书馆都开始向用户提供这种数据库的检索服务。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光盘技术、联机目录、集成化的图书馆管理系统等新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彻底改变着图书馆的工作方式。这个过程使很多计算机科学的人才进入图书馆工作领域,为图书馆职业带来了鲜明的技术视角,成为与芝加哥图书馆学院开创的社会学传统并存的视角。

这一时期影响西方图书馆学的第三大因素是社会科学方法大辩论。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大辩论,是一场反思实证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适用性的讨论。截至那时,实证方法一直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性研究方法。追随法国哲学家孔德的信念,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相信,这种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法可以武装他们去寻求人类社会的规律,如同自然科学家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与这样的目标相适应,实证方法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象自然科学家一样,在研究中保持客观、中立,独立于被研究对象之外。到20世纪60年代,很多社会学家发现,这种所谓的客观、中立立场在社会科学领域既不可能,也不适用,因为社会学家总是带着已有的价值观取向去研究社会现象。著名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形象地描述这种反思:"那些寻求牛顿式社会科学的学者很快发现,他们不只是在等待一列不会到来的火车,他们根本就站错了站台。"[25]这种反思的结果使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都放松了对实证方法的迷信,各类定性研究方法迅速步入了学术研究的殿堂。在图书馆学领域,哈里斯呼吁采用多元化的、全方位的研究方法[26];威尔逊(Tom Wilson)呼吁借助定性研究寻求对用户的更深刻的理解[27]。

所有这些变化都大大削弱了图书馆学在研究视角和方法等方面的一致性,使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图书馆学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不仅如此,这些多元体之间常常不是协调地,而是冲突地发展着。

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研究团体的构成上。20世纪70～80年代末出现了很多颇有影响的图书馆学家(尽管有的人更希望被称为情报学家),其中较著名的有美国的兰卡斯特、加菲尔德(Garfield)、兹维基格(Zweizig)、怀特(White)、哈里

斯(Harris)、麦克鲁(McClure),英国的莱恩(Line)、麦德斯(Meadows)、威尔逊(Wilson),北欧的英格沃森(Ingwersen)等。这些人风格各异,观点不同。作为整体,他们无法与巴特勒、阮冈纳赞和谢拉那种相得益彰的影响相比;作为个人,没有一人能接近上述三位图书馆学巨匠的领袖地位。一一细述些学者的贡献是不可能的,冒着有失全面的风险,本节将他们的主要贡献简述如下:

兰卡斯特是一位在图书馆管理、文献分析加工、情报系统评价等方面都颇有建树的图书馆学家。他的最大影响是关于无纸时代的预言。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接受了贝尔等人关于信息社会的观点,不仅认为信息正在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而且预言在信息社会,电子化信息将取代纸质信息,图书馆职业将成为非机构化的(deinstitutionalized)信息资源管理职业[28]。

加菲尔德是一个出身于化学领域的情报学家。他对情报学,也是对图书馆学的最大贡献是他继承了早期文献学研究的成果,进一步阐述了文献引文对科学继承关系以及文献主题关联性的反映,并以此为依据开发了基于文献引用关系的情报检索系统。这种系统的广泛应用不仅弥补了其他检索途径的不足,而且大大提高了引文分析法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中的方法论地位,使引文分析成为探索科学交流规律、研究科学团体特点、评价学术团体及期刊影响力的最常用的方法。

兹维基格在图书馆服务和用户研究方面具有突出贡献。他与德尔文一起,系统地提出了"用户中心论"[29]。由于他与德尔文的杰出贡献,用户中心论得以成为一种思路,甚至可以说是范式,它不仅影响了图书馆服务,而且影响着系统设计、图书馆及系统评价,甚至影响着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

哈里斯被称为图书馆学领域的"修正主义者"[30]。这主要是因为他最早质疑了图书馆领域那种自以为是的大众教育使命感和客观、中立、公正的价值观。他认为,美国早期公共图书馆并非他们所声称的那样以大众教育为目标,也并非是客观和中立的,它们的真正意图是对新移民进行意识形态的同化(即控制),维护已经建立的社会秩序[31]。20世纪70年代,这种对图书馆作用的剖析和对传统观点的批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越战之后美国社会的反对正统、反对权威的情结,在年轻一代图书馆学学者当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也因此被称为"修正主义"者[32]。事实上,哈里斯也是较早对实证研究方法提出批评的学者之一,堪称方法论方面的"修正主义者"。

英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家麦德斯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但他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对科学交流系统的研究。与以往研究科学交流系统的学者(如20世纪40年代的布拉德福、60~70年代的加菲尔德、米哈依罗夫等)不同,他的研究视角带有强烈的社会学色彩。因此,在麦德斯看来,无论是科学交流过程的起点(研究活动)、中间环节(出版),还是最终环节(阅读和利用),都构成一种独特的社会活动,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制约。所以,引文格式的复杂化不仅仅是

为了体现科学的继承，更重要的是为了肯定科学发明的优先权(知识产权)。出版格局的形成并非科学交流系统的理智分工，而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把发展中国家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33]。

在上面提到的其他图书馆学家中，威尔逊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对用户的研究。他肯定了定性方法在用户研究中的作用，是几种颇有影响的用户行为模型的作者[34,35]。美国的麦克鲁、怀特和英国的莱恩都是图书馆管理方面的专家，麦克鲁在图书馆绩效评估及图书馆网络建设方面，怀特在倡导图书馆职业的"政治敏感性"方面，莱恩在图书馆事业的宏观管理方面(如图书馆合作和图书馆政策)，都很有影响。英格沃森是一位情报学家，主张图书馆学是情报学的一个特殊分支。

2．20 世纪 70～80 年代我国图书馆学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末，我国图书馆学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再次陷入停滞状态。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图书馆学也得以恢复。恢复以后的图书馆学一方面继承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开始吸收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如巴特勒、谢拉、兰卡斯特的思想。短短十年中，我国图书馆学就产生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学的大讨论。这是一场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事实上，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我国几乎每一代图书馆学者(杜定友、刘国均、黄宗忠等)都要提出这一问题，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对这一问题的提问发展为一场更大规模的讨论。正是在这一大讨论中，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图书馆学学派，包括"文献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知识交流说"等[36]。文献交流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交流过程主体的文献，包括文献交流的产生、发展、功能、内容、渠道、方法、效果，以及组织交流的相关机构[37]；知识交流说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中所进行的知识交流活动的规律的学科[38]；文献信息交流说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进行文献信息交流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39]。事实上，这些观点之间的区别既不像它们各自的名称所隐含的那样分明，也不像"流派"二字所隐含的那样显著。他们都把图书馆视作社会的一种交流设施，强调的是它连接交流双方的工具性、功用性。这样的理解显然吸收了情报学的解释，同时吸收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西方图书馆学，特别是在情报学冲击下形成的谢拉的思想。

(2)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这个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主动寻求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先后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情报交流"[40]和"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知识交流论"[41]等观点。20 世纪 90 年代末，徐引篪、霍国庆在回顾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研究时，曾批评一些徒有虚名的理论基础，这种批评不无道理。在这场讨论中，人们对于理论基础之于整个图书馆学的作用似乎并没有统

一的认识。有些关于理论基础的研究,把寻求理论基础当成了目的本身,因而未能对整个图书馆学研究产生实质性指导作用。

(3) 谋求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结合。这时期,在各种交流理论(文献交流论、文献信息交流论、知识交流论)的影响下,我国图书馆学也开始探讨自身与情报学的关系问题,例如周文骏和宓浩都曾试图通过重新定义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把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融为一体。

(4) 图书馆现代技术。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的领导下,我国开始研制中文机读目录格式,同时开始了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开发。

就是在这一时期,在我国图书馆界大胆吸收西方思想的过程中,芝加哥图书馆学院的思想,在该学院成立半个世纪以后,才正式进入我国。我国图书馆学立刻就对巴特勒、谢拉倡导的理论建设产生了共鸣,这从 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的大量"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的论文中就可略见一斑。遗憾的是,我们似乎误读了巴特勒所说的"理论"和"理论建设"。从这段时间我国发表的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论文来看,我们似乎把"理论"理解成了纯粹思辨的产物,这与巴特勒所倡导的"理论"大相径庭。巴特勒所说的"理论"是指那些通过对经验数据的分析和概括而形成的、可以按一定程序被经验数据检验的科学发现。在实证主义强盛的 30 年代,即使是具有浓厚人文主义色彩的巴特勒也不否认,这种经验数据必须按照科学的、规范的、缜密的方法去收集,数据的分析也必须按照理性、科学、严谨的规范去进行,理论往往要经过若干个从经验数据到理性分析的周期才能形成。"任何领域的正常研究活动都是周期性的:先是根据一般知识形成系统的假设,接着是大量的深入的个案调研,然后是精确的数理和统计验证,再形成新的系统的假设"[42][原文7]。科学理论对于研究方法的依赖正是巴特勒和他的同事从一开始就极力倡导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原因。在引介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思想、强调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的时候,我国图书馆学似乎恰恰忽略了图书馆学科学化中关键的一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可以说,在对"理论"的误读中,我们又错过了一次图书馆学科学化的机会。

四、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图书馆学

1.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西方图书馆学

20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图书馆学出现的多元化冲突以及研究团体缺乏核心人物的局面难免使它带着困惑和危机感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信息技术的迅速

[原文 7] Normal progress in every field of intellectual activity has been cyclie: a period of systematic speculation from general knowledge is followed by one of extensive case study and that by exact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mass verification, and thence back again to new systematic speculations.

发展和"信息社会"概念的普及更加剧了这种困惑。信息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状况——日益普及的网络技术、迅速更新的计算机处理能力、多媒体技术、万维网(WWW)技术等——使图书馆作为物理实体的存在前景更加不确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已经建立的对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及研究对象的认识。"信息社会"概念的普及引发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传播学等学科对信息社会问题浪大声高的讨论,与这些学科相比,图书馆学在关于信息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几乎失落了声音。对那些社会普遍感兴趣的重大问题,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商品化、信息分化等,图书馆学表现出明显的幼稚和学术惰性[43]。

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图书馆学也表现了一些顽强的发展势头,有不少迹象表明,这是一个在多元化基础上整合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为学科交叉点上的整合、方法论的整合和新的学科增长点的整合。

在学科交叉点上,20世纪90年代的图书馆学和计算机科学、情报学等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渗透空前活跃。与20世纪70年代这些新兴学科冲击图书馆学的情景不同,90年代以后的学科交流表现出更强烈的交互性。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图书馆中应用的加强,计算机科学向图书馆学的渗透自不必说,图书馆学也开始向计算机专业输送知识,例如,很多大型的网络搜索引擎便是计算机技术与图书馆学相结合的产物。美国康乃尔大学计算机教授阿姆斯(Armes)在谈到这种渗透时说:"直到最近,这两个专业团体(图书馆专业人员和计算机专业人员)还令人失望地互不往来。即使今天,一个计算机专家对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工具一无所知,或一个馆员只知道一些过时的情报检索知识的现象也很常见。但是,自从有了万维网,这两个团体之间已经有了更多的协作和理解"[44][原文8]。

与此同时,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也继续着它们的融合。图书馆学继续吸收情报学注重理论和技术创新的优势[45],同时也向情报学渗透着它的注重服务和人文关爱的精神。尽管目前反对图书馆学、情报学融合的声音在两个领域都存在,如图书馆学家雷蒙德(Raymond)[46]和情报学家萨拉萨维克(Sarasavic)[47],但是,融合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更明显、更强劲的趋势[48]。英国的图书馆协会和情报科学家协会在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犹豫、徘徊、磋商之后,终于于2002年4月合并为一个整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趋势。

在方法论上,图书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已基本上实现了对实证方法的扬弃。它吸收了实证方法的科学精神,即在严格、规范的研究方法中收集经验数据的

[原文8]　until recently, these two communities had disappointingly little interaction; even now it is commonplace to find a computer scientist who knows nothing of the basic tools of librarianship, or a librarian whose concepts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are years out of date.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b, however, there has been much more collabo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精神,以及在经验数据与理性分析的结合中寻求科学发现的精神,但它摒弃了实证主义的"唯定量方法是科学"的教条性[49]。这种扬弃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就是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并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在继续合理使用定量方法的同时,已经实践了大量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定性调研(如访谈、个案调研)、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批判分析(critical analysis)等,形成了运用这些方法的图书馆学规范。这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整合过程[50],其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的图书馆学研究拥有更大的方法论选择,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选择最适合的研究方法。

新的学科增长点,特别是数字图书馆研究,对于促进学科的整合趋势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图书馆学来说,数字图书馆所涉及的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仅涉及技术问题,还涉及法律问题(如版权问题)、经济问题(如数字图书馆运行中的商业模型)、社会问题(如作者、用户和出版商的利益均衡问题、工作方式的改变问题)、人性化问题(如用户的需求和好恶)等,要求图书馆学聚集多方面力量,吸收多种学科的成果。在这方面,阿姆斯的观点值得再次引证:"技术决定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速度,但是如何使用技术却由人决定"[51]。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的渗透、研究方法的整合,以及在学科交叉点上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似乎都表明了一种学科整合的趋势。这种整合的结果可能是一个视野更广,势力更强的独立的图书馆学(如Raymond所希望的),也可能是一个统一的"图书馆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但是,正如新的英国"注册图书馆情报专业人员协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的名称所显示的,"图书馆"无论作为职业的名称还是学科的名称,都不会轻易消失。"图书馆"作为学科的名称或学科名称的一部分,并非像维克里(Vakkari)所说的那样"没有内容","没有意义"[52],恰恰相反,它包含了政治的、语义的和职业精神方面的丰富含义。在政治含义上,它表明图书馆专业人员是一批有着明确社会使命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会轻易让自己的身份消融在使命不同或不明的任何其他群体之中。在语义上,它对无所不包的"信息"(information)和"信息职业"(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起着限定作用。当图书馆与"信息"连用的时候,人们至少可以确定,这里的"信息"不是通讯意义上的信息或生物意义上的信息,"信息职业"也不是指通讯领域的技术人员或其他更泛意义上的信息人员。在职业精神上,"图书馆"一词象征着崇尚理性、注重服务和人文关爱等精神,这些职业精神是图书馆学和图书馆职业向相关学科和职业的重要输出[53]。

2.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我国图书馆学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图书馆学似乎比西方图书馆学带着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步入20世纪90年代。首先,我国图书馆学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从未经过西方图书馆学所经历的科学化洗礼,理论建设和职业精神的建设都比西方薄弱,因而也比西方图书馆学更不堪冲击。其次,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国图书馆学表现出更明显的多元化的特征,在短短十多年间我国图书馆学就涌现出众多不同的所谓流派[54]。但是,与西方图书馆学的多元化特征相比,我国图书馆学的所谓流派之间明显地缺少辩论与对话,这说明我国图书馆学的多元化特征更多地体现着学科内部的分歧,而不是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补充。其结果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西方图书馆学的多元体之间已经开始出现整合的趋势时(如随方法论大辩论而出现的研究方法的整合),我国图书馆学依然分歧如故。

不仅如此,我国图书馆学在20世纪90年代也比西方同行遇到了更大程度的冲击。与西方图书馆学相比,我国图书馆学不仅经历了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问题大讨论的冲击,而且经历了概念体系骤变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当我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围绕着文献、文献信息、情报、情报交流等概念体系,一边构建各自的研究领域,一边探索两个学科的融合之路时,一场以“信息”代替“情报”的更改系名、学科名、文献题名的浪潮席卷了我国图书馆学界。很多学者把信息管理看成了我国图书馆职业地位提升的机遇,并开始以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体系取代原有的图书馆学概念体系,使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概念体系出现了极大的混乱。这种混乱势必阻碍甚至间断学科的继承,加剧学科已有的困惑,从而延迟我国图书馆学走向整合与振兴的时间。

第三节　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一、理论与理论基础的含义

所谓“理论”(theory)就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或过程做出解释的概念及原理。它是理性对经验数据或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分析、解释而形成的,是科学研究过程的成果。尽管有的时候,猜测或假设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起点,因而成为理论形成的胚胎,但是任何猜测、假设或观点本身都不能构成理论。一种理论的形成往往需要多轮“假设—经验数据—理性认识”的研究活动。科学的理论(即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理论)还需要经过社会实践或经验数据的反复检验。

根据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范围可以将理论分为三种:宏大理论(grand theory)、中间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和具体理论(substantive theory)[55]。宏大理论是解释重大社会或自然现象的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理论是关于某个领域中的具体现象的理论,例如文献检索过程中查全率与查准率关系的理论;而中间理论是介于宏大理论和具体理论之间的、试图解释较大的社会或自然现象的理论,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

有些理论不仅本身提供着对特定现象的解释，而且还能指导对其他现象的观察和解释，这样的理论经常被一个甚至多个学科的研究者用作理论视角或研究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theoretical perspective），并被应用它的学科领域称作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对应用它的学科领域具有多方面的指导作用，其基本作用包括：

（1）提供概念体系。即帮助一个学科形成专业术语，并赋予这些术语以确定的含义。

（2）提供研究框架。即帮助研究者确定哪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哪些经验数据是应该收集的，哪些因素之间存在着关联以及这些关联的性质等。

（3）提供研究视角。即帮助研究者对研究问题形成透视焦点，发现现象背后的实质。例如，对于观察到的同一组现象，女权主义理论会让研究者聚焦其中反映的性别关系，而政治经济学则会让研究者聚焦其中反映的阶级关系。

（4）维系本学科与整个知识体系的联系。理论基础可以将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置于同一根基之上，避免学科陷入学术孤立。例如女权主义理论可以将图书馆领域中的性别关系研究与文学评论中的性别关系研究关联起来，使这两个领域不仅可以彼此借鉴，还可以共同为女权主义理论体系提供新的见解。

由于理论基础对研究工作的上述指导作用，不同的理论基础往往形成不同的研究风格、研究课题、概念体系和新的理论，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例如，在文学评论领域，由于理论基础的不同，就存在传统学术流派（如历史性研究）、文本分析流派、社会文化流派、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流派等[56]。

二、寻求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图书馆学对学科理论基础的自觉寻求始于芝加哥大学所倡导的图书馆学科学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学科的科学化进程几乎必然伴随着对理论基础的寻求。因为研究者一旦开始对研究现象进行科学、系统的观察，他们就需要某种理论为之提供概念体系、研究框架和研究视角，他们也必然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通过某种理论的纽带成为人类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就引导他们自觉寻求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基础。

最早对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进行系统阐述的是巴特勒。巴特勒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专门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但是在他看来，图书馆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图书馆学自然应该到社会科学领域寻求理论视角。他所建议的研究视角是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的综合视角。在巴特勒之后，谢拉给予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以更高的关注。在谢拉的时代，情报学正在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谢拉十分关注这门新学科的发展，曾希望它能为图书馆学提供理论基础，但是，情报学的发展却令他失望，他发现情报学事

实上提供的只能是一种偏重技术的狭隘视角[57]。在关注情报学的同时，谢拉还提出了以社会认识论作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设想，他提出的社会认识论是研究社会及其知识体系之间交互作用的学问，是对传统认识论的补充。遗憾的是，谢拉本人并没有对他提出的社会认识论做深入研究，后来在哲学领域出现的社会认识论虽然承认了谢拉对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却未能沿着谢拉的思路去指导图书馆学研究（详见下节）。80 年代初，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rooks）提出以英国哲学家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哲学思想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波普尔认为存在三个世界，世界 1 指客观的物理世界，世界 2 指主观的精神世界，世界 3 指客观的精神世界（如图书馆组织整理的知识）。布鲁克斯认为，波普尔的理论可以指导我们把世界 2 和世界 3 的关系确定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58~60]。在布鲁克斯论文发表 20 多年后，“三个世界理论”在图书馆学的应用依旧寂然寥落。

20 世纪 80 年代，在我国图书馆学开始广泛吸收西方学说的时候，上述诸家观点被介绍进来，并很快激发了我国图书馆学界寻求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大讨论。如上节所述，在这些讨论中虽然产生了诸如“情报交流论”、“知识交流论”等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然而大多数研究都把理论基础的构建本身当成了最终目的，很少有人把这些理论真正作为基础、视角或框架去指导新的研究，致使这些理论失去了作为理论基础的意义，有些甚至是自生自灭了。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尽管这些刻意寻求的、专门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未能产生如期的影响，但是很多其他理论体系，如政治经济学、女权主义理论、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却在图书馆学领域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这些理论虽然很少被正式冠以“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称号，却指导了一大批图书馆学研究。例如，美国学者麦克尔·哈里就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修正了以往图书馆学界关于早期公共图书馆运动的解释[61]；罗玛·哈里斯（Roma Harris）从女权主义理论的角度解释了图书馆职业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困惑和艰难[62]；英国学者布莱克（Black）则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解释了英国社区图书馆事业的兴衰原因[63]；更有很多学者试图从认知学的角度探索情报检索系统的合理设计。这些不同理论体系在图书馆学的应用可能说明，由于图书馆职业活动具有多重属性，如社会属性、认知属性、技术属性，同时由于图书馆学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因而，并不存在适用于该领域的惟一的理论基础，而是可以有多个理论基础，以指导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图书馆活动进行研究。这样一来，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探索似乎又回到了巴特勒的综合性理论基础的建议，只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比巴特勒提出的更丰富、更多样化罢了。

三、几种主要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1. 社会认识论

“社会认识论”是谢拉和他的助手发明的一个术语,也是他们构想的、当时并不存在的理论体系。根据谢拉的构想,社会认识论的主要目标是解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认知”过程,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如何认识其外部环境,如何理解作用于它的各种作用力(stimuli),如何获得和积累知识,如何协调、整序和利用它的知识等。在谢拉看来,社会认识论与传统认识论一样,是关于知识的知识,它应该成为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认识论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弥补传统认识论只注重个体认识过程,而忽略社会作为整体的认识过程的局限。由于它关注社会作为整体的“认识”过程,社会认识论与图书馆学密不可分——它可以为图书馆学提供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则为它增加有关知识积累、组织、传播的新见解[64]。

可以看出,谢拉本人对社会认识论的设想是非常笼统而模糊的。社会显然不能像个人一样“认知”,但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的“认知”是什么含义,谢拉并没有阐明。他本人也没有根据最初的构思继续发展社会认识论的理论体系。因而,在谢拉提出“社会认识论”概念之后的很多年里,它始终都是一个空壳。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知识在社会中作用的增强,社会认识论逐渐吸引了一批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如富勒(Steve Fuller),戈德曼(Alvin I. Goldman)等。与谢拉一样,这批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相信,对社会认识论的理解,会有助于我们对各类知识及信息机构(如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图书馆与大众传播机构等)的组织。他们对谢拉提出的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促成了专门学术性刊物《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的问世。然而,或许由于学科的差距,这个在哲学领域发展起来的“社会认识论”版本似乎并没有受到图书馆学领域的很多关注,更没有像谢拉希望的那样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2. 知识交流论

知识交流论是我国学者宓浩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专门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提出的。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关于知识交流的基本原理;第二层是关于知识交流过程与社会的交流机构之间关系的理论;第三层是关于图书馆实现知识交流的内在机制和工作机理。如此构建的理论体系把读者看成“是交流作用的对象,藏书是一种交流的媒介,图书馆员是交流的组织者和中介者,图书馆内部的处理工作则可以理解为以交流为目的的知识整序过程”[65]。把知识交流论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的初衷,是为了从图书馆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构建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

正如黄纯元博士在评价知识交流论的历史意义时所提出的,知识交流论作者的本意是要在宏观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图书馆学之间建立一个界面,这个界面的作

用不仅在于它比宏观的社会科学理论更接近图书馆学，而且在于它吸收了分散在各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中的理论，它的作者希望它能成为有关知识交流的较为完整系统的理论。

知识交流论没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产生影响，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作者自己似乎并不清楚这个"界面"的合适深度——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结束，而是在其中包含了从认识论（第一层次，如知识的概念及生产等问题）到具体的图书馆工作方法（第三层次）的繁杂内容，这就难免削弱这一理论的系统性和一致性，削弱它作为理论基础的指导作用。第二，与西方图书馆学寻求理论基础时的背景不同，我国图书馆学对理论基础的关注并没有伴随图书馆学研究活动的科学化，相反却伴随着我们对巴特勒所倡导的"理论"的误解。这一方面使理论基础的寻求成了最终目的本身，另一方面也使理论基础失去了指导研究这一基本的用武之地，产生于这种学术背景下的理论基础不可避免地成为架空了的象牙塔。第三，知识交流论的思想来源，如英国肯普（Kemp）关于知识本质的思想，美国谢拉关于图书馆的交流功用的思想，都建立在一组相互关联的、带有西方"现代性"特征的假定之上，如假定文献是一种客观、真实、有效的交流媒介，假定知识的接受者如同申农通讯模型中信号的接受者一样被动[66]。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些假定日益受到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质疑，著名法国哲学家福柯就是这些假定的彻底的批判者。随着这些假定被质疑，建立在它们之上的理论的有效性也必然受到质疑。虽然宓浩提出的知识交流论在我国未曾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直接冲击，但是，它的思想来源在西方世界受到的冲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它带来了釜底抽薪的负面影响。

3. 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

信息政治经济学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方法分析信息生产、交换、使用过程中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理论体系，是20世纪后半叶随着信息资源之政治经济意义的增强而出现的批判性理论（critical theory）。英国学者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67]在评述信息政治经济学研究时指出，信息政治经济学视角有三个突出特点：①在社会结构关系中研究信息过程，认为所有的信息现象都体现着已经建立的社会生产关系；②从社会经济体系的整体出发来研究信息过程，认为信息产业已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一全局趋势必然决定具体的信息政策的制定；③强调当前社会发展的历史延续性，认为信息作用的增强并未改变社会的基本关系，所谓的"信息社会"并不构成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使信息政治经济学比其他理论更加关注信息生产和利用过程中的阶级关系和信息平等问题，关注市场机制对作为公共财富的知识和信息的侵蚀、关注政府以及社会的强势阶层通过信息流通而实施的社会控制，关注全球范围内日益拉大的信息鸿沟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害，关注信息帝国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侵蚀。

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信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剖析信息领域体现的社会关系,较少涉及具体的发展途径,因此很容易给人一种“只批判,不建设”的感觉[68]。另外,他们的分析往往聚焦于私营部门(特别是跨国公司)对知识及信息资源的不可抵御的控制力,很容易导致另外一种意义的“图书馆消亡论”——市场机制和私人利益将毁灭作为公共财富的图书馆。著名信息政治经济学学者席勒(Herbert Schiller)[69]对美国图书馆事业现状的分析就渗透着这种意义的“消亡论”。他认为,私人资本为了扩大市场,必然积极倡导信息的商品化进程,他们一方面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政府政策,另一方面资助保守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媒体机构,为信息的商品化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支持。席勒还以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为例,显示了私人资本、政府、保守的研究和媒体机构在图书馆发展问题上的立场趋同,并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社会分工的图书馆职业的存在正在被质疑。运用新技术谋求利润的做法正在瓦解着美国图书馆职业的基石——信息自由存取原则”[70]。显然,根据他的分析,图书馆似乎已经失去了发展的空间。

尽管信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图书馆学和社会学领域都不乏批评者,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已有很多学者运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图书馆领域的问题。70年代的哈里斯据此分析了早期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认为美国早期公共图书馆是上层社会为了维护已经建立的社会秩序,对弱势阶层(如移民)实施思想控制而建立的[71]。这种解释对70年代的美国图书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威甘德(Wiegand)认为,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美国图书馆学事实上分成了哈里斯派和反哈里斯派[72]。80年代以来席勒、韦伯斯特等人又运用这种理论不断剖析西方国家信息资源的私有化对图书馆发展带来的影响,使信息政治经济学成为图书馆学领域一种有力的批判性理论基础。

4. 女权主义理论

关于“女权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运动”等概念,即使在女权主义者内部也不存在统一的认识。但是,女权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它把性别关系看成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把两性的不平等看成社会的基本的不平等,认为两性的不平等与阶级之间、种族之间、文化之间的不平等一样应该予以消除。

由于传统上图书馆职业一直被视为女性占多数的职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理论在西方图书馆学中逐渐得到重视。哈里斯(Roma Harris)[73]、雷德福(Marie Radford)[74]、科什雷克(Kerslake)[75,76]都堪称女权主义图书馆学者。哈里斯认为,图书馆职业过去和今天存在的问题都与它的性别特色(女性占多数)相关。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即使图书馆职业拥有现代专业化职业的一切特征(如专业化的知识体系、一定规模的协会、规范的职业道德等),它也不可能

获得与男性职业（如医生、律师等）同样的地位和薪酬。这就是说，图书馆职业的很多问题事实上是涉及两性关系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而非专业问题。忽略这一点，可能会使解决职业问题的很多努力矢不中的[77]。

第四节　图书馆学方法论

一、科学研究与方法论

科学研究（research）就是采用科学方法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的活动。在西方，17 世纪以前，科学研究活动统称为哲学研究，有关物理世界的研究称为自然哲学，有关人类社会的研究称为道德哲学。当时的自然哲学被认为是人类知识的主要来源，自然哲学采用的逻辑分析和数学方法则被认为是惟一科学的研究方法。17 世纪以后，由于培根经验主义思想的影响，经验观察（如生物学研究）和实验方法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方法。19 世纪，经孔德实证哲学的发展，这种经验观察和实验方法也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且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都被认为是研究人类社会规律的惟一科学的方法。

20 世纪 60～80 年代，社会科学领域开展了对定量方法的反思。这场反思的结果使定量方法的影响大为削弱。由此形成的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新共识认为：所谓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指：研究设计、研究程序的适用性、规范性；研究证据的经验性、充分性、真实性；结论的可靠性、真实性和客观性等[77,78]。凡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方法，包括定性方法，都可以被认为是科学的方法，定量方法不再是惟一科学的方法。

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是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科学化的重要日程。其主要目标是反对图书馆职业队伍中实用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学术传统，希望树立起以科学方法为支柱的科学研究之风。在此后的岁月里，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也经历了从实证研究为主到多元化的发展。这个历程已经使图书馆学在方法论方面日益成熟，正如哈里斯在 80 年代末所评论的，图书馆学的科学化过程不仅使图书馆学真正告别了以发表主观见解为主的研究方式，而且使它可以无愧地立于社会科学之林[79]。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

1. 定量方法

定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也叫实证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它指采用统计分析来验证理论假设的方法。例如，假定一项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影响大学教师使用全文数据库频率的因素，研究者可以根据已有的相关理论（如有关新技术普及规律的理论）提出有关数据库使用率分别与教师年龄、计算机技能、学科等因素关系的假设，然后通过问卷或其他形式收集有关上述因素的数据，再利用合适的统

计程序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假设,最后根据验证结果补充或修正已有理论。这样的研究设计就是一份比较典型的定量研究设计。

定量方法的研究过程,即假设的验证过程,通常包括以下步骤:①根据已有理论确定假设;②确定变量;③用特定方法测度变量,收集数据;④按特定统计程序分析数据;⑤根据分析结果接受或否定假设,从而决定已有理论表达的一般原理是否成立[80]。所以,一项典型的定量研究项目一般要涉及下列要素:

(1) 已有理论。用来作为研究框架、指导假设的形成和变量的选择的概念、原理等。

(2) 变量。根据已有理论确定的研究对象的可测度特征或属性,如用户每周从全文数据库下载论文的篇幅。社会科学所涉及的变量有四种测度方法(或称四个测度等级):定比尺度(ratio,如对身高、体重的测度),定距尺度(interval,如对温度的测度),定序尺度(ordinal,如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定类尺度(categorical,如男、女)。问卷是社会科学领域最经常采用的变量测度工具。

(3) 假设。根据已有理论形成的关于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

(4) 数据。通过观察或实验对假设所涉及的变量进行系统测度的结果。

(5) 统计方法。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描述性统计(如表示频率、差异、分布的统计);另一类是推理统计(如T检验,回归统计等)。前者用数字描述研究对象的特征和分布,后者则根据概率论原理检验假设是否成立。

定量方法的基本哲学基础就是实证主义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为外部世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研究者可以站在研究对象之外,以超越研究者自身价值标准的眼光独立地、客观地观察它、描述它(关于实证主义认识论,详见下章)。

2. 定性方法

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是把研究对象置于全方位的自然情景中探索其特征、属性和彼此关系的方法。与定量方法不同,定性方法不是用统计的结果来验证事物的性质或关系,而是用文字力求真实地描述事物的本来面目,再现事物所处的背景,从而再现事物的特征或属性及其形成原因。为了尽可能真实地建构研究对象所处的情景,定性方法通常需要在自然环境下采访研究对象的观点或观察其行为,然后加以详细分析、报道[81],所以定性方法常以访谈记录、实地观察记录作为研究数据。一项探讨同性恋者阅读行为的研究就更适合采用定性方法,因为定量方法很难真实地测度出这些读者对自己性别倾向的困惑,对社会压力的畏惧。

定性方法的哲学基础认为社会现象无法被客观地观察,研究者也无法独立于被研究的对象之外,而是不可避免地要在研究中融入自己的价值标准及感受。美国学者克里斯韦尔(Creswell)将这两大方法的对比总结为表5.2[82]。

表 5.2　定量与定性方法比较

哲学观点/特征	定量方法	定性方法
哲学基础特征	现实是客观的、一元的，独立于研究主体	现实是研究对象观察到的、是主观的、多元的
	研究者独立于研究对象；客观、中立、公正、没有偏见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相互作用；带有价值取向和偏见
方法论特征	演绎	归纳
	确定因果关系	确定彼此影响的因素
	固化型研究设计——类别（变量）定于研究过程之前	显现型研究设计——类别形成于研究过程之中
	不依赖背景分析	依赖背景分析
	结论可以从样本概括到总体，形成预见、解释和理解	形成模式、理论来增进理解
	通过有效性和可靠性检测确保准确性	通过数据的核对、验证确保准确性

尽管社会科学的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但通过 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的方法论大讨论，很多学者都认为定量和定性方法可以相互补充。一般认为，在一个开创性的领域（即还不存在可资利用的理论框架的领域），定性方法可能运用得较多，而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域，定量方法可能运用得较多。一些大型的研究课题也经常同时采用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

三、几种常用的图书馆学定量研究方法

1. 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法就是从研究对象的人群总体中按一定的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对样本的属性、特征、态度等进行调查分析，并将样本的属性、特征、态度概括为人群总体的一般属性、特征、态度的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法的一般程序包括：确定假设和变量、选取样本、设计数据收集工具（最常用的就是问卷）、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这种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的应用很广。用户需求研究、用户行为特征研究、用户对图书馆工作的评价研究、馆员培训需求研究等都是社会调查法的适用领域。美国学者利布舍尔（Liebscher）等对大学教师利用互联网资源的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就是采用社会调查法的范例[83]。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互联网正在成为高等教育机构教学科研的重要资源，推广其利用无疑会对教学和科研产生良好影响，但是，要推广其利用，必须首先了解哪些因素促进其利用，哪些因素阻碍其利用。为此，利布舍尔等人设计了一项以社会调查法为基本方法的课题，旨在验证用户的个人因素（如专业领域、计算机熟练程度）和环境因素（如所在单位设施状况）

与互联网使用情况之间的关系。作者从美国数所大学的教学科研人员中选择了调研样本，又通过问卷收集了有关这些人员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和互联网使用情况的数据，最后，作者通过数理统计确定了上述各因素与互联网利用率及利用模式的关系。

2. 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就是在实验室或现场，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分组并给予各组不同处理(treatment)来确定变量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实验研究的一般过程包括：确定假设和变量，设计实验过程和实验条件，随机分组，对各组实施不同处理(treatment)，观察和记录实验结果，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解释实验结果，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得出结论。

实验方法也是图书馆学领域经常采用的定量方法。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与评价、情报检索过程中的认知特性研究、用户培训方法研究、图书馆管理方法研究等都是实验方法的适用领域。例如，20 世纪 70 到 80 年代，为了探索阅读促进活动的有效组织方法，美国学者戈德尔(Goldhor)曾对公共图书馆的图书宣传活动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84,85]。在其中的一项研究中，戈德尔希望通过实验前测试(Pre-Test)和实验后测试(Post-Test)相结合的方法来检验"展示书架"和"推荐书目"在促进阅读方面的效果。他把按照同样标准选择的图书随机分成三组，在实验前测试阶段(持续三个月)，这三组书与其他书一起排列，未接受任何特殊处理。在实验后测试阶段(持续六个月)，第一组图书依然与其他书一起排列，未接受处理(在实验研究中，未接受处理的小组通常被称为控制组)；第二组图书则被分出来单独排架，书架上标有"不能错过的好书"标志(在实验研究中，这种接受处理的小组通常称为实验组)；第三组也与其他书一起排列，但在后测试实验阶段，图书馆散发了有关他们的推荐书单。实验结果发现，在前测试实验阶段，三组图书馆的流通率基本相同，而在后测试实验阶段，第一组图书的流通率基本保持不变，第二组图书增长了 7 倍，第三组图书增长了 4 倍。戈德尔根据卡方(Chi-Square)统计分析的结果，将这一差别确定为统计显著(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并由此得出了"图书展示"和"推荐书目"都能显著提高图书利用率的结论。

3. 文献计量方法

这是用统计方法对一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以期揭示一个领域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文献著述、出版和利用模式的研究方法[86]。主要包括引文分析，文献离散率统计，文献增长规律统计，文献老化规律统计，个人作者和机构的科研生产率统计，著作方式和作者数量统计等。文献计量方法的使用程序一般包括：确定假设和变量(如引文语种变量、引文数量变量等)，从特定范围的出版物中选取样本，收集

数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文献计量方法的经典性应用见于20世纪30到40年代的文献学家(如布拉德福等)的研究。它在我国的图书馆学文献中也很常见。

4. 用户——系统交互记录分析(transaction log analysis)

这是一种运用特定软件详细记录用户与计算机系统的整个交互过程,并对记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期揭示系统使用情况或用户行为特征的研究方法。这种分析方法的一般过程包括:确定假设和变量,选择人机交互过程的记录软件,对抓取的人机交互记录进行编码(coding);对编码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近年来,随着网络资源的增长,很多网站或系统都安装了类似的记录软件,积累了大量详尽的人机交互记录。由于这些记录是在用户不知觉的状态下形成的,因而是用户行为的较为客观的记录,对于研究用户的行为特征具有宝贵价值。

英国电子图书馆项目课题"SuperJournal"对学术电子期刊用户行为的研究就是应用这一方法的例证。SuperJournal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电子图书馆项目的大型课题之一,研究网络环境下学术电子期刊系统的功能设计、传递模式和用户行为。电子期刊利用模式研究是SuperJournal的重要子课题,其目的是了解用户使用电子期刊的行为特征。课题组根据已有的用户行为理论提出了关于用户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若干假设,如用户所感受到的系统的相关性、全面性、图书馆和计算机中心的技术支持等因素将影响他们使用系统的频率、深度和广度。为了验证这些假设和完成其他研究目的,SuperJournal课题组向13家英国大学图书馆的用户提供了由49种学术期刊构成的电子期刊数据库,记录了3000多用户在三年时间内使用该数据库的详细情况,并对这些记录按事先确定的变量(如登录次数、浏览目次的次数、阅读全文文献的次数等)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的一项分析采用Cluster统计程序验证了用户行为模式的多样性,对用户行为模式进行了归类,又根据课题组收集的其他数据(问卷和访谈数据)确定了导致这些模式的主要因素,建立了用户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87]。

四、几种常用的图书馆学定性研究方法

1. 个案调研

这是对少量(一个或几个)个人、集团、机构等研究对象做深入的观察调研,确定研究对象的属性,揭示其属性或特征之间关系的研究[88]。个案研究的最大优点就是它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如访谈、实地考察、问卷调研、文献分析等),在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情景下,收集到有关研究对象的综合信息,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全面的、细致的认识。其研究结果可以直接用于被调研的对象,也可以作为寻求同类对象一般规律的起点。在图书馆学领域,个案调研经常被用于图书馆管理问题、用户行为等的研究。

2. 历史研究

对历史资料进行收集、评价、分析和解释，从而描述和理解过去的人类经验的方法[89]。历史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需要对历史资料（如档案）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核实、考证，在确认数据可靠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对数据加以选择、整理、分析，做出结论。历史方法是研究图书馆史的基本方法[90]。

近年来，采用历史方法进行的最有影响的研究当属英国学者布莱克（Alistar Black）对英国公共图书馆发展问题的研究[91~93]。在对 1850～1914 年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史的研究中，布莱克不仅收集了这段时间出现的大量公共图书馆著述、法令、政策性文件、图书馆报告、图书馆统计资料，而且收集了有关这段时间的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状况的大量证据。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他发现，从 1850 年到 1914 年，有两大不同的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功利主义思想和理想主义思想，前者视公共图书馆为变革的、科学的和物质性的力量，后者视公共图书馆为学术、智慧和美的象征。功利主义思想更多地引导了早期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理想主义更多地引导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布莱克还探讨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英国社区图书馆事业（community librarianship）在传统和后现代文化的冲突中产生、兴旺、衰落的过程。

3. 理论衍生法

理论衍生法（grounded theory）是一种以生成理论为目的的研究方法，其基本过程是：首先对研究现象进行细致的观察、访谈、描述；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编码和主题归类；对研究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观察、访谈、描述；将新收集的数据与已经得出的主题类别进行对比；根据新数据调整主题类目和类目间的关系；继续收集数据并根据新数据继续调整已有的主题类目，直到比较稳定的类别体系或理论完全“浮出水面”[94]。

于良芝等关于英国公共图书馆用户阅读兴趣的研究就是运用理论衍生法的一个例证。在这项研究中，作者采用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访谈的方法在两个中型公共图书馆中收集了比较详细的用户行为数据。这些数据涉及用户查询消遣性图书的途径、手段、图书的选择标准、阅读方法等。当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者开始根据已有数据对用户兴趣进行编码、归类，同时不断地将结果与新收集的数据进行对比，根据对比结果删除不再经常出现的类目，合并相近的类目，增添新的类目。经过若干轮对比调整，作者最后将公共图书馆用户的消遣性阅读兴趣分为七类，分别总结了他们各自的特征[95]。

4. 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就是通过对谈话或文献中的语篇(discourse,即由若干句子构成的语言单位)进行分析,剖析一个领域话语体系的形式、结构和规则,透视这种形式、结构和规则背后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及权势关系等的方法[96]。

话语分析是近年来得到较广泛应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它的哲学基础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特别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思想。根据后现代主义思想,我们对外部事物的反映是以话语体系为工具的,话语体系是反映物,研究对象是被反映物。作为反映物,话语体系先于研究对象,即被反映物而存在。例如,称东南亚为远东的话语体系在一个作者把东南亚地区确定为研究对象之前就已经存在。话语体系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作者用已经存在的话语体系来表述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这种认识就必然带有话语体系所体现的社会制度和权势关系的深刻烙印,体现着社会的权势关系。但与此同时,对一种话语体系的运用又反过来强化着它所体现的社会制度和权势关系,这种作用使话语体系本身就成为一种力量。例如,把东南亚地区称作"远东"是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殖民主义制度的产物,而对它的利用又强化着这种制度的影响。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看来,话语体系与社会制度及权势关系的上述联系,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通过话语分析透视社会制度的特点,这就是话语分析被接受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依据。

这样的哲学基础同时也决定了话语分析法的基本特征。首先,话语分析是以语篇中的语言要素,如词汇、句子结构等为数据。其次,话语分析所要揭示的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而是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和权势关系,这是话语分析与文学评论的根本区别。再次,话语分析的样本必须是特定制度/机构背景下(institutionalized context)的话语,例如,用户和图书馆员在图书馆服务背景下的话语,男女在社会交往背景下的话语,学者在特定学术领域背景下的话语都可以成为话语分析的样本。

托米宁(Tuominen)对"用户中心论"著述的分析是这一研究方法的范例[97]。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反思"用户中心论"中隐含的制度因素和权势关系。作者以"用户中心论"的代表作品"Seeking Meaning: A Process Approach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98]为样本,以其中的语篇为分析单位,考察了"用户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对用户和图书馆员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映。研究发现,用户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事实上把用户视作无知的、不能确定自己需求的、甚至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感觉的情报外行人,把图书馆员视作能够解读用户思想的、能够驾驭情报查找过程的专家,作者认为,这样的话语体系恰恰在用户与图书馆员之间建构了一种不平等关系。

参 考 文 献

1 Machlup. Cited in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40

2 来新夏主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词典.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3 Vakkari P.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ntent and scope. In: Johan O. Erland Munch-Pedersen, and Wilson P, ed.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to Social Interaction,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9～232

4 Loriene R. Personality, tradition and library spirit: a brief history of librarian education. In: Loriene R, Brooke E S, 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Washington D C: Mansell, 1998

5 Butler P.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In: Richardson Jr J V. The gospel of scholarship: Pierce Butler and a critique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93.179

6 Butler P.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In: Richardson Jr. J V. The gospel of scholarship: Pierce Butler and a critique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93

7 Shera J.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Fritz Machlup and Mansfield U, ed.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ssages. New York: John Wiley, 1983: 379～389

8 Harris M H. The dialectic of defeat: antinomies in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Trends, 1986, 34: 515～534

9 Wiegand W A. 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What the past tells us about the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9, 69 (1): 1, 32

10 Warner J. W(h)ither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Quarterly, 2001, 71 (2): 243～252

11 Butler P.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In: Richardson Jr. J V. The gospel of scholarship: Pierce Butler and a critique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93.193

12 Clapp. Cited in Shera J H. Toward a theory of librarianship: papers in honor of Jesse Hauk Shera.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73

13 Karetzky, S. Reading research and librarianship: A history and analysis. Westport, Conn.: Greenweed Press, 1982

14 谢拉著,张沙丽译.图书馆学引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 59

15 Harris M H. The dialectic of defeat: antinomies in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Trends, 1986, 34: 515～534,518

16 克鲁普斯卡娅,引自 Rogers, A. Robert and McChesney, Kathryn. The library in society. Littleton,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84,21

17 彭斐章.文华图专和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图书馆,2001(2):2～6

18 黄纯元.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

19 威尔逊,引自孟广均等.信息资源管理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20 Raymond B. Paradigms in conflict. In: Apostle R and Raymond B. Librarianship and the information paradigm.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7. 1～36

21 Shera J.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Fritz Machlup and Mansfield U, ed.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ssages. New York: John Wiley,1983. 379～389

22 Lilley D B, Trice, R W. A histor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945～1985.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89

23 Vakkari P.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ntent and scope. In: Johan Olaisen, Erland Munch-Pedersen, and Patrick Wilson, ed.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to Social Interaction,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9～232

24 Kohen M.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Broad or narrow? In: Fritz Machlup and Mansfield U, ed.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ssages. New York: John Wiley, 1983. 371～377

25 Giddens A. Cited in Harris M H. The dialectic of defeat: antinomies in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Trends, 1986, 34: 515～534

26 Harris M H. The dialectic of defeat: antinomies in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Trends, 1986, 34: 515～534

27 Wilson T. D, Recent trends in user studies: action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Information Research, 2000, 5(3). http://informationr.net/ir/5-3/paper76.html

28 兰卡斯特,F.W 著,郑登理 陈珍成 译.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8.

29 Dalrymple P W. A quarter century of user-centered study: The impact of Zweizig and Dervin on LIS research.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01, (23): 155～165

30 Wiegand W A. 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What the past tells us about the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9, 69 (1): 1

31 Harris M. The Purpose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a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ibrary Journal, 1973,2513 (Sept 15): 2

32 Wiegand W A. 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What the past tells us about the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9, 69 (1): 1

33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8

34 Wilson T, Walsh C. Information behaviour: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British Library.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Report, (10) 1996, 62

35 Wilson T. D. Models in inform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1999, 55(3): 249～270

36 徐引篪,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37 周文峻.文献交流引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38 宓浩等.图书馆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39 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40 周文俊,引自徐引篪,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22

41 宓浩等.图书馆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42 Butler P.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In: Richardson Jr. J V. The gospel of scholarship: Pierce Butler and a critique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93,87

43 Warner J. W(h)ither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Quarterly, 2001, 71 (2): 243～252

44 Arms W Y. Digital librar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45 Raymond B. Paradigms in conflict. In: Apostle R and Raymond B. Librarianship and the information paradigm.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7. 1～36

46 Raymond B. Paradigms in conflict. In: Apostle R and Raymond B. Librarianship and the information paradigm.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7. 1～36

47 Sarasavic. Cited in Vakkari P.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ntent and scope. In: Johan Olaisen, Erland Munch-Pedersen, and Wilson P. ed.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to Social Interaction.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9～232

48 Vakkari P.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ntent and scope. In Johan Olaisen, Erland Munch-Pedersen, and Wilson P, ed.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to Social Interaction,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9～232

49 沃野.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学术研究,1998(7):32～37

50 Dick, A L. Epistemological positions an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Quarterly, 1999, 69 (3): 305～323

51 Arms W Y. Digital librar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52 Vakkari, P.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ntent and scope. In: Johan Olaisen, Erland Munch-Pedersen, and Wilson P, ed.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to Social Interaction,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9～232

53 Kessler J. Internet digital libraries: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Boston: Artech House, 1996

54 徐引篪,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55 Cresewell J W.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4

56 Meadows, A J. Communicating research.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1998

57 Shera J.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Fritz Machlup, Mansfield U, ed.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ssages. New York: John Wiley,1983:379～389

58 Brooks B C. The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Part 1.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1980,2: 125～133

59 Brooks B C. The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Part 2.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1980,2: 209～221

60 Brooks B C. The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Part 3.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1980,2: 269～275

61 Harris M. The Purpose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a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ibrary Journal, 1973,2513 (Sept 15): 2

62 Harris R M. Librarianship: the erosion of a woman's profession. Norwood, N.J.: Ablex Pub. Corp., 1992

63 Black A, Muddiman D.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librarianship: the public library in post-modern Britain, Aldershot, Hants. Brookfield, Vt.,England: Avebury, 1997

64 Shera J. Social Epistemology, General Semantics, and Librarianship.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1961, 35 (June): 767～770

65 黄纯元.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172

66 黄纯元.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

67 Webster, F.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7

68 Webster, F.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7

69 Schiller H, Schiller A. Libraries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erce. In: Mosco V, Wasko J,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146～166

70 Schiller H, Schiller A. Libraries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erce. In: Mosco V, Wasko J,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146～166, 164

71 Harris M. The Purpose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A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ibrary Journal, 1973,2513 (Sept 15): 2

72 Wiegand W A. 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What the past tells us about the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9, 69 (1): 1, 32

73 Harris R M. Librarianship: the erosion of a woman's profession. Norwood, N.J.: Ablex Pub. Corp., 1992

74 Radford M L, Radford G P. Power, knowledge and fear: feminism, foucault and the stereoptype of the female librarian.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7, 67 (3): 250～266

75 Kerslake E. Constructing Women in Library History: Reponding to Julia Taylor's "Left on the Shelf?" Libraries & Culture, 1999, 34(1): 52～63

76 Kerslake E, Liladhar J. Angry sentinels and businesslike women: identity and marital status in 1950s English career novels. Library History, 2001, 17(2): 83～90

77 沃野.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学术研究,1998(7):32～37

78 Cresewell J W.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4

79 Harris M H.. The dialectic of defeat: antinomies in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Trends, 1986, 34: 515～534

80 Cresewell J W.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4.1

81 Cresewell J W.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4

82 Cresewell J W.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4.5

83 Liebscher P, Abels E G, Denman D W. Factors that Influence Use of Electronic Networks b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culty at Small Institutions. Part II. Preliminary Use Indicato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7, 48(6): 496～507

84 Goldhor H. The effect of primary display location on public library circulation of selected adult titles.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75, 42: 371～389

85 Goldhor H. Experimental effects on the choice of books borrowed by public library adult patrons.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81,51: 253～268

86 Young H. The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hicago: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3

87 Eason, K; Richardson, S.; and Yu, L. Patterns of use of electronic journal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0, 56(5): 477～504

88 Powell R R. Recent trends in research: a methodological essay.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99, 21(1): 91～199

89 Powell R R. Recent trends in research: a methodological essay.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99, 21(1): 91～199

90 布沙·哈特著,吴彭鹏译.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技术与阐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91 Black A. A new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ublic library: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s, 1850～1914. London,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92 Black A. The public library in Britain, 1914～2000. London: British Library, 2001

93 McNally P F. Book Review of "A New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ublic Library: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s, 1850－1914",Libraries & Culture, 1998, 33(3): 323～324

94 Cresewell J W.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4

95 Yu Liangzhi and O'Brien, Ann. Towards a practical typology of adult fiction borrrower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999,25(1):35～50

96 Powell R R. Recent trends in research: a methodological essay.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99, 21(1): 91～199

97 Tuominen K. User-centered discourse: an analysis of the subject positions of the user and the librarian. Library Quarterly,1997. 67: 350～371

98 Kuhlthau C C. Seeking Meaning: a Process Approach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Norwood, NJ: Ablex., 1994

第六章　图书馆职业哲学

第一节　图书馆职业哲学概述

一、图书馆哲学的含义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人们对于整个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问题的认识。用一定的哲学观点来解释各学科领域的根本问题就形成了各领域的哲学基础，由此产生教育哲学、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等。例如，教育哲学就是用一定的哲学观点来解释教育的本质、目的、价值、方法等根本问题的学问[1]。

同样，图书馆职业哲学（也称图书馆哲学）讨论图书馆职业的根本问题，如图书馆的性质、图书馆职业的使命、图书馆职业对知识及真理的态度、图书馆职业的价值观等。与图书馆学的具体理论（如“标引的网罗度能提高检索过程的查全率，但有可能降低查准率”）相比，图书馆哲学具有以下特征：①与其他专业领域的哲学思想一样，图书馆哲学对职业根本问题的回答通常不是基于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而是基于一般哲学提供的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观，体现着一般哲学思想在图书馆职业的应用。例如，无论是谢拉关于图书馆职业使命的观点——连接人类知识记录和它的需求者[2]，还是布罗德菲尔德（Broadfield）关于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观点——思想的自由是个人最基本的权利[3]，都不是按照科学研究方法，观察、验证的结果，而是源于他们各自所持的基本的世界观。因而，不同的图书馆哲学思想背后，一般都有更广泛、更基本的哲学思想为基础。②由此形成的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活动的实质以及图书馆职业基本原则的表述。这种表述经常采取描述式（descriptive）、处方式（prescriptive）、规范式（normative）的修辞，例如，“图书馆所传递的知识和信息是社会的公共财富”[4]，“图书馆员在工作中应该保持绝对的中立”[5]；“书是为了用，书是为所有人用的”[6]。在这种看似绝对的陈述背后，是表述者对图书馆职业使命和价值的明确认识。这种认识是与陈述者的一般世界观相一致的。体现在这些陈述中的自信、明确、统一正是来源于陈述者对自身的世界观的坚定信念。③作为一般世界观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图书馆哲学思想无法像科学理论那样被经验数据所验证。再以上文提到的谢拉和布罗德菲尔德的图书馆哲学思想为例，经验研究无法验证它们当中哪一种更正确。或许有人会提出，尽管这些哲学观点不易被具体的经验数据所验证，但是历史的长河将裁决出哪一种观点更有益于社会。但是，是否有益于社会的判断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这种判断依然取决于判断者对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等概念的理解，即取决于判断者的世

界观。④图书馆哲学与其所处社会的观念与信仰密切相关，反映着这个社会整体的世界观。因而，图书馆哲学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中立的，不同社会中的图书馆员对特定图书馆哲学思想的接受与摒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本身的世界观与这种思想的亲和程度。这些特征使图书馆哲学区别于一般的、具体的图书馆学理论和技术，而成为图书馆职业知识体系中较特殊的组成部分。

二、图书馆哲学的构成

根据图书馆职业根本问题的性质，美国学者尼蒂奇(Nitecki)将图书馆哲学分为三大部分：形而上学(metaphysics)、认识论(epistemology)和伦理(ethics)[7]。图书馆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是指对图书馆和图书馆职业的性质、使命、目标、价值的认识，这是图书馆职业队伍依据他们对个人的属性(如善恶性、可教化性)、社会的属性(如秩序、民主等)的认识，以及他们对真理、知识、文献之于个人和社会的作用的认识而形成的关于图书馆职业使命和价值的思想体系。在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概念常用来指对感官不能达到的事物的研究。在这里，尼蒂奇显然沿用了这一含义，认为图书馆的使命等问题是感官无法观察，因而也是经验研究无法验证的。

图书馆哲学中的认识论是图书馆职业队伍对于一般哲学的认识论立场所做出的响应和选择。作为一般哲学组成部分的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活动的本质及发展过程的学说。自古以来，不同的学说在知识的性质、来源、标准、构成、发展过程、知识与客观存在及认识主体的关系等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对立、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对立就是认识论领域存在的根本性分歧。可知论承认认识主体可以认识外部世界，而不可知论否认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性。唯物论承认外部世界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Reality)，承认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唯心论则否认物质世界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否认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古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生关于认识的来源的分歧就是上述根本分歧的一种体现。柏拉图认为，我们看到的所有具体事物都不是真实的客观存在，而是真实的理念的"影子"或"摹本"。人的灵魂本已先验地知道具体事物所临摹的对象，即理念，所以认识就是灵魂对理念的回忆。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受老师的影响，他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但在认识的来源上，他否定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一般概念不能脱离个别的具体事物而存在，事物的一般特征就体现在个别的具体事物当中，所以认识是人们通过观察具体事物而对其一般特征做出的概括总结。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一些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所坚持的认识论之间的分歧也体现着认识论领域的根本分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认识的发展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

界的过程。但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认识不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特定文化、特定区域、特定团体所接受的共识。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在认识论领域里,始终存在着一些截然不同的立场,图书馆职业所认同的立场往往影响到他们对人类认识活动的结晶——信息、知识、文献的处理,因而图书馆职业对一般认识论的选择构成了图书馆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书馆职业伦理,或称图书馆职业道德,是图书馆职业将一般伦理学运用于图书馆职业实践而形成的,关于图书馆职业"是"、"非"、"善"、"恶"等根本问题的准则。一般伦理学就是关于道德问题的学说,它研究道德的起源和发展、人的行为准则、人与人之间关系、人对社会和国家等的义务等,简单地说,它讨论何以为善恶、何以为是非,以及善恶如何可能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8],是哲学的重要分支。历史上,关于何以为善恶,哲学家之间也存在很大分歧。例如,有些哲学家(孔子、康德等)认为无私利他的行为为善,有些(如费尔巴哈)认为为己利人的行为为善,有些(如尼采)则认为单纯利己的行为为善[9];有些认为决定行为善恶的是其动机,而有些则认为是效果。图书馆职业对于这些伦理学的运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图书馆员对知识、文献及用户的态度,如向用户提供的文献是否应该经过审查,用户的借阅记录是否可以公开,图书馆员是否应该对用户的文献选择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包括在阅读指导名义下进行的干预,如何对待主流文化产品和非主流文化产品等。因此,图书馆职业道德也构成图书馆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图书馆哲学的作用

图书馆哲学对于图书馆职业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首先,它可以指导图书馆员理解图书馆职业的使命,定义各类型图书馆的目标,从而帮助图书馆员从图书馆职业整体使命和最终目标的角度理解具体工作的意义,指导图书馆资源的战略性分配。例如,公共图书馆员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图书馆的教育目标与娱乐目标相对重要性的判断,这种判断必然影响他们对图书馆资源的分配和具体工作的开展。其次,对自身使命和目的的了解,可以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一个指南,使图书馆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不致迷失发展方向,也不致把手段当成目的。例如,在经费短缺的压力之下,明确的图书馆使命感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图书馆把创收当成目的。第三,图书馆哲学可以帮助图书馆职业向全社会,特别是图书馆的母体机构,陈述和宣传自身的价值,从而提高图书馆职业地位。根据美国学者巴里斯(Paris)的研究,不能向校方清楚有力地陈述自身的使命和价值,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数所图书馆学院停办的重要原因[10]。第四,图书馆哲学通过系统的职业道德,为图书馆职业队伍提供行为规范,从而保证图书馆职业的专业化水平。第五,图书馆哲学中的认识论,不仅奠定了图书馆知识组织整理的范式,而且决定着图书馆学经验研究的方法论,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图书馆用

户研究中大量的定性研究方法的应用就主要源于图书馆职业认识论的变化(第三节将对此做详细阐述)。

四、图书馆哲学的演化

在世界图书馆界,对图书馆哲学进行自觉探索的历史还很短,大约始于20世纪30年代。19世纪后半叶之前,图书馆工作一般由其他领域的学者兼任,除少数学者(如德国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茨和法国学者诺德)以外,这些学者很少自觉思考支撑他们工作的哲学基础。即使在现代图书馆职业形成以后,多数图书馆工作者也只满足于具体技术的操作,很少系统地考虑涉及图书馆发展的根本性问题[11]。直到20世纪30年代,图书馆职业才在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图书馆职业不断壮大的背景下开始自觉地思考职业的根本问题。美国学者尼蒂奇(Nitecki)在综述图书馆哲学时指出,对图书馆哲学的探索始于20世纪30年代图书馆学的科学化[12]。另一位美国学者罗杰斯(Rogers)对图书馆哲学的综述也大致从那时开始[13]。

但是,像图书馆这样重要的社会机构,不可能存在于哲学的真空。从古代苏美尔、古埃及以及古代中国开始,每个社会对这一机构的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图书馆建设者们的世界观烙印。这就意味着,即使在图书馆职业自觉地探询它的哲学基础之前,甚至在图书馆工作成为专业化的职业之前,就已经有了哲学思想与图书馆观念的结合。这种结合既体现在个别图书馆员对图书馆使命的定义上,也体现在他们对具体工作方法的选择上。与现代图书馆哲学不同的是,这些早期的思想大多是少数图书馆员零散的个人感想,而非图书馆职业自觉的系统表述。但是,这些早期的思想很多都被现代图书馆职业哲学所继承,成为现代图书馆职业寻求哲学基础的先导。

1. 19世纪之前(职业化之前)的图书馆哲学思想

关于图书馆使命与价值的思想在早期图书馆的建设中就有体现,而这种思想从一开始就与某种关于世界、人、知识的更基础的观念联在一起。例如,传说在人类最早的图书馆之一——埃及法老Ramses II的皇宫图书馆的门廊上,刻着“灵魂之医”(Healer Of The Soul)的字样,表明当时人们关于图书馆功能的认识与宗教理念有密切关系。公元前7世纪,当亚述国王阿舒尔巴尼拔建成尼尼微图书馆之时,他坚信,图书馆的使命不仅在于保存文书档案,而且要保管学术资料,以利研究和教育。

根据美国学者鲁宾(Rubin)的历史考察,在几千年世界文明史上,图书馆的使命曾一再被重新定义,宗教使命、学术研究使命、特权教育使命、大众教育使命相继出现(有时甚至是轮番登场)[14]。这个过程反映了图书馆的赞助者和建设者试图

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图书馆，并利用这一机构为自己的世界观服务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明代学者程俱和法国17世纪图书馆活动家诺德的观点值得特别介绍。

程俱为我国南宋时期的官吏学者，曾负责管理南宋国家藏书。1311年，他将多年管理国家藏书的经验加以总结，写成《麟台故事》。这是一部关于复兴南宋国家图书馆的意见书。全书共5卷12篇，内容既包括关于图书馆价值的论述，也包括一些具体工作方法的总结。关于国家图书馆的价值和使命，程俱认为，丰富的国家藏书是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条件，"祖宗以来，馆阁之职所，以养人才，备任使一时，各公卿都由此涂出……复兴馆阁，国有大礼大事，于兹有考焉"[15]。不难看出，这里所表述的是一种明确的特权教育和学术研究使命观。

诺德是17世纪法国学者、图书馆活动家。1627年，他在总结自己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书》，阐述了他对图书馆社会意义及图书馆工作方法的认识。该意见书赋予图书馆极高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关于图书馆的象征意义，诺德认为，图书馆比任何其他事业都更好地象征着它的拥有者的地位、荣誉、品质、智慧。"一般人的行动指南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许多君主却不如此，他们每一步行动的目标是荣誉……再没有比建立一座蔚为壮观为世人所用的图书馆更高尚，更能普遍赢得荣誉的事业了"[16]。关于图书馆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现实价值，诺德认为，图书馆比任何其他美好的事物更能带来心灵的满足。"我深信，假若世间还能获得什么最美好的事物，什么最完美的满足，莫过于建立这样一所图书馆所能给予一位学者的丰富的、令人心旷神怡的享受"[17]。在此基础上，诺德进一步提出，图书和图书馆的价值只有在利用中才能得到实现。"如果不打算将书提供给公众利用，那么，一切执行（本意见书建议）的努力，一切巨大的购书开支，全属徒劳。因此，即使对最卑微的能多少获益的人也不要限制，要让人们借阅"[18]。

当时的欧洲，刚刚沐浴了文艺复兴的洗礼。文艺复兴使整个欧洲兴起了反对宗教特权和教会束缚、崇尚世俗科学文化知识、关心世俗政治、复兴古典文明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特权阶层的人物纷纷兴建图书馆，既为满足对荣誉的虚荣心，也为满足对知识的求知欲。这种世界观不仅造就了诺德关于图书馆创建之声，也给这一声音提供了无数悦纳的耳朵。正因为如此，他的图书馆思想对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他的思想也被誉为近代图书馆思想之源[19]。

2．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职业化过程中）的图书馆哲学思想

19世纪是专业化图书馆职业逐渐形成的时期。随着图书馆类型的多样化及数量的增长，图书馆工作已不再主要由知识渊博的学者兼任，而是有了专门的从业

人员。1808年,德国图书馆活动家施莱廷格出版了《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提出了图书馆员完成其工作所需要的知识体系,这是以图书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为核心的体系。稍后,另一位德国图书馆员艾伯特专门讨论了图书馆员的教育。1876年,杜威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宣布,图书馆职业已经成为专门化的职业。

虽然图书馆职业并未因杜威的宣言而出现突变,但是,19世纪出现的很多关于图书馆基本问题的认识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感想或个别的、具体图书馆的经验,而是从职业的高度表达一个职业群体应该共同拥有的理念。而这种角度的阐述,又以英国图书馆员爱德华兹、美国图书馆员杜威、俄国图书馆活动家鲁巴金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爱德华兹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公共图书馆活动家。他构想了英国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系统,促成英国国会通过了公共图书馆法,出版了图书馆论文集,系统地论述了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包括藏书建设、图书馆建筑、分类与编目、图书馆内部结构与服务设施等,被誉为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

爱德华兹活跃于19世纪中叶。当时英国正在进行各个方面的社会改革。这种社会改革一方面受到工业革命成果和国力增强的祝福;另一方面受到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照耀。爱德华兹的图书馆观念便形成于这种社会改革的背景,秉承了启蒙运动的传统。他坚信图书无论对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没受过教育的人都有开启智慧、愉悦心灵的作用,图书馆因此具有改善国民素质的内在价值,他坚信在英国建设面向全民的公共图书馆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

> (公共图书馆)必须拥有大量对没受过教育的人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有吸引力的图书,以及对牧师、商人、政客、学者的研究和学习有帮助的图书。它们应该向每个来访者自由开放。应该向所有人提供服务,不仅要提供实用的科学知识、短暂的猎奇满足、当代流行的观点,而且要提供前人的智慧、古人的宝库,以及关于未来世界的希望和迹象[20][原文1]。

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和当时的激进政治家埃德沃特(Edwart)联手,决心将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建立纳入当时英国社会"上演"的社会改革大戏,并最终促使国会于1850年通过了公共图书馆法,该法案准许人口在10 000人以上的城镇通过征收财产税来建立和支持公共图书馆[21]。

[原文1] [Public libraries] must contain, in fair proportions, the books that are attractive to the uneducated and the half-educated, as well as those which subserve the studies and assist the pursuits of the clergyman, the merchant, the politician, and the professional scholar. They must be unrestrictedly open to every visitor. They must offer to all men, not only the practical science, the temporary excitements, and the prevalent opinions of the day, but the wisdom of preceding generations, the treasures of remote antiquity; and the hopes and the evidences of the world to come.

杜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美国图书馆员。他对图书馆职业的最杰出贡献包括：编制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组织创办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图书馆专业杂志——《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的图书馆学院。1876年在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之初，杜威就明确提出，图书馆管理的原则应该是"用最低的成本，以最好的书刊，为最多的读者服务"和"在适当的时间为适当的读者提供适当的图书"[22]。与爱德华兹一样，杜威相信"最好的书刊"对于心灵有道德净化作用，对于智慧有灵性开启作用，也相信图书馆的社会教化功能，认为图书馆职业对于社会进步负有神圣的责任[23]。

鲁巴金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图书馆学家。他的杰出贡献是他不懈地实践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不遗余力地利用图书馆来提高俄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阅读能力。为配合这种实践，鲁巴金对阅读社会学和读者心理学都作了很多研究，出版了很多著作。尽管这些著述主要集中在阅读心理学和阅读行为方面，较少论及他的哲学观点和图书馆的基本问题，但是，他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信念表明，他的世界观与同时代的杜威和爱德华兹的世界观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

无论是爱德华兹、杜威，还是鲁巴金，都对当时正在形成的现代图书馆职业充满了热忱和自信。这种热忱的来源正是他们对知识、图书、图书馆价值的坚定信念。在哲学上，这种信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世界高于可感世界，知识高于感觉，理性高于激情和欲望"的哲学思想。在柏拉图的哲学中，理性是灵魂中控制思想的部分，激情是控制情感的部分，欲望是控制肉体的部分。灵魂通过理性对理念的回忆获得知识，追求善和真理，因而理性、知识与善和真理是相通的，当激情和欲望服从理性时就产生德性。在《理想国》中，国家的统治者是富于理性和智慧的人，保卫者是富于激情和勇敢的人，劳动者是富于欲望和节制的人，当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禀赋承担分工，就产生公正、正义的社会。可见，在柏拉图的哲学中，社会的公正、正义与理性、知识、善、真理也是相通的。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现代图书馆职业先驱们对图书及图书馆价值的坚定信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尼蒂奇（Nitecki）（1993）将这种信念称为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24]。（关于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系统介绍，参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25]。）

在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现代意义的图书馆逐渐出现的时期。那时，我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仁人志士纷纷探求富国强邦、救国救民之路。效仿西方办法，兴建现代意义的图书馆被视作一条重要的兴国途径。所以，当时的我国图书馆哲学思想里融入了深深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振兴教育以求兴国的使命感。以下这段关于图书馆价值的论述就代表了这种使命感"……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立学堂，定学会，建藏书楼……斯三者皆兴国之盛举也……"[26]这种对大众教育使命的关注尽管与爱德华兹、杜威、鲁巴金等西方同行的观点不无相似之处，但我国学者似乎更加关注通过培育人才

促进富国强邦，而同期的西方图书馆哲学似乎更加关注通过社会教化促进社会进步。

3．20 世纪 20～40 年代（图书馆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图书馆哲学思想

如第五章所述，把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加以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该学院是首家在研究生层次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学院，聚集了一批来自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他们从各自的学术背景为图书馆职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学术研究氛围。直到这时，图书馆职业哲学问题才乘着图书馆学科学化的东风，成为图书馆学者自觉、系统研究的领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蒂奇（Nitecki）认为，对现代图书馆职业哲学的寻求，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27]。

20 世纪 30～40 年代，在英、美等国，涌现了很多关于图书馆哲学思想的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对图书馆哲学本身的含义和意义进行界定[28]，或者对图书馆职业的使命、功能、价值观等基本问题进行形而上学的研究，以期形成统一的图书馆职业世界观[29]。关于图书馆职业的根本问题，这段时间的图书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杜威和爱德华兹等人对知识、图书和图书馆内在价值的信念以及图书馆职业教化育人的使命感，例如巴特勒、理查森（Richardson）都在各自的著作里明确表达过这样的信念[30]。但是，在这段时间里，这种理想主义的图书馆职业使命感和价值观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新的图书馆哲学思想更加关注的不是图书的内在价值和功能，而是个人的需求和权利；不是图书馆教化育人的使命，而是它满足个人需要的责任；不是图书馆与道德、秩序的关系，而是图书馆与自由、民主的关系。美国学者伯德萨尔（Birdsall）将这种图书馆哲学思想归源于一般哲学中的自由主义[31]。自由主义哲学视人为至高无上的，相信人本善及人的理性能力，强调个人权力，追求个人自由。40 年代后期，随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思想控制及其后果的反思，这种自由主义的图书馆哲学思想在西方图书馆职业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表现之一就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在 1948 年对《图书馆权利法案》（"*Library Bill of Rights*"）的采纳。在这一法案和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其他重要文献中，信息自由的原则都被确定为图书馆职业的最高原则。

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和英国图书馆活动家麦克考文（McColvin）的思想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图书馆哲学思想。在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巴特勒更接近于前者，而麦克考文更接近于后者。巴特勒的图书馆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方面[32,33]：①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他认为图书馆是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到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②关于图书和图书馆的价值，他认为图书可以通过教化、愉悦、鼓励的作用影响个体的行为，因而，图书馆和好的图书都有促进社会进步的内在价值。为了更好地实现图书的教化功能，图书馆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图

书的内容进行审查(censorship)。③关于图书馆职业价值观,他认为图书馆员对真理、公正和美应该具有根深蒂固的忠诚。他提出:"图书馆学若要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哲学基础,它就必须不仅根据人性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解释图书和图书馆,而且要论证图书馆员对真理、公正和美的根深蒂固的忠诚。"[34][原文2]④于图书馆职业认识论,他认为图书馆职业必须有科学理论为指导,这种理论应该源于科学的经验研究。

与巴特勒相比,麦克考文的观点更明确地代表着自由主义图书馆哲学的主张。麦克考文是英国20世纪30～40年代最有影响的图书馆活动家之一。他领导完成的《英国公共图书馆系统:当前状况及战后重组意见报告》(即著名的《麦克考文报告》)对战后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图书馆的性质、本质、使命、价值观等根本问题上,麦克考文关注的基本焦点是"人"及其需求。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有权按自己的意志安排生活,都有能力为自己的需要做出适当的选择(包括文献资料的选择)。图书馆员的职责不是改善用户的个性和心灵,而是最大程度地扩大他们的选择。他进而断言:"一个馆员,如果他把自己的信仰、政治倾向看得高于馆员职责,如果他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馆员是无信仰、无政治倾向的,他就不可能是个好馆员,他就背离了他作为馆员的信仰,忽视了他的真正的职责。"[35]

这段时间,苏联图书馆职业正在发展以列宁图书馆思想为基础的图书馆哲学。早在社会主义苏联成立之初,列宁就对苏联图书馆的使命、功能、意义以及图书馆职业的价值观做过相当系统的论述。列宁充分肯定了图书馆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目标的价值,他认为图书馆应该是国民教育的中心,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场所。列宁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利用,提出帮助人民利用现有的每一本图书是图书馆服务的最高原则。需要指出的是,对图书和图书馆价值的认识,30年代到40年代的苏联图书馆哲学与同时代的西方理想主义图书馆哲学确有相通之处,但是,他们的哲学渊源却完全不同。苏联图书馆哲学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它认为无论是图书的内容,还是图书馆这一机构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作为上层建筑,它们对新苏联的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推动和发展作用,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20世纪20～40年代,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研究扬帆起航的年代。在这一时期,图书馆的使命、功能等基本问题也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焦点。其中尤以杜定友和刘国均先生的思想最有影响。杜定友关于图书馆职业基本问题的思想主要包

［原文2］ If librarianship ever achieves a philosophy worthy of the name, it must not only explain the book and the library in terms of man's nature and his status in the cosmos but also rationalize the librarian's ingrained loyalties to truth, justice, and beauty.

括:①关于图书馆的本质,杜先生认为"图书馆是一种活的教育机关"[36],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37]。②关于图书馆职业认识论,他认为图书馆职业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这个理论应该是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即关于书(包括一切文化记载)的理论,关于人(即阅览者)的理论,关于方法(包括图书馆的设备、管理方法和管理人才)的理论[38]。

刘国均关于图书馆职业基本问题的思想主要包括:①关于图书的价值和图书馆的性质,他坚信阅读习惯对于社会教化的作用,强调图书馆应该坚持"关注读者,服务平民"的精神(即巴特勒等西方图书馆学者所强调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他看来,近代图书馆的基本任务是"以用书为目的,以诱导为方法,以养成社会上人人读书之习惯为指归"[39],"近代图书馆具有自动化(自行用种种方法引起社会上人人读书之兴趣)、社会化(将注重对象由书籍而变为其所服务的人,使图书馆成为社会之中心)、平民化(应为多数人所设)等特征"[40]。②关于图书馆职业认识论,他也认为,图书馆职业应该有一个由不同要素组成的共同的理论基础,这些要素应该包括关于图书、人员、设备、方法的学说。刘国均的思想与杜定友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对于图书、阅读和图书馆之于社会教化的功能,他表现了更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杜定友和刘国均的思想体现着东西方世界观的结合。在图书馆职业使命感方面,他们对图书馆功能的信念、对培养阅读习惯的热忱、对图书馆中人的要素的重视,都包含了西方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因素;他们试图对图书馆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要素的分割,则似乎受到中国传统哲学(如阴、阳划分,金木水火土的要素划分等)的影响。这种独特的结合,本应是他们对世界图书馆哲学思想的巨大贡献,遗憾的是,由于语言交流的限制,西方很少有人了解他们的学说。在图书馆职业认识论方面,他们比巴特勒等西方同行更早关注到科学的理论对图书馆职业的指导作用,却未能进一步阐明图书馆职业该如何获得这种理论。

4. 20 世纪 50～70 年代

从 20 世纪 50～70 年代,图书馆职业面临着战后反思、情报学的兴起、计算机技术的出现、文献的激增、战后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更多地转向经济控制和信息控制)、知识和信息被视作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等局面。所有这些社会和技术的变化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对图书馆哲学思想的重新思考。50 年代初,对纳粹思想控制的反思使西方图书馆职业更趋向于强调思想自由的职业哲学[41],使自由主义拥有了更多的追随者,也得到更多的正式机构(如美国图书馆协会等)的认可。60 年代以后,随着情报学的发展,一些图书馆员更加关注知识、信息和图书馆在满足人的交流需要方面的功用,因而使图书馆职业更趋向于强调知识、信息有用性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美国图书馆

学家谢拉和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的思想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图书馆哲学思想。

谢拉是20世纪中叶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也是巴特勒的学生。在图书馆哲学思想方面，他首先继承了巴特勒的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成分，认为图书馆和真、善、美、进步等具有内在联系，它可以通过改善个人而改善社会。

> 虽然图书馆学越来越多地吸收自然科学，虽然它归于社会科学，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人文的……这是因为它关系到人类思想与人类文明的记录之间深邃难解的关系。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是社会的产物。它的目标是通过帮助个人理解自我、理解世界来改善社会，但是，图书馆(职业)对人的关注是对理性之人的关注，因此，图书馆首先是一项人文事业[42][原文3]。

其次，谢拉还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麦克考文等人强调的个人主义，认为图书馆虽然具有很强的包容和聚合功能，从而成为社会分化和分裂的抵抗力量，但是它却并不抹杀个性：

> 在(社会)走向分化、分裂的时代，图书馆与它所处的整个社会交流系统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聚合力量。但是，与大众传播系统不同，它并不是一种同化工具，而是个人主义的堡垒。大众传媒、报纸、广播、电视是雄辩说服型的；而图书馆却是引发探询型的。到图书馆来的人们，都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来寻求真理的。在图书馆里，用户不会被告知他们需要思考什么，什么时候思考，而是独立地发现他人的思想和观点，自主地理解这些思想和观点。因此，图书馆必须在社会的对立、分化、冲突中发挥促进理解、促进凝聚的作用，而不是成为一种同化力量[43][原文4]。

[原文3] Librarianship despite its increasing utilization of the sciences and its affiliation with the social sciences, remains in its essence humanistic... because it is basically concerned with that elusive and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mind and the record of the great adventure... [T]he library, as an institution, is a creature of society. and its goal is th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by helping the individual to understand himself and the world of which he is a part. But the library is also concerned with man as a rational being. Thus, it remains primarily a humanistic enterprise.

[原文4] Thus in an age of specialization, of social fragmentation, the library like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which it is a part, can become a great cohesive force at a time when social cohesion is most vital But unlike the mass media of communication it needs not be an instrument for the achievement of conformity. It is and should remain the stronghold of individualism. Whereas the mass media, the newspaper, radio, television are declaratory, the library is interrogative. To the library men come seeking truth, each in his own way and for his own ends. In the library the patron is not told what to think or when to think it. but in his search each must discover for himself the thoughts and opinions of others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m. The library, then, must be a force for understanding, for cohesion, in a world of antagonisms, conflict, and specialization, but it must be a unifying, not a homogenizing force.

在继承已有图书馆思想的同时，谢拉又吸收了正在兴起的情报学的研究成果。情报学是研究情报及其交流过程的科学，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如第五章所述，与此前的图书馆学相比，情报学关注的是情报交流的过程，而不是交流的机构；是作为交流过程两端（信源和信宿）的用户，而不是图书馆的读者；是信息的物理意义（如可测度、可分解、可处理等）而不是它的文化意义。正是在情报学的影响下，谢拉重新认识了图书馆的性质和它的使命，他认为图书馆是社会建立的、满足其交流需要的工具，而交流是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因而，归根结底，图书馆是一个对于个人和社会有用的机构。关于这一点，谢拉认为：

> 外界的刺激对于神经系统的正常运行是必需的。没有它们，人脑就不能思考，因为人脑通过线索和类比而产生新信息；通过将这些线索和类比分解成含义熟悉的较小部分来解决问题。正如对信息的需求驱动着个人，这种需求也驱动着社会。它是集体行为也是个人行为的基础[44][原文5]。

在阐明了信息有用性的基础上，谢拉进一步指出，信息及其传递过程都是功利性的（Utilitarian），图书馆的作用也是功利性的，即图书馆首先是满足人类功利目的的工具，这种工具性也是评价图书馆好坏的基点。

> 它（信息）具有内在的功利性、工具性，它通常以有组织的、正式的形式加以传播，而这种正式的传播正是为了增强其功利性。由于它的工具性，功用便成为衡量它的社会价值的主要标准…… 图书馆在交流过程和人类文明中的作用就是使知识记录的社会功用达到最大。这是评价所有图书馆职业的基本标准[45][原文6]。

不难看出，由于对情报学成果的吸收，谢拉图书馆哲学与前面所述的理想主义图书馆哲学和自由主义图书馆哲学皆不相同，他对这两种图书馆哲学的最大的发展就在于他在关注图书的精神作用和人的个性的同时，开始强调图书和图书馆的功用性。对事物和行为功用性或效果的强调在哲学上可以归源于功利主义道德哲

[原文 5]　External stimuli are necessary for the proper operation of the human nervous system. Without them, the brain cannot reason, for it generates new information through clues and analogies, and it solves problems by fragmenting them into manageable parts with familiar connotations... As the need for information drives the individual, so also it drives societies.

[原文 6]　Libraries are, essentially, utilitarian constructs. That which tends toward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is good; that which does not is bad. Libraries exist to serve and to be used. Libraries, their collections, and technoloical advance are not good in themselves. They are means to vital ends-disseminating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preserving the records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nd raising and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of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life··· The role of the library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and in the civilization that process serves is to maximize the social utility of graphic records. This is the standard against which all librarianship must be judged. The key words here are utility and graphic records-use and books... It is the utility of the tool and the skill in its manipulation that justify an art, a profession, or a craft.

学。这种哲学认为事物或行为的好与坏、正确与错误，取决于它产生的效用(utility)或为受其影响的所有人带来的幸福。凡能对人们带来幸福的事物或行为就是道德的、正确的、好的，反之则是不道德的、错误的、坏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斯图亚特·弥勒称这种原则为效用原则或最大幸福原则。将这种思想融入图书馆哲学是谢拉对图书馆哲学思想的重大发展，也使功利主义成为他的图书馆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正是由于谢拉思想里体现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结合，罗杰斯(Rogers)认为，谢拉的思想是连接过去的图书馆哲学思想与新哲学思想的桥梁，对图书馆学具有深远的影响[46]。

阮冈纳赞是著名的印度图书馆学家。他的图书馆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图书馆职业五法则中，即：①书是为了用的(books are for use)；②每位读者有其书(every reader has his books)；③每本书有其读者(every book has its reader)；④节省读者的时间(save the reader's time)；⑤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 (the 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47]。这些法则首先确定了书(即图书馆)的有用性，强调书就是为了用的。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把阮冈纳赞的思想同样视作对功利主义图书馆哲学的贡献，但是，与谢拉一样，阮冈纳赞除了强调图书和图书馆的有用性，他的法则还明确地提出了信息平等原则(人人有其书)、人文关怀精神(节省读者的时间)和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发展原则等。在这简短朴实的法则中，包容了作者对图书馆使命、图书馆价值观、图书馆职业道德、图书馆发展机理博大精深的理解，是图书馆职业哲学的最精练的表述。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哲学虽然更接近功利主义思想，但却包含了鲜明的理想主义、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所以能够被几乎所有派别的图书馆思想所接受和推崇，对世界各国图书馆职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这段时间我国图书馆哲学思想主要接受来自苏联的影响，对图书馆本质、使命和价值的理解多基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其他矛盾运动关系。当代图书馆学者黄宗忠先生对图书馆活动本质的理解就是这种哲学思想的代表。从事物的辨证关系的角度，黄先生提出，图书的“藏”与“用”的矛盾是图书馆的特殊矛盾，图书馆活动的实质和核心就是解决这对矛盾[48]。

5.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由杜威、巴特勒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图书馆思想依然影响着很多图书馆员对职业活动的信念，如公共图书馆员对阅读促进活动的信念；由麦克考文等为代表的个人自由主义图书馆思想依然规定着很多图书馆协会，如美国图书馆协会、英国图书馆协会的核心伦理；以谢拉思想为代表的交流功利主义依然引导着很多人对图书馆活动本质的理解。但与此同时，20 世纪后半叶出现于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开始在图书馆领域产生反响；流行于西方各国的新自

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也开始在图书馆界留下印记。在过去20多年中,上述各种图书馆哲学同时并存,几乎使这段时间成为图书馆哲学的"春秋战国"。

(1)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图书馆思想。如前所述,理想主义图书馆思想曾点燃现代图书馆职业先驱,如杜威、爱德华兹等对图书馆的热情,造就了他们对图书馆职业的忠诚。虽然这种思想的某些早期主张,如按图书馆员的职业标准向读者推荐最好的图书(这意味着抑制他们认为不好的图书)、容忍一定程度的图书审查等,从20世纪初开始就受到新的图书馆哲学思想的冲击,但是,理想主义思想对图书馆之于个人发展及社会进步的坚定信念、对阅读兴趣的褒扬推广、对图书馆知识之公共财富性质的忠诚等,依然在当代图书馆职业队伍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以下这段来自当代图书馆员的评论就明显地秉承了理想主义的图书馆思想:

> 文字很重要。文字为我们名物叙事……我们相信文字改变生活、揭示机遇、重建希望、充实娱乐……我们相信文字具有力量……因为我们相信文字重要,所以我们相信阅读重要[49][原文7]。

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西方图书馆职业队伍来说,自由主义似乎比理想主义具有更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对个人权利和思想自由的维护始终是英、美等国图书馆协会制订专业政策和参与政府决策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的权威性自从被美国《图书馆权利法案》确定后,始终未曾动摇过。20世纪90年代,在有害的互联网信息,如色情、暴力、种族歧视等开始毫无限制地出现在网上的时候,不少西方图书馆员呼吁对经图书馆传递的网上信息进行过滤或审查,很多图书馆甚至采取了过滤或审查措施,但是,这种呼声最高的时候,也是反对之声最厉的时候,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任何形式的过滤或审查都是对用户权利和思想自由的损害,都是图书馆职业不能接受的[50]。

除了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谢拉等人在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关于图书馆使命和价值的功利主义论述也被很多学者发扬光大。在澳大利亚,戈德曼(Godman)提出图书馆的基本使命是传播知识和信息、保存人类文化记录,图书馆的存在价值体现在它的利用之中,因而,图书馆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的一种功利产物(utilitarian constructs)[51]。在美国,巴克兰德(Buckland)重申图书馆的基本使命是传递图书、杂志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和信息载体,帮助人们获取情报[52]。在欧洲,英格沃森(Ingwersen)认为,图书馆职业活动的目的是对文献内容进行组织、分

[原文7] Words matter. Words give us names for objects and experiences. Using words we can perceive with differentiation-dogs are different from horses, love from lust, and freedom from license… Words have mattered because they convey ideas,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 Because we have believed that words matter, we believe that reading matters.

析并提供给用户利用，这种活动只是情报交流在图书馆这一特定机构的体现，因而图书馆职业是情报交流系统的组成部分，图书馆学是情报学的组成部分[53]。在我国，各种大同小异的图书馆学交流理论（如知识交流论、文献交流论、文献信息交流论）在80年代相继出现。这些理论都认为图书馆活动是社会所必需的交流功能的组成部分，他们或者把图书馆的基本使命定义为保存和传递社会知识（知识交流论），或者定义为贮存和传递文献（文献交流论和文献信息交流论）。与谢拉一样，这些学者对图书馆使命和价值的共同理解可以概括为：图书馆是一个交流机构，是社会交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交流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必需的活动，如同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的必要条件一样，因而，图书馆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机构，对这种功用性发挥的程度是评价图书馆工作的基本标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种功利主义思想成为我国图书馆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

(2) 德尔文与建构主义。德尔文是活跃于传播领域的学者，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她对图书馆哲学贡献了最有影响的思想之一。她认为图书馆职业向来以传统的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基础，把知识和信息看成可以进行分割的客观世界；把用户看成没有个性的群体类别；把头脑对知识和信息的吸收看成清晰确定的过程。她进而认为这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使图书馆实践背离了信息和信息需求的真正属性——主观性，因而使图书馆远离了大众需要，成了大多数情报寻求者不愿问津的机构。图书馆若要真正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机构，就必须摒弃这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而采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认识论[54,55]。

建构主义是一种强调认识过程的主观性的认识论。在本体论上，建构主义一般并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但是，它认为，主体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是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忠实的反映，而是主体以原有经验为基础对现实的建构，因此，知识从来就不是对现实的准确反映，而只是主体对现实做出的解释。现代建构主义有很多不同的派别，其中个人建构主义认为，在认识过程中，每个人都是主观地用自己的经验在建构个人的知识，每人所建构的知识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基本上与客观存在无关。由于个人的经验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不相同。因而知识是主观的，只存在于个人头脑。个人建构主义认为书中的知识也是主观的，是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赋予的。社会建构主义则认为，认识过程，即个人建构知识的过程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受到该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别人认识的调整和修正，所以，知识的建构过程虽然是主观的，但不是随意的。书中的知识也不是读者随意赋予的，而是读者和其他生活在相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人的共识。共识的部分是可以相通的。

德尔文所采用的认识论基本上是社会建构主义的认识论。以此为基础，德尔文提出，信息从本质上来说是主观的东西，无论是被记载下来的信息（信息1）还是人脑中的信息（信息2）都不可能是现实世界的如实的、客观的反映，它们永远只能

是外部世界的片面的反映。认识的这种不完整性(Discontinuity)就决定了特定用户在特定背景下需要寻求特定的情报来填补认识上的空白。这就产生了情报需求。要满足这样的需求,图书馆应该关注的不是用户的类别,而是用户的个体性以及他(她)的具体背景,因为每个用户及其背景都是独特的,因而其情报需求也是独特的[56]。与麦克考文等图书馆学者一样,德尔文图书馆哲学思想同样强调用户的个体性,但是,与麦克考文图书馆哲学以自由民主思想为基础不同,德尔文的图书馆哲学则以建构主义认识论为基础。

(3) 巴德、雷德福等图书馆学者与福柯。法国哲学家福柯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影响主要产生于他对西方启蒙运动所象征的思想特征(这种特征经常被称为"现代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哲学,如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的挑战。这种挑战涉及认识论、伦理及政治哲学等几乎所有领域,但突出体现在认识论领域,即关于知识、真理、认识主体、语言的作用等方面。按照现代性(Modernity)的解释,人是具有理性的认识主体,知识是认识主体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真理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的反映,语言是反映客观现实的忠实的工具。知识的生产过程与权势无关,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置身权势和自身利益之外,保持着知识生产过程的客观和中立。但是,在福柯看来,在认识过程中,语言既不是反映现实的忠实的工具也不是被动的工具。首先,它不是认识过程的忠实工具,因而它无法完美地反映现实,无法使认识过程,即对真理的追求摆脱权势的纠缠;其次,它也不是认识过程的被动工具,它对知识生产过程具有控制作用,因而,它本身就是权势。福柯进一步解释说,语言对知识生产的控制是通过话语体系的排斥功能来实现的。话语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被某种制度所支撑组织起来的、被认为是具有真理性的陈述群"[57]。科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是由学术创作、教育、出版发行、图书馆等制度或机构支撑的。每个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都决定着知识声称者(作者)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以及在哪儿说。话语体系一旦形成,就开始排斥体系之外的话语所表达的思想。因此,话语事实上控制着知识的生产。新的科研领域的出现也是话语变化的结果,例如,心理学之所以在20世纪初产生,就是因为到20世纪初,用讨论物理世界的话语来讨论人的心理世界逐渐被学术世界接受了。总之,福柯的思想使人们看到了一个与权力领域密不可分的知识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对西方图书馆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根据福柯的思想,雷德福(Radford)提出图书馆是权力化的知识生产和积累的组成部分,而非传统图书馆哲学所认为的中立机构。他认为,图书馆与其他社会机构(如学校、出版社)一样,强化着话语对知识生产的控制作用。它通过文献的收集,强化着学术领域对什么是或不是知识所做出的裁决;它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及其在空间上的安排,规定着知识的学科定位和知识之间的联系;它通过文献的提供决定着哪些文献能够被当前的知识创造者所利用。所有这一切都表征着图书馆的倾

向性，而不是它声称的中立性[58]。

从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来看，德尔文的建构主义和福柯的思想都可以视作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后现代主义通常指20世纪后半叶(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社会的文化和思想特征。与启蒙运动象征的现代性相反，后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上反对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传统的物理科学的研究方法，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否定知识和真理的中立性；在文化领域强调特殊性、多样化、不稳定性，否定文化有优劣等级之分。尽管在有些场合，德尔文否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她否认的只是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所坚持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的本体论观点，事实上，她所坚持的社会建构主义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与德尔文相比，福柯思想的内容更加丰富，视角也更加广阔，很难用“主义”来归纳，但是，由于他对现代性的挑战，他更经常地被视为后现代主义者。

(4) 新自由主义与图书馆职业的市场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发达国家，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无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技术的角度看，似乎都在成为现实。在这样的社会中，知识和信息已经取代土地等有形资源成为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主要来源。如同农业社会的土地和森林、工业社会的资本和机器一样，信息一旦成为如此重要的资源，就必然带来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至于这些变化是否已经触及社会的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形态，学术界依然存在很大分歧，但是一些比较表层的社会变化却是有目共睹的。首先，随着知识和信息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都加紧了对这一资源的有效管理，以期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在这些部门，信息资源管理业(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RM)因此迅速壮大；其次，过去被视作公共财富的知识和信息正在成为不同社会群体追逐和意欲占有的对象，信息的拥有及利用与权势的联系日益密切，信息商品化日益广泛，信息分化(即信息穷人与信息富人之间的分化)日趋严重，信息的分配和获取问题成为信息社会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59]。“(信息社会)是一个信息十分充裕的世界。在这里，信息被买卖、交易、被按价消费，它已经成为太有价值的东西，不可能被继续当成公共财富；在这里，政治和经济在信息服务的设计和实施中发挥着主导作用”[60][原文8]。

就在知识和信息引发深刻社会变化的时候，保守的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主张让市场决定一切。在经济领域主张实施最小政府干预，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在公共领域，主张减少政府支持，以便引进市场竞争机制。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

[原文8]　an information rich world in which information is bought, sold, traded, exchanged, and consumed in economic terms, in which information has become too valuable to be treated as public good, in which polities and economics now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里根政府执政期间,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这两个国家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都达到顶峰,并对图书馆职业的传统哲学思想,特别是理想主义图书馆思想提出了严峻挑战。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保守的研究机构,亚当·史密斯研究所在一项关于公共图书馆的研究中,就强烈抨击把公共图书馆视作公共财富的理念,呼吁将公共图书馆商业化、产业化。

在上述社会和政治背景下,一部分图书馆专业人员开始把信息资源管理视作提高图书馆职业地位的绝佳机遇,认为图书馆职业重心向信息资源管理的转移(兰卡斯特称这一过程为"非机构化"过程)会大大改善图书馆员的形象、身份,并提高他们的薪酬[61]。他们认为,图书馆职业应该抓住机遇,重新定位,使自身全方位地融入信息资源管理。从表面上看,这些学者似乎找到了一条未来图书馆职业发展之路,但是,当这些学者把信息视作可以竞争的资源,他们也就很难避免将这一资源视作商品,将市场视作分配这一资源的有效机制。在很多信息资源管理者看来,信息的自由获取就是信息的自由买卖,没有比一个自由的市场更自由、更民主的[62];在他们看来,把图书馆资源视作公共财富、反对信息商品化的传统观念已经成为图书馆职业融入信息资源管理职业、提高自身地位的障碍[63]。显然,用信息资源管理来定义图书馆的使命和其他基本问题,产生的是一种建立在商业理念上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渗透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图书馆哲学。

(5)"社会主义"与图书馆职业的社会责任。新自由主义图书馆哲学并非 20 世纪后期社会和政治背景下惟一的图书馆思想产物,与这一思想同时出现的是图书馆职业社会责任感的强化。当一部分图书馆职业队伍开始积极倡导图书馆职业与信息管理职业的融合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商业理念的时候,另一部分图书馆专业人员则更加关注信息资源分配和占有的政治及经济寓意。他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深刻地剖析信息社会的强势阶层为占有知识和信息这一宝贵资源对公共信息部门的挑战,并希望在这种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中重新定义图书馆的使命。例如,美国学者席勒夫妇认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阻碍美国图书馆发展的最大社会因素就是来自私营部门(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压制。它们一方面通过保守的研究机构和舆论机构,否定信息作为公共财富的理念;另一方面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减少政府对公共信息部门的支持力度,抑制图书馆等公共信息部门的发展[64]。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和信息离开了公共财富的领域而进入了市场,需要通过购买才能获得,这就使得社会的弱势阶层经常无力承担他们需要的知识和信息资源。

包括席勒夫妇在内的相当一批图书馆员认为图书馆职业对这些弱势阶层负有特殊的责任,图书馆职业必须为他们的情报需求提供一个安全港(Safety Net)。这些图书馆员反对图书馆开展的有偿服务,他们主张一切图书馆服务,不管是传统的借阅服务还是依托互联网的新型服务都应该由公共开支承担,由图书馆服务无偿提供。他们认为,图书馆职业若要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就必须抵制图书馆领域的

商业化、产业化。

> [今天的]图书馆员发挥着维护公众信息利益的重要作用。……宽容、尊重真理、追求质量、维护公共利益、关心文化和信息领域弱势群体的利益等观念或许已经过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重要。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些观念[65][原文9]。

美国图书馆学家伯德萨尔(Birdsall)在总结这类图书馆思想时认为，它来自政治哲学中的"社会主义"[66]。这里的"社会主义"指社会主义思想，而非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除科学社会主义以外，还存在若干其他的思想流派，如空想社会主义。尽管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分歧，但它们都强调某种意义的社会平等。伯德萨尔认为正是这种平等主张引导图书馆职业把图书馆视作促进社会平等的机构，引导图书馆员去关注社会弱势阶层的情报需求。

(6) 哈里斯与折中的图书馆哲学。与席勒夫妇一样，美国学者哈里斯同样认为，信息领域的政治经济变化是过去二三十年间图书馆职业面对的最突出的现实。但是，与席勒夫妇不同，哈里斯认为，这种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政府和少数研究机构的观念，而是整个社会(至少是整个美国社会)的观念。在信息社会，信息作为商品已被大多数人所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界如果再恪守其传统的哲学思想，似乎已不合时宜。但他同时提出，这并不意味者图书馆职业应该欢迎信息商品化与市场化的潮流，更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毫无批判地成为这一潮流的同盟军。他认为图书馆职业目前应该做的是反思已有图书馆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职业哲学。这种新哲学既不是传统思想的盲目继承，也不是市场及商品观念的全盘照搬，而是某种折中的形式。

> 图书馆信息职业应珍惜这个机会，批判性地、系统地重新审视图书馆在维护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权利中的作用……但是要发挥这种[职业]潜力，我们就必须克服我们长期存在的鄙夷政治的传统，开始一种长期的、甚至可能是痛苦的关于权利的讨论……我们作为专业馆员的责任是开辟一条既不全盘接受

[原文9] Librarians need to be tough and to fight for their values. Toleration, respect for truth, appreciation for quality, dedication to the common good, and a concern for the well-being of those who are less affluent, in cultural and informational terms, may be out of fashion. That does not make them unimportant. We need to hold fast to these ideas …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at we do battle for regulation in the public's interest and that we campaig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that fulfill people's needs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succeed in the marketplace.

尚不存在的未来,也不反动地恪守几乎不再可行的过去的中间道路[67][原文10]。

但是,这种折中的思想,即哈里斯所说的"中间道路"到底是什么样的,哈里斯本人并没有回答。

五、图书馆哲学思想分类

综上所述,自19世纪末以来,即图书馆职业作为专门化的职业出现以来,先后有不同的哲学观点引领了这个职业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图书馆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理想主义的图书馆哲学思想。受柏拉图哲学思想和近代启蒙运动的影响,这种思想对知识、图书、阅读以及图书馆之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充满了坚定的信念,认为好书和阅读活动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使人达到更高、更完美的精神境界,从而达到社会教化的目的。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这些价值,图书馆员必须怀有对图书的挚爱,不遗余力地培养社会成员的阅读习惯,坚定不移地维护真善美。为了社会的整体进步,图书馆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文献审查。代表人物有杜威、爱德华兹、巴特勒,以及我国的刘国均先生。尽管理想主义的图书馆哲学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断受到其他图书馆哲学思想的批判,但是,直到今天,它依然激励着无数图书馆员致力于阅读促进活动。

(2) 自由主义的图书馆哲学思想。受自由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图书馆哲学思想认为,社会的个人享有从图书馆获取他们所需要资料的权力。图书馆的个体用户有能力判断文献资料的价值,并为自己做出明智的选择。图书馆员的职责是向用户提供尽可能广泛、全面的知识和思想,这种提供不应该受到馆员个人政治及道德倾向的制约,也不应该受到来自任何权威(如政府、政党)的限制。基于这样的哲学思想,自由主义图书馆员提倡有助于用户选择的开架阅览方式,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文献审查。自由主义图书馆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包括:麦克考文、布罗德菲尔德、福斯克特 (Foskettde) 等。这种思想在西方图书馆界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至今仍是美国图书馆协会等西方图书馆协会的基本指导思想。

(3) 功利主义图书馆哲学思想。受功利主义伦理(utilitarianism)的影响,这种图书馆哲学思想认为图书馆的根本价值在于它的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效用。在这种思想看来,对信息的需要是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为满足这种需要,社会建

[原文10] librarians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should welcome this opportunity to rethink crit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 the role of the library in securing and preserving fundamental rights in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is potential can only be successfully tapped if we are able to transcend our longstanding disdain for politics and engage in a sustained and (perhaps) painful form of rights talk of our own... Our responsibility as professional librarians is to discover a way to steer responsibly a course between the Scylla of an uncritical embrace of an as yet nonexistent future and the Charybdis of a reactionary commitment to a barely workable past.

立了不同的信息交流设施,图书馆是这些设施之一。图书馆员的职责在于保证这种交流的有效进行,从而使图书馆的文献发挥它们的最大效用。在如何才能保证有效交流的问题上,有些图书馆专业人员更关注服务和人文关怀的作用;而有些则更关注技术的作用,前者可称为人文功利主义,代表人物有阮冈纳赞、谢拉、巴克兰德以及我国的宓浩等;后者可称为技术功利主义,代表人物有科辰(Kochen)、英格沃森等。

(4) 社会主义的图书馆哲学思想。受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这种图书馆哲学试图将信息的生产、交流、利用以及图书馆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加以考察。认为对信息生产、流通和利用进行控制是社会的强势阶层维护已有社会秩序的必然选择;而信息的商品化则是资本对利润追求的必然结果。这就使信息分化日益成为社会的政治问题。图书馆职业对弱势阶层的情报需求负有特殊的使命,应该保证他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不受其经济能力的制约,从而维护信息领域的社会平等。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席勒夫妇、英国的韦伯斯特、海伍德等。

(5) 新自由主义图书馆哲学思想。受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这种图书馆哲学认为,在信息成为主要经济资源的时代,图书馆职业队伍面临着职业地位提升的机遇,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图书馆职业就必须重新定义自己的使命、章程、政策、甚至服务,必须站在运用新技术的前沿,融入信息资源管理的行列。这意味着,图书馆职业需要淡化其长期恪守的信息作为公共财富的信念,深化信息作为组织(如一个企业)的资源的观念,同时还要现实地承认,信息被视为资源自然会伴随着信息的商品化过程,市场也自然会成为信息的分配机制。在图书馆实践中,他们支持图书馆服务从无偿转向有偿,支持保护版权人利益的较强硬的著作权法。代表人物有早年的兰卡斯特。

(6) 后现代主义图书馆哲学思想。受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影响,这种图书馆哲学认为知识和信息从根本上来说是主观的,知识永远不可能是客观世界的真实的反映,反对传统的图书馆将知识载体当作实物进行分门别类的组织,否定图书馆员有资格或能力指导用户的信息利用(包括阅读)。所以,图书馆员在文献收集时要忠实于用户的需求,而不依赖于自身的职业判断力;在情报服务中,要关注每一位用户需求的特定情景,而不是把用户看成没有区分的群体。代表人物有德尔文、雷德福等。

六、图书馆职业范式

1."图书馆服务范式"和"信息范式"

"范式"(paradigm)一词由于科学哲学家库恩对它的使用而成为学术界的常用语。库恩用"范式"一词表示在特定历史时期被某一学科领域普遍接受的规范、规

则、理论、方法等。图书馆学文献关于职业范式的讨论也基本上沿用了上述含义，指在特定时期被图书馆职业所接受的图书馆哲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等。如此理解的"范式"是一个比图书馆哲学思想更宽泛的概念，范式的变化也往往比哲学思想的变化带来更深刻、更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贝苓(Robert Berring)在谈到图书馆职业范式的变化时认为：

> 范式可以为人们吸收新经验提供模式，并因此决定着人们对事件做出的解释。当社会变革或科学发现的结果导致现存范式与新的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一种不同的范式就可能出现，这个新范式会提供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新的词汇体系。但是新范式未必一定要吸收旧范式，支撑着新范式的结构常常并不取代旧范式的结构，而是像细胞的分化一样，在给予它生命的原有结构之外建立独立的或平行的存在[68][原文11]。

根据美国学者瑞蒙德(Boris Raymond)的研究，目前图书馆界存在两大颇为对立的职业范式，一种是"图书馆服务范式"(library service paradigm)，另一种是"信息范式"(information paradigm)。"今天，这两个看来不相兼容的范式正在竞争图书馆职业的灵魂"[69]。

瑞蒙德所说的"图书馆服务范式"是以用户服务为核心的范式。在世界范围内，这种范式是19世纪中后期随着现代图书馆职业的出现而出现，并随现代图书馆职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根据瑞蒙德的总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用户服务思想带着强烈的"以图书和阅读教化社会"的理想主义色彩，到了20世纪上半叶，随着图书馆的社会教化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用户服务的思想更经常地被理解为帮助用户找到满足其需求和兴趣的相关文献，但不管如何理解"用户服务"的含义，图书馆服务范式始终强调对人的关怀和尊重，强调图书馆职业的人文主义色彩。20世纪后期，在信息社会渐现端倪、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图书馆服务范式开始受到来自图书馆界内外的很多批评。它的批评者提出，传统的图书馆服务范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背景和技术条件，已经不利于图书馆职业的发展，图书馆职业必须对它进行改造。这些批评者认为，首先，这种范式的视角局限于图书馆这一社会机构，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需求，这些未满足的社会需求就为其他信息职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导致一些"图书馆地盘"的沦丧，图书馆职业在缩小了的地盘上很难避免走向萎缩；其次，图书馆服务范式中的图书馆员过于保守，这种"职业性

[原文11] Paradigms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way events are interpreted by providing models that help assimilate new experiences. When, as a result of societal changes or scientific discoveries, the existing paradigm comes into conflict with a new reality, a different paradigm tends to emerge, one that helps create a new way of seeing the world, and provides a new vocabulary... However, a new paradigm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absorb the old one. Quite frequently the structure that underlies the new paradigm does not replace the old one but rather, as in the partition of cells, develops an independent if parallel existence with the structure that has given it rise.

格”导致他们地位低下，报酬羞涩，对职业队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此外，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来说，是信息处理技术，对新技术的应用必然要求图书馆职业范式更加关注信息及其管理，拒绝这种变化会导致图书馆职业落伍于新技术的发展，从而导致图书馆职业的社会地位进一步边缘化。在指出图书馆服务范式的局限之后，这些批评者建议图书馆职业在更大程度上采用“信息范式”。

瑞蒙德所总结的“信息范式”指体现在各类型专业图书馆和各类信息中心工作中的范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注重情报交流过程，视图书馆和信息中心为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强调图书馆职业的技术色彩，注重新技术的应用，视技术手段为图书馆工作和信息服务工作的最重要因素；注重从职业外部吸收新的理论。20 世纪后半叶以来，信息范式特别受到申农的信息论和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的巨大影响。

信息范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期出现的专业图书馆(special libraries)。这些图书馆服务着少数专业化的工程技术人员、商业人员和政府官员，视自己的使命为向具体用户提供准确、具体的情报，如事实性或书目性数据。

20 世纪初，在这些专业图书馆的活动和科研机构的文献活动的基础上产生了以科技文献的加工、整理、检索为主要内容的“文献运动”(documentation movement)。到 20 世纪中期，随着“文献运动”的专业协会在英美更名为情报学会，信息范式也渐趋成熟。此后，随着信息被视为社会的重要资源和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信息处理，越来越多的出身于专业图书馆和“文献运动”的人员把自己视同“信息管理人员”，而非“图书馆员”。从 70 年代末开始，也有相当一批图书馆专业人员试图采用“信息”范式来改造图书馆职业实践，由此构成了对“图书馆服务”范式的巨大挑战。

2. 图书馆职业哲学与图书馆职业范式

如前所述，图书馆哲学构成了职业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按“图书馆服务”范式和“信息”范式的划分，可以将不同的图书馆职业思想归入“图书馆服务”范式，或者“信息”范式。不同图书馆职业哲学思想与当前图书馆职业两大范式的关联大致如图 6.1 所示

3. 图书馆职业新范式

在过去的 30 年间，随着图书馆职业对传统哲学思想的反思、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商业文化的渗透，图书馆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随着变化的深入，很多图书馆专业人员都注意到这是一种触及职业范式的变化。在美国学者兰卡斯特看来，这是以非机构化的(deinstitutionalized)、无纸的、信息管理范式取代以机构和纸质文献为基础的、传统图书馆服务范式的变化，是一种能够给图书馆职业带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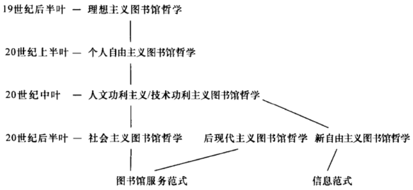


图 6.1　图书馆职业哲学与职业范式的关系

位和荣耀的变化；在伯德萨尔(Birdsall)看来，这是植根于启蒙运动和个人自由主义思想(individualistic liberalism)的物理图书馆模式(the library as place)向植根于技术功利主义(technocratic and utilitarian)的数字图书馆模式的转变，是一种在服务上向专业化的强势群体倾斜的转变；而在雷蒙德(Raymond)看来，过去的 30 多年是两种颇为相左的职业范式——"图书馆服务"范式(library service paradigm)和"信息"范式(information paradigm)——在冲突中竞相塑造新时期图书馆职业的时期，是一种前途未卜的转变。

从这些讨论来看，目前图书馆界尚不能确定的，不是新的范式是否会到来，而是这种新的范式将新在哪些方面以及新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从职业哲学到话语体系再到工作方法和手段的全面革新还是部分革新？是将"图书馆服务"范式转化为"信息"范式还是各自汲取对方所长？如果是汲取对方所长，最后的结果是一个统一的图书馆信息范式(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LIS)呢，还是两个相互独立又彼此渗透的范式(一个是信息化了的图书馆服务范式，用于指导图书馆实践；另一个是人文化了的信息模式，用于指导信息管理业的实践)？

"信息"范式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向信息范式的转化是图书馆职业在信息社会的惟一出路，这是一种从哲学思想到话语体系到行为方式的全面转化。"对于那些抵抗这些进展的图书馆专业人员来说，如果他们还固守那些陈旧过时、阻挠他们与时俱进的思维和行为习惯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消亡"[70]，"那些不能实现向'知识管理者'这个新角色过渡的图书馆肯定会被淘汰"[71]；"除非我们放弃'图书馆式'的信息传递模式，否则我们职业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72]。

而瑞蒙德等人则认为，图书馆职业虽然可以向信息范式学习很多长处，例如对新技术的积极利用，对理论的关注等，但是，图书馆职业具有信息范式不能涵盖的

哲学思想(职业精神)、概念体系(如馆员、文献等)、用户需求(如文化氛围需求、学习空间需求、娱乐需求)和功能构成(教育功能、道德功能、美学功能等)[73];"如果把自己定义为信息管理者,图书馆员就忽视了他们职业的核心价值"[74]。

也有学者认为,新的图书馆职业范式将是不同范式的融合。例如,美国学者伯德萨尔(Birdsall)相信新的范式将包含传统图书馆服务范式的成分[75];另一位美国学者罗宾森(Jane B. Robbins)认为,新的范式是图书馆服务范式与信息范式的联姻[76]。

在实践领域,2002 年 4 月,在经过了长达数十年的努力之后,代表英国信息职业的情报科学家学会(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tists)和代表图书馆职业的图书馆协会(Library Association)终于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组织"注册图书馆与情报专业人员协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CILIP)。对于图书馆职业范式来说,尽管这种统一的真正寓意——它是两种范式联姻的结晶,还是联姻的序幕,亦或是同床异梦的结合——目前还很难断定,但它毕竟标志着两个同源的职业朝着统一迈出了令人瞩目的一步。

第二节　图书馆职业的使命

一、图书馆职业使命感

对社会的职业使命感是现代图书馆职业的特征。在现代图书馆职业形成之前,特定环境下的图书馆的使命——不管是保存文献,还是支持学术研究,或是辅助特权教育,一般都由特权阶层或他们聘请的个别图书馆员加以确定。正是针对这种状况,谢拉称 19 世纪以前的图书馆为权势的使女、学术的使女和地位的象征[77]。

现代图书馆职业的社会使命感和职业意识是同时产生的。现代图书馆职业首先继承了以往图书馆的贮存功能,视保存人类知识记录为图书馆职业的神圣使命。同时,它还扩大了以往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明确提出了对广大社会成员承担的教育使命,"过去的图书馆就像一座博物馆,图书馆员就像霉书堆中的探寻者;现代的图书馆是一座学校,图书馆员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师"[78]。此外,新形成的现代图书馆职业还明确提出了促进阅读的使命,认为"用最少的时间,把最好的图书,传递给最多的读者"是图书馆职业的重要职责[79]。20 世纪上半叶,在弘扬个人自由主义原则,反思纳粹思想控制的基础上,很多西方图书馆员提出,图书馆职业需要承担起维护个人思想自由的使命。20 世纪中叶,随着信息超载(或称信息爆炸)现象日益突出,情报传递使命也被提到议事日程。70 年代以后,随着知识和信息资源的政治经济意义日益显著,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员开始关注他们的职业活动对于维护社会和谐、包容平等的使命。这些与时俱进的职业使命观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

哲学思想，也使图书馆职业活动具有了更强的方向性、主动性和影响力。正如谢拉在评论图书馆职业的教育使命感时所说的："自我教育给予公共图书馆一种不曾有过的、自觉的社会使命。如此定义的使命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毕竟是使命。作为使命，它赋予图书馆巨大的动态性，使其不再被动"[80][原文12]

二、现代图书馆职业的主要使命

1. 保存知识记录、保证知识继承的使命

这是指系统收集人类知识记录，对它们进行保护性贮存（如防火、防潮、防虫、防盗等）以便当代和未来社会能从中获取知识的使命。保存知识记录是社会赋予图书馆的最早的使命。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就是对国家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文书进行保存的机构。尽管后来的很多图书馆也十分重视学术研究和特权教育，但是对文献的物理实体进行保护始终被视为图书馆的基本职责，为此，很多图书馆曾采取极端保守的保护措施（如用链条把图书锁在书架上）。直到印刷技术相当发达，大众阅读能力普遍提高以后，这种极端保守的保护措施才逐渐消失。

现代图书馆职业从一开始就继承了这一使命，而且几乎所有的图书馆哲学思想都强调这一使命的重要性。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巴特勒称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装置，图书馆则是将这种记忆移植到到现代人意识中的一种社会机构。杜定友称图书馆为社会上所有人的脑子。这些学者所强调的都是文献保存与知识继承的统一功能。20 世纪中叶的功利主义图书馆思想曾对历史上极端保守的图书保护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这种极端的保护措施将文献保存当成了目的本身，限制了图书功用性的发挥，但是，即使是比较激进的功利主义图书馆员也不否认保存文献是利用文献的前提。谢拉就曾经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的所有职能都归于保存，因为无论图书馆的保管职能与当代社会的倾向有多大不同，无论我们如何把它标示为辅助职能，保存对于图书馆来说始终是最基础和最必要的。"[81][原文13]

迄今为止，对上述使命感的最严峻的挑战来自数字图书馆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初，面对数字化文献的载体特点和存取方式，图书馆职业第一次对保存知识记录这一古老的使命而感到力不从心。从那时起，图书馆职业已经为解决这一问题

［原文 12］ Self-education gave the public library a conscious social orientation that it had previously lacked-if the goals were not always the best, at least they were goals-and as such they helped to make the library dynamic rather than passive.

［原文 13］ ...in a sence, all functions of the library converge in conservation; for however much the role of custodian runs counter to the more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however much we may embellish it with ancillary objectives, conservation is basic and fundamental to the library.

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发现，尽管问题起源于技术革命，但它的解决却主要依赖于协调社会分工之间的合作和制定合理的政策。出版商的支持和完善的呈缴本法规都有利于图书馆职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履行这一使命[82]。

2. 教育使命

图书馆职业的教育使命是指通过文献传递服务或其他职业活动支持那些自觉的、有目标的教学或学习行为的使命。

教育功能是图书馆的一个古老功能。人类历史上早期的图书馆通常都是王宫和寺院的附属品。它和学校一起坐落于王室成员和神职人员的生活区内。特权阶层往往请来有名的学者做他们的年轻一代的教师，同时兼任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些学者利用图书馆的文献进行学术活动，同时把图书馆积累的知识传授给他们的学生。所以，几乎从一开始，图书馆就与教育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在中世纪时的西方，寺院图书馆曾是培养僧侣的主要场所；在我国封建社会，图书馆是书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图书馆职业一开始就自觉地将大众教育确定为自己的使命，认为图书馆员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教师。这种使命的最积极的倡导者是理想主义图书馆思想和个人自由主义图书馆思想。理想主义图书馆思想坚信好的图书具有内在的教化功能，认为图书馆职业的教育使命就是主动向社会成员提供最好的图书及相关服务，改善他们的知识水平和道德。以下这段为公共图书馆而发表的演说，表现的正是一个理想主义图书馆员对自身教育使命的热情：

> 在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内，会有多少愚昧被消除，多少恶习被戒除，多少沉睡的才智被唤醒，多少唤醒的才智被辅佐、被赋予成效；会在多大程度上使人们更睿智、更明白、更有用、更令人尊重，使整个社会的面貌和风气得到改善[83][原文14]。

个人自由主义图书馆思想坚信个人接受教育的权力以及个人的可教化天性(perfectability)，认为图书馆职业的教育使命就是服务于个人的教育权利，为社会成员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资料和服务。相对而言，功利主义图书馆思想和新自由主义图书馆思想较少强调图书馆职业的教育使命，有些甚至认为教育是图书馆职业拔高自身的使命，分散了图书馆职业对情报传递使命的注意力。虽然这些思想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图书馆职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图书馆实践似乎表明，在

[原文14] How much more ignorance would thus be removed, how much vice reformed, how much slumbering talent awakened, how much awakened talent aided and made efficient. how much done to make many in a high degree intelligent, well informed. useful and respectable citizens, and to correct. improve and elevate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whole community in five, in ten, in twenty, in fifty, in a hundred years.

当代社会，图书馆职业的教育功能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增强[84]。

3. 情报传递使命

根据第一章的定义，情报是被特定用户寻求的、已有了明确接受对象的那部分知识或信息，它表现为具体的事实、消息、定律或原理等，是文献中包含的内容。因而情报传递使命就是指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提供他们需要的情报，以及为实现情报传递而对文献进行深层揭示和分析研究。

早在 19 世纪末，很多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就已经开始从事一定程度的情报传递服务，但图书馆职业作为整体直到二战之后才将情报传递明确为本职业的社会使命。很多社会和职业因素促进了这一使命感的觉醒。首先，战争刺激了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对科研的投资，从而带来了科学技术文献的急剧增长。用户希望从广泛的文献中准确地找到他们所需情报的需求也迅速增强。其次，在美国和欧洲，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逐渐普及，大学迅速成为这些国家或地区重要的科研基地。这使大学图书馆的用户需求与专门的科研机构中的用户需求日趋相似，要求大学图书馆提供与之匹配的情报服务。第三，经过了 50 年的探索，计算机技术被成功地应用于文献处理，不久又被应用于图书馆，为图书馆的深层文献揭示和有针对性的情报传递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此外，20 世纪上半叶，由专业图书馆(special librariy)的工作人员和文献工作者组成的情报职业队伍在图书馆职业之外迅速壮大。美国专业图书馆协会的成员曾以数倍于美国图书馆协会成员的速度增长[85]。他们的壮大把图书馆职业置于一个从未有过的竞争环境中，迫使图书馆职业开始反思自己的使命定义。

功利主义图书馆哲学思想就是适应这样的背景而产生的，因而也是情报传递使命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功利主义图书馆员认为图书馆的文献首先是有用的东西；它有用乃是因为它包含的信息和知识具有功用性。图书馆职业的基本作用就是通过情报交流使文献的功用最大化[86]。在功利主义图书馆思想的影响下，情报传递逐渐成为图书馆职业的基本使命。

过去二十多年的职业变化无疑使这一使命观更加牢固。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使计算机的文献处理能力与日俱增，在数字图书馆中，这样的处理能力意味着快捷的全文检索，用户需要的很多具体事实、消息、知识都可以在浩如烟海的数字化文献中直接找到。这就意味着，至少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图书馆职业所进行的知识传递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情报传递而非文献传递，即使考虑到非技术因素(如用户的阅读习惯、文献实体本身的文化价值)，也很少有人否认，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已经使图书馆职业的情报传递能力空前提高。

4. 促进阅读的使命

阅读行为是图书馆实现其他使命如教育使命、情报传递使命的条件，但是，现代图书馆职业将促进阅读确定为自身使命的真正含义在于，他们把阅读行为视作具有独立意义的文化活动而加以倡导，这就是说，在促进阅读的使命感中，现代图书馆职业已经把阅读行为和习惯的培养当成了最终目的，而不仅仅是实现知识/情报传递的条件。

促进阅读的使命是现代图书馆职业确定的一个新使命。在现代图书馆职业形成之前，图书馆的读者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和接受特权教育的学生。阅读的特权性事实上排除了促进阅读的可能。只有在经过了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以后，阅读之于社会进步的价值才逐渐被人们接受。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诞生的现代图书馆职业才明确提出"要以最小的代价向尽可能多的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图书"[87]。

理想主义图书馆哲学是这一使命的最积极的倡导者。理想主义者认为，图书具有改变读者行为的内在活力，好的图书可以教化、愉悦、激励它的读者。因此，促进阅读就是促进社会的文明、理性、秩序，图书馆职业的神圣职责之一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读者阅读最多最好的书。在一定程度上，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和功利主义图书馆思想也鼓励阅读。自由主义者认为，思想的自由交流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促进阅读也就促进了思想的交流。图书馆员的使命是要向最多的读者提供最广泛的阅读选择。"公共图书馆员的责任是敞开大门并清除一切可能的障碍，以便愿意惠顾的人可以进入。工作人员的任务不仅在于保证图书馆的大门永远敞开，还要让这扇大门具有吸引力"[88][原文15]。功利主义者（如谢拉和阮冈纳赞）则认为，图书是有用的东西，促进阅读是最大程度地发挥图书功用性的途径。所以阮冈纳赞呼吁图书馆员要走街串巷地宣传图书馆的图书[89]。

在这些不同观点的背后，其实存在一个共同的隐含的价值观——通过书面形式表达的思想优于其他形式（如口头）的思想；阅读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如电视文化）。这种对印刷品的价值观在图书馆职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事实上，20世纪后半叶以来，英、美等国图书馆职业队伍所开展的阅读促进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与电视等媒体竞争读者的休闲时间。

不难理解，这种价值观与使命感的结合在数字化时代会出现很多困惑。在数字化时代，到底什么样的活动构成阅读活动？一个沉迷于网上冲浪的少年是不是

[原文15] 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public librarian to keep the door open and to see that no stumbling block lies in the way of those who would enter...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operating personnel not only to see that the open door shall remain open, but also that it shall be inviting.

在"读"网？是不是在"读书"？一份因其图像和声音而吸引了读者的多媒体图书是不是被阅读了？图书馆职业队伍应该促进的是哪一类阅读？目前，图书馆职业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还不明朗，但是英国的《图书馆协会通讯》("*Library Association Record*"，现已更名 Update)、美国的《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上所介绍的阅读促进活动似乎还在沿着传统的价值观进行。

5．促进和谐、包容、平等社会的使命(social cohesion、social inclusion、social equity)

和谐、包容、平等是人们对理想的社会状态的描述。它们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和谐强调的是秩序以及处于该秩序中的社会各阶层间的相互依存、和睦共处；包容强调的是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平等强调的则是机会、利益的平等。现代图书馆职业很早就认识到图书馆对于社会的秩序、和谐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理想主义图书馆思想坚信阅读好的图书可以净化心灵、弘扬理性；而心灵的净化会促进和谐，理性的弘扬会带来秩序。哈里斯认为，正是看到了图书馆对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自然作用，美国波士顿的富裕阶层才积极地推动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建立[90]。

图书馆职业明确地把促进社会的和谐、包容、平等确定为自身的使命则是相对近期的事情。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英、美图书馆职业队伍曾以"社会责任"的讨论触及社会包容与平等的主题；又以"社区图书馆服务"(Community Librarianship)的形式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90 年代，面对在"信息高速公路"中日益加剧的数字鸿沟，英、美图书馆职业又率先阐述了图书馆职业在数字化时代承担的社会和谐、包容、平等的使命[91,92]。"如果无偿使用的原则要得以维持，那么图书馆界就得更有力地证明图书馆是真正的公共财富，它的服务能真正达到各种收费服务所不及的社会弱势群体，而不是利用公共经费为少数经济和文化的富有者谋利益的文化资源"[93][原文16]。1999 年英国的文化、体育与传媒部出版的《所有人的图书馆——社会包容政策指南》曾这样评论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包容的关系：

> 如果[社区的]信息流量降低到某个关键水平以下，则本地的信息生态就会变脆弱，"信息停滞"就会产生。[人口中]相互觉得面熟的比例就会降低，信息交换和共享就会停止……邻里环境就会萎缩。在这种背景下，重要的是帮助社区建立起健康的非正式交流条件，让信息交换繁荣起来。这时，让社区居

[原文 16] ...if the principle of free access is to be retained. then the library world will have to be better equipped at demonstrating that it is a genuine public good, that its services do reach some of the most disadvantaged sections of the community that a charged-for service would not, and that it is not an instrument by which cultural resources are paid for out of the public purse for the benefit of a minority who are already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privleged.

民有一个[像公共图书馆这样]方便的、临近的、亲切的去处就变得十分重要[94][原文17]。

这种使命感的最积极的倡导者是社会主义图书馆哲学。如前所述，这种思想认为，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信息日益成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这就意味着，作为资源，信息领域本身已经成为社会冲突、排斥、不平等的阵地[95,96,97,98]。社会主义图书馆哲学思想坚信，具有悠久公共财富传统的图书馆职业对维护社会和谐、包容、平等担负着重要的职责。

第三节　图书馆职业价值观及道德规范

一、图书馆职业价值观

试图正式地、科学地定义“价值观”的尝试有很多，但是简单地说，价值观就是个人或群体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所信奉的原则、信念、标准等[99,100]。

图书馆职业的价值观是图书馆职业对事物的好与坏，善与恶进行判断的原则、标准和信念。它既不是所有图书馆专业人员个人价值观的总和，也不是个人价值观中共享的部分，而是图书馆专业人员在专业活动场合(如各类型图书馆、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会议等)经过交流、讨论、实践而形成的、被大多数从业人员接受的价值观。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构成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原则、标准和信念来自很多方面，主要包括从业人员的个人价值观、图书馆职业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图书馆上级主管部门的价值观、相关利益群体(如用户、出版商、图书馆代理商；图书馆设备提供商等)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不同社会的图书馆职业价值观，如中、美图书馆职业价值观，往往会存在很大差别，任何国际范围的交流和合作都需要意识到这种差别的存在。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形成同时还意味着，在有些时候，图书馆专业人员个人的价值观可能与职业整体的价值观存在差异甚至冲突。服从职业价值观是图书馆职业对个体专业人员的基本要求。例如，一个图书馆员不能因为自己是一个动物保护者而拒绝购买以动物为实验品的医学图书。

由于构成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原则和信念来自很多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冲击图书馆职业已经建立的价值观。当这种冲击出现的时候，图书馆职

[原文17]　If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drops below certain critical levels, the local information ecology is vulnerable and ‘information stagnation’ sets in. Levels of face-recognition drop significantly, people stop receiving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relatively little information enters or leaves the locality, and the neighborhood could begin to atrophy. In such a context, the challenge is to help establish and sustain healthy conditions in which inform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can flourish.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vitally important for communities to have a place to go to that is convenient, local and unintimidating.

业的一部分人(保守者)会试图维护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并根据已有的价值观抵御来自图书馆职业自身和外部的冲击;另一部分人(维新者)则会要求图书馆职业做出反应,改变已有的价值观。在具体背景下,究竟是保守的立场还是维新的立场有利于图书馆的长远发展不能一概而论,但不管怎样,冲击的结果都可能导致图书馆价值观的某种冲突。解决冲突、寻求共识的过程就构成了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演化过程。

二、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演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图书馆职业不是在它形成之后才开始确定其职业价值观的,相反,它带着特定的价值观而生。在18、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确立,资产阶级已经拥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与教会和政府争夺政治势力,因而对不受政府或教会操纵的独立的文化活动(包括由公民税收支持的公共图书馆运动)大力扶持,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意义的图书馆的成熟和现代图书馆职业的出现。因此,现代图书馆职业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反映着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现代图书馆职业的最早的领导者(如杜威、爱德华兹)都是深受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价值观——理性、秩序、科学、真理——影响的图书馆活动家,他们也是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最早的陈述者,因而,现代图书馆职业从产生之时就带着资产阶级启蒙主义价值观的深深烙印。理想主义图书馆思想的价值观(如爱书、爱知识)正是这种启蒙主义价值观在图书馆领域的表达。

图书馆职业的价值观虽然是与生俱来的,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前所述,由于构成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原则和信念来自很多方面,职业价值观的冲突往往难以避免,从而导致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经常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第一次大的冲突,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对理想主义价值观的挑战。与理想主义强调通过图书改造个人、教化个人,从而改善社会的观念不同,个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人的自由个性和个人权利。在图书馆领域,他们强调尊重读者自由选择图书的权力,强调图书馆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反对图书馆员根据自己的判断标准推荐图书,更反对任何形式的图书审查。在美国,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与理想主义价值观的冲突到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发展为以"社会责任"为题的全国性大辩论[101]。在这场讨论中,自由主义者认为图书馆职业的社会责任在于维护所有人使用信息的平等、自由权利;理想主义者认为图书馆职业的社会责任在于向社会成员提供好的、有价值的文献,使其免受无用甚至有害信息的纷扰。

现代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第二次较大的冲突是技术功利主义对理想主义、个人自由主义、甚至人文功利主义的挑战。受通讯技术和申农信息论的影响,技术功利主义认为信息是可以被客观传递、客观观察、客观测度的"物"。与以前的图书馆

职业价值观强调人性及人的作用不同，技术功利主义强调这种“物”的功用性，强调通讯技术是最大程度地实现其功用性的途径。如前所述，这一冲突构成了“图书馆服务范式”和“信息范式”之争的焦点。

图书馆价值观的第三次较大冲突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价值观对公共财富价值观的挑战。现代图书馆职业的理想主义、个人自由主义、人文功利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大都认为知识和信息对于社会进步和个人生活至关重要，图书馆职业必须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获取其所需的知识和信息，不受经济能力和其他能力的限制。为此，图书馆职业所传递的知识和信息，应该被视作公共财富。与此观念相反，市场价值观认为，信息是商品，市场是实现信息传递的最佳途径。一切知识和信息，包括图书馆职业组织整理的知识和信息，都应该按市场机制，有偿获取。关于“无偿”与“有偿”的大辩论就集中体现了这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前者认为，一切图书馆服务，包括以现代技术为支撑的服务都应该由公共开支支持，向社会成员无偿提供；后者则认为图书馆服务应该按市场机制运作，向其使用者有偿提供。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图书馆服务应该部分地由公共开支支持，部分地按市场机制运作。

目前，不仅上述价值观的冲突还在继续，新的变化又在引发新的冲突。例如，关于是否应该对互联网上的信息进行审查、过滤以阻止色情、暴力等有害资源流向儿童等脆弱群体，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图书馆职业队伍争论的焦点。面对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冲突，1998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专门组成了“图书馆价值观工作组”，希望确定出美国图书馆职业统一的价值观。2000 年，在图书馆协会的 119 届年会上，该工作组起草的“价值观声明”引起了巨大争议，这次寻求统一的职业价值观的努力不得不宣告搁浅。

三、现代图书馆职业主要价值观

1. 注重服务和人文关怀

注重服务和人文关怀的价值观事实上包含了一组相互关联的职业信念。首先，它坚信图书馆职业与其他服务性职业一样，通过服务于个人，对社会的福利安康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其次，它坚信个人和社会的福利安康是图书馆职业的最终目标；赢利或其他个人利益，无论对个体图书馆专业人员如何重要，都不是图书馆职业的最高目标，这是图书馆职业区别于经营性行业的重要特征。第三，坚信人是图书馆职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认为人的理性、尊严、隐私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人的需要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关心和帮助。

注重服务和人文关怀是很多图书馆哲学共享的信念。理想主义图书馆思想坚信，图书馆服务可以给个人带来教化、愉悦、美感，从而帮助个人改善自己的能力和生活质量，帮助社会营建秩序和文明。个人自由主义图书馆思想坚信，图书馆服务可以向个人提供他们需要的思想，从而可以帮助个人维护自己的权利，帮助社会营

建民主、自由。人文功利主义图书馆思想则坚信,图书馆服务可以满足个人生活、工作中产生的情报需求,从而帮助个人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和途径,帮助社会实现其知识和信息的最大功用。可见,尽管不同的图书馆哲学思想对于什么是图书馆职业的基本使命和价值的认识有所不同,但对于服务是图书馆实现其使命和价值的基本途径,他们的认识却是一致的。

2. 尊重理性、知识、真理,尊重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

理性是对事实和经验做出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是与感觉、感知、经验等相对的概念;知识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运动形态和规律的认识和见解;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对理性、知识和真理的尊重曾经是启蒙运动反对神秘的宗教信仰和教会控制的重要武器,也是启蒙运动建立的重要的价值观。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理想主义图书馆员是这一价值观的最坚定的维护者。在图书馆实践中,它要求图书馆员尽职地保护人类知识的记录,最大程度地传播人类知识,向最广泛的用户提供准确的信息,全力支持用户学习和创造知识的努力。同时它也要求图书馆人员在探索本职业的问题时能够严肃、理性地进行研究。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尽管这种价值观受到比较偏激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但它依然是图书馆职业队伍秉承的主要信念之一。

3. 热爱图书、倡导阅读

对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图书馆职业人员来说,热爱图书就是热爱以文字形式表达的人类知识记录和文化记录,特别是印刷式的记录。这种价值观曾得到理想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图书馆思想的共同提倡,所不同的是理想主义所热爱的图书是那些严肃、高雅的图书,倡导的是有教化意义的阅读。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的相当长时期里,这种信念曾促使很多理想主义的图书馆员不遗余力地向读者推荐他们认为好的图书,也使很多人试图遏止通俗类读物(如小说)的流通。

个人自由主义也是“爱书”价值观的倡导者,但是,在阅读问题上,他们认为,读者有权满足自己的任何阅读兴趣,他们也有能力为自己的阅读兴趣选择合适的图书。凡是用户喜欢的图书都应该收集,用户决定的阅读,不管是为学习,为娱乐,还是为感情寄托,都应该倡导。如前所述,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个人自由主义的“热爱图书、提倡阅读”的价值观在西方图书馆界已占据主要地位,其标志就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对《图书馆权利法案》(“*Library Bill Of Rights*”)的采纳[102]。

4. 主张社会成员享有使用图书馆服务的平等权利

这一价值观认为,每个社会成员,不管其年龄、性别、宗教信仰、生理条件、经济能力、社会地位如何,都享有使用图书馆服务的平等权利。这并不是说所有类型的

具体图书馆都需要向全社会开放，而是强调，任何社会成员，不管其自身条件如何，都有权力在他(她)认为需要或适当的时候，得到图书馆职业的服务。

自现代图书馆职业诞生以来，这一观念一直受到多数图书馆哲学思想，如理想主义、个人自由主义、人文功利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图书馆思想的倡导。理想主义认为，图书馆职业只有将人类知识平等地传播给每一个社会成员，才可以通过教化个人来维护和发展整个人类文明；个人自由主义认为，平等使用图书馆服务的权力是维护人类思想自由的基本条件；人文功利主义认为，图书馆是教育的工具，而教育是每个人享有的平等权利，所以，图书馆服务也应该是每个人享有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图书馆哲学则认为，信息的分化是信息社会重要的政治问题，维护社会成员使用图书馆的平等权利关乎信息社会的平等与公正。

5. 倡导合作和技术创新

合作精神是指图书馆之间本着互助互利原则，互通有无，共享资源的精神。整个 20 世纪，随着文献数量和价格的增长，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图书馆合作的内容之广、形式之多，很少职业能与之相比。对合作精神的关注是大多数图书馆哲学的共同的价值观。理想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图书馆哲学相信知识和信息是可以共享的财富，功利主义则相信合作是最大程度地开发知识和信息功用性的途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倡图书馆间的合作。

技术创新精神指图书馆职业积极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效率，改善服务的精神。图书馆自古以来就是信息技术进步（从造纸、印刷到缩微技术和复印技术）的最早见证者，20 世纪的图书馆职业队伍更是表现出极大的应用最新技术的热情——60 年代末研制机读目录格式(MARC)，60～70 年代引进大型联机数据库，80 年代开始集成化图书馆系统，90 年代开发数字图书馆，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图书馆职业对新技术的反应可谓非常迅速。

现代图书馆职业对于技术创新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功利主义图书馆哲学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功用性是知识、信息、文献以及图书馆的基本特性，图书馆职业的职责就是最大程度地实现这些事物的功用，而技术的应用正是最大程度地开发其功用的有效途径。在这一点上，就连反对技术功利主义和“信息范式”的学者，如美国图书馆学家瑞蒙德都认为，“信息范式”的技术创新精神是图书馆职业应该学习的方面。

6. 倡导宽容、公正

宽容是指图书馆职业承认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会出现歪曲、片面甚至错误的知识，承认图书馆职业的判断力经常不能识别这些歪曲和错误，因而在任何时候，图书馆职业都要能够容纳代表不同见解、立场、文化背景的文献资料和用户。公正

则是指给予所有文献公平的处理和揭示；给予所有用户公平的服务和关爱。

四、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

职业道德规范（codes of ethics or codes of conduct）是指图书馆职业团体或政府部门制定的、为图书馆职业提供行为准则的成文规定。制定职业道德规范的目的是指导职业实践中的行为，帮助从业人员明确职责范围及其优先次序，帮助整个职业维护其质量、信誉和地位。职业道德规范应该体现出图书馆职业秉承的价值观，但它比价值观更具体、更具约束力。

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一般涉及以下方面：①图书馆专业人员对知识、信息、文献的行为规范，如反对或拥护对文献资料的审查；②对用户的行为规范，如视用户的合法要求高于管理的需要，尊重用户的隐私权等；③对职业整体的行为规范，如必须不懈地从事继续教育以维护职业整体的信誉和水平；④对所在的图书馆及其母体机构的行为规范，如必须履行与单位签订的合同等。

例如，在前英国图书馆协会（现改为注册图书馆员及情报专业人员协会）制定的会员行为规范中，包含以下职业道德规定[103]：

(1) 协会会员的首要职责是服务用户，用户的合法要求高于其他利益。

(2) 除非涉及保密责任，对于用户有权获取的信息，会员有义务帮助用户获取，会员有义务保护用户平等、自由地获取信息的权力。

(3) 会员必须尽力履行与雇佣单位签订的合同，当会员发现公众利益和职业声誉与雇佣单位利益冲突时，应该首先考虑公众利益和职业声誉。

(4) 会员不得有意推荐带有歧视性倾向的文献资料（种族歧视、肤色歧视、信仰歧视、性别或性别取向歧视）。

(5) 除非依照法律的要求，不得向他人泄露或允许泄露他们承诺保密的任何形式的资料，或未经允许将这些资料用于其他目的。

(6) 会员的行为和决定只能出于职业判断，不得利用职务牟取私利。

(7) 会员如果被发现不诚实或会员行为引起了对整个职业的争议，会员必须向协会如实报告事实。

第四节　图书馆职业的认识论基础

一、认识论与图书馆职业

如本章第一节所述，认识论是哲学的基本分支之一，它是关于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过程、知识的性质、知识成立的标准等问题的学说。认识论关注的问题使它至少在两个方面与图书馆职业存在密切联系。首先，图书馆职业是对人类知识及其载体进行组织、整理和传递的职业，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职业化地“看待”人类知

识及其载体，如同医生需要职业化地“看待”人体。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无论是在众多的出版物中选择馆藏文献，还是对网上资源进行评价、筛选，图书馆员都必须了解形成这些文献的认识过程、对文献内容进行评价的标准以及这些文献将如何作用于其用户的认知过程等。所有这些都已经触及认识论范畴。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赖特(Wright)等图书馆学者把图书馆员称为“研究哲学家”并进而将图书馆学与哲学视为一体。“从本质上来说，图书馆员是研究哲学家而非研究者。他们必须明白科学研究的结构，因为他们的基本功能就是照顾其他人的研究兴趣，他们的管理功能和他们自身的学术功能都是为了服务于这一基本功能”[104][原文18]。

其次，图书馆职业自身的研究活动，即图书馆学研究，构成了人类知识创新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如何组织研究活动，如何设计研究方法，如何通过研究过程形成职业理论，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知识加以“声称”，图书馆职业团体如何对个体研究者的“知识声称”进行评价，所有这一切无不贯穿着认识论的指导作用。

现代图书馆职业诞生于实证主义认识论最盛行的时代，因而受到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深刻影响。但是，图书馆职业的理想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又使它表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使它对非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也比较接纳。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和以非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性研究方法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方法论”大论战，就彼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弱点进行了批判。随着这场论战的深入，图书馆职业也开始了对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反思，非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影响因此得以传播。当代图书馆职业在很多时候都体现着实证主义认识论和非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双重影响。

二、实证主义认识论

实证主义认识论(positivism)萌芽于英国牛顿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哲学，后经 19 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发展而成为成熟的哲学。至 20 世纪上半叶，经过欧美等哲学家的修正、发展以及广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的实践，实证主义不仅成为自然科学领域，也是社会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认识论[105]。

实证主义认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

(1) 存在一个独立于研究主体之外的客观世界。

[原文 18] Librarians are essentially the philosophers of research, not the researchers. They must therefore know the structure of inquiry, because their primary function is to attend to the research interests of other people. The administrative and scholarly functions of librarians, furthermore, are merely instrumental to their primary function.

(2) 存在一个稳定、一致、有认知能力的自我，即认识主体。

(3) 认识主体能够依赖经验观察和理性推论，客观地揭示客观世界规律，这种研究客观世界规律的活动就是科学研究。

(4) 科学研究的有效方式就是自然科学采用的定量法。定量法不仅适用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也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

(5)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因而要求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独立于研究客体之外，保持客观、中立，即必须排除先入为主的判断和价值取向。

(6) 语言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载体，能够合理、客观、忠实地表述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现代图书馆职业形成于实证主义认识论上升之时，无论是图书馆的实践人员，还是图书馆学的研究人员都受到这种认识论的深刻影响。尽管实证主义认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影响了图书馆职业的实践，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但是，正如雷德福(Radford)评论的[106]，即使是随意的观察，也足以发现实证主义认识论在图书馆职业中留下的深刻印记。例如：

(1) 图书馆职业所采用的概念体系。20 世纪上半叶以前，图书馆职业的基本概念体系，如知识、信息、图书、文献、用户，几乎都建立在知识是客观的这一假定之上。德尔文在批评这种定义时说，图书馆职业把信息当成了客观的物，把用户的头脑当成了空净的竹篮，以为这个“竹篮”可以原原本本地装载倾入其中的信息[107]。对文献的理解也基于同样的假定，认为文献是作者思想的忠实记载，图书馆职业通过传递文献，就可以实现知识创造者与知识利用者之间的交流[108]。

(2) 关于图书馆存在意义及使命的理解。无论是将图书馆理解为移植人类记忆的设施[109]，还是沟通人类知识记录与用户的交流机构[110]，图书馆的存在意义都依赖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实证主义观点：首先，科学研究是不断探索客观世界规律的活动，从科学研究中得出的知识可以积累和继承，通过代代不息的探索和知识积累，人类知识就能不断地接近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不断接近真理。其次，语言记录能够忠实地再现知识，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和语言作为反映物的忠实性有如不变的港湾和可靠的船锚，维系着文献这一知识之舟的永恒价值。正是这样的实证主义观点，使图书馆作为收集知识的场所和过去文明的见证的意义能被人们广泛认同。

(3) 图书馆职业的价值观。不仅尊重科学、知识、真理以及保持客观、公正、中立的职业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影响，而且注重服务等价值观也与实证主义认识论不无关系[111]。如前所述，注重服务的价值观的实质是强调图书馆职业为了用户和社会的利益，应该最大程度地辅助用户对已有知识的获取，这就隐含了知识需要继承，知识可以继承，知识可以在知识生产者、图书馆员和知识利用者之间基于共同的理解进行传递的假定；也隐含了图书馆员在知识和信

息的组织整理方面优于用户的假定。在德尔文和雷德福等学者看来，这些都是源于实证主义认识论优于用户的假定。

(4) 图书馆的工作方法。现代图书馆职业的工作原理基本上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我们可以对人类知识进行划分，可以对作者的思想进行二次描述，也可以据此对文献进行组织，使之形成秩序井然、等级清晰的目录体系和文献体系。同样，语言（如关键词、主题词）可以客观、真实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描述文献内容，从而成为连接文献创作过程、知识组织整理过程、知识检索与利用过程，即沟通作者、馆员、和用户的桥梁。在雷德福（Radford）看来，这些职业假定事实上都体现着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影响[112]。

(5) 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图书馆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最大的图书馆学研究基地是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该学院聚集了一批深受实证主义传统影响的学者，使早期的图书馆学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如采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研究阅读行为和习惯。尽管当时就有不少学者和图书馆员认为这样的方法对于图书馆学这样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领域来说过分“科学化”了，但是，定量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还是渐成传统，并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

三、非实证主义认识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论战中，图书馆专业人员也开始了对实证主义认识论传统的反思。实证主义的批评者（如美国学者德尔文、兹维基格）认为，实证主义在图书馆界根深蒂固的影响，使现代图书馆职业对知识和信息的认识、对知识和信息组织方法的设计、对知识和信息用户的态度都存在着很多偏差。在德尔文和兹维基格等学者看来，这些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图书馆职业把知识视作对客观世界的如实的反映，忽略了认识过程的动态建构性和不完整性（Discontinuity）[113]；第二，图书馆职业把自身视作客观、中立的职业团体不符合科学交流系统固有的、内在的权势性和倾向性[114]；第三，图书馆职业把作品当成作者思想的忠实的记载，把图书馆职业对作品的二次描述当成作品内容的有效揭示，忽略了语言作为反映物的局限性[115]；第四，图书馆职业把用户划分为具有共性的群体，并按群体的共性设计服务，忽略了用户及其所处环境的特殊性[116,117]；第五，图书馆学研究者把自己视作可以独立于研究对象之外的研究主体，背离了研究主体的特征。在德尔文等学者看来，上述实证主义的影响极大地限制了图书馆功能的发挥，使现代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与用户的实际需求无关的机构[118,119]。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反思，一些非实证主义认识论，如建构主义、相对主义等，开始对西方图书馆职业的实践活动和研究活动产生

影响。关于非实证主义对图书馆职业的改变,目前还不存在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是,以下方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实证主义的影响:

(1) 20 世纪后期,随着非实证主义学者(如雷德福、哈里斯)对西方图书馆职业长期声称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提出质疑,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员开始接受并正视图书馆职业的倾向性[120]。很多西方图书馆员不再把政治倾向性视作现代图书馆职业的消极的、负面的特征,而是把它视作一项积极的、动态性特征。例如,怀特(White)和哈里斯都强调,图书馆职业应该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营建良好的图书馆发展环境[121,122]。

(2)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由于德尔文、兹维基格(Zweizig)等人对传统用户服务理念的批评,"用户中心论"的服务理念在图书馆界牢固地树立起来[123]。这种理念的基本特征包括:关注用户个性和他们所处的环境;采用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Naturalistic Inquiry),即定性的研究方法形成对用户需求的深入理解;根据用户需求设计用户服务和情报系统,从而使图书馆工作、图书馆管理和情报系统适应用户的要求,而不是让用户适应图书馆的安排和系统的设计。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虽然德尔文和兹维基格在用户研究中采用的建构主义思路还经常引起争议,但是,他们确立的用户中心论思想毕竟开启了用户服务理念的新时代。

(3) 根据英国图书馆学家布莱克(Black)的分析,除了"用户中心论"外,20 世纪后半叶西方图书馆职业的很多其他理念,如强调文化产品平等地位的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否定图书馆员的职业评判标准的相对主义倾向等都体现着非实证主义的影响。布莱克认为,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馆藏文献过度迎合"市场"口味的现象[124]。

(4) 如前所述,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早在 40 年代,著名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就已经开始对这种研究传统进行反思,认为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一种过度的实证主义热情[125]。70 年代以后,出现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更加深了图书馆学对自身研究方法的反思。随着这种反思的深入,定量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统治地位也开始动摇,各种定性方法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在有些领域,定性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更重要的方法,这不能不说是非实证主义认识论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一种胜利。

参 考 文 献

1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1470

2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2

3 Broadfield A. A philosophy of librarianship. London: Grafton, 1949

4 Schiller H, Schiller A. Libraries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erce. In: Mosco V, Wasko J,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146～166
5 McColvin, Lionel R. The faith of a librarian. Indian Librarian, 1949. 1～16
6 阮冈纳赞,夏云等译.图书馆学五定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7 Nitecki Z. Metalibrarianship: A model for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1993. http://www.du.edu/LIS/collab/library/nitecki (2002/5/23 查阅)
8 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9 王海明,孙英.几个伦理学难题之我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76～73
10 Metuchen N J, Marion. Library school closings: four case studies. Paris: Scarecrow Press, 1988
11 Butler P.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In: John V, Richardson Jr. The gospel of scholarship: Pierce Butler and a critique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Metuchen N J: Scarecrow Press, 1992
12 Nitecki J Z. Metalibrarianship: a model for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1993. http://www.du.edu/LIS/collab/library/nitecki
13 Rogers A R, McChesney, Kathryn. The library in society. In: Littleton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84
14 Rubin R.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Neal-Schuman Publishers, 1998
15 南开大学.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285
16 诺德.关于创见图书馆的意见书. 见:袁咏秋,李家乔.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26～238,229
17 诺德.关于创见图书馆的意见书.见:袁咏秋,李家乔.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26～238,230
18 诺德.关于创见图书馆的意见书.见:袁咏秋,李家乔.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26～238, 232
19 南开大学.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89
21 Sturgess P. Conceptulizing the public library 1850～1919. In: Kinnell M, Sturgess P, ed.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library: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 institution.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1996. 29～47,31
22 Wiegand W A. 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What the past tells us about the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9, 69(1): 1～31,3
23 黄纯元.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
24 Nitecki J Z. Metalibrarianship: A model for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1993. http://www.du.edu/LIS/collab/library/nitecki(2002/5/23 查阅)
25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6 汪康平. 引自南开大学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112
27 Nitecki J Z. Metalibrarianship: A model for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1993. http://www.du.edu/LIS/collab/library/nitecki(2002/5/23 查阅)
28 Danton J P. Plea for a philosophy of librarianship. Library Quarterly, 1934, 4: 527～551
29 Butler P.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In: John V, Richardson Jr. The gospel of scholarship: pierce butler and a critique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Metuchen N J: Scarecrow Press, 1992
30 Richardson, Cushing E. The book and the person who knows the book. ALA Bulletin, 1927. 21: 289～295
31 Birdsall W F. The myth of the electronic library: librarian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4

32 Butler P.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In: John V, Richardson Jr. The gospel of scholarship: pierce butler and a critique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Metuchcn N J: Scarecrow Press, 1992

33 Butler P. 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librarianship. Library Quarterly, 1945, 15(October):347~351

34 Butler P. 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of librarianship. Library Quarterly, 1945, 15(October):347~351

35 McColvin, Lionel R. The faith of a librarian. Indian Librarian, 1949.4, 1~16

36 杜定友.图书馆学的内容与方法.教育杂志,1926,18(9)

37 杜定友.研究图书馆学的心得.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1928,1(1)

38 杜定友.图书馆管理方法之新观点.浙江图书馆月刊,1932,1(9)

39 刘国均.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新教育,1923,7(1).见:刘国均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40 刘国均.近代图书馆之性质与功用.金陵光,1921,12(2).见:刘国均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41 Wiegand W A. 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what the past tells us about the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9, 69 (1): 1~32,32

42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2.9

43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2.108

44 Shera J. Social epistemology, general Semantics and librarianship.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1961.35: 139

45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2.164,194

46 Rogers A R, McChesney K. The library in society. Littleton,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84

47 阮冈纳赞著,夏云等译.图书馆学五定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48 黄宗忠. 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 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62(2)

49 Rodger J. Core Values: our common ground, American Libraries, 1998, 29(9)

50 UKOLN. An introduction to filtering: issue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1999. http://www.ukoln.ac.uk/public/present/lis-99/lis-filtering/(2003/3/9 查阅).

51 Gorman M. New libraries, old values.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1999, 48 (1)

52 Buckland M. Redesigning library services: a manifesto.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2. http://sunsite.berkeley.edu/Literature/Library/Redesiging/preface.html (2003/3/18 查阅)

53 Ingwersen P.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ontext. In: Olaisen J. Erland M P, Wilson P, ed.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to social interaction.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69~111

54 Dervin B. Useful theory for librarianship: communication, not information. Drexel Library Quarterly, 1977, 13 (3): 16~32

55 Dervin B. An overview of sense-making research: concepts, methods, and results to dat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Dallas, Texas, USA. 1983

56 Dervin B. In: Neills D. Dilemmas in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exploring the boundarie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

57 福柯著. 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58 Radford G P. Positivism, foucault, and the fantasia of the library, conceptions of knowledge and the modern library experience. Library Quarterly, 1992, 62: 408~24

59 Feather. J.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 study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1998

60 Harris M, Stan H. Into the Future: the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Greenwich, Conn: Ablex Pub, 1998,60

61 兰卡斯特 F W 著. 郑登理,陈珍成译. 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

62 Harris M, Stan H. Into the Future: the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Greenwich, Conn: Ablex Pub, 1998. 128

63 Harris M, Stan H. Into the Future: the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Greenwich, Conn: Ablex Pub, 1998. 49

64 Schiller H. Schiller A. Libraries,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erce. In: Mosco V, Wasko J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146~166

65 Dalton M S. Old values for the new information age. Library Journal, 2000, 125 (18): 43~47

66 Birdsall W F. The myth of the electronic library: librarian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4

67 Harris M, Stan H. Into the Future: the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Greenwich, Conn: Ablex Pub, 1998,125,120

68 Berring R. Raymond B. Paradigms in conflict. In: Apostle R, Raymond B. Librarianship and the information paradigm.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7. 3

69 Raymond B. Paradigms in conflict. In: Apostle R, Raymond B. Librarianship and the information paradigm.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7. 1

70 Lancaster F W. In: Harris M, Stan H. Into the Future: the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Greenwich, Conn: Ablex Pub, 1998. 48

71 Molholt. In Harris M, Stan. Into the Future: the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Greenwich, Conn: Ablex Pub. , 1998. 48

72 Surprenant. In: Harris M, Stan H. Into the Future: the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Greenwich, Conn: Ablex Pub, 1998. 49

73 Raymond B. Paradigms in conflict. In: Apostle R. Raymond B. Librarianship and the information paradigm.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1997

74 Macintyre S. Librarie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 Libraries: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proceedings of the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2nd Biennial Conference,1992: 195~198

75 Birdsall W F. The myth of the electronic library: librarian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4

76 Robbins J B. Curriculum reform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Roy L, Sheldon E, e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rndon, Virginia: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17~32

77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2. 107,103

78 Dewey. In: Nardini R F. A Search for meaning: American library metaphors, 1876~1926,Library Quarterly, 2001, 71(2): 111~140

79 Dewey. In Wiegand W A. 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what the past tells us about the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9, 69(1): 1~31

80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New York: Wiley, 1972. 150

81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2. 139

82 Woodyard D. Digital preservation at the British Library. Update. 2002(2): 36~38

83 Wright. Cited in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2, 144

84 Kerslake E, Kinnell M.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public libraries and social inclusion. Libri 48 (1), 1998:1～12

85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2.

86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2.194

87 Dewey. In Wiegand W A. 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What the past tells us about the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9, 69(1): 1～31

88 Johnson. In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2.157

89 阮冈纳赞著,夏云等译.图书馆学五定律.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90 Harris M. The Purpose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A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ibrary journal, 1973: 2

91 Kerslake E, Kinnell M.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public libraries and social inclusion. Libri,1998, 48(1):1～12

92 Dalton M S. Old values for the new information age. Library Journal, 2000, 125 (18): 43～47

93 Greenhalgh Liz. Libraries in a world of cultural change. London: UCL Press, 1995,30

94 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Libraries for all: Social inclusion in public libraries. London: 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1999,10

95 Schiller H, Schiller A. Libraries,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erce. In: V. Mosco V, Wask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146～166

96 Schiller H I. The context of our work. In: Nordenstreng K, Schiller H J, ed.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3: 465～471

97 Schiller D. From Culture to Information and Back Again: Commoditization as a Route to Knowledg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994(11): 93～115

98 Feather J.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 study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2nd ed,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1998

99 杨宜音. 社会心里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中国社会科学,1998(2):82～93

100 Gorman M. New libraries, old values.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1999, 48(1):43～52

101 Rogers A R, McChesney K. The library in society. Littleton,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84

102 黄纯元. 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

103 Library Associatioin. The Library Association's 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http://www.la-hq.org.uk/directory/about/conduct.html(2003/3/18 查阅)

104 Wright H C. Inquiry in science and librarianship.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Philosophy, and Comparative Librarianship,1978,13 (Summer): 250～264

105 沃野.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学术研究,1998(7): 32～37

106 Radford G P. Positivism, Foucault, and the Fantasia of the Library: Conceptions of Knowledge and the Modern Library Experience. Library Quarterly,1992(62): 408～424

107 Dervin B. On studying information seeking methodologically: the implications of connecting metatheory to metho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1999 (35): 727～750

108 黄纯元.黄纯元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集.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

109 Butler P.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In: Richardson J V, Jr. The gospel of scholarship: Pierce Butler and a critique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92

110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New York: Wiley, 1972

111 Radford G P. Positivism, foucault, and the fantasia of the Library: conceptions of knowledge and the modern library experience. Library Quarterly, 1992(62): 408～424

112 Radford G P. Positivism, Foucault, and the Fantasia of the Library: conceptions of knowledge and the modern library experience. Library Quarterly, 1992(62): 408～424.

113 Dervin B. Useful theory for librarianship: communication, not information. Drexel Library Quarterly, 1977, 13 (3): 16～32

114 Radford G P. Positivism, Foucault, and the Fantasia of the Library: Conceptions of Knowledge and the modern library experience. Library Quarterly, 1992(62): 408～424

115 Radford G P. Positivism, Foucault, and the Fantasia of the Library: Conceptions of Knowledge and the modern library experience. Library Quarterly, 1992(62): 408～424

116 Dervin B. Useful theory for librarianship: Communication, not information. Drexel Library Quarterly, 1977, 13 (3): 16～32

117 Zweizig D, Dervin B. Public library use, users, uses: Advances in knowledg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he adult clientele of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In: Voigt M J, Harris M H, ed.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231～255

118 Dervin B. Useful theory for librarianship: Communication, not information. Drexel Library Quarterly, 1977, 13 (3): 16～32

119 Derwin B. How libraries help. Sacramento: California State Library, 1985

120 Wiegand W A. 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What the past tells us about the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9, 69 (1): 1, 32

121 White H S. Librarianship-accept the status quo or leave it? Library Journal, 1991, 116 (7):68

122 White H S. Librarianship-quo vadis?: opportunities and dangers as we face the new millennium. Englewood,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2000

123 Dalrymple P W. A quarter century of user-centered study: The impact of Zweizig and Dervin on LIS research.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01(23): 155～165

124 Black A, Muddiman D.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librarianship: the public library in post-modern Britain.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rookfield, 1997

125 Buttler. In: Harris M H. The dialectic of defeat: antinomies in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Trends, 1986(34): 515～534

索　引

J

K

L

M

N

Q

R

S